



王志安

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王志安

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版权声明

Copyright Notice

版权 © 2024 王志安。保留所有权利。本电子书及其中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像、图表和图表）均受版权法和国际版权条约的保护。未经王志安先生（以下简称“版权所有者”）明确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式（电子、机械、通过复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存储在检索系统中、传播、转载、下载、分发或商业利用。

Copyright © 2024 by Wang Zhia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Book and its cont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ext, images, charts, and graphs) ar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and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treatie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transmitted, reprinted, downloaded, distributed, or commercially exploi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Mr. Wang Zhian, herein referred to as the “copyright owner”.

警告

Warning

未经版权所有者授权，任何未授权的复制、传播、分发或其他形式的利用本作品的行为，可能会对侵权者构成民事赔偿和/或刑事罪责。版权所有者将保留一切法律追诉权利。

Unauthorized re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distribution, or any other form of utilization of this work without authorization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 may subject the infringer to civil liability and/or criminal prosecution. The copyright owner reserves all rights to legal recourse.

请尊重知识产权，合法使用电子书。

Please resp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se this eBook legally.

用冰冷的理性温暖这个世界

——王志安

五月

5.2 我想问连岳

连岳老师最近翻车了(也许该加上个“又”字)。

事发突然。一个多月前，2022年3月22日，微博突然实行了一个措施：对于评价俄乌事件的网民，强制显示其IP属地，目的，据说是为防止“境外敌对势力”冒充人民群众，扰乱视线，蛊惑人心。这个举措被评估为相当有效，十分必要，于是，微博推而广之，干脆让所有帖子无分内容，都自动显示博主发帖所在地，如在国内，就精确到省，如在国外，可显示数十个国家，其他显示为“海外”。

微博这么一机灵，快手、抖音、今日头条以及微信公众号也纷纷跟进，网络进入IP透明时代。

连岳老师猝不及防，中枪了。

2022年4月29日白天，连岳发文《只得一票，光荣地失败》，文章讲什么内容，注意的人不多，但IP地址令人意外：日本。

一下炸了锅。

当晚，很多人都在问，连岳老师，你怎么会在日本？有些人直接开骂：你一个坚贞不屈的“爱国大V”，长期鼓吹风景这边独好，国外水深火热，说移民美国的可能要遭遇“911式恐怖袭击”，说去日本，就可能要尝尝奥姆真理教的毒气。那您自己，怎么跑日本去了？

连岳挂出了一位叫马东的(网友)提问：连岳老师您平时说日本这不好那不好，中国这么好，为什么您去了日本？

他放出义正词严的答复：怎么着，去旅行不行吗？

也许连岳老师是嫌事儿不够大，所以要自己再点一炮。这种自戕型的胡编乱造哪里糊弄得了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众所周知，新冠疫情开始后，日本早就暂停了外籍人士的普通旅游签证，连岳说到日本旅游，纯属扯淡。

大概自己也觉得这谎撒得离谱，过了会儿，连岳又把这段评论删了。可毕竟，还是有不少网友已经看见了。

第二天，连岳又专门撰文《我为什么在日本》，解释如下：一，我是和家人到日本来看病，拿的是医疗签证；二，我生为中国人，亡为中国鬼，永远不会变；三，我前半生喜静，后半生喜动，以后我全球各

地旅游，待上十天半个月甚至几个月，拿个笔记本电脑写写文章也是很正常的，别骂了。

文章口吻是淡定的，但实际上，连岳可能还是着急的。因为在他信口开河说自己赴日旅游的同时，还干了一件事：让人连夜把他公众号的IP地址改为了福建，光速回国！

公众号地址改有啥用？文章IP地址又改不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要说连岳这一系列的折腾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有用，就是让大家亲眼见证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信口雌黄的经典案例，而这正是连岳一以贯之的自相矛盾，左右互搏式表达。

这里要说说连岳老师的来头了。连岳本名本名钟晓勇，1970年生人，住福建厦门，2000年曾担任《南方周末》记者，2002年开始做自由撰稿人，擅长对陷入迷惘的中青年给予感情、生活、理想等方面指导点拨，时而嬉笑怒骂，时而温柔婉约，由于见解独特，文笔较好，所以成功地成为一代人生指南导师，粉丝众多。但真正让他暴得大名的是他于2007年在厦门PX事件中的努力。无论是“带头散步”还是夫妇俩参与和政府谈判，以及用八九个月笔耕不辍进行口诛笔伐，都使得他坐稳了意见领袖的地位，不仅成功阻止了厦门这个化工项目的建设，迫

使政府不得已而异地迁建，也通过《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报道让他一举进阶为“公共知识分子”，还获得德国之声当年的最佳中文博客奖。

有人说，“如果你看过他那时的激进发言，会觉得被他用力嘲讽过的方方，简直是毫无冒犯之处的小清新”。

在获得巨大影响力和话语权之后，连岳却开始面目不清起来。2013年，他推出个人微信公众号，第一篇文章《我不关心世界》说：“我不关心世界，我不关心他人，我不关心下一代，我只关心我们，我只关心我和你（指他和妻子）。”

实际上，连岳的很多评论文章仍然是“关心世界”的，只是论调变成了各类爱国的说教和对“异见分子”的抵制，认为谁跟政府较劲谁就不够爱国，谁要是移民就是背叛祖国，脱离群众，不会有好下场。

十几年来，连岳惟一不变的人生主题是他时时刻刻在做生意，卖书卖货卖公众号资源……《我爱问连岳》系列已经出了六七本，加上其他鸡汤文学，他著作等身，快比鲁迅全集都要厚了。

今天，我也想问问来到日本的连岳。如果他愿意接受我在日本采访他，那实在太好了，但是我猜他可能不太乐意。所以我就权且通过网络把问题抛给他：

第一个问题，连岳老师您的医疗签证是什么时候获得的？您是什么时候入境的？

据我所知，医疗签证在日本的疫情之后几乎就停办了，目前还有有效的医疗签证，难道是两年前就获得了？从你发的微信公众号文章IP地址推测，4月25日前你已经抵达了日本？

第二个问题，到日本来就医，对你来说讳莫如深？拥有如此多粉丝，影响力超群的你应该知道，你到日本的动作容易让人浮想。其实要是说开了，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看病，在我看来也不是什么黑料，你初期不说，后来胡诌，说来旅游，为什么？是觉得网友够傻？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让“生是中国人，亡为中国鬼”的你带着家人在日本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冒险到日本治疗？如果说，你觉得日本医疗水平比中国更高。不能吧？这不符合您长期对中国各方面的盛赞啊！如果说，你觉得日本医疗服务水准比中国高，这不符合你早年的那篇文章《医生“腐败”的合理性》，在那篇文章中，你说得很清楚：为了我们生大病的时候能找到好医生，完全可以，甚至就应该包红包，医生不是天使，是人，收红包也是人性使然，政府也应该对医生收回扣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才是市场经济下让医生好好治病救人的道路。所以连岳老师您完全可以金钱开道啊。

再说，论服务，那肯定是咱们中国的顶级医疗服务好，比如咱们的中央领导和日本的安倍晋三如果都要就医，安倍首相得先预约，但在中国，高干有一套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医疗体系为他们服务，连岳你虽然跟中央领导是没法比，但大小也是个名人，更是身价不菲的公知，无论在福建，还是在北上广，想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医院，肯定不难，你绝对出得起让医生“腐败”，让家人受益的钱。

其次，千里迢迢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到日本来看病，这其中的病毒感染风险、声誉风险都挺大，你怎么毫无顾忌呢？

以2022年4月25日你已经在日本那天为例，当日日本确诊新增病例38579例，累计病例7668318例，东京新增4936例，而中国呢，全国确诊新增1923例，全国累计病例18135例，北京新增32例。你看，东京的病例是北京的224倍，日本的病例是中国的3988倍！差距如此之大，让你多次表达中国防疫成功，动态清零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高度负责。而日本疫情现在就是很多中国人认定的防疫失败。对比高

下如此明确，怎么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到日本这个对民众不负责任的国家去看病，你对亲人也不负责任。

试想，万一你和家人染上病毒后回国，那可就是千里投毒，对您“爱国大V”的形象极为不利。

第四，我想问的是，您强调自己“生为中国人，亡为中国鬼”，怎么理解？按我的阅读理解能力：生生死死，都在中国。“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要是在中国生了病，必须得在中国看，喝点莲花清瘟怕什么，找找号贩子也没什么，搞搞医疗腐败也没什么，但原则就是坚决不把治病这么重大的事情委托给别的国家，尤其是像日本这种国家。否则，您这中国心无论生死，都不太好佐证到底落地在哪儿。

第五，连岳老师您下半生喜欢动的这个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启动的？是从这张医疗签证开始喜欢的？喜欢动的第一站就是日本，一个可能释放毒气的地方？你说可能不时去任何一个国家去走走，“短可数日，长可数月”去发现“陌生人的笑脸和人世间的烟火，那才是令人痴迷的风景”，您竟然这般贪恋海外，期待全球游？海外能有“令人痴迷”的风景？您这是又一次的又一次在一反常态啊。

不过，我们期待连岳老师的全球散步，不知道这样的离岸爱国会不会影响他的作品，他是否依然展现中国的岁月静好，外国的水深火热？他是否能持续俘获那么多善男信女的心？

我要问连岳的问题，到此为止。希望连岳老师未来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

也许有人说我讲话夹枪带棒。说实在的，早年我对连岳老师没有任何偏向性看法，在厦门“PX事件”发生时，当时任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我还曾经想采访他，虽然连岳当时也没同意，但我理解他的拒绝，也是把他当作有识之士才想采访的。不过，这些年连岳身上令人咋舌的变化，让人三观尽毁，他的微信公众号上遍布着自己不相信却大声疾呼摇旗呐喊的话，比如自己做丁克，却大力号召别人生二胎，比如跟别人说日本不能去，迟早被毒气毒死，自己轻轻松松带家人来看病。

人们很难相信一个谎话连篇的人，如果连岳这次回答我了，我可能也很难相信。

当然，信连岳的仍大有人在，有人喜欢他抖机灵的俏皮话，喜欢他的上帝视角和另类说教，感受到醍醐灌顶，不过，他灌溉世人的是营养

液还是毒鸡汤，是真心诚意还是巧言令色，难说。但只要有信众，他就有生意。

在连岳那些顾头不顾腩的文章后面，常年带着打赏和卖书卖货的广告，他认为是凭自己真本事赚钱，不丢人。我觉得，赚钱本身当然不丢人，但怎么赚钱可能还是得有点讲究，目的不纯，姿势不雅，践踏别人认知能力的赚钱方式挺丢人。

比如你若看见个男的天天做卫生巾广告，说“谁用谁知道”，这是什么味道？

不过，现在连岳这种人不在少数，不是为祖国高喊“厉害了”，就是共同喜欢新华社报道和新闻联播，一起为动态清零感动得涕泪交加，他们的表演路径不一样，但真实意图表现得非常一致，那就是带货，比如为莲花清瘟叫好，为鸿茅药酒站台。

当主义变成生意，你让谁信你？

后记：

2022年5月2日《王局拍案》在YouTube播出“我想问连岳”后，5月4日连岳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文《人生与爱国》，承认自己早年的观点和现在大相径庭，无论公共话题还是私人生活的想法，都有改变，而原因是“历史总是很难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要发展以后才能看到局限性。”

连岳在该文中对过去的自己批判得相当透彻，他认为自己在厦门PX事件中是个“蠢货”，不够成熟，说了糊涂话，而在此后的公知生涯中逐渐觉醒，不愿意再过之前“疯狂的、愚蠢的人生”。他还回头评价异见人士：“不少公知原来都是聪明人，是精英，就是被这种力量推得回不了头，疯疯癫癫，最后智商断片”。

他强调，自己人生可分四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学生时期受爱国主义教育，第二第三阶段年轻不懂事，作为公知走偏了，好在目前的第四阶段，让他顿悟：“疫情这两年多来，市场发达的美西方最后只能依靠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救不了老弱病穷，你们死掉吧。而中国的动态清零，将疫情的损害降到最低，不仅死人最少，GDP的增长也出色。这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既有市场力量，更有政府力量。只有中国政府，才有这个力量”。

如果说这段罔顾事实穷凶极恶的文字只是他“智商断片”的表现，那么后面一段才是连岳智商的最高峰：“有人说，爱国不等于爱政府。在中国，这话不成立。中国有今天的成就，就是靠中国共产党的政府领导而成的，爱国必然爱政府。自己半生曲折，否定之否定，终于走到爱国的境界，有后怕，有庆幸，毕竟，有太多人一生只停留在年轻的思想认知”。我想问连岳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5.3 所谓宣传，就是用事实来说谎

2022年4月29日，新华网发了一个视频新闻，次日被整理到《上海战疫看点》的专栏中，标题是《飞跃黄浦江！他们为一名癌症晚期患者送“救命药”》。文中说，“4月27日，共青团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收到求助信息，一位家住徐汇区的老年癌症晚期患者缺药，需要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领取紧急配置的药品。经共青团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协调……出动了两架无人机接力，飞跃黄浦江，执行了一次约20公里的飞行运输任务”。

视频拍得美仑美奂，加上恢宏的背景音乐，给人感觉像看电影《拯救大兵瑞恩》。

新华网播出之后，人民网也转发了，不过令官媒遗憾的是，这么正能量题材的新闻，不少老百姓不仅没有鼓掌，反而不少人喝倒彩，新闻评论区一片挞伐之声，最后这些“别有用心”的评论被删除，目前剩在评论区的，是文字风格几乎一模一样的赞美。

但网友提问相当精彩，大家都已经记住了。

有人问，黄浦江上桥都塌了吗？为什么不开车去呀？

还有人说，一架飞机去拍，另外一架飞机去护航，这个确实是很壮观的。

又有人说，这精神不就是：没有困难，就创造困难再上？！

看看，永远不要低估人民群众的智慧。

要是跟着视频的节奏想，当然是好事，为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冲破重重阻碍去送药，这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视。可大家，尤其是上海人民，为什么不领情？因为这事的大前提太荒谬了，为什么晚期癌症患者无药可用？为什么不能正常交通？为什么还要用直升机送药？为什么还跟拍？如果发生“求救”的大背景就是荒谬的，你用重锤敲完人，然后给人上药，这还得我们一起为你鼓掌？

新华社做视频新闻的记者很在行，充分意识到这么好的影像资料是绝佳的宣传好选题。

但这只是宣传而已，不是新闻，或者说，这其实说一个假新闻。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看看虚假的宣传报道和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之间的区别吧。这至少还是我的本行，能给您详细分析分析：

宣传报道和新闻报道区别的第一点：宣传报道会把镜头对准宣传者自己，而新闻报道会把镜头对准新闻当事人。

在这条新闻中，镜头里的主角是两架无人机，从前到后，拍的是它们如何吊着一袋药飞越黄浦江，最后被一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取下。当事人，那名晚期癌症患者呢？不曾出现。在文案里出现的也只有上海徐汇区的部门机构，说他们如何协调资源。也许有人说，这是为患者隐私考虑，那么，就算不说姓名，但患者得了什么癌症，病程如何，严重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断药，目前是在医院还是在家？是普通群众，还是高级干部？他此前药物怎么获得的？送去的这些药能管多久？要是用完了无人机还送吗？报道只字不提，要么说他们不关心这些问题，要么，说这个当事人根本不存在。

在宣传片里，患者不存在，这视频也能拍，因为表扬的是徐汇区的某部门。

然而新闻因为什么而生动呢？“人”！通过这个人的情况，我们想知道，在上海有多少类似这样的患者，有多少比这位患者更加艰难，无从就医，求告无门的人在上海的各个角落。

但这些群体不是《上海战役看点》的关注对象，他们只顾得上说他们想说的：政府爱群众，有能力解决各种问题，集中力量可以办成各种大事。

所以说，宣传报道只会把镜头对准自己，证明自己“干得漂亮”，用一件事的合理性和所谓亮点，证明自己更大行为的正当性。这就是以偏概全，用局部放大来说全局。

宣传报道的第二个特点，新闻当事人如果出场，也只能当工具。工具人会有使命地说话，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得经得起考验，如果他说了不够正确的话，播出版本也会让他正确。

这种案例在疫情中比比皆是。比如这个新闻：上海永南地区五位“大白”，将一个八十多岁的截肢瘫痪老人，从四楼抬下楼去做核酸检测采样，老人连声说感谢。

这新闻看得我啼笑皆非，又悲从中来。一个平时就无法移动的80多岁老人被五个人硬生生挪下楼。大白辛苦不辛苦？辛苦。但，有必要吗？就不能找人上门给他测一下吗？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费尽周折？后期，上海吴泾镇政府工作人员回答记者说，这位老人因为在非封控楼栋，按要求，就得自己下楼做核酸。上门做核酸属于特事特办，那就需要调动各方力量，也需要和做核酸的医务人员协调一致，整个过程相对时间比较长……

您觉着，这答复合理吗？在我看来，本质上来讲，他们就是把人当工具，而不是把人当人，可能灵机一动，花点力气来促成这个宣传报道。所以新闻上有图，还有“工具人”说话。其实但凡他们把人当人，就得关注老人的感受，关注人的权利，非要八十多的瘫痪老人下楼，就是不人道，跟封控不封控的规则毫无关系！

我猜，真正的原因是，政府宁愿花力气去抬人，也不愿意因为协调耽误事情。他们很有可能是有截至某个时间节点完成任务的命令，因为核酸检测完，试管要批量运送，批量测试，批量上传数据，同口径被公布到政府网站，他们不想在这种政治任务上“掉链子”。所以，费点力气怕什么，其他都不重要！老人还能对着媒体说感谢，凑成一个正面报道，何乐而不为？

再比如，前两天有个方舱医院的视频，一位女士边拍边说，很多人说方舱医院条件不好。你看，厕所一排一排的，还有浴室，可以洗澡……条件是太好了，这么多人帮助我们，应该感谢不是？

这也是宣传，哪怕是群众主动宣传。这个宣传里面，没有“人”正常的体验和感知。即便拍摄者讲得很动情，它的目的也就是赞美，而不是全面客观地呈现事实。有厕所有浴室就是条件好？她对比的是此前连如厕都没地方去的方舱，比下有余就是好了吗？不好。为什么？因为它违反基本人性，基本人性是什么？是方舱医院再好，但不是正常生活环境，大白再好，不是家人。被隔离，被迫与跟家人分离是令人神伤的，没有什么可喜庆的。

让她失去或者隐瞒基本判断的是，不断有人告诉她：别人在帮助，你应该感恩，你这不是最差的条件，要学会知足，在恩人面前，你得到的每一样施舍之物，都不应该挑剔。

忘记人有基本判断力、基本诉求，忘记要给人基本尊重和爱护，这就是宣传报道的特征。

第三点，宣传报道会用局部事实来掩盖全面事实。你也可以说他没有胡编乱造，但他只说了部分事实，却用以放大到全貌，这就是弄虚作假。新闻报道应该是全力用各种方法来呈现全部的事实。

就拿这个无人机事件引申开说，这样的事例有几件？可复制吗？而上海疫情从4月份到现在，官方有多少新闻是在讲述医院诊疗秩序危及危重病人的救治？有没有说过医院封控期间的缺医少药？有没有给出病人能及时得到急诊治疗的渠道？没有。可这些问题对群众来说才是有普遍意义的。

我们看到的大量新闻是类似于急腹症病人因医院接收不了而跳楼，尿毒症患者由于没有医院接收得不到及时救助，家属千辛万苦把

患者送到医院门口却因为没有核酸报告进不了医院而死在门口，住院的人也无法正常手术……这些你们怎么不报道呢？而这才是大多数。可这些新闻不是正规媒体在报道，都是当事人通过自媒体在控诉，正规媒体不可以去报道这些，真正的新闻被迫隐身了。

新闻会通过一个人让你想到千万人，而宣传报道，是只让你看一个场景不看其他，让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是宣传和正常的新闻报道之间最大的区别。

言已至此，我想，大家都可以联想到，这次上海疫情报道跟武汉疫情报道之间的区别。作为一个新闻人，我可以从专业视角清晰地看到，在武汉疫情期间仍然奋战一线的媒体在上海全部失声。专业的财新团队在武汉曾坚持数月，持之以恒地报道新闻，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也纷纷努力发声，做出了有价值的报道。尽管在湖北时媒体人也受到很多限制，但我们至少知道了李文亮去世的消息，知道了医保不覆盖疫情治疗项目时民众的苦痛，因为有新闻报道，整个社会合力推动了很多问题的解决。

但是整个上海疫情期间，没有任何一家市场化媒体做出正常的新闻报道，只有官媒在发声。发的是什么声音？是宣传，是无人机这样的看点。

上海市民在整个疫情期间遭受的那些苦难，也许都要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的报道来回顾了。

如果我们把疫情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对人民健康的冲击，那么武汉疫情要比上海疫情严重得多，在没有疫苗、没有有效药物的时候，大家都是揪心的。而第二个层次，如果谈疫情对整个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冲击的话，在我看来，上海疫情比武汉疫情严重太多太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本该拥有新闻报道权力的媒体被噤声，本来有权知道真相的群众被蒙蔽。

上海外滩空空荡荡，野草顿生，如果这些不曾被报道的画面没有消失在上海人、全中国人的脑海里，那么，真相就不会被忘记。

5.4 贵为马某，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未法时代，每天都有魔法新闻发生。

昨天，2022年5月3日，各大媒体，尤其是官媒：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率先报道杭州市国家安全局于2022年4月25日依法对勾结境外反华敌对势力，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马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这个新闻的关键词很多，除了“反华敌对势力”，“颠覆国家政权”，还有“杭州”、“马某某”。每一个词都是如此抓人眼球，而“杭州”、“马某某”似乎更为夺目，大量媒体在不断转发的过程中，竟然把“马某某”省略了一个字，转成了“马某”。

这种省略，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股市上，阿里巴巴的股票应声下跌了9.4%，公司市值下跌260亿美元。

大家都心照不宣：“马某”？哪个“马某”？是……那个？

大家不约而同地猜测，马某，是不是两年前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大放厥词，然后基本消失在大众视线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昔日大红大紫的“马爸爸”？

事后大家都知道了，此马某某，非马云，一个乌龙让阿里巴巴股价下跌得有点冤，误会消除后，股价重回原点。

要说这事也不能怪各个媒体和吃瓜群众，反过来说，谁能想到杭州还有别的“马某某”能如此被官媒大动干戈地报道呢？况且，人民群众捕风捉影也是因为有迹可循，自从2020年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责无旁贷”地“畅所欲言”，他确实就一直在挨社会主义铁拳。

首当其冲的就是蚂蚁金服上市计划，原本一年半以前投资者就开始认购股份，但在马云发言完之后，IPO被紧急叫停，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多家金融管理机构多次约谈蚂蚁金服并进行深入调查，再之后，蚂蚁金服上市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时间表的事情。

此外，有关部门还叫停了阿里巴巴不断延展的业务中一些敏感性的内容，比如传媒类业务投资。外滩事件后，阿里退出了包括香港的《南华早报》在内的传媒类股份，同时，在保险、银行和信托等方面的业务，阿里也被要求限期退股。中央铁拳连续出手，让人们对于“马爸爸”社会地位乃至阿里系的业务未来走向都开始了悲观揣测。

以上，是大家把马某误会为马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听了马云的外滩放言，认为马云太不自量力了，如此狂放，也的确有可能再做出点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新闻里的马某某是“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胆子这么大，说不准还就是自信爆棚的马云干的？

之所以大家把马云看得如此反叛，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外滩说的话几乎是在挑衅当局。

在那次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式上，马云和各位领导谈笑风生，其中包括了各个位高权重的中央级领导，但当大家正襟危坐，听马云宣讲时，他却在客气话后面直接开炮，直指监管机构过度在意风险，说

“巴塞尔协议比较象一个老年人俱乐部”，“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他的大意是说当局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那你想想，这些行长、部长甚至中央领导脸上，挂得住吗？这不是大放厥词吗？

讲话完不久，蚂蚁金服就被约谈了，上市黄了。

有人说，是因为这次演讲导致了蚂蚁金服上市失败，也有人说，其实这次演讲前蚂蚁集团就对危机有所感知，演讲才是为了力挽狂澜而做的最后一搏，何因何果我们不得而知，显然，马云的演讲彻底失败，完全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其实，马云一些话我也不完全赞同，比如他说银行就是当铺，有待商榷。银行本质而言就是通过可评估的风险提供金融服务，互联网时代前，银行能找到的评估工具很少，所以当然要抵押物。到了互联网时代，支付宝掌握了大量个人消费信息，大数据的整合分析可得出消费者画像，由此也可以进行信用等级的评估，如果个体信息呈现的信用等级足够高，那的确可以免去抵押物，直接放贷款。互联网创新，金融创新当然好，不过如果现在来否认传统银行的风险评估逻

辑，这种嘲笑也很不厚道，其实银行无非是手里没有那么多消费数据，没有便利的互联网工具而已。

但马云的大放厥词没有道理是一件事，连续不断地挨铁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马云的发言是有错而不是犯罪，那么对于阿里系的整顿就应该沿着法制的路线正常行进，而不是搞运动，呼啸而来的全面打击。今天马云都变成新闻里的“马某”了，这多少也反映了在群众心目中，阿里系出现任何被整信息都不意外。马某如果真的有牢狱之灾，大家惊讶吗？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分析马云言论里的对错，也愿意客观公正地看待马云以及阿里系的发展、约束，也许更多人只是在看风向。

2019年，人民网的人民财评刊登过评论：《没有所谓的马云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马云》，里面敲打了马云和马云崇拜者，“只有抓住了时代机遇的个人才有可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无论是马云、马化腾、马斯克，还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概莫能外。因此，盲目的崇拜

很难带来成功，认清个人成功与时代的关系，找准方向并付诸行动，才是获得成功的根本”。

“找准方向”是评论员送给马云的一个建议，不过马云可能没有认真去听。过去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马云演讲的金句，被粉丝整理成语录传颂。现在马云还敢对外演讲吗？他若敢讲，还有人会整理吗？一个被判定为没找准方向，和主流背道而驰的人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看到这个新闻，我发了一条推特：在中国，是个人都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贵为马某，也没有。

在这个国家里，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要说你不敢越现存法律的雷池一步，就说法律规定的应有权利，你敢全面行使吗？结社自由，你敢吗？言论自由，你敢吗？你能随便议论某位官员吗？村支书都能把你办了。人民教师，你敢对历史对当代有任何个性化评论吗？一个爱国心切的学生就能给你举报了。谁不担心因言获罪？谁不懂莫谈国事？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晚上家里经常会来一些客人，父母和他们凑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我妈就会说，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为什么怕别人听见？因为怕被人举报，扣帽，最后坐牢。

在所有的反动行为中，说话反动是最难自我防控的，言多必失是中国人必须掌握的硬道理。成功人士、企业家，概莫能外。做老板的在企业里对下属可以释放话语权，走到政府面前，同样没有大声说话的份。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的经历就是个例子。几年前，非洲猪瘟爆发时他企业里数万头猪染疫而死，按政策，他的企业可以拿补助，可当地政府就不认。他求告无门，发私信给我，希望我能给他转发一下这个事件，当时我的新浪微博还没有被封杀，我就给他转了一下，之后问题就解决了。政府为什么为难孙大午的企业？是不是因为孙之前对政府某些工作不配合，我们不清楚，但我清楚一点：不管你是多大的企业家，只要你在某个环节上跟政府过不去，你迟早会踩进坑里。

阿里巴巴如日中天的时候，杭州市余杭区政府特地为他们在海创园的政府办事大楼里设置了一个“亲橙办”，表达政府是为企业服务的，现在还有亲橙办吗？

所以，不要以为谁可以豁免恐惧，企业家、达官显贵，谁都别想有持续性的安全感。如果他们说有，要么是装的，要么是膨胀得不知所云了。中国历史上，权倾一世的和珅都可以因为换了一个皇帝被赐予一丈白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而皇帝呢，其实也没有安全感，“总有刁民想害朕”嘛。

我们没有免于恐惧的土壤，因为在这个社会，凌驾在所有人、所有制度，包括法律之上的，是权力。一个人一旦获得了权柄，他权力的边界就会肆无忌惮漫无边际地扩张，没有人敢冲出来把这个权力关在笼子里。所以，在威权面前，不管你有多少钱，多少资源，多少能力，只要你激怒了权力这头怪兽，你拥有的一切随时可能清零。

这就是马云被“对号入座”在“马某身上的原因。每个中国人都懂得的逻辑。

有人还在那里幸灾乐祸，“看，再风光你也随时挨整吧”，对于这种低级认知能力的人，我想告诉他们，富人倒霉你更应该紧张了，一个拥有巨大资源的堡垒都可以倒下，那你作为草根，万一触及不可知的机关，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你有什么可欢欣鼓舞拍手称快的？

我们不要追求一个富人倒霉的社会，我们应该希望不论贫富，都有法可依，都有规可以自保，可以呼告。我们不想接受任何等级的权力来侵门踏户，无论是城堡还是草屋，我们得有守卫家园的可能，说到底，我们希望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显而易见，这个希望，还很遥远。我们只能祝愿无罪的马某、马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都能平安。

5.8 所谓“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罪”

《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罗昌平被判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公开赔礼道歉》，这个消息在2022年5月5日的微博上被各大媒体静悄悄地转载着。大家都看见了，但几乎没人敢议论——既然作为知名媒体人的罗昌平因为这个罪名被判七个月，你要是敢讨论，一旦被举报，搞不好也就跟罗昌平一样进去了。

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罪这个罪名，是依据2018年的《英雄烈士保护法》，后《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之一作出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这条法律在我看来是继寻衅滋事罪之后又一个口袋罪。如果说寻衅滋事罪针对的是行为，那么这个侵害英雄英烈名誉荣誉罪就是专门

针对言论，一旦公民针对历史事件中的某个群体发言，说不准就会掉这个坑里。

罗昌平不是第一个因为侵害英雄英烈名誉罪进去的，前面已经发生好几个案子。

2021底一个旅游博主去新疆，在某个烈士陵园出于搞怪猎奇心理，先是踩着有烈士陵园名称的石碑底座斜靠着拍了照，另外又在一位烈士墓前，笑着用手比了一个“手枪”姿势对着墓碑拍照，发到微博上之后马上被举报了（见图），他也是判了7个月。一个时尚女博主被认为侮辱英烈董存瑞，也被判7个月。

有点严刑峻法的感觉了吧？

而罗昌平说了什么犯下这条“侵害”罪行的呢？

他点评电影《长津湖》中的“冰雕连”，说时隔这么久，难道就没有人来反思这场战争（抗美援朝）的正当性吗？后面说了一个“沙雕连”。这个“沙雕连”当然是讥讽甚至脏话，但“反思”也是小粉红受不了的，于是，罗昌平发出微博半小时后就被人举报了，海南省警方予以

电话传唤，罗昌平感到了事态严重，他删掉了帖子，后又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当即就被扣押，直到近日，官方宣布判了7个月时，他被拘押的时间也正好达到了扣抵刑期的日期。2022年5月6日，罗昌平出狱了，7个月内，他说自己在里面“面壁思过”，整个人暴瘦9公斤。

新华社报道中还写道：“罗昌平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愿意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8万元……法院予以认可”。所以说，罗这七个月的量刑，还算是从轻处罚，已被网开一面了。那要是重判，三年可能也是正常的。

以上三个案例都让我认为，《刑法》增加的这个罪名是针对言论自由的口袋罪，无论是定罪范围还是量刑依据，都经不起推敲，是荒谬的，是意识形态压倒法律。

首先，名誉侵害、侮辱名誉属于人格权范畴，而人格权是依附于生命权的，一个人活着有人格权，死了就没了，名誉荣誉不能继承，也不应该由他人来为其主张。如果人格权可以继承，那假设我现在评价刘邦是个小流氓，刘姓后裔是不是都可以起诉我？刘邦如果在世，

对侵害他名誉的人当然可以起诉，但他死了，人格权已随之消失，就可以任由后世评说。所谓“千古风流人物”都可以由后世评价，史学家随时可以根据最新发现的材料补充对个体的认知。刘姓后裔可以说我的评价不对，但没有权力替刘邦来起诉我。

现在这个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罪，给人感觉这些英烈的人格权还在，也可以继承。比如被定义为侮辱了董存瑞的时尚女博主，被媒体采访时说要道歉，她还真到董存瑞的一个后代那里赔礼道歉，董存瑞的当代亲戚表示我可以原谅她。其实，博主的道歉对象对吗？董存瑞的后辈原谅得着吗？董存瑞的人格权你继承不了，就算你是他的孩子、孙子，也不可能继承董存瑞的人格权、名誉权，否则就乱套了。

此外，目前被判刑的所谓侵害英烈名誉罪的案子都是公诉案件，也不是那些英烈后代去起诉的，是网民举报。说起来，举报人是维护公共利益，可什么叫公共利益？它最多是伤害了一部分人的情感，全社会人的认知不同，这构成公共利益吗？公共利益的外延不能任意、随意扩大。

比如，如果我说雷锋日记里存在虚假内容，这事侵害了公共利益吗？如果雷锋活着，他可以起诉我，用证据说明我造谣，侵害了他的人格权，我也可以应诉，举证。而现在，我一说看法，就有人不摆事实摆感情，说我伤害民众感情，伤害公共利益，这是哪门子公共利益？

所以，这个法律最可怕的地方在哪儿？它没有概念、范围，似乎无远弗届，而操作方式是大众参与，定罪与处罚都带着强烈的主观随意性。通读《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的一条，以及其来源《英烈保护法》，你们谁也看不到，谁是英雄英烈？从哪朝哪代算起？活着的和死去的英雄都适用？入罪标准是什么？

如果根据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毛主席的题词，自从1840年以来，为了中国人民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牺牲的人都是英雄。那么蒋介石也曾率领国民党抗日过，他属不属于中国的英烈保护法保护范围？光绪皇帝还曾经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时候下宣战诏书，算不算英烈？再比如，林彪前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名将，无论抗日战争的奋力厮杀，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指挥了两场战役，对新中国肯定有汗马功

劳，那么，他算不算英烈？如果算，那后来叛逃就肯定不算了？如果在公众平台点评他的时候，是不是先说，我们讲述的是某个阶段的林彪，以此来给他进行英雄英烈的分段描述？

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必然界定清晰，有统一标准，不能以任何个人任何党派的概念去罗织罪名。

回过头，我们看《长津湖》中的“冰雕连”，罗昌平称其为“沙雕连”，是有点粗俗不敬，但就事论事，罗昌平提出对这个电影的历史背景进行重新解读，对冰雕连牺牲的价值和原因重新评估，而不仅因为牺牲得惨烈就感动，这逻辑有何不合法之处？

我不用沙雕连这个词，但仍然请大众思考下：“冰雕连”的上层领导置自己战士的生命于不顾，最终导致他们活活冻死，十分混蛋，这话算侮辱英烈吗？冰雕连的领导是不是也在英烈保护法的范畴之内？是不是也绝对不能讨论和质疑？

罗昌平的判决书里说他既往就在微博里发表了很多讽刺英烈的内容，看来，讽刺也是不行的，也是“侵害名誉荣誉”，那什么叫讽刺

呢？怎么界定？我们又知道了。

可以想象，以后没有人再敢点评历史了，只能照本宣科，不能发出疑问，不要颠覆旧说，更不要把你对教科书上有异议的地方发布到公众场合，否则，你可能就成为下一个罗昌平。

正确的言论不需要法律保护，因为赞美当然动听，不同意见，甚至错误言论才是要保护的，因为那才是言论自由的真谛，我可以不同意你，但我维护你说话的权力。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才是让法律治国。

阿尔巴尼亚1972年的老电影《战斗的早晨》里，一个武工队队员对反派说，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啪，一枪就给人毙了。那电影在中国很红，有段时间小孩子也拿着玩具枪学这句台词：“我代表人民判你死刑！”。现在很多人也想代表人民，给人判刑，侵害英烈名誉罪就是机会。

你很难不联想到，这个罪名特别像文革期间最知名的口袋罪——反革命罪。无数现在被认定为英烈的人，在那个年代被五花大绑游行

示众，推出去就枪毙也正常，而他们被定罪的原因只是有人跳出来“代表人民判他们死刑”。反革命罪也有着无限延展的内涵外延，从攻击伟大领袖到不好好生产，甚至连开会不认真也算是犯罪，而甲可以代表人民，乙也可以代表，所以这个罪名造就了十年浩劫。

幸亏改革开放以后反革命罪取消了，改出来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把概念相对明晰化了。然而，现在又出来这个以保护英烈名誉为名的口袋罪，我们又一次进入了法律政治化的境地。这是不是在开倒车？

当然，这条法律的制定者目的就是要开倒车，目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斗群众，以此来维护什么，铲除什么，那，我无话可说。

5.9我为什么被封杀

2019年6月4日，我的新浪微博、《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突然全部无法登录了，按照众所周知的情况，我知道，我被封号了。同一时间，被中国人使用率最高的三个平台集体封号，我知道事情不简单，而且，这个动作发生在6月4号这么一个敏感的日子。我心里一沉。

虽然当时还不算全网封杀，有些相对冷僻的社交媒体我依然能登录，但是它们的发声作用要小得多，我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被封堵了。

为什么事情发生在6月4号？这是我的疑问。很快，新浪微博上开始流传一个谣言，说我因为在美国参加"6.4"的集会而被三大平台封杀了。

这可真是个拙劣的很容易被证伪的谣言。2019年6月我是去过美国，那是去跟律师讨论在美国起诉方舟子的事情，但我在6月3日就回国了，有机票为证，然而，国内社交平台我已经无处去发声明，于是，我就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声明，说我6月3日回国，谁造谣我要保留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

但这一连串遭遇让我感觉自己像进入了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我做新闻这么多年，尤其在央视也工作了很多年，我还不知道在国内，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踩踏的红线吗？去美国参加"6.4"集会这种事情如果真实发生，不要说我还想在内地做媒体，就是做个普通自由人也是不可能了，这点“觉悟”我还能没有？用这招来对付我，我想，操纵者是想让我在中国永世不得翻身了。

重创的后果逐渐显示出来，损失首先是我在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的所有文章都没有了。早年我不曾想过自己会有如此待遇，所以没有备份，如今，这些文章无从拷贝了。虽然我的电脑里也零散地有一些，但保存得并不全。本来有很多出版社找我谈出版的事情，出事之后，出版就不用说了，但我更心疼的是那些属于我的文字，那是我的

思想痕迹，我的采访记录，是我的历史，丢失了它们，就像丢了孩子一样，我至今怅惘。

我的另一个直接损失是《局面》做不下去了。本来，《局面》前两季的播出在市场上可以说取得了非常大的影响力，最高一期节目的播放量有两三个亿，比如“江歌案”、“周立波枪毒事件”，几乎每一个拿智能手机的人都看过，海内外的华人都看过。

我去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曾经在前往偏僻小岛的高速公路旁超市小憩，超市里有一位华人走来向我打招呼说，王局，我看过您的节目“周立波”。你想，这个节目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有多大？

除了《局面》，其他想跟我合作的项目在炸号之后也都烟消云散了。没有哪个平台还敢跟我签约，工作没了，其他和工作相关的机会我也不可能做了，因为我的肖像、画面、声音全部成了禁忌，伴随着我社交账号的阵亡，我曾经做过的节目也被下架，这几乎就是宣判了我的“社会性死亡”。

失去发声的机会，这是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已经通过自己的作品获得市场认可的媒体人无可估量的损失，如果一个医生或者美食博主被炸号，他还能看病，还能开餐馆，而媒体人没有了写字的平台，没有了话筒，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

情急之下，我也找了一些朋友去打探消息，我想知道封号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一轮的答案是，这是网信办社会局起的文，下发到了应急管理局，要求各大平台把我封杀，但具体原因不清楚。我又托人追问，有人反馈说，说因为我的公众号影响太大，而网信办当时正搞整顿活动，不准许互联网平台上存在“不是自己人”的大V存在。

这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今日头条平台上的不少大”V“发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官媒上的评论员文章，让有关部门警觉，在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人们可能更多地把视线集中到像我们这种“不是自己人”的帖子上，不听官方报道而来听我们这种民间影响力大的人发出的“杂音”。官方当然不希望看到这点。

我在微博的影响力，主要是在社会新闻领域。不客气地说，在当时的新浪微博的社会新闻栏目里，我帖子的浏览量应该算是全国顶流，每个月的浏览量都在几个亿，最高时上十亿。

如果说影响力就是我被网信办关注的原罪，那我没话说了。媒体人追求的成功就是舆论影响力，这也是我工作的动力。但这有错吗？

至于说，“我不是他们自己人”，这是他们的看法。其实，回顾我过去的种种舆论，以我自己的标尺来衡量，真不算负能量的博主。我的老东家央视多多少少教会了我“红线”原则，在微博上，我基本还是保持了谨慎、低调，不走极端不出格的状态，尽量做一个温和的建设者。说实在的，让我说极端的话我还说不出来，这不符合我的个性，也不符合我对新闻专业的追求。

我经常告诉我的团队，不要说无谓的极端的话，在这样的时代，保护我们不出问题的，是新闻专业性，是理性。我们做的节目不能让人在专业性上挑出毛病，否则，谁能来保护我们？谁也保护不了。所

以，我没有计划做一个挑刺儿的反对派，我只是想做好自己的新闻本职工作。

真要说他们不能忍受的内容，肯定不是在我制作后被正式播出的节目上，而是在社交媒体上。确实，我愿意在公众号上对社会热点发些自己的点评，尽管《局面》团队的同事以前天天拉着我说，王老师你少发点儿微博吧，你的微博太危险了，看完之后胆战心惊。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为我好，但就我自己来看，我的言论应该也不算特别过分。现在看来，也许我的敏感度不够。

而替我向网信办去了解情况的朋友又给我捎来了另外一个被封杀的可能性理由，说是中医药管理局给网信办发了一个文，要求封杀我，他们的理由也很明确：我在网上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中药，尤其是中药注射液。

那是没错，在做“鸿茅药酒”节目过程中，在我采访完谭秦东后，公安部就曾给《新京报》发文，要求撤下这节目，所以节目在四十八小时之后就下架了。当时我的确义愤填膺，节目不让播，那我就在网

上写文章，继续抨击鸿茅药酒，指出它的技术问题，比如药酒的配方里头仍然有豹骨，而豹子已经被列为国家珍稀动物，你这豹骨哪儿来的？如果是真的豹骨，那么就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如果没有，那就是欺骗消费者。这些质疑确实在网上形成了一波舆论浪潮，据说鸿毛药酒还专门请了一家公关公司要整我的黑材料。

除了鸿茅药酒，还有步长药业。其董事长赵涛花了650万美金把孩子“送”进耶鲁大学，装学业优秀，最后跟着其他几个贿赂案一起被美国破获。很多人看了新闻说赵涛冤大头，砸了这么多钱送闺女去镀金，结果还被曝光了。我不想八卦，我想让公众关注步长药业的当打产品：步长脑心通胶囊，这个没有双盲实验，把中药研磨粉末灌进胶囊，大肆广告，靠“销售费用”打出江山的名牌中成药，到底效果几何？

我另外一个与中药相关的议题是丹红注射液。这个药的出厂成本只有两块五，但到了医院却卖得非常贵，因为售价中的80%是销售费用，也就是给医生给医院回扣的费用。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对中医药企业的质疑。我质疑之后，丁香园、澎湃这些大流量专业媒体也跟进了，引发了大家对中成药，尤其是中药注射液的质问。我想，至今这些舆论的浪潮也有余威尚在，而这些企业，乃至中医中药行业的人对我和一些媒体的憎恶有多么强烈？如果他们联名请求中医药管理局动用力量封杀我，那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向我反馈中医药管理局这条线索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是中医药协会给中医药管理局写了一个文，请求后者给国家网信办发文封杀我。但我其他的朋友帮我去求证时，中医药管理局还是否认了，说知道我反中医，但没有发文。

为我职业生涯着想的朋友想在我和中医药管理局之间建一个桥梁，帮我求情希望双方沟通一次，我也想过，为了职业生涯，可以妥协，只要你让我继续做采访，那以后针对中医药问题，我概不发言总可以吧。可我做完了能屈能伸的心理建设后，中医药管理局并没有要跟我坐下来谈的意思，他们说，你去别处问问，这事儿与我们无关。线索断了。局部牺牲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半年后，2020年年初，我到了日本，旅游散心过程中，和一个国内的平台约了，想尝试做一档音频节目的预热，他们找了三个主持人，其中一个是我。如果内容尺度能被有关部门接受，观众也认可，那我们后期可合作开个音频节目，放在付费墙里。这是我当时能想得到的最后一点缝隙，我很珍惜，对方也发了宣传海报。因为当时我人在日本，正亲历日本疫情，所以直播就定了讲日本防疫的主题。

没想到，就这次尝试，让我遭遇了全网封杀。

直播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和后台失联了，平台说，网信办发来文要求王志安的直播必须停，马上停。这一停，就把我原来没有炸的平台账号瞬间一起封杀了，包括了网易、知乎甚至常年不用的一些账号，至此，我在中国境内互联网上就销声匿迹了。

我困兽犹斗，再次托人去问，全网封杀，是要把我赶尽杀绝吗？到底为什么？他们反馈说，你在境外有账号，这种情况，一律炸掉。

我不信，推特上有账号的人多了去了，胡锡进也有啊，当然，有人说了，胡锡进是奉旨翻墙，但除了他，国内在推特上有账号的博主

难道都炸了吗？而且我推特账号不是直播的时候才有，早就有了。

至今，我也不是百分百确定是谁在坚持不懈地盯着我，让我在国内互联网上再无立足之地。当然，我有个百分之八九十的推断，不过，现在这些也不重要了。

我知道，我在中国做新闻已经彻底没希望了。五十岁，本来是我做采访的黄金期，半生积累的阅历和专业经验可以让我比年轻人多一些对社会、对世界、对人性的认知，可以让我提出更多有价值的问题。然而多年厚积薄发的机会，创作的最佳时机被一夜之间就炸掉了，再也没有了。

事情过去3年，现在回头看，作为当事人我想说几点感受：

一、网信办对互联网炸号的管理是极其主观随意的，或者说，是秘而不宣的，其实，只要某个领导签字了，他们想炸谁就炸谁，不需要给当事人一个说法，现在据说也不需要通过平台动手，直接就操作了。而这种秘而不宣无人监督的巨大权力，当然可以给人寻租的空间。或许，搞定我王志安，某个企业只要跟网信办的一个处长谈好就

行了，不需要更大的领导再审核，尤其是到"6.4"这种时间节点，本来就是批量封杀的日子，名单里多一个王志安，谁会关注？看看裁判文书网，上面有个案子是，一家企业出50万贿赂网信办帮他们删帖，通过层层关系，分包转包，最后那个国家网信办的人拿了多少钱呢？两万。

所以如果有人想买通网信办封杀我,也相当容易。

二、行政处罚按道理是应该有救济渠道的，可封号并没有行政复议或起诉的途径。我微信公众号被封掉了以后，后台有个信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你的号永久封禁。请问，根据的到底是哪条法律？如果我说的哪一句话违反了法律，那法院还有个裁决程序。假设法院受理我的起诉，而最高法裁决说王志安这话不违法，你就得给我恢复账号。可我们的法院不受理这种案子，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救济渠道。

三、无论普通人还是我这种公众人物，网信办的封杀是毫不顾及对当事人造成的摧残力的，他的职业生涯，他对社会过去的贡献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你们在意吗？

这跟草菅人命有什么差别？

三年了，我没有一直没有公开讲过我被封杀的原因，为什么？说了有用吗？只会得罪他们，后果是不是严重我也无法预料。整顿已经是他们的既定方针，假设他们还管得着推特，肯定把推特的号分分钟给我炸了，他们会让我在全球互联网上死无葬身之地。

一纸命令葬送了我在国内的职业生涯，如果我留在国内，只能做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如今我在日本重操旧业，总想着要跟过去做一个告别，用什么纪念呢？我想好了，接下来我要买辆汽车，申请的牌照里面必须有两个数字：6、4，因为这一天，是我在中国互联网社会性死亡的那一天。

我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祭奠我故国的新闻亡魂。

5.10 《宪法》在违宪？

童之伟被禁言了。

童之伟是何许人？他是中国知名的宪法学者，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法学界泰斗。

2022年5月8日，童之伟教授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的署名文章，针对上海从2022年5月5日开始实施的两个防疫措施表示异议。上海的两个防疫举措中，一是住宅区有一人感染，则整栋楼居民将被强制送往方舱隔离；二是阳性病例被隔离前，须交出钥匙，以便防疫人员要进入民宅进行消杀。

两措施在上海引起大量民众的不满和恐慌，童之伟教授在法律意见书中表示，一人感染全楼隔离的措施是违法行为，并无法律依据。虽然上海市有关方面声称，他们是根据人民政府“紧急状态”的命令，而中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如果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发布的决定，那政府就有权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这也是中国

其他地区防疫措施表述时用以告知民众的法律依据。但童之伟教授说，非也，你们这是信口开河。

到底何为“紧急状态”，童教授给大家上了一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款，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有权力宣布上海市或上海市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颁布“紧急状态”的这个权利只有国家层面有，任何地方政府都无权宣布“紧急状态”。而且上海市从未正式宣布过进入“紧急状态”，也没有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宣布，所以据此对不服从强行隔离的居民采取强制措施，也不成立。

此外，对于有人搬出《传染病防治法》来为防疫措施背书，童之伟教授也说，不对！因为《传染病防治法》里规定的对于“甲类传染病”采取的强制措施针对的是病人和疑似病人，而不是完全没有疑似依据的同楼居民，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密接”都可以排除，却仍要被送去强制隔离，显然是非法的。

他通过公开的法律意见书告诉上海市民，如果有人上门要求你去隔离，你有权要求来人出示正式的决定文件，假设你不是密接或者疑似，仍然要被强行送到方舱医院隔离时，你也有权对人民政府发起诉讼。

对于防疫措施中第二个强行入户消杀问题，法律意见书里说，这一条也是胡闹。因为我们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人民政府有权要求人民交出钥匙任由政府入户。《宪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如果你侵入居民住宅，就是犯罪。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的防疫人员要求居民交出钥匙，然后派人入户“消杀”，是严重违法，构成了“非法侵入”罪。

这个法律意见书一上网，反响强烈。两年来全国各地的防疫措施在不断加码的过程中不断地突破法律授权，不少举措已经践踏了公民权利，民间哀声载道，无从反抗。在升斗小民眼里，政府说的每一句话，随时随地似乎都可以变成法律，而真正的法律到底是什么，已经无人敢申辩主张。

类似的还有，我们明知道，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里，针对哪些情况下哪些机关可以要求公民出示身份证有非常明确的说法，超出这些情况和机构的，没有权力要求公民出示身份证，否则不利于公民隐私的保护。但是在防疫期间，你看吧，随便一个“大白”或者保安都可以要求你出示身份证，《居民身份证条例》的权威性失效了，没人想着来保护公民权利。

不过相比上海被曝光出来的这种“强制”类内容，身份证的被迫出示已经算是小事。童之伟教授法律意见书中指出来的内容已经属于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对公民的住宅、财产和隐私等权力已经全然不顾，所以他才说，必须停止，否则就是法治的灾难。

让人感动的是，童教授的法律意见书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共同签署法律意见书的有20多个法学教授，一位姓桑的法律教授还提出了修改意见。应该说，这是凝聚了我们国家法学界共识的公开信，他们告诉大众：这些罔顾公民自由的防疫措施没有法律依据，是在乱搞。

但是这一篇文章在网上只生存了很短暂的时间就被平台删除了，而随着新浪微博大量为童之伟教授鸣不平的舆论升腾，童之伟教授又被禁言了，他曾经写过的七千篇文章也消失不见。

荒诞吗？一个研究《宪法》的专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民为政府普法，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法可依，心怀苍生的，因为在他背后，本来有一个最大的靠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而现在，这个靠山也要被推倒了！

我替网信办和有关部门归纳这删帖和禁烟的理由可能属于“《宪法》在寻衅滋事”，《宪法》的条款触犯了政府临时出台的各种说法。可笑！

再看童之伟教授这批法学家，在中国几十年里都致力于让国家在《宪法》这个根本大法框架下建立起一个法治化的国家治理形态，他们的理念被称之为“立宪主义”。这个背景是，1949年新中国的“政权的合法性”源自“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本身不是通过《宪法》组织起来，而是通过用暴力手段夺取的。这样一个革命的政权在改革开放以

后，随着体制上的逐步变革，也到了从法律意义上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将革命政权转化为宪政政权的时刻。当然，这个过程很缓慢，但过去40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法治的概念在一点一点地深入人心，通过“立宪派”学者的著书立说和媒体的推动，民众感受到了法制的进步。

而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也要做调整。首先应该把自己放在《宪法》体系下，按照法律的框架来执政。全国人大首先应该成为一个“代议制”的机构，其次，政府的预算管理要严格按照全国人大审定方式来执行。再比如《刑法》，过去我们只提打击犯罪，后来逐步行进，就把维护人权的目标也写进了《刑事诉讼法》，我们也把西方的先进理念，比如非法证据排除、避免双重危机这样的司法理念逐渐引入《刑法》了。

再比如，我们重新建立了《物权法》、《民法典》，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进步，应该说，大家有目共睹，看到我们国家在缓慢，但比较坚定地向着一个法治甚至一个宪政的方向在发展。概括而言，“立宪主义”对于政府的治理方向的推动是沿着“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方向去的。

也就是说，政府所有行为都必须有法律明确的授权，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合理性，才可以做，这是“宪政主义”的核心，也是“立法主义”的核心。

而“立宪主义”对于公民的权利保护，和对政府的要求恰恰相反，它的重要原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公民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不受干预。

如果这两点可以慢慢地贯彻到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从一个革命性的政权慢慢过渡到一个“宪政”政权。

可是，疫情来了，我们感受到的缓慢进步似乎戛然而止，过去四十年积累的法律体系下对公民权利点点滴滴的保护措施骤然失效了。连在上海这样一个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和文明治理程度天花板级别的区域，竟然也出现了一人阳性，全楼转移的荒谬政策，也可以随意让市民交钥匙去侵入民宅“消杀”。如果没有童之伟教授这样的发声，政府似乎可以堂而皇之了。

这是法治的灾难，是童之伟教授等立宪主义者心痛的地方。

如果今日上海有这样的大踏步倒退，那“立宪主义”在中国还有前途吗？期待中国变成一个真正法治化的国家，还有可能吗？

恐怕谁都无法说出答案。

5.12中国人民大学退出QS世界大学排名

本月上旬，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被曝退出QS世界大学排名，引起社会热议，大家的问题是，这是人大在追求自我发展，还是要与世界脱钩？

QS世界大学排行榜是历史第二悠久的全球大学排名，虽然近年来也被外界诟病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但至今也仍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比如在日本要申请高度人才签证的话，在加分政策中毕业院校被三个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2个列为全球前300的，就可以获得加分，这三个世界大学排名体系中第一个就是QS，所以说，QS在国际上是比较被认可的。

而人大要退出国际搞笑排名的事情其实2020年时就已经放出风声了，他们的计划是，不仅要退出QS，还要退出其他的国外评估机构的评选。那当然是因为，实在太委屈，在全球

大学的排行榜上，人大似乎总是得不到恰当的评分，比如在QS榜单中，排名始终徘徊在600多位，掉在清华北大后面是正常的，但他们不解的是，很多在国内排名远不如他们的高校，比如深圳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也在他们前面。

这跟人大的自我认知反差实在太大了。

给大家讲个故事。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2003年，清华的荷园餐厅和北大的农园餐厅突然在同一天先后炸了，清华大学是上午11点多炸的，北京大学是下午1点多炸的。中国最著名的两个高校发生这样的连环爆炸案，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北京市的其他高校也都非常紧张，因为作案手法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干的，如果他继续作案，那也不是没可能。当时北京高校里的最紧张的是两所大学，一个是北师大，另外一个就是人大，他们非常紧张，怕什么呢？怕下一个不是自己，是对方，那就太丢人了，因为他们都自评为北京第三大高校。万一犯罪分子炸

了对方，那就表示，排名第三的美誉被犯罪分子送到别人家去了。

当然，这是笑谈。当年犯罪分子似乎没兴趣找第三名，他炸完了清北就回老家了，不久就被公安机关抓获。

北京高校云集，互相心里排座次是众所周知的，人大认为老三的位置当仁不让非我莫属，北师大却也未必服气。就说QS排名吧，北师大多年稳定地排在200多位，甩了600多名的人大几条街。人大怎么想？他当然觉得这世界大学的排名不客观。

排名如何客观，这是个大学问，我无法回答。但人大是否优秀，我挺愿意分析一下，首先，我会想到十几年前的人大往事。

不知大家是否知晓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是谁从意识形态角度给予了理论支持，还著书立说高调宣扬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他对薄熙来助力颇多，不仅为重庆想出了

“共同富裕”的主题词，也力挺薄熙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占领高地。

纪宝成自己就是人大经济系的研究生，后留校担任教职，专业没有继续往纵深发展，但仕途非常顺利，九十年代他担任了十年国家教育系统的干部后，2000年回到人大当校长。应该说，他对人大肯定是很有感情的，所以他决定发奋图强，让人大更上一层楼。根据学生对他的印象，这位校长非常有经营智慧，“清华梅贻琦一直有‘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老纪则提出了大楼、大师、大气，一个都不能少的办学理念。”所以这位纪校长在任期间，人大的基建改造搞得轰轰烈烈，国际交流也频频开展，至于大师，据说来了不少名人，却也走了不少骨干。

除了经营学校，这位校长也经营自己，“老纪一直在副部级大学校长、商学院教授身份之外，谋求一种突破，而他渴求突破的领域，也许比长袖善舞、跑资源谋发展的能人校长身份更重要”。于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纪宝成想要做的重大

课题和重庆模式相遇了。在薄熙来想要争夺最高权利的时候，他急迫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找到与他现实操作相匹配的理论，以合理化重庆模式。当时他找了不少高校，但没有人理他，最后终于和纪宝成一拍即合。

2010年10月，纪宝成率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考察团赴重庆考察，跟重庆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回到北京后成立了重庆研究院，搞了重庆课题组，当时，人大的老师可以到重庆去挂职，重庆的官员可以到人大去进修，如此密切的合作，让他们很快有了知识成果，2011年10月《重庆新事》一书出版，纪宝成亲自担任主编，在序言中，他写道，“‘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重庆新事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潮中留下浓浓的一笔”。

通过纪宝成的资源整合，人大为重庆打黑模式包装上了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的精美装扮，这个过程在当时还颇迷惑了一些人，让薄熙来俘获了不少民众的心。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其实一个大学的水平，有时候通过一些典型事例能直观地看到一些。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也不是整个学校的事情，但这样事情也会影响一个大学的声誉。不需要西方大学来排名，就在国内，在人心内排一排座次，很多人也会一目了然。

事实上，国际机构的高校评估标准的确和国内高校现实情况不匹配。比如说QS排名，其中的权重主要是以下几个内容：第一，学术声誉，由全球高校间互相评价，第二，雇主声誉，是由雇主对毕业生(进行)评价，然后，是论文、文献的引用率，还有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的比例等。这一套体系在西方大学内部评价没有太大问题，但用以评价中国大学就会遇到问题。比如说雇主声誉，在2011年的时候，人大的学生毕业之后都到重庆市政府就职了，你能说他声誉不好吗？但这能说明人大的学术水平高吗？再举个例子，中央党校，那他们的毕业生雇主评价绝对高，一般来说，都得是县长、县委书记以及更高

一级干部才能在那进修，进修之后，平步青云，他的雇主评价能不高吗？肯定高。但这能说明中央党校水平吗？

由于有了这水土不服的全国高校排名，咱们不少高校也开始要搞国际化，弄出了不少笑话，比如QS的评选内容中有一条国际生和国际教师的比例。为了充门面，我们很多高校就大量招非洲留学生，不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毕竟这些区域招生相对容易。有些大学优待留学生的政策也优厚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不仅给高额奖学金，还有陪读生，甚至网上传言，某高校设置了专门陪男留学生的女生，就为了完成留学生占比的问题。而这一项占整个QS测评5%的权重，为了整体排名上分值拉高，很多高校在每一项上都得费尽心机往上冲，留学生这个分还好拉一点，努努力，说不定要比中国人民大学高出好多名次去。

说到这里，其实也是想对人大退出QS排名说一声：理解。我们和国际上的不少排名完全不搭，水土不服。他们的权

重系统里，有的事儿咱们接轨得了，有的就比较费成本，还有一些，跟咱们的大环境不匹配。

反过来，咱们觉得重要的事儿，人家可能不以为然、莫名其妙。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高校教室里面，有高清摄像头，大学老师上课全程录像存档，这在全世界可能都绝无仅有。可能只有金日成大学能理解这种举动，只是他们的经济条件有限，估计不一定买得起海康威视或者大华，毕竟，把摄像头装得满世界都是也是需要花好大一笔钱的。但中国的大学被要求必须花这个成本，好听点，这是智能化配套，迟到早退都能被发现，丢了东西能找着，但另一方面，老师课堂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盯着，可以随时复盘，找你毛病，那是不是挺可怕的？这算不算是大学的优越性呢？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教我们中俄关系的老师是从文革过来的，对文革心有余悸，他说文革时候的课堂上，所有教师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怕说错话了就要挨批，甚至会失去工作，下场会非常惨。他们见到了很多教师被批斗，整个文革期

间，北大有20多名教授跳楼自杀，何其恐怖？因为这种往事，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阴影非常严重，讲课也相对保守。其实研究生阶段，教师完全可以自由引领学生在学术上面有自由见解，进行创新，但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胆量了。

那代人已经退休，现在被全程录像的当代高校教师难道会觉得处境比文革好很多吗？君不见我们在网络上屡屡看到学生举报老师说错话，表错态，之后教师被处罚，丢了饭碗，甚至社会性死亡的新闻？一种新的恐怖色彩已经在各个大学蔓延了，你不知道课堂上除了监控之外，还有哪个学生在持续关注老师的一言一行，一旦你被发现授课内容和教学大纲不符，你的延伸性讲述中有对社会现状不满，对执政党不敬的，那你就危险了。因为学生里面，有被授意甚至奖励的“埋伏”、“监管者”。

前段时间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有个女教师在课堂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和战争仇恨表达自己的看法，说30万遇难者的数字因为没有实际性史料支持，更像“民间说说”，而对历史不

能带着永远的仇恨心理，应该去反思。这些言论被她的学生拿着手机全程录下，学生边录边说，举报她，给她发微博。这名学生将视频发到微博上后，可想而知，该名老师很快就被学校给开除了。

这事情还有后续是，因为对这名女教师的言论表示支持的湖南女教师李田田被当地教育局和派出所要求前往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而深圳大学一名教师因为转发2015年《人民日报》文章《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一文，批评举报震旦女教师的学生是小人，也学生告发，说老师“将国家的根本底线抛在了对立面”……

从这些新闻中，你可以读到，现在的大学是什么氛围？现在高校里的老师有多少自由发表个人观点的可能？一点都没有。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中国的高校去参加西方世界的全球高校评估系统，有意义吗？

你看不到目前学校的学术水平，因为教师释放不出真知灼见，你也看不到真实的雇主声誉，因为每个评价背后还有复杂的背景，你看留学生占比，那可能只是看到了这个高校花了多少代价给外国学生制定优惠的报考条件。所以，去参评没什么意义。

据说，目前国内除了中国人民大学，还有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也已经退出了排名系统，后期也会有一些高校陆续退出，但更多的高校还是热衷排名的，原因是，他们的参与得到的正向反馈更多。

比如排名在不断提高的北大和清华，现在已进入到QS排名的前20，在亚洲是最高的，已经超过了东京大学。那这个榜单对他们而言就是实力显示了：我跟国际接轨了，而且我不比别人差。事实上，中国真正的一流大学的确是朝着国际标准在发展自己，提高学术水平，加强国际交流，培养大师，奋勇争先。整体而言，中国真正第一梯队的大学在各类全球大学排行榜上，是跃升的。

只是，在文科专科领域，可能就很难做到举世瞩目了。

这个原因，就是前面说的，我们的导向不是给教师百花齐放的空间，而是引领学生一起去限制教师的言论自由。这种“发动学生斗老师”的方子我们很熟悉，后果也可以想见。

最后，我认为中国人民大学退出排名是非常正确的，境外机构根本无法揣度人民大学优秀与否，糟糕与否。

再说回昔日600多名，说不定跟纪校长留给人大的“功德”有关。一个没有摆正心术的校长能带来优秀的学术水平吗？当然，随着重庆模式的垮塌，纪宝成校长的结局也就可以想到了。据说薄熙来出事那一天，人大正准备搞重庆唱红打黑的成果展，听闻薄倒台的消息，学校赶紧撤展。但纪校长肯定已经知道，他的结局不会是红，可能是黑。

5.14北京的“动态清零”政策注定会失败

北京城这两天乱套了。

2022年5月12日，北京人都听说了，要封城，连封三天。

老百姓还能怎么办啊？囤货啊。就这两天，各大超市又人满为患了，大家伙都去抢菜、抢米、抢面。这不是北京市民第一次这么抢购，20多天前抢购过，半个月前也抢购过，只是这一次大家积极。新闻照片里，市民一边抢菜一边看超市里的电视，因为电视里正在放北京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到底宣不宣布封城，大家都等着，你们如果一声令下，封，我们赶紧结账回家，不封，那放下点吧，囤多了也没意思。

大家都已经有战斗经验了，见机行事。毕竟，上海疫情的前车之鉴都在那儿摆着呢。

半个月之前北京市民抢购就是因为看到上海市民的防疫情况，不少上海市民没囤够，太大意了，后期不够吃，所以北京市民都是宁可囤多，不可错过。当时我还发过一个帖子，我的老单位中央电视台，录节目的主持人在演播厅里说：北京市民们不用恐慌，不要抢购物资，可就在中央台自己办的餐厅和超市里，员工已经把食品一抢而空。

这不是说央视员工虚伪，主持人念的是政府的声音，走下演播厅还得过老百姓自己的日子，虽然政府三令五申安抚群众，但信不信，老百姓观察的是社会现实。

又说起上海的前车之鉴，最初上海市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不也是言之凿凿说：不会封城，可说完没多久就封城了，一开始封城的时候说，浦东和浦西分开封，错峰封控，尽量不影响群众正常生活。结果呢？一个多月了，到现在，上海市也没有彻底恢复正常。所以，任谁敢轻信北京不封城，只封三天？

要真是只封三天的话，说实在的，确实没有必要抢菜，一般家庭冰箱里都不会缺过三五天日子的食物，可大家仍然去抢菜，无非是觉得，可能不止三天。

其实，如果我仍在北京生活，还真不会抢菜，因为这里是首都啊，北京不至于物资匮乏到连菜都供应不上的程度，这一点我绝对有信心，因为北京是什么地方？它是一个只能由其他城市牺牲来力保的城市，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谁都可以不正常，唯独北京得全力正常运行。

回顾疫情以来，北京市市民的生活受到的打扰是最少的，所有的风险，其实都分散到北京外围去了。有人要说了，怎么没有被打扰啊，国际航班都不正常了啊，您想，这是为什么？因为国际航班风险大，让其他城市承担吧，有大连有沈阳，有青岛也有西安，坐航班的人少，城里力求平安的人多嘛。不止国际航班熔断了，客运、铁路也是，跟首都存在直连的所有地区，只要出现阳性，所有相关交通路线立刻中断。所以你想想，任何一个哪怕是不带星地区的人要有去北京的正常诉求，他怎么去？插翅难飞。

北京通过各种断舍离，通过健康宝和弹窗，成功地把境外的输入性病例阻隔在外，把外地病例阻隔在外，也通过各种手续成功阻止了不带病毒的人也别想顺利进京。

北京市要安全，就得真空，这苦了周边的城市，也苦了有正常生活工作要来往北京和其他地区的人。最典型的是和北京通州只有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因为房屋售价和租金便宜，那里集聚了大量的北京打工人，原本他们每天坐着公交地铁就可以往返，政策一严，他们上着班就回不去燕郊的家了，或者住在燕郊的人去不了北京上班了。因为北京把燕郊当成了屏障，所以多次在燕郊本身全城无阳性的情况下封城，阻隔了走燕郊进京的道路。

北京周边地区不叫地区，就叫北京的屏风。

所以说，北京是一个可以让其他地区城市付出成本，自己稳坐军中的地方，北京的市民应该有更高的安全感，抢菜的确没有太大必要。

可是，也有北京市民告诉我，他们抢菜是怕防疫过度，出门买菜太有难度！

这倒是有一定道理了。

因为保北京不仅要把病毒阻隔在外，还得针对任何一株挂万漏一的病毒下手。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内的防疫力度也是空前的，新闻上朝阳区的区长说，他要下社区，还立下军令状，疫情不解决他就不回去。北京市餐馆基本全部禁止堂食，只能外卖。可能聚集人的商店、写字楼、电影院、博物馆，都关了。想要进入任何带屋顶的地方，都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报告，您说，这虽然没有封城，出个门进个楼都那么难，谁乐意常出门？

更让人无奈的是，即便如此草木皆兵，可病毒还是长驱直入了。最近几天，北京的疫情数据开始攀升，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还能再怎么阻绝？怎么动态清零？我想说，拉倒吧，别费这个劲了。全球都知道，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染性实在是太强了，跟早期武汉的病毒株包括德尔塔毒株比起来，它的传染性已经提升了一个数量级，你

隔断所有交通也好，内部核酸也好，都无法铁桶一般阻断病毒，而全城静默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如果今天我们只是猜测，未来经济数据出笼的时候，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们还要再为动态清零作更多的努力吗？我们的努力是在跟自然规律对抗，会有效吗？如果武汉疫情后期的封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一个成功的经验，那我们要不要把这种经验当成克奥密克戎的宝典？

诚然，武汉和湖北其他城市封城对于当时遏制病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举世公认当时中国控制得非常好，但这一次情况变了，你们还要路径依赖？病毒变异后，阻隔方法已经明显收效甚微了，为什么还是用静默、封城为手段？

前两天，一直力挺中国，称赞中国在武汉疫情期间作为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跟中国专家交流的时候表示，现在再采取这种清零的方式来对付奥密克戎，不现实。他建议，要通过逐渐开放的方式来对付奥密克戎，最终把新冠病毒只当作一个流感来对待。

我想，这是谭德赛代表世卫组织以专业视角来跟中国对话，他在提醒我们，目前的防疫措施很有可能是徒劳，因为你已经是在跟自然规律对抗，结果就必然是失败。

我们中国人“人定胜天”的亏吃得还少吗？“大跃进”的时候因为不尊重自然规律，以为可以改天换地，结果呢？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民众、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就拿“除四害”来说，人人对麻雀喊打喊杀，后面麻雀少了，病虫害反而变多了。麻雀当然吃粮食，其实人家同时也吃害虫啊，再说“亩产十多万斤”，连钱学森都写文章论证，说理论上太阳的光合作用只要能利用40%，亩产十多万斤就不是不可能。

如今的动态清零，和“大跃进”的荒谬如出一辙。

如果北京仍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动态清零的话，我们可预见，结局注定失败。

5.15我的文革家史

今天，2021年5月16号，55年前的今天，中国掀起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浩劫，文化大革命。

在这个至今不能在中国全面讨论的话题上，很多历史学者以他们的努力在复盘这段岁月，而作为这个大事件中还残存着一些记忆的小人物，我想回忆一下我的家庭在文革中的故事。

我的名字王志安，最后一个“安”字来源于文革中我母亲的遭遇和我父亲的期望。

1966年5月16号文革开始，次年，我母亲怀上了我，家里的第四个孩子。由于我母亲娘家的成分不好，是佃富农，也就是说通过租赁了别人的土地，但最后又变成了富农的农民，按照中国土改过程中对于农民成分的划分，这也属于有剥削行为的阶级，所以我母亲在建国后就一直备受歧视，好在我父亲成分还可以，在单位里又是个干部，

所以文革前我母亲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文革后武斗开始风起云涌，我母亲虽然是个身怀六甲的孕妇，也还是被革命小将盯上了。

我母亲怀孕六七个月时的一天夜晚，一户朝鲜族邻居闯进了我们家，上来就质问我母亲，说你属于地主残余，富农后代，是阶级敌人的残余。当时我父亲被分配去陕西建设三线不在家，我母亲性格刚烈，没有丈夫在一旁也照样针尖对麦芒，双方从争执变成肢体冲突，结果他们对我母亲一阵拳打脚踢，其中一脚踢到了我母亲的肚子上。踢完后，他们扬长而去，幸亏有别的邻居帮忙，当晚把我母亲送到了医院。

医院的医生因为半天听不到胎心，说这孩子大概率是保不住了，让我母亲住院观察两天，幸亏两天后终于有了微弱的胎心，于是我母亲回家卧床安胎。而我父亲直等到我出生才赶回。

我母亲说，我一落地就能看出来，下肢跟上肢不一样，不是舒展的，而是近乎萎缩，用东北话说就是抽抽的样子。我父亲看了以后

特别心疼，不知道我能不能健康长起来，于是就给我名字里放了一个“安”。

说文革家史前，先说说我父母在文革前的动荡吧。

我父亲是1950年左右参加的工作，在鞍钢一直工作到1958年。

1959年全民大炼钢，我母亲也参加了工作。但从1958年开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的动荡，我父亲多次调动转移。首先是“大跃进”的失败后鞍钢负担不了那么多职工，在1958年5月，由一部分领导带着职工疏散去筹建酒泉钢铁公司。到那儿才干了两年，1960年12月，由于自然灾害及国民经济困难，中共中央西北局开会后决定，缓建酒泉钢铁公司，我父亲又没活干了。厂子里为解决职工吃饭问题，再次疏散职工，移工就食，52000余名职工中大部分调往全国各地，只留下了1900名职工留守酒泉。而我们一家人就在这过程中从酒泉搬到了新疆石河子，在新疆建设兵团待了几年。到了1964年，因为中苏关系交恶，中国开始搞三线建设，东北重工业企业又开始把散到全国各地的职工招回来，于是我们全家又从新疆又搬回了吉林。到了吉林没多久，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

我父亲的单位属于冶金部，冶金部在陕西小秦岭地区发现了一个金矿，于是我父亲单位的职工就从东北再次前往陕西开始建设所谓的矿场。当时我们这些家属仍然被留在东北，我父亲在陕西被编入建筑工程队伍，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给那个金矿建选矿厂，建设备，建完之后移交给金矿去运营，这个工程建设公司再转移到下一个地方去。我母亲怀着我被踢到肚子就是这个时候。到了1968年7月，我三个月的时候，单位让三线建设者的家属共同搬迁，几千个家庭全部移居到陕西。于是我们家就再度举家迁徙，从东北搬到了陕西的潼关县。

在这次大迁徙过程中，我父亲让全家在北京作了个停留，他们在大栅栏旁边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一周，在附近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全家福：我爸妈，我哥哥和两个姐姐，三个月大的我被我妈妈抱在怀里。

这是我们家在文革十年里难能仅有的平静幸福时光。对我父母而言，后面的文革岁月，主题剩下了蹉跎二字。

我父母的单位因为是整建制搬迁，所以人口众多，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除了上班工作在一起，单位还建设了食堂、学校、医院、理发店、澡堂子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家几乎不用跟本地人打交道，相当于把一个东北小社会整体挪移到了陕西。

本来大家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应该团结，但文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一到潼关，大家就感受到武斗的激烈了，工作基本上干不下去，每一个小单位都分成两派甚至许多派，天天斗来斗去。我母亲告诉我，我们家住的那一排平房刚开始时就专门负责集中关押阶级敌人。有一天，我母亲听到隔壁有惨叫，她过去一看，那里关了一个分配到我爸单位的大学生。那个年代，大学生是非常很稀罕的，可他到了单位以后，却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被打成了所谓的反革命。这个年轻人跟我妈说，大姐，我渴，能不能给我一口水喝。我妈回家就给他倒了一杯水，可第二天，这年轻人就死了。这是我妈印象特别深的事情。

各派之间的打来打去有时候还闹出很多笑话。我爸单位里有一个人被起了一个外号叫“十八层大裤衩”，原因就是这个人多次在两派

之间斗争时，被抓了挨打，来来回回几次挨皮鞭挨板子，他受不了了，他老婆心疼他，给他做了很厚的裤衩。后来有一次他又被暴打时，被打他的人发现了情况不对，说他挨打的喊声没有平时那么惨，为了一探究竟，人家就把他外裤扒下来了，这就发现了他的秘密：他穿的裤衩非常非常厚，一数，一共十八层布缝了起来！于是，他的外号就定下来了：十八层裤衩，这个笑话后来广为流传，几十年了大家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其实想想，这真是笑中带泪的故事。那个时代，又有多少人能逃脱被侮辱和损害呢？

我自己对文革没有太深的印象，因为文革结束那年，我也才8岁，我惟一残存的印象就是毛泽东去世。

1976年9月9号，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天突然发现所有大人在哭，路人在哭，老师也在哭，目力所及，每个成年人都在哭，小孩子不懂发生了什么，就去问大人，可没有一个人回答。回到家，我父母也在掉眼泪，我当时的猜测是：这个世界是不是要完蛋了？否则为

什么大人都哭？后来单位大喇叭里哀乐传来，大人终于说了，毛主席死了。

回头看那天那一幕，至今觉得，那似乎像一幕世界末日。一个人的死亡，令所有人悲痛且失措，可见当时中国人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小时候玩甩叠纸游戏，一种厚厚的，最好是水泥袋子纸做成的纸叠，四四方方的，啪一下往地上摔过去。因为水泥袋子少，我们就常找报纸来叠，但我们互相之间会检查，如果谁叠的报纸上有“毛”这个发音的字，那就完了，直接从游戏出局。看，在那个年代，连小孩子都自觉地把毛泽东当作封建帝王一样要有“讳”。

除了这些孩童心里的印象，以及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大家都上街游行，声讨王张江姚，这些我有印象，其他我都不记得了。

现在说起文革，我能从父母身上感受到的，就是“蹉跎”。我父亲这一辈子基本上没干出什么像样的工作成果，他退休前身处于毛泽东领导的“伟大时代”，天天政治学习，然后批斗，批斗完了再政治学

习，周而复始，没有本职工作，全是政治事件。三线建设中陕西潼关的选矿厂如果按照现在的工程建设速度，估计一年就能干完了，可我父亲他们那个单位从搬到那里，一直到文革结束都没建完。直到我考上大学，要离开那里的时候，那个工程才基本建完，前前后后用了18年。

所以，我父亲这一代，是被牵着鼻子走的一代。政治斗争侵占了他们所有的时光，没有事业，只有整人和被人整。

后来我在北大读研的时候，专门有一门课叫做“北大清华与文革”，其中说到北大清华两个学校著名学者组成写作班子叫“梁孝班子”，他们专门在一个叫“北招”的招待所给江青和四人帮提供写作，对于这个写作班子，大家没记住什么作品，只记住一个传说，说那里的学者可以每天吃香酥鸡。

文革让所有人从可以有所作为变成混乱度日，让他们从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变成垂垂老矣一事无成，还让有些人从善良变成邪恶，让

有的人从生变成死，它闹出了无数的笑话，更摧残出无限的血与泪。

55年过去了，这个可怕的时代彻底走远了吗？我不知道。

我为父亲喟叹他生在毛泽东时代的悲哀，也感慨自己遇到了邓小平时代，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倚赖谁来主宰这个时代，我们应该靠法制，靠刹车机制来给社会带来安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安全感。

1976年9月9号那天，我只有8岁，没有看懂周边大人的痛哭流涕，后来我在史料中看懂了，其实党内高层很多人都明白，只有那一刻来临，权利的方向盘才会离开那个伟人的手。虽然中国人对他报以眼泪，很多人对他至今难以辞别，但从那天开始，中国离开了一个长期固化的权力结构，正所谓方死方生。

5.15战狼赵立坚是国家的负资产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这几天用他一贯不得体的傲慢又给中国丢人了。

针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跟中国防疫专家交流时说的“用动态清零的方式面对奥密克的这种方式看起来不可持续，应该在适当的时机改变动态清零的防疫措施”的观点，赵立坚对媒体点评，说：“谭德赛的话，是不负责任的言论”。

这话说得很重，人家是世卫组织总干事，不说他在武汉疫情期间对中国有力挺态度，就说一般而言，对全球性组织的官员，你就随随便便点评他“不負責任”，你这话負責任？

事后我去查看外交部的官方网站上对这段新闻发言稿的发布，把“不負責任的言论”这句话拿掉了，不过，在凤凰网的报道里，这段话仍然被留了下来。对比可见，外交部也觉得赵立坚的发言不太合适。

对于赵立坚这个人，我前段时间在推特上发了一段话评价他，赵立坚日常说话就像北京胡同里的小流氓，他能把每一句话用非常难听，极其粗俗傲慢的方式说出来。我不是外交部受过礼仪培训的专业外交官，也知道普通人之间得有基本的对话礼貌，你不同意谭德赛说的话，也可以把话说得委婉文明一些，比如“我们尊重谭德赛先生的观点，但是中国对疫情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们有办法处理,有信心取得胜利”。这是不是就悦耳多了？

这几年赵立坚“金句”快成为外交部“一景”了。不知掉外交部内部是如何评价他的得瑟的。

比如有一次在答记者问时，他翻着白眼说，“你们这些外国记者在疫情期间能够生活在中国，就偷着乐吧”。这发言水平，像不像农村里抠脚大汉说的？还有一次记者问，“你觉得俄罗斯对乌克兰是入侵行为吗”？最开始赵立坚说，“我们中国政府早就表明过态度了”，试图躲避，但彭博社的记者又站起来提问相同问题，赵立坚脸上就挂不住了，说：“你们老纠缠这些有意思吗”？你瞧这些话，像是一个外交官说的？而且还是一个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的。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汉语体系里面有雅言和俗语，一个人受了教育以后，得说雅言，虽然现代汉语中，雅言和俗语之间界限渐渐模糊，但无论古代现当代，在公文书写和上流社会的交往语境里，没人会说俗语。不止中国，东亚文化中，韩语、日语中的敬语都是十分讲究的，象征着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基本素养。

可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用乡村野夫的语言体系和肢体表情面对全球媒体，这合适吗？他难道不知道，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自己代表的是外交部，是中国。泛滥的俗语和不得体的表情展现你赵立坚个人的粗鄙也就罢了，现在是有损国格，成了笑话。真是难以理解，赵立坚这样一个像小混混一样的人，怎么当上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不过，这几年的外交部，除了赵立坚，其他几个发言人虽然仪态好点，语言组织得没那么粗鄙，但发言水平体现的外交素养也是一个比一个表现差，你可以说他们态度强硬，但也可以评估为无赖傲慢，总体气质慢慢有一种膨胀之后的我行我素，这几乎可以说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集体无意识气质了。

不止是新闻发言人，中国驻外的一些外交官也开始有“赵立坚气”。比如，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基本是“小号赵立坚”，针对俄乌

战争，他在网上发表言论：“一个弱者，永远也不要办愚蠢的事情，不要招惹强者，否则没有好果子吃”。这是在赤裸裸地宣扬丛林法则啊。全世界都在谴责俄罗斯作为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践踏国际法，声援乌克兰，你这个时候想跟着外交部的风向走我可以理解，可你的语言里表露的是什么价值观？“因为你弱，你就别蠢”。你在作为一个外交官，随意把“强”与“弱”拿出来说是，毫无“是”与“非”的分辨，还洋洋自得？

如果他这个道理说得通，那在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时候，还要国际社会主持公道干嘛？新中国为什么积极回到联合国，为什么要联合国来维护世界和平？如果我们的外交官奉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种强弱逻辑，不需要是非观念，那我们向整个国际社会传达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

看到这样的外交官形象，我真的在厌恶至极之外替外交部、替全球华人害臊，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么低素质的人现在还频频出现在媒体上，拉低整体中国人素养形象。

也许这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真的想“战狼”外交？

我想起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一个故事。他平时在外蒙古做事，遇到甘肃省领导到外蒙访问，想跟外蒙谈边贸。因为甘肃省跟外蒙古有60多公里长的一段边境线，他们想在边境开个口岸，所以到了外蒙之后就委托我朋友他们代为约见外蒙古的外交部长。然而他们见面时，却遇到中国驻外蒙古大使馆的一个秘书用手却指着外蒙古的外交部长破口大骂，原来，在他们见面之前，有一个外蒙古青年在中国境内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深圳警方羁押了，外蒙古天天给中国政府发照会，要求释放该青年，一个多月之后外蒙青年被释放送回外蒙古，可蹊跷的是，回国第二天，这个青年就死了。由于他曾被中国的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外蒙古就怀疑这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想跟中国政府交涉，于是引起了那位中国驻外蒙古大使馆的秘书的不满和呵斥。当时甘肃省的代表团和中间协助联系的商会人员都愣住了，尴尬至极，不知如何自处。事后使馆的人讲，现在他们的上级指示他们对待外事工作，立场要强硬，一定要强硬。

我想，强硬和粗鲁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强硬也得有道理支撑，没有道理的强硬就是颡预粗鲁，不仅体现不出大国风范，还自取其辱。

回顾过去，建国初期，当中国不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承认的时候，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时，美国著名的冷战骑士、国务卿杜勒斯曾下令与会期间美国代表团，任何人不得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周恩来总理的主动和礼貌大家都看到了，而杜勒斯不允许握手的姿态大家也看懂了。这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掌故，这件事情谁得分，谁失分呢？显然是周恩来得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分，杜勒斯失分了。

而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下飞机的时候，看到迎接的周恩来就主动把手伸出去握手，周恩来说，“你的手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跟我握手”，这些细节里不仅体现了双方的风度，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周恩来当时在国际上为中国赢得的形象分是其他人比不了的。

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兼任外交部长，那段时间中国外交政策是不是更强硬？但是周恩来可以把这种强硬表现得被西方社会接受，甚至加分，这就是技巧。

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这些外交官，他们表达强硬的方法可能取决于他们的内涵，而效果也可想而知。

针对外交部现在的强硬外交、“战狼外交”，我还有几个观点：首先，外交部不是国防部，外交部总体是交朋友的，国防部彰显实力才是王道。所以国防部有的时候可以适当地表达一点强硬观点，这是每个强大国家的武将都会有的强硬。比如中国军队秀肌肉的时候，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就会出来走两步说几句。这个大家都理解，但外交部你恐怕更适合点到为止。其实，不同国家的外交官之间，即便在两国关系特别紧张的时候也不应该把私人友谊变得剑拔弩张，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时移势易，外交官应该随时准备交朋友，这一方面是体现国家的善意，另外一方面，有很多信息也是通过私人关系才能获得的，有时候两国僵持不下局面的冰释也需要私交来进行缓冲，这在国际外交界是屡见不鲜的事。

其次，外交部即便是想表达强硬立场，也应该用文明的方式表达，这是文化输出的一个方面，用粗鲁的方式口无遮拦地想说什么说什么，有时候沦为小丑。

再次，所谓的战狼外交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现在强大了，不需要像过去那样韬光养晦。我们在邓小平时代的整体外交策略是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现在中央政府决定一改气场，要处处秀肌肉，一

言不合就树敌，这样真的好吗？我们是不是误解了“强大”真正的内涵，把“秀”的内容简单化了？我们如果真的想要获得别人的重视和尊重，是不是要履行好我们在国际社会应履行的职责，比如积极地主持公道，积极输出举世公认的价值观？

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的很多老同事在香港做直播，他们说可以感觉到普通香港人看到英国的国旗降落，英国人离开香港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100多年殖民地的历史，让港人对英国人不无感情，因为在这段殖民历史中，英国给香港带来了一些无形资产，比如香港的法治，比如香港的文官制度、社会治理体系。和百年前的香港相比，1997年的香港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之珠而它的繁荣发展，当然也离不开英国的殖民者。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对殖民者歌功颂德，而是想提醒国人，要赢得尊重，你必须有更高阶的价值观输出，在尊重对手的同时展现强大。而真正的强大，不需要露出腹肌。

最后我想说，今日的赵立坚之所以膨胀到如此不得体，也跟国内很多网民、小粉红的呼吁有关，他们对于赵立坚式的没轻没重大加褒奖，感觉很“爽”，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强大到“爱谁谁”，“我强我有理”的阶段。这些网民其实应该被好好教育。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用

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另外一个国家说话，那也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太可能用平等的态度对自己的国民好好说话。强硬的习惯一旦养成，国家机器的粗鄙就不会分对象实施。

我们可以看到，自认为强大的俄罗斯无视乌克兰的主权入侵乌克兰，而它对自己的国民如何呢？他们已经不懂何为善待了，因为他们权力的边界在欺辱他国的过程中已经消失，他已经“强大”到所有人都应该听我的。“生活在我俄罗斯，你就偷着乐吧”，这是他的心得。

自负的赵立坚能代表外交部走多远？我拭目以待，衷心希望外交部早点认识到，他这样的战狼，不值得珍惜，他代表的，只能是国家的负资产。

5.16东方之珠，风采何在

2022年5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上刊登公告《李家超高票当选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虽然各大官媒时效性很强，点票直播的同时，通稿发得很快，但市场类媒体对这一则新闻反应一般，甚至在很多媒体上都没有成为头条，跟以往几届香港特首当选的时比，得票率99.16%的李家超得了个寂寞。

大家不觉得这是新闻，因为这届选举没有悬念。尽管过去几届香港特首选举，大家也能预料到当选人，但在形式上，至少还有一些竞争者，林郑月娥当选时的竞选对手曾俊华也很得选民欢迎，获得365票，林郑月娥以777票胜出。而这一次，李家超是惟一的候选人，出席投票的1428名选委中，只有8个人投了反对票。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评价李家超高票当选的原因：“充分反映香港社会对其高度认同和肯定。”这话类似于说金正恩每次百分之百当选是因为得到全北朝鲜人民的一致拥戴。

其实选举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因为这次特首选举是2021年中央政府出台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执行的第一次特首选举，谁能做得到候选人，谁就是中央政府看上的人。

2021年3月，全国人大宣布的香港选举制度修改案要基于习近平强调的“爱国者治港”原则，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最核心举措，就是把选举委员会的资质作出了巨大改变。

现在的选举委员会有五大界别，比之前增加了一个界别，每个界别的分组席位规定也被修改。比如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的300人里，加了15席中小企业界小组；第二界别专业组里的300席中，原有的“社会福利界及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被并入了另外一个小组，席位从60减到30，而高等教育界席别被彻底取消。

还有，第四界别里面原有的区议会议员互选产生的港九区议会（57席）及新界区议会（60席）遭到取消，由扑灭罪行委员会、防火委员会这种组织取代，另外加入27席内地港人团体；最体现“爱国者治港”的是第五界别，300席中，有原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席位合计87席后，扩大了103席，让这个团体变成190个席位，然后加了110席的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小组。

看得出来，这个界别结构的改变原则是，增加新鲜血液，减少不可控席位，取消有“污点”团队。

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圈子选举”？唐僧画了一个圈，悟空你进去呆着吧。

所以，只有一个候选人的特首选举，有新闻性可言吗？

据说，香港曾经对李家超做过民意检测，根据第三方的评测，他的民望五分里只能得在二分左右，也就是说，不及格。但民意不重要，中央政府的意愿才重要，中国需要一个强势的香港特首去解决过去几年香港“混乱”的局面，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

谈谈我眼中的香港吧。

9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去香港，满耳听到的是艾敬的《我的1997》，看到的是香港的繁荣街头老百姓对回归的期待和一点点忐忑，总的来说，我们大陆民众也对香港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香港回归时，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对大型新闻进行现场直播，这是每一个新闻人热切期盼的事情。我进台工作后问过当时的直播组，他们都说印象非常深。有一个梗是，在彩排驻港部队零点跨越罗湖口岸进入香港这个场景时，我们有一位主持人两次激动得口误，把驻港部队说成“戒严部队”，领导就叮嘱说，你可要好好练，如果直播时来这么一个口误，那不光你完蛋了，我们整个团队都完蛋了。万幸，直播时没出错。

还有一位记者，在香港特首府邸做直播，按照既定程序，英国派驻的最后一位特首彭定康会定时定点离开特首府，结果，彭定康的车开出特首府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去军港，而是沿着特首府转了一圈又一圈，三圈之后才离开了，这个细节超出了直播的预案，现场记者就不知

道怎么表述了，因为所有直播的稿子也都是事先准备好，审核过的，现场不能随意发挥，于是他当场就懵了。彭定康绕府三圈，可能出于自己个人对香港的感情，也可能是代表英国对这个殖民地的感情，我们的记者除了解说“他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就无从下口了，不敢。事后这个细节被传为笑谈。这件事情除了说明媒体的政治性问题，也反映了当时内地新闻人对直播缺乏经验的事实。

香港回归后不久，我去了一次，当时过元旦，香港的时代广场跨年活动热闹非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香港街头的警察态度特别和蔼，跟内地警察一比，亲民指数非常高。内地的警察即便帮老百姓办事，也非常严肃，威仪感十足，让人看了想敬而远之。而香港的警察看到我因为听不懂粤语打不到车时，会主动帮我们拦车。我看到，他们在午夜协助市民在活动结束之后疏散，首先把所有道路变成人行道，然后用拉绳子左右移动的方法形成绿灯通道，让人群有序离场，这过程中，我感受到的是香港警员的执法文明，训练有素。

最近一次去香港，已经时隔近二十年后了，我和一个朋友像约在香港见面。这一次，香港留给我的印象却有点不舒服。我从香港本岛

打车去九龙见朋友，仅仅四五公里的距离，司机要了我五百港币，我纳闷香港的出租价格涨价那么厉害吗？可当我从九龙回本岛的时候，同样的路程，出租费是一百港币，我明白了，我在本岛上的那辆车，司机把我宰了。

这个细节让我特别不舒服。我一向认为，一个地区的出租车服务水平往往就代表着当地的公共治理水平，因为出租车司机很多时候是在跟异地人打交道，外地人对本地信息知之甚少，司机要动手脚当然方便，而乘客投诉也比较困难，这是典型的本地人欺负外地人，这种低级的骗术也充分体现着这个人群的文明程度，而深层次看，其实就体现了当地官员对城市管理的水平和意识。

你可以随便看任何一个国家，凡是治理得比较好的，出租车服务都非常好，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治理混乱，出租车管理就会最先出问题。欧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去过希腊，当时希腊的出租司机毫无忌惮地漫天要价，这就是希腊政府的管理不力。但是在治理有序的国家，比如英国、日本等，就基本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后来我在香港遇到我另外一个朋友，他说，这种情况他也遇到过。就因为他说了普通话，被司机判断为外地人，对他宰客。而挨宰的另外一个原因，根据朋友的观察，说因为本岛市民对大陆口音的人选择性地下手，朋友说，现在本港人对大陆游客的观感跟“九七”时已经大相径庭，原因当然是复杂的。

尽管有这个背景，我还是想说，香港的公共治理水平和九七时候相比，有了很大滑坡，单纯从一个普通人对城市的感受力来说，我对香港的观感，也顿然下降了。

回到李家超高票当选香港特首这件事情上，选举过程充分说明了，中央政府在港问题上态度的坚决和强硬，他们认为林政月娥这样的特首解决不了香港目前的重大问题，而昔日警察出身，长期任职于保安局的李家超在过去几年香港的街头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强硬和忠诚，才是中央需要的。

接下来的香港会怎样？我想，有几点我们可以预料。

首先，未来香港的议会制度、街头政治等等都会失去空间，无论港人期盼通过议会渐进式地得到一些他们珍视的民主，还是以往轰轰烈烈的街头政治以剧烈冲突来迫使当权者谈判作适度退让，这种可行性基本没有了。因为目前的当权者会按照中央政府的一贯方式来处理冲突，他们不会愿意跟这些反对势力进行适度妥协，不会考虑谈判的方式。

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发生过非常著名的“美丽岛事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冲突剧烈，被政府判死刑的人也不少，但当律师出来辩护后，国民党政府还是作出了一定妥协的。我曾经看到讲述台湾的回忆录，说到陈水扁被判入狱时，国民党政府还允许他搞入狱前告别会。这等情形在大陆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以后的香港，也不可能发生。

其实台湾民进党街头政治运动能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没有绝对的专制，他还愿意跟民进党在有限的空间里进行谈判甚至妥协，这个空间香港曾经有过，但现在，这扇门已经关上了。

其实事实也摆在那里了，街头运动中最著名的反对领袖，比如周庭，被关了几个月之后出来，没有任何一个本地媒体去采访她，她的声音消失了。这说明很多人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就认为反对的意义也不存在了。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曼德拉。

其次，香港会逐渐深圳化，变成大湾区的一角。这不仅仅是说香港和深圳毗邻地区在逐渐动工开发，而是说，它会失去原来的特点，可能最终只有经济上一个特区的功能。

现在，香港仍然是中国与跟西方之间交流互通的一个重要地区，有其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中概股被迫在美国退市，退到哪儿去？还是香港，因为香港股市跟美国的股市之间还有制度联系，在美上市的公司退到香港上市的话，原来的股东可以不清掉手里的股票，做一个手续转换就可以继续交易，而没有香港证券交易所，中概股的退市就是灾难性的对抗。

所以，即便香港失去了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港币也不可能跟美元脱钩后改为跟人民币

挂钩，否则，港币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第三，李家超的施政报告里最瞩目的内容是坚定地推进23条立法，这是历届香港特首都实现的目标，李家超说，要在本届任上完成。他的政治目标非常明确。大棒之外也有胡萝卜，他承诺香港在经济上会开始亮眼。

我想，李家超的压力虽然大，但来自中央政府的扶持力度应该也会很大，目前的香港立法会基本已经没有民主派，都是建制派，立法会通过23条也容易多了，而经济上的笼络人心是必须有的姿态，香港民众最大的痛点住房问题如能改善，一定很拉好感，这个好处已经不能说是胡萝卜，可以形容为“端牛肉”了。

此前的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几乎全军覆没，香港人的投票尽数奉送给泛民主派，现在，选举已经不是李家超的障碍，他要充分利用他可能获得的经济赎买资源，拉拢人心。

这也许就是北京的态度：当所有反对势力逐渐被消灭之后，大陆会对香港的经济给予一些支持，“只要你们政治上听我的，经济上不成

问题”。香港才600万人口，1,000多平方公里，对中国来说是弹丸之地，我愿意让你繁荣，你就必然能繁荣。深圳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让香港经济发展不难，但前提是：在政治上，你没有讲条件的可能。

东方之珠走到今天，光辉岁月有过，失意惘然有过，此刻，是什么阶段呢？我把它定义为：蒙尘暗淡的日子。她还会不会重新绽放荣光，我不知道。但愿香港同胞能见证她未来的辉煌。

5.18东航坠机被指“人为”

2022年5月18日，路透社和美国《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一个消息，中国东航3.21空难事故（官方命名“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是人为导致。

“3·21”东航坠机事故发生已经有近两个月的时间，中方一直没有披露调查结果，而美国的NTSB（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了三名高级航空安全调查员协助调查空难事故，这个消息大概率就是通过美方调查人员披露出来的。《华尔街日报》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坠机原因，但报道里隐约讲到，根据黑匣子里的数据链分析，飞机事故是人为因素导致的。至于到底是怎样的“人为因素”，报道里说了两种可能性：一是飞行员自己操纵，让飞机置于从高空向地面俯冲的状态，二是驾驶舱外面有闯入者，在控制了驾驶舱后让飞机撞了下去。虽然最终结论没有得出，但我们知道：一个黑匣子的数据分析已经出来了。

空难的原因调查，黑匣子是最核心因素。每一架飞机上都有两个黑匣子，分别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通话记录仪。其中飞行数据记录仪记录了飞行过程中机上各系统数据，而驾驶舱通话记录仪能录下驾驶舱内对话和与塔台之间对话，还有机舱内的各种声音。从报道来看，美方只拿了一个黑匣子，是数据记录仪，没有拿到座舱通话记录仪。这个比较耐人寻味，因为国际民航公约强烈建议事故调查过程中两个黑匣子同时提交给事故分析人员，以便于信息互补。

现在飞行数据分析出来是人为操纵坠毁，那到底是遭遇了劫机，还是飞行员出了问题，是驾驶舱通话记录仪录下的对话能推断的，两个黑匣子信息一对比，空难原因就清楚了。但非常可惜的是，关于驾驶舱通话记录，中方没有出示。

美方的NTSB派往中国的三个人中，带队的人叫沙迪亚·席尔瓦（Sathya Silva），她是一个“人因”调查员，擅长调查人为因素导致的空难事故。这位席尔瓦是麻省理工的航空航天学博士，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曾和多个航空航天组织合作，包括NASA、波音和FAA。席尔瓦同时也是一名飞行员和飞行教官，这一次到中国调查的时候升为

主管。之所以派席尔瓦这个“人因”调查专家带队，可能和美方预判有关。

按照民航公约的规定，空难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国最有优先权主导事故调查，而航空器的注册国、经营国、设计国、制造国也有权派至少一名人员到事故调查组里去，但不能派太多，所以派什么类型的专家就要倚赖NTSB的基本预判。席尔瓦的出场意味着美方在没有拿到任何数据之前已经预判东航这起事故大概率是人为导致的。

而事故发生后一些国内媒体的报道也在指向“人为”因素。

2022年4月20号，也就是东航坠机事故发生一个月后，涉事机型波音737-89P已经全部复飞，这说明由航空器原因导致飞机失事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否则出于安全角度，这种机型绝对不会复飞。

此外，波音飞机复飞之后实行了双机长制。从一个机长和一个副驾驶变成两个机长加一个副驾驶，这似乎也在说明，东航对于“人”非常在意，多一个人，意味着多一种补充和置换力量。

第三，近期国家民航局强调要对飞行员的心理安全问题高度重视。这份“重视”是否源于东航？虽然，两年疫情对民航业打击很大，机组工作人员普遍收入大幅下降，但选择在这个时候关注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问题，似乎意有所指。

最后一点，4月11号坊间流传信息说，出事的航班上，副机长本来是个机长，而且是个功勋机长，比正机长年龄大二三十岁，但近年被降职为副机长，导致他收入下降，对单位也很不满意。如果这一点是真的，那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信息，不过目前权威机构否认这一点。

以上因素整合在一起，基本能判断，这起空难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可能性非常大。

今天下午，中国民航局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事故调查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对外披露信息。他强调民航公约里关于最终调查报告出台前，任何调查人员无权披露信息，可能是在对美国专家不满：假如你披露了，就不厚道了，你就没有遵守规则。

美方虽然否认，但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中方的种种表现，如果美方一点信息都不漏出，可能所有信息都会被屏蔽，他们也无法推动中方信息公开，爆料多少也是在倒逼中方公开信息。

没错，国际民航公约的确规定只有事故调查组才有权公布最终报告，但还有一个约定说，应该在12个月之内向全球公开最终的调查报告，以此来维护行业安全标准，警示后续相关细节。无论是飞行员的心理安全问题还是航空器的设计缺陷、维护漏洞，每一次空难的调查结论都可以让行业反思是否存在共性问题，所以，调查结论的公开不是为了追责，而是为了日后安全。

但这套逻辑在中国可能行不通。中国的空难报告中，只有一起“8.24空难”是公开了的。除此之外你查不到任何一个中国空难的公开调查报告，都是国家机密。所以，中国会不会在12个月之内公开最终调查报告说个悬念。

除了中国，俄罗斯、前苏联也是这个德行。

现在世人皆知，全世界最危险的飞机一个在非洲，一个在独联体，这些国家对空难的调查既不认真，也不公开，而这跟他们空难的再度发生频率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俄罗斯的航班口碑非常差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中国多次以东航坠机案的“复杂”来推脱调查结果的延宕，其实已经在违反国际民航公约，荒谬的是，中国还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所以，《环球时报》竟然还好意思指责别人透露消息，为什么不指责中国民航部门不早日公开调查结果呢？典型的双标吧。

再说说关于调查的独立性问题。国际民航公约明确规定调查组必须独立于一个国家的民航组织，但是，中国的空难调查都是在中国民航局下属成立事故调查组，包括这次东航321空难也是一样。这叫独立吗？所以，假设事故责任跟民航总局的管理有关联的话，他们还能公开披露吗？

为什么“8.24空难”的调查报告公开了？因为那个调查报告不是民航局调查的，是国务院专门成立的一个应急管理局调查的，但，仅

此一例。所以说，这个体制不改变的话，中国的民航行业要持续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

看似一起空难，本质上暴露出中国民航体制存在的问题：在空难调查过程中一是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二是调查过程不独立。

民航公约明确规定事故调查组在调查中限定范围内拥有无限权力，任何部门不得在证据获取、原因分析过程中进行阻挠，这在中国做得到吗？

其实哪个国家都有空难，调查清楚，避免事故或事故原因的发生，就很正常，但中国的民航多数是国有的，我们的政府或许不能面对事故真实的原因最终指向的责任主体是自己，从而造成公众对政府的问责，所以他们不敢公开。

从东航坠机的报道看来，现在政府对民航空难信息的控制程度已经登峰造极。5.7空难的时候我还在中央电视台，我们还做过报道，而现在，东航的3.21事故没有任何媒体做出深度调查报告，只有新闻发布会，一个不能发布真实透明信息的发布会。死难者家属的声音你听

不到，公众利益被忽视了，家属想到现场去，祭奠一下，拿一杯土回家，也得不到允许。他们被拉到一个地方隔离起来，工作人员天天24小时作陪，就是不让去现场，不让你接触记者。

我们可以猜测，12个月之内是否可以看到3.21空难的最终调查报告，我的预判是，他们不会公开，事实如何，明年3月我们看结果。

5.18北大学生又“闹事儿”了

2022年5月15号，北京大学万柳校区传出一段视频，宿舍楼前学生情绪激动，一个校领导跟学生沟通说，只要他们不聚集，他将会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去解答学生的问题，结果就在起哄中，轰隆一声，学生宿舍楼和教师公寓之间一道新砌的墙被推倒了。

疫情期间，各地对防疫措施不满闹事的很多，但比不得这北大学生闹事，于是这段视频一下子传开了。我了解了一下，事情倒也简单，因为北京现在各单位都开始推行比较严厉的防控措施，北大的万柳校区，一个离北大本部四五公里远的研究生住宿区就开始了严管封控，事情的起因是北大规定学生不能随便出门散步，也不能出校区，早先的班车也取消了，学业和生活备受影响，但同住在这个校区里的教师却完全不受耽误，可以随便出入，外出散步购物都可以。于是，学生因为感受到了北大校方对师生同住不同权而开始反抗。

别说是北大学生，哪儿的年轻人也受不了被双标对待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学生非常愤懑地指出，病毒又不对教师豁免，凭什么老师能出入自由？

造成视频中矛盾升级的，是5月15日当天，针对学生提出的平等对待、正常防疫的要求，北大的反馈竟然是当天就砌了一道柏林墙，把万柳校区一分为二，其中大幅区域，包括了理发店、快递点、小花园的那部分划到了教师公寓，学生的活动范围比较小。当晚，学生就不干了。

视频中，大量学生聚集在这堵墙附近，有的学生开始喊口号，傍晚时候先来了一个校领导跟学生沟通班车的情况，没什么效果，就在这期间，学生越聚集越多，达到数百人，一看事态愈演愈烈，晚上10点40分左右，北大主要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叫陈宝剑的副校长来了，可能他比较有经验，到了现场就跟学生说：“今天问题不解决我不走”，然而就在他说话的档口，隔离墙被轰然推倒了。

到深夜11点，有学生代表站出来表示可以代为谈判，虽然也有人担心这位代表是否校内沟通了来分化学生的，但没有更好的选择，大家就确立了谈判代表。学生代表对校方提出几个意见：1、如果师生必须分开隔离，应该把花园区域分给学生多一点，增加学生的活动空间；2、增加班车，让学生到北大本部去得更便利。谈到晚上12点，学生开始陆续散了。而次日陈校长回复的信息是学生的诉求基本都满足了：墙拆掉，门口的隔离栏也拆掉，保证不处理任何学生。

对于这个结果，北大学生表示比较满意，而校方为了安抚学生情绪，也采取了系列怀柔政策，之前万柳校区购物不便，不让外出散步，禁止点外卖，谈判后北大校方联系了一个超市免费给学生送货；为了让学生能锻炼，体育老师到现场带学生跳操；为了在有限空间给学生增加娱乐，又给安排观影活动，甚至说要给学生发游戏券。这次闹事事件到这里，可以说是“闹”得十分划算，远超预期。

这让我想起来，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当老师的时候，学校制定的教师食堂伙食极其糟糕，长期不改善。由于年长教师都成家立业了，这教师食堂也只有势单力薄刚毕业不久的单身青年

教工去，属于学校眼里的“一小撮人”，所以跟学校反映多次也没人理。我当时血气方刚，就觉得忍不了了，于是就在单身教师宿舍楼里搞“串联”，跟化工系的一个老师说，咱们组织一次“罢灶”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连夜起草了一个号召大家“罢灶”的声明，待半夜把“声明”打印出来之后，两个人去每一个青年教工的宿舍门上贴倡议书，号召第二天中午不去教师食堂吃饭，大家就在楼上看着。第二天中午，教工食堂突然把伙食做得特别好，校领导见着我们青年教师就想拉我们进去：“快来吃饭”。不过青年教师都比较争气，都站在楼上扒着窗户往下看，——看谁进去就起哄谁就是“叛徒”。当天下午，校领导过来跟我们谈判了，跟北大这个情况差不多，领导说一定解决问题，我代表青年教师还发了言。

所以你看，不闹事，不解决问题，一闹事，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有时候还超越了你的期望值。北大学生5月15号的斗争就是个典型，当对方判断付出代价不是很大，又急于扭转局面的时候，条件就很好谈，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就是中国很多问题处理的方式：你按照正常程序去反映问题，没人理你，你用不正常方案来操作，他们马上就来解决问题了。

北大的特殊还在于，在这个学校，学生聚集喊口号永远都是大事，因为它带有太强烈的象征色彩了，让管理者恐慌后续。比如媒体尤其是外媒会不会报道？如果一旦小事变大，走上国际社会的舆论场，那象征意义太强了。所以北大校领导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不能让学生组织、参与各类群体性事件。

其实，自1976、1989年以后，北大学生真正参与到政治事件中的事例已经没有了。几十年来，虽然也有过几次北大学生聚众，比如北大昌平园校区女生失踪案件，在学生中影响很大，因为时间接近“六四”，北大校方本来不允许学生对遇害女生进行集体悼念，北大很多学生就不干了，在三角地贴大字报，并在校内搞了游行，最后校方让步同意在校内进行公开悼念活动。

所以说，北大学生只要聚集，对于很多部门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压力。这次万柳校区事件，也有人解读说北大学生对抗中国的

防疫政策，这就属于想多了。八九年之后，北大里面如有有群起呼号之声，都是相对单纯事件，这次也不例外。发生在北大的惟一特殊性就是学生闹起来之后，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变大，速度很快，仅此而已。

其实，1989年之后，北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学校的一个重点工作，校方也在有意识地分化、瓦解学生。北大校内有个最著名“三角地”，一个破破烂烂的告示栏，但由于地段醒目，任谁都可以往破版面上贴自己想贴的东西，除了广告通知之类也是不少“斗士”贴大字报的地方，更是学生集会的聚集点和必经之路，所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为北大的“民主圣地”，后来互联网兴起，有了BBS等学生更能轻而易举发帖之处，三角地的民主内容渐渐减少，形象又日渐破败，于是在2007年北大就以整体美观的理由把“三角地”给搞掉了。如今的三角地变成了一个玻璃橱窗的告示栏，环境当然变得漂亮了，但没人，也没可能往里面贴东西。

可就算学校知道学生目前基本不再集会，但为什么至今那么害怕北大学生聚集呢？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学生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我们学生时期学过的《中国革命史》里，讲述过推动历史进步的有几大力量：一是农民，比如太平天国起义，二就是学生，比如五四运动，北大就是五四“发轫地”，北大学生游行到曹汝霖的住宅，把曹拽出来打了一顿，毛泽东把此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鲁迅撰文纪念的刘和珍君也是一个学生。所以，在全社会看来，学生是具有天然正当性的，他们不会是反动势力，他们的造反，多半有理。毛主席曾经说过的，“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

所以，一贯以来，学生是当局的重点观察对象，不能集会，不能集体上街，不能参与群体事件，把所有可能转化成社会运动的聚集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第二，学生搞运动的目标基本是针对公共利益，他们还没有毕业，相对来说没有太多利益的束缚和羁绊，也不会专注在某行业计较利益得失，所以他们血气方刚的诉求多半是因为心怀天下，而这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年轻人的手里非常具有煽动力，很容易传播在公众心中，得到共鸣，这对于有关部门来说还是比较棘手的。

第三，现在不止是学生运动，随便什么聚集，什么群体行为，都是政府极度关注警惕的事情。这次我回北京，遇到一位拍纪录片的朋友，他说北京有个新闻是一个快递小哥想要组织一个类似于工会这样的组织，为大家维护权益。结果，这快递员刚发了一个朋友圈，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被有关部门给搞走了。这人就消失了。拍片子的人不知道，因为遍寻不到这个小哥就发了一个微博想要找这个人，结果他刚发完微博，国安就找他来了，“你想干什么，你找这个人干嘛”？

现在，针对敏感话题、敏感事件和敏感人物，无论互联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中国的控制体系是极严的。任何群体性事件都会被盯上，尤其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事件更是不可能任由你发酵。

所以总的来说，经过多年各种类型“润物细无声”的控制，北大学生已经不太可能有通过街头运动表达政治诉求的可能了，他们也就只能在自己眼前的小事情上维权一下而已，任何风吹草动的意识形态歧路，他们都不太可能去走了。

从北大著名的“马会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北大学生的处境。

马会是北京大学2000年成立的一个学生社团，全称“马克思主义学会”，简称北大马会，这个社团有很天真烂漫的学术理想，就是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来分析中国当代社会问题，所以他们每周组织社团学生前往北京郊区的厂子打工，像工人工作、吃住，体验工人生活，自然也非常同情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结果，2018年，在深圳一个工厂的工人维权搞罢工的过程中，部分“马会”成员因为声援罢工工人，被警方带走。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来认识深圳工厂发生的罢工事件，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对付资本家这件事情完全具备正当理由，但发生新中国，领导罢工的工人却会被刑拘，声援罢工并要求释放工人的大学生会被控制。据说，北大马会的学生向社会公开了警方要求他们认罪的视频，并且还接受了外媒访问，这导致事态更加严重，北大马上对马会进行了改组。新组建的马会向原马会发出公开信，敦促原成员“悬崖勒马，知错悔改，回归理性”，原马会回应，改组无理，并反

驳有关指控。结果，后期北大六名学生被捕，其中马会原成员有四人。

2018年，在马会声援深圳罢工之后，曾担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的邱水平被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您看，北京大学的學生还能不清楚自己身处的局面吗？

北大已经很难再成为八九年之前的北大了，北大的学生站在高校之巅，但也是在强光之下，如果真正有人想搞带有政治意味的活动，他们面对的打击肯定是毫不留情的。

北大的学生不得不面对现实，如今，理科的学生很多都出国了，文科的学生倒是有不少考公务员的，要么经商，他们不太可能再用家国情怀去指点江山，启蒙民众。

北大万柳校区的风波发生后，有个北大学生给我发了以下私信：“就事论事而言，本校学生对万柳事件的处理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个人也不觉得这件事能定义为北京大学学生反抗疫情防控政策，只是大家保护自己最基本的平等和权益。但是普遍地说，对于一

直以来北大疫情管控出现的舆论管控、限制人身自由、为难学生等现象，需要的是体制方针的改变和科学思想的普及，这一点，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也渐渐从愤怒、不满，变得麻木了。

这就是今天的北大，今天北大的学生。

5.21如果金正恩开微博

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朝鲜因为近期也出现了新冠疫情，在5月15日通过平壤官方电视台播放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科普宣传片，被新浪微博封杀了。

朝鲜为什么制作这个“科学防疫”宣传片？当然是因为他们破防了，两年来没有新冠肺炎病例的朝鲜，到底还是被奥密克戎攻陷了。以奥密克戎的传染率，以朝鲜的公共卫生条件、医疗水平，众所周知，对朝鲜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朝鲜最新的数字显示，现在每天已经有一二十万人感染，死亡数字也在不断攀升，如果朝鲜民众对疾病不了解，引发大恐慌，那对医疗机构的挤兑是肯定会发生的。

朝鲜选择了面对现实，在这件事情上，不跟队中国了。

当然他们早期的封控政策，比中国还彻底，也比较有效。武汉开始有疫情的时候，朝鲜马上切断了跟全世界的交往，当然，呵呵，切断与中国的交往，差不多就相当于切断了和全世界的交往了。所以，边境一封锁，朝鲜就过起了闭关抗疫的日子，没有受到新冠的影响。但这次，奥密克戎所向披靡，很快攻陷了朝鲜的城池，虽然朝鲜至今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引“毒”入室的，但事已至此，他们决定把国民安抚好，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做了一个被网友誉为“迄今为止看到的最通俗易懂的奥密克戎科普宣传片”：《正确认识奥密克戎》。

这个宣传片里面讲，奥密克戎的变异毒株BA.2传染性非常强，但症状相对弱，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数量更少，再感染的风险也更低，致死率比德尔塔低75%，而感染者中93%都属于轻症，居家治疗或门诊就可以，感染五天后天一天就能康复。还特地谈到，假设被感染了，要科学治疗，不要滥用药物。

这个宣传片被好事者翻译成了中文放到微博上后，评论区很就闹。很多人说，朝鲜都认识到了针对奥密克戎不可能清零，“清零派”

还要孤注一掷吗？还有人说，以后别再嘲笑朝鲜了。人家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在科学防疫这个问题上，思路清晰得很，绝不昏庸。现在全世界搞“清零派”的，就剩下我们中国了，而且，还不让讨论“共存”和“清零”的利弊得失比较。你要是讨论，微博上肯定会封你账号的。这不，朝鲜的这个视频就被微博从热搜上撤下来了，继而屏蔽了。

就这个新闻，我想说几个意思：首先，睁眼看看世界吧。一意孤行地“清零”连朝鲜都放弃，咱们中国死守着不放，到底还有没有基本的科学精神呢？

当然，朝鲜放弃可能更多的原因是出于迫不得已，而且朝鲜的“共存”跟美国、英国的“共存”是有区别的，英美等国家都是在有有效疫苗和药物的前提下才可以把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疫情死亡率降低到普通流感水平，这种“共存”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政策，所以不会发生医疗挤兑。但朝鲜既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这种放开就有点无奈摆烂的意思了。说起疫苗，其实世卫组织给朝鲜捐过，科兴疫苗朝鲜竟然不要，可能信不过？后来世卫组织给又过朝鲜其他国家的疫苗，但毕竟

数量有限，普及性接种是不可能的，估计也只有朝鲜的特权阶层能打到这些疫苗。所以，在没有疫苗屏障的情况下与奥密克戎“共存”，风险肯定是比较大的，死亡率也肯定比一般的流感要高。

类似朝鲜这样，因为管不过来而不管的国家也有一些，比如印度就是，对假如感染新冠而死亡的病例，据说不少就直接把病人遗体拉到恒河边上火化了。

中国当然是不愿意摆烂的，但积极对付奥密克戎是不是就要清零？我们是否具备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共存”条件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具备的，只要愿意进口辉瑞疫苗和特效药，我们在与病毒共存的时候风险也是可控的。像我们对付甲流这种二类传染病一样，都有很成熟的经验。

但直接的建言不仅没有用也不被允许，搞到现在网民要用朝鲜的嘴来评价中国方针，言论不自由，那除了这种可笑的参照方式，还能怎么规劝政府呢？

第二点，我们让全球看到了，同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封杀朝鲜的视频，和朝鲜屏蔽中国的言论，都存在。我们两个国家，加上古巴，没有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就真正变成“同志加兄弟”，相反，后来几乎都反目了。中苏之间，中国和朝鲜、越南，跟阿尔巴尼亚，都没办法亲亲热热走下去。看似有一个共同的理想，现在兄弟反目，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甭管过去是谁跟谁兵戎相见闹独立，或者世界大战里面有过深仇大恨，针对现在时态结为联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凡是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组织，都是很难共处的，因为他们都掌握着绝对性，不容置疑，更不必反思。

在这点上，中国和朝鲜是雷同的，都有着至今不能质疑的个人崇拜，都有领袖有无可指摘的独裁权威，都容不下不同的声音甚至挑战性的提问。所以，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正恩，一个个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你敢对他有任何不认同的评价，马上进劳改营。而每个国家都这么绝对，就无法调和互相意见和利益有差异性时的冲突。

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也有利益冲突，苏联想占着中国的中东铁路，想租借中国的大连港、旅顺港，中国想从苏联拿原子弹技术，让

苏联协助武装自己的军队，这种利益诉求本来也正常，但双方都不用利益协商的方式，而是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理念纷争，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纠缠在一起。中苏论战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九评”文章，毛主席说一万年太久，苏联总理前来与中共谈判，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时候，毛主席又说，中苏之间原本要争论一万年，看在他主动来的份上，减一千年，还要争论九千年。这种论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正常的外交行为，更像是意气之争。

和资本主义阵营最大的区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太阳，苏联有斯大林，中国有毛泽东，朝鲜有金日成，罗马尼亚有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有恩维尔·霍查，古巴有卡斯特罗，这些太阳无论做什么决策，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都不能被挑战。所以他们之间是很难结成真正的同盟的。

中国跟朝鲜还是“同志加兄弟”吗？显然不是。中国只是视朝鲜为中国跟西方之间的一个战略缓冲区，让美国的势力不至于推进到鸭绿江。对于朝鲜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不予点评，只是扶着金家王朝让他不至于垮台。金正恩对中国，也不过是偶尔拱手作揖。

所以，不要说防疫政策跟不跟，在绝对的权力之间，没有什么平等的商议，大家各说各的而已。其实，即便是金正恩本人在中国的微博上开个账号，难道微博会锣鼓喧天吗？说不定，也会被“404”了。反过来中国要是到朝鲜去开微博账号，想都别想了。

5.21请不要逼他人做政治表态.

今天不说新闻，而是根据近期的话题感受，就“换位思考”跟大家做个探讨。

我上推特是从国内开始的，当然，需要翻墙。那时候我对海外的中文市场充满期待，因为国内言论有很多管制，所以我对外面自由开放的舆论环境就有很高的期待。可说句心里话，上了推特之后却很失望。我发现海外的中文客户对中国大陆的用户非常不友好，往往上来就给你贴标签，认定来自于中国的多半是“大外宣”，是官方派来的胡锡进类似部队，否则你怎么翻墙？要么觉得大陆用户天然就应该特别卑微谨慎，否则可能是特务，似乎大陆不配拥有自信一点的正常人。他们对专制社会的民众已经有了一个想象，那就是由于长期得不到自

由而对西方世界毕恭毕敬，但凡某个人的精神气质不匹配他们的想象，就会被要求表态你到底是什么政治立场。这让我，非常不舒服！

今天想就这个问题说开去，谈谈我认为人与人之间，无论是线上线下，都应该有怎样起码的互相尊重。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应该有一个基本原则：不强迫其他人对政治问题进行表态，尤其是，当对方还身处对政治非常敏感的国度，又不具备充分自由的时候，不应该强人所难。今天我做了个关于陈秋实的直播报道，谈那个话题的时候我讲到了：第一，聪明人不但听别人说了什么，还能体会到别人没有说什么；第二，善良的人可以换位思考，要体谅到其他人的难处，不要故意提出让人家不便说的话题。

现在我是出国了，但过去很长时间内我是在国内生活的，所以我非常理解在国内生活，有家庭有事业，有被人称之为“软肋”的人有多么无奈和克制。在这种环境里的人，你要求甚至逼迫他表明立场，其实对他们来说有很多难处。一定要让他们进行政治表态的话，这可能

算不得什么“民主自由”，从人之为人的角度来说，可能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良心大大地坏”了。

而且，我们要善于去读解一个人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还要看对方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每个人都在体制内，没有例外，只不过每个人的边界不一样”。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而有的人在《南方都市报》工作，我们的言论边界就不同，中央电视台的管制会更多一些，而《南方都市报》管理的边界可能大一些，他能说的话我可能就不能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两个人的理念差异有那么大。而且，说什么，说到什么程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

我在中央电视台也做过一些正面宣传报道，早些年，十八大等等重要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是有任务要去做正面报道的，我也做过，没办法，你要是想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下去，总得服从领导的工作分配，没得选。这能说明我政治立场吗？不能。这只代表我想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通过一些自己不乐意做的事情转而赢得做对这个社会有价值工作的集会。

我想，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为了得到一些，我们会牺牲一些，这是没办法。

而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个聪明人是可以理解戴着镣铐跳舞的人的。只要换位思考，你就会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还有一点，一个人真正想做什么和他目前能做什么，聪明人是可以分辨出来的。为什么我们通过柏林墙的典故非常理解所谓的“枪口要抬高一寸”？因为我们理解他们的身不由己，也期盼他们用有限的自由释放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

给体制内的人打标签是很简单的事情，但也是不聪明的人，或者说认知能力不够的人做的武断判断，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相对长期的观察，通过他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来判断这个人的底线和真正的理想，但推特平台上，似乎大多数人缺乏这种耐心和友善的观察能力和思维方式。

一说原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马上有人说，这是“大外宣”，是党的喉舌，不齿；一说中国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哦，那你就是狗腿子。

这逻辑对吗？当然不对了！这种武断粗暴是毫无智商的起哄。反过来，你以为你在境外网站上匿名喊几句口号，就是勇敢吗？当然不是。

所以我个人觉得，一个人是否善良，比他站在哪个政治立场重要多了。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善良的本心，他们信仰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如果不能换位思考，不能对别人的苦难、境遇给予同情，他信仰什么都不可靠，所以善良本身比政治立场要重要得多。

其实我在国内有很多体制内的朋友，也包括政治立场或者对社会的看法跟我不一致的朋友，这不妨碍我们互相尊重，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次回国，有个朋友在吃饭时就说起，他站在俄罗斯这一边，认为乌克兰就是不对，我们也会争论，但我们不会因为立场不同指摘对方，为什么？因为我了解他们，他们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们可以在生活中将心比心地替别人考虑。我相信这样的人将来如果有一天面对大是大非，面对重大历史责任的时候，他们不会愧对历史。

反观有些人口号在境外平台上喊得震天响，说不准在生活中，就是坏人，喊完口号，就开始做爱国生意，真正在意的是自己兜里几个子儿。这些人比那些默默在体制内工作的人高尚吗？我一点儿都不这么认为。

我想说的第二个话题说，你怎么看待在国内体制内工作的人？我的观点：体制内工作的人，能人很多，好人很多，善良的人也很多。你千万不要认为体制里一团乱糟，里面每个人都是坏人，与体制为伍，为帮凶做事。不是！体制内大多数人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他们也有最基本的是非观，也真的信奉为人民服务，只不过因为体制内容不下太多的言论，让他们比较少地谈及政治话题而已。

你们可以听到，上海封城期间有几个体制内的人跟普通老百姓的电话录音，非常讲人道，有原则，有见识。这种人在体制内很多，他们有专业的立场，懂得是非，而且敢不计个人安危在关键的时候发声，这种人不令人尊敬吗？

体制内当然也有想要整人，或者只看上级命令不顾群众感受的坏人。但不可以一概而论。

中国体制内的能人非常多，他们很多人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在负重前行，他们有专业才学，也有悲天悯人之心。

我曾经采访过中央农村工作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这个人很了不起，是一个技术官员。据说因为八九年的事情受牵连，没有走得很高，是一个副部级干部，但是中国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讲农村问题、农村政策的“三农”的文件都是他负责主导起草，是一个真正的专家。他每年都在用自己微弱的力量鼓动国家、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能力倾斜到中国的农村，因为中国的体制对农民，对农村亏欠太多了。有一次做年终节目的时候，我们讲农民看病问题，请他到演播室。在这个节目中，一个孝顺的农民因为没钱给他得了癌症的母亲看病，把生命垂危的母亲带到一个有公益项目的医院去看病，以为可以不要钱，结果发现他母亲并不符合救助标准，还要花钱。他没钱，迫不得已，把自己母亲留在了医院，自己留下一封信不告而别了。这个新闻披露之后，当地政府去关心了，我们也做了报道，到年终，我们把新闻当

事人到演播室，让陈锡文跟他对话。节目之外，我私下问他，陈部长你觉得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到这种地步，农民至今没有社会保险，没有钱看病，你觉得这是国家财力决定的，还是意识决定的。他想了想跟我说，是意识决定的。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新农合”，所以农民看病完全要靠自己来负担。但我想，正是在陈锡文这样的官员以及众多体制内人的合力推动下，中国建立起了“新农合制度”，农民有了保险，大病也可以看了。你说，这样的人不值得尊敬吗？

再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同事薛飞和杜宪。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熟悉八九年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个值班《新闻联播》时的表现，他们勇敢吗？

当历史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做到不惜付出自己职业生涯的代价？中央电视台新闻部还有一位部长，也是八九年的时候做报道，受了牵连被拿掉了职务，从此就升不上去了。但是大家尊

敬他，后来大家喝酒时就邀请他来谈这一段往事，他的前途也就这样牺牲掉了。

体制内这样的人不是很少，是很多。所以戴着有色眼镜看体制内的人,我觉得是大错特错的，到境外的互联网平台匿名喊几句口号不叫勇敢，因为仅此的话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还不如王思聪发的那几句话，是勇敢的，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当时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说一个富二代说那几句话，我也天天说，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影响力不一样，引起的社会舆论之广度远超过你，这是其一；第二，王思聪说这话，他付出的代价也远超过你。所以，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勇敢不勇敢，取决于他承担什么风险，付出什么代价。

所以，对比一下，在境外匿名喊口号，算得上什么勇敢？

一个人真正的勇敢，是能够意识到公民的责任，是在历史选择的关头敢于站出来，站在历史该选择的那一面，而这跟你在不在体制内

没有太大关系。反而有很多人正是因为体制内才有机会站在历史的潮头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真的非常希望境外互联网平台能改一改风气，不要动不动就抓特务，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大外宣，动不动就要求人进行表态，动不动就逼别人喊口号。

很多人到我（推特）底下天天问我什么立场，问我反华和反共之间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我告诉大家，我是政治学专业毕业的，受过规范的政治学训练，要是搬弄典故掉书袋，我也可以讲三天三夜，这有意义吗？

你不要逼我做政治表态，我内心有政治立场，但是不需要跟你们讲。在我看来，逼我做政治表态的这些人，第一不够善良，第二，也违背你所宣扬的这种价值观。民主自由的核心是什么？首先要尊重别人，能够换位思考。当你知道别人在生活中面临各种各样的难处和选择，给予体谅的时候，你的价值观才符合人道主义，才有人本主义思想。

而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连人本主义思想都没有，民主和自由对你有什么价值

5.22“公益诉讼”范围在扩大

2022年5月19号，天津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被告张某因为在境外媒体推特上发布了9条针对袁隆平院士的帖子，之后，相关推文被他人留言10条，被转推36次，被点赞275次，应该说，影响力不算大，结果被检察院以公益诉讼名义起诉，说其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

法院宣判结果是，张某发表不实言论,亵渎了袁隆平院士的事迹和精神，丑化了袁隆平院士的形象，贬损其名誉，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合法范围，不仅侵害了袁隆平院士的个人人格尊严，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感情，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判决张某十日内在国家级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这个案子，在我看来意味深长。其实针对推特上的言论，过去中国境内也管，但是管制内容多数是刑事领域内的，比如说在推断上攻击党和人民政府了，当地公安机关找到你，说你“寻衅滋事”，这类案

子我们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在民事领域内起诉宣布侵权的案子，我此前闻所未闻。

值得注意的是，起诉主体不是袁隆平的家人，而是检察机关征求了袁隆平近亲意见之后，以公益诉讼的名义发起的诉讼。

公益诉讼最早是在2015年7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两年提起试点，试行结束后，2017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正式建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其实，这个制度早期主要针对的是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的问题，比如公共区域的污染会导致公众利益都受损，但不可能寄望于个体花费时间和成本去起诉，所以公益诉讼就可以由检察院提起，去保障公众利益。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在媒体报道中解释，“随着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效能的显现，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对这项制度寄予更高期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怎么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张雪樵说，最高人民法院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指导各级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在他们制发的《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检察公益诉讼的法定领域拓展至九大领域，除了原来的四大领域之外，增加的范围是：①英雄烈士保护领域；②未成年人保护领域；③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领域；④安全生产领域；⑤个人信息保护领域；⑥反垄断领域；⑦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⑧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⑨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公益诉讼。截至2021年底，全国已有26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相关决定。

看到了吗？公益诉讼扩展出来的九大领域里，第一个内容，就是英雄烈士保护领域。而且，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新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了增加办案覆盖面，“加强公益诉讼检察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平台、‘益心为公’志愿者平台以及公益诉讼研究基地辅助办案作用”。

这个“益心为公”志愿者平台起什么作用呢？最主要的作用是“对发生在身边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食品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公益损害问

题，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反映到检察院，成为检察机关的办案线索”。我想，志愿者可以理解为举报者。

起诉张某的公益诉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起了。

我相信这种震慑力是很强大的，想想看，推特上这么多中国人发言，理论上来讲，只要你持有中国护照，哪怕你发言的时候在境外，但只要你回国，都有可能被起诉，要么是刑法“伺候”，要么是民法“伺候”。

看完这个案子我觉得不寒而栗。

从公益诉讼原来的办案覆盖范围来说，原本是没问题的，但是从扩大到九大领域开始，我几乎就没再听说过在环保领域或者食品安全领域有过什么公益诉讼，但是在“侮辱英烈”这方面，已经发生多起案件了。

前一段时间罗昌平那个案子，其实也分为两个内容，一个是刑事的，一个是民事的。刑事案件前面已经说过了，侵害英烈名誉荣誉法

法，刑事“伺候”，但他同时还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益民事诉讼，所以最后他给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赔了八万块钱。

旅游博主在新疆被起诉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罪的那个案件中，也是检察机关发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我个人认为，这个定性有问题，什么叫“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其实大家不够清楚，都是凭着们“有关部门”说了算，他们主观中认为谁侵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那就是侵害了。

另外，这种公益诉讼的程序也极其随意，这一类案子谁可以发起呢？三个人：检察官、检察长、检察委员会都可以，也就是说这三个层级任何一个人看你不顺眼都可以对你进行立案调查，而且对这类案子的取证实际上是公诉化的，可以找证人询问，可以现场调查，甚至可以利用录音录像这些手段来举证。当然这些手段如果要是对付那些违反环保法的企业来说还有一定道理，但用来对付一个个体，这就太可怕了，这意味着民事诉讼的公诉化。

民事诉讼本质上来讲要“不告不理”，张某发表了对袁隆平的侵权言论，袁隆平的家属如果不去告的话，这类事情公权力没必要介入，公权力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应该是一个消极角色。比如你被侵权，假设证据不足，就算你权利确实受到了侵害，但你没有提交关键证据，那法院也有可能判你败诉，这就是因为公权力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是一个消极性的角色。而你们当事人之间一旦用公益诉讼的方式来介入，以检察机关的名义介入的时候，所有的手段就全部公诉化了。因为他们是国家机器，权力远远大过个体，他们处理民事诉讼就会带来诉讼主体之间极大不平等的问题。

本来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主体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基本是平等的，但一旦公权力成为原告，那么被告的权利要怎么维护呢？在刑事诉讼法中，国家机关拥有巨大权力的同时，被告其实也有一些特别的法律保护条款与之对抗，比如说“无罪推定”、“超越合理怀疑”的原则等等，因为国家公诉机关拥有巨大的权力，所以要给一个犯罪嫌疑人定罪的时候必须要超越“合理怀疑”，把定罪标准定得非常高。

可民事诉讼不一样，检察机关成为原告，胜诉和败诉的标准又仍然是
一般的民事诉讼，那这官司还怎么打？我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

如果动用公权力来介入民事诉讼，那被告的权利也应该相应地调
整到刑事诉讼法过程中被告所拥有的权利，否则两者权利全然不对
等，这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相匹配的原则。

在袁隆平院士这个案子里，公益诉讼把袁隆平放在要保护的英雄
英烈范围，这可能也不一定合适吧？杨振宁院士现在就有很多人有不
同评价，他提起诉讼了吗？需要检察院提起诉讼吗？他们都是名人，
在正常的社会中，名人自然有比普通人更大的舆论容忍义务，这也是
人之常情，谈不上破坏公序良俗，更谈不上损害公共利益。名人可能
已经通过名声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那对公众在讨论公共事务的时
候议论到你个体也有义务敞开胸襟，这都要举报、起诉，那谁跟谁是
世仇，盯着他发言就可以了，肯定能拿着短处，除非这个仇家一辈子
都议论不到名人。

我们现在通过这样的案子告诉国人：“对待主流社会已经定调的名人要特别予以保护，袁隆平你们不能议论，议论就违法，就要吃官司，要么是刑法伺候，要么是民法伺候”，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法治原则？

那么，检察机关是不是应该把必须保护的名人名单公示一下，让我们知道哪些人是议论不得的，司马南算吗？这么多人骂他，要是起诉的话，被告人太多，不过，幸好，司马南还活着呢，算不得英烈，算不算英雄咱就不知道了。

《动物庄园》里说，“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咱们公益诉讼要保护的，好像就是“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的群体。

最近几年，我们立法有个趋势，表面上看，是更大地维护公共利益，实际上，有的法规是在钳制公民的权益，把个体的权益压制得越来越小，而尽量去维护国家机器的利益。

大家还记得“杭州蓝色钱江保姆纵火案”吗？犯罪嫌疑人莫焕晶的律师党琳山看案卷过程中发现，检察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存在重大问题，不知是否有意忽视了一个细节，消防人员进入现场将近两个小时时间没有发现火场中的受害者，直到死者亲属自己闯进火灾现场，发现受害者时，已经太晚，四名受害人抢救无效，全部遇难。律师党琳山认为，检察院应该发现，消防车离死者家只有八百米远，应该及时快速抵达现场，也应该首先在火场营救人员，这是消防救援的最重要原则。然而这个疑点检察机关在采集证据时似乎略过不表，在证据采集过程中只找了两个没有进火场的消防员。对这个情况，党琳山在法庭上要求现场叫来进火场的消防员接受律师盘问，他想的是，如果法官拒绝，他就要退庭抗议，而现实是，法庭没采纳，他的律师资格也被剥夺六个月，让犯罪现实人莫焕晶失去了辩护律师。

当再有人想去为莫焕晶辩护，且得到莫家人认可的时候，他却连党琳山那样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政府强行给莫焕晶指定了一个法律援助律师。关于这个案子，我们以后会详细说。今天举例，只是想说明

明，法律的很多维护公民权益的条文和救济手段，现在不止是一纸空文，确切来说，还被反手折成了一把利刃。

如果公益诉讼这么执行下去的话，所有海外的中国人，只要拿着中国护照，就不可能拥有任何安全感，因为你在境外任何一个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言论都有可能（成为）政府部门收拾你的一个证据。

这样的时代会不会到来呢？我对此保持悲观的预期。

5.24中国的新闻直播都是假直播

这几天上海一家电视台的直播节目火了，因为一个可以预料主题的宣传正能量直播因为超出想象的采访，最终造成了令人捧腹的效果。

这场直播是为记录疫情期上海终于恢复了地铁运营而做的，记者找了一位上海阿姨问她在经历了近两个月不能出门的生活后，终于坐上了首列恢复运营的地铁，心里有何感触。他们的对话如下：

记者：您是哪一站上车的啊？

被采访者：延安西路。

记者：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啊？能坐地铁。

被采访者：坐地铁，今天特别高兴，因为过了将近有两个月了吧。自从我出生到现在，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日子，被关在家里不能出去啊，真是天大的笑话啊.....

这句“真是天大的笑话”实在是太精彩了，而记者的表现也非常逗趣，他一听阿姨话锋一转就有点不知所措，阿姨讲到“出生到现在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日子”就开始把话筒往后撤了，也愣是没躲过阿姨最后这个“笑话”的感慨尾声。

看到阿姨的表现让我想到自己在央视做过的直播报道的故事，觉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让大家充分感受到，在中国做直播，是什么状态，有哪些风险。

首先就前面那个直播，我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情况肯定是这样的：首先，这位被采访的阿姨，您可别以为是随机找的，她一定是记者在现场先做了一番调研，在上车群众中选择了一位相对而言正能量的群众，至少不会对摄像机（宣传类媒体）有敌意，愿意配合，看起来又比较能代表热爱上海热爱祖国的人民形象。在中国官方媒体的直

播过程中，在大街上随机采访普通百姓这是绝对不可能，绝对不被允许的。

其次，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到，镜头摇过去，车厢也没其他人，那是经过了布置，清场了，怕周边有其他群众，发出不同的声音，喊出不和谐的声音，那采访就不可控了。

所以说，这个直播采访，是有意安排了环境，有意安排了人物，但因为不能太刻意，没有事先约定好说辞，所以阿姨一放开，把话说了。原来记者和阿姨肯定也大致聊过，预设的对答是：心情怎么样？心情太好了。为什么？因为过去两个月一直在家里出不来，现在终于能重新坐上地铁，肯定高兴。结果，阿姨讲到动情处，感慨起过去两个月的日子太苦了，偏离了记者能播出的主题。尤其是这句由衷的感慨“天大的笑话”这就彻底否定上海防疫政策了，隔离就是“天大的笑话”，阿姨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不假思索地释放了自己的心得。

所以记者就只能逐步把话筒往回撤，按照网友的话说，这位记者是“战术性撤退”。阿姨没思想觉悟，记者有啊。声音得弱下来，画面得赶紧拐到别的地方去，一句“谢谢”记者就赶紧截住阿姨的话了，反应还是挺快的。其实这一队媒体人还算是训练有素的，想得到要车厢清场，就是怕有意外因素，比如阿姨在那说心情好，别人插一句，好不好呀，群众一起哄，那这直播就成了反面宣传了。谁知道，都把局面控制得很牢靠了，没防住阿姨的话头跑偏。

在中国直播，可控性是最被强调的因素，控场，控人物，控话题，控节奏，都必须经过前期策划做好防火墙，中央电视台如此，上海电视台如此，所有上星的中国地方电视台都如此。所以，严格意义上，中国所有的新闻直播都是假直播。

真正的直播是完全不可预知新闻现场会发生什么的，这在中国，做不到。

按照行业术语来解释，新闻直播在电视时代崛起之后分为两类，一类叫“播报直播”，比如说《新闻联播》、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各

个新闻直播。主播在直播间里面播报新闻，过程中假设有突发新闻，稿件递进去，那就马上就可以插播一条口播，把最新的新闻进展报告给大家。这个中央电视台做出新闻频道以后就实现了，现在各地地方台都能做到，这是叫直播，但这种直播说白了只是完成了技术性同期播报，还不是新闻专业角度说的内容直播。至多，在播报过程中，连线前方记者，让这个记者讲述现场情况，但无论是主播还是被连线记者，他们都是电视台员工，说什么内容也都给过提纲，是可控的。假设夹杂着现场采访，也是必须事先沟通充分，才会插入在演播厅的连线中，这些内容中也略体现了直播的状态，但新闻性还是不够的。真正具有新闻性的直播，是“现场直播”，比如“911”当日，电视台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把摄像机打开，现场所有场景实施播报和拍摄给全球观众，记者完全不知道还有第二架飞机来撞楼，所以当第二架飞机撞楼的时候，现场直播就直接录下并播出了这让全球人震惊伤痛的画面。这是真正的“现场直播”。这种现场直播的核心是新闻现场发生什么，媒体和观众一样，无法预测。但记者肯定第一时间把现场事实传递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所以，真正“现场直播”的新闻基本特点就是：不可控。

在中国，哪里有这种不可控局面的现场直播？基本没有。我们的现场直播都是什么呢？庆典类，比如说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建国七十周年大庆；还有会议，比如“两会总理意见报告”，当然还有体育竞技类的比赛，等等。

这些直播其实跟“新闻突发”之间没什么关系。真正的突发的，非常体现新闻现场进行时态的内容，比如说天津危险品仓库着火，矿难现场，让你直播吗？不可能。凡是不想让你知道的负面信息，是一律不可能直播。如果要直播，也是直播新闻口径，也就是新闻发布会。观众基本看不到进行时态的新闻现场和新闻当事人。

其实庆典直播，有时候也有意外，但是我们直播的目的是万无一失，要把直播搞成像录播一样顺畅和平滑，不允许任何意外，因此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做记者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战术性撤退”。

记得有一年国庆大阅兵，央视做彩排，结果有一辆坦克在长安街上趴窝了，这纯属意外，也幸亏是彩排，我们新闻中心的命令马上就

下来了：拍到坦克趴窝的那个播放带保密，这个细节任何人不能对外透露，实际上呢，外国记者早就拍到了。据说是因为他们包下了北京饭店那几间有窗户对着长安街的房间，摄像机架在窗口，正好拍到了坦克趴窝的场面，就给播出去了。所以，其实所谓的保密也只能对中国的老百姓保密。

直播要彩排，而且要彩排好几次，当然是想把最好的一面亮相给全球观众，所以这最后的镜头虽然也是技术性直播，但实际上，已经被演练得跟专题片一样，什么时间切什么机位，人物出场顺序，场景顺序，甚至什么人物哪个时间去拍摄表情特写，都已经事先确定，所以，这样的直播都可控，基本没有意外。这还叫现场直播吗？

中国的直播就是要消灭一切不确定性，给你一个完美的展现。奥运会上放和平鸽的时候，鸽子突然不飞了，你能播出来吗？不行，信号赶紧切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就根本看不到鸽子不飞的情况，要是看到了，那领导就会说，这是直播失败，是事故。

上海地铁上的阿姨，就是一次直播事故，新闻当事人虽然选好了，但毕竟不是背台词，阿姨一放松，真话脱口而出。这就是一次播出事故。

其实，只要直播，泄露真相的突发意外就肯定会有。中国发射火箭成功率是很高的，但1996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发射我国长征三号乙首飞时，火箭却脱离既定轨迹，撞地了。直播间里直播当场就傻了，完全没想到会发射不成功，所以就没有直播发射不成功的应急方案，沉默了好一会儿，看现场指挥中心似乎大家也完全没预料，直播的主持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最后，过了几分钟说，科学实验都有可能失败，于是那次的直播草草结束。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火箭就不直播了，怕失败，失败了怎么点评，不太好表述。

我在中央电视台做新闻评论员的时候也出过小事故，正在我评论的时候，眼前拍我的摄像机突然被摇臂上去了，我就知道我肯定是“出画”了，我正在评论，不能停下来提醒摄像，就只能接着说下去，摄像看见吓坏了，赶紧把镜头摇下来，我的影像才又从“海平面”升起来了。现在说起来，这都是趣事，但在直播中，的确就是事故。

为了避免事故，央视对直播的时间要求特别严，参与节目直播的人都必须留足足够的时间到现场进行准备，有一年《新闻1+1》的一个专家没有准时到场，眼看直播即将进行，节目前的交流无法进行，我们领导就让我应急顶上。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选择，我从主持人的柜子里头随便找了一身西服套上去，随便化了个妆，在开播前五分钟坐进了演播厅，临时顶替了那个评论员的角色，非常惊险。

在中央电视台里，最有名的直播事故是张斌、胡紫薇事件，胡紫薇突然闯入直播现场，曝光其丈夫婚内出轨之后，现场一片哗然，而胡紫薇还说，法国一位外交部长曾经说过，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她说，“明年是中国奥运的一年，中国人如果在价值观上没有...，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时现场工作人员惊慌无比，要拉开胡紫薇，结果她还喊了一声，“中国离一个大国还差得太远了”。这个播出事故可以说是非常罕见，非常令人震惊了，事后，张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镜。

所以，管直播，还要管直播的场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直播间从进大门开始，至少要经过三道岗，每一道岗都有武警把关，一般的中

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出入证也进不去，必须有特殊标记的才能进去。所以，类似于前段时间俄罗斯新闻中，有女子到新闻主播后面举牌子，这在央视绝不可能发生。

说一千道一万，我想表达的核心是，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里，是不可能真正的新闻现场直播，换句话说，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里面，所有的新闻直播都是假的，而真正的新闻正在被人严防死守。

上海电视台的直播不小心播出了真实，变成了大众的笑话，笑完了我们心照不宣：如果要想在中国看到真正的新闻直播，必须要等到未来有一天，新闻工作者可以真正自由发声。

我们盼望着，愿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5.26为虎作伥也不会让你有苟活的权利.

爱国大V赛雷被禁言了。

赛雷何许人？他原名李偲锐，在读大学期间搞了一个“赛雷话车”的自媒体，用漫画科普汽车知识积累了一些名气，毕业后拿到三千万融资，开始了正式创业，除了汽车类内容，还成立赛雷三分钟与赛雷话金，开始对人文历史和金融的科普，早期不温不火，但2021年因为积极向粉红方向发展，一下子火了。

2021年一个海外的NGO组织想请赛雷做一个谈中国沿海存在过度捕捞的视频话题，赛雷看了这NGO的网站后，发现其中有中国的负面消息，于是认定这是个反华组织，不仅没有朝着对方的意图创作，还反其道而行之，做了一期视频《继肉蛋奶之后，吃海鲜也成了中国人的罪状》，说中国人的蛋白质摄入量本来就远低于发达国家，现在境外反华势力不想让中国人更健康，连海鲜也不让中国人吃了。

其实这个文章中间的数据全都是错的，也没依据来下这个论断，但这种论调很有挑唆力：不怀好意的西方人欺负咱们，自己海鲜吃够了，不让中国人吃。这个话题让他吃到了一拨流量后，他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第一是攻击西方，第二是阴谋论，第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有这三个法宝，他的自媒体不愁流量。于是，他干脆吧主业放在了四处抓人小辫子上。

最后他就盯上了谁呢？大象公会，以及大象公会下面的自媒体“回形针[PaperClip](#)”。早期他就用《补充那些回形针没说出来的知识点》，抨击“回形针PaperClip”地图不正确，而且上升到他们存在政治上的思想偏差，试图影响网路舆论。后来由于赛雷又爆料“回形针”有两个前员工一个供职于美军某部门，另一个通过境外社交媒体账号发布“反华言论”，终于导致“回形针[PaperClip](#)”被炸号，而赛雷一战成名。

给赛雷如虎添翼的是，回形针炸号不久后，大象公会也被封杀，松鼠会也差点小命不保，在周边一片萧条之际，他的粉丝一夜之间暴涨到一百万左右，也坐定了“爱国大V”的位置。

然而这么红的一个自媒体，竟然也在2022年5月18号被封杀，让人始料未及。而赛雷被封杀的原因也十分可笑，由于他常年不守知识产权规则，利用境内网站不审核境外图片的漏洞长期在境外盗图，终于踩到了一颗天大的地雷：他竟然没看出一张坦克人的照片是264事件的图片，还放到了自己做的视频里.....结果可想而知。

赛雷话金和赛雷三分钟被多个平台显示封禁一年。也算是咎由自取。

该怎么看这样的人和事？我想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确是流量密码，如果能煽动民众的情绪，不愁没有流量。所以胡锡进老师的《环球时报》虽然陈词滥调常年在表达“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台湾“天天欠收拾”，周边国家在“找中国的麻烦”，而中国当然是大步走在复兴之路上，然而大众就喜欢这一套，这些陈词滥调吸引的共鸣量非常大，所以至今《环球时报》都是中国航班上长期被免费赠阅的报纸，市场销量相当好。

我做电视栏目策划嘉宾的时候也清楚地知道，有些节目要拉动收视率，那就赶紧做一期中国航母节目，肯定有人看，那收视率蹭蹭往上涨。航母是中国人的心结，你只要讲这个主题，围绕着“中国航母什么时候能建好”，“中美航母比能耐”，“中国航母要收拾日本够不够”，“未来中国航母还能建几艘”，都能收获眼球。

这个流量密码是如此有效，也助力了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人们只愿意听中国的好话，不管是不是实际情况，一说“厉害了我的国”大家群起呼号。于是，客观理性的声音就渐渐稀疏，慢慢消退了。相反，人们愿意相信新冠病毒是美国人在武汉军运会的时候带过来陷害中国的，一传十，十传百。

在民族主义流量面前，任何辨析的声音都难以存在，如果有，也是被拿出来作为负面教材，至少，是不得人心的。

我一直有一句口头禅，叫“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将近二十年，我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勉励自己，但愿未来我的墓志铭上也是这几个字。理性不一定有热度，它不靠温度来搅沸人心，不需要情绪

化，但这感知起来似乎冰冷的认知在日复一日的启蒙道路上，一定会让更多人得到奔赴真相的愉悦，它会带领人脱离被蒙蔽的世界，看到真正的阳光。我认为这种努力才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

但现在这个流量变现的时代，让人不去逢迎市场是很难的，所有媒体都要生存，都要在融资之后给投资人回报，假设没有流量，他们就会迅速没落，最后不能生存。所以，一家负责任的媒体会时刻提问并警醒自己，我做的内容是真实理性客观的吗？是基于事实本身给予大众的吗？我自称为媒体的根本性原则还在吗？

第二，赛雷这样的“爱国大V”对别人被封杀乐见其成，享受战果，然而自己也被反噬，不知是否反省得到，剥夺人开口说话的权利是很不人道的行为？你以为自己站队正确，于是就可以有豁免权？

请君入瓮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善用酷刑的周兴终有一天遇到了武则天派人来审讯他，而且，审他的人是用他发明的酷刑作为恐吓，这是典型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天下再周密的整人逻辑，终会反噬到自己，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

赛雷你可以做揭发的事情，别人也可以举报你赛雷。

所以联想到方舟子在我被封杀的时候，恨不得手舞足蹈鼓盆而歌，趁着我已经无法发言澄清，在社交媒体上添油加醋污蔑我参加六四活动，说我做虚假报道，但我是不可能在他不久后被封号时也像他一样，来一出幸灾乐祸的剧目。该做的事情，我还会做，关于他诈骗公益捐款的事，我会在美国，在他认为最公平合理的法庭上起诉他，但方舟子被封杀，别人问我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我说我不否认跟他有个人恩怨，但我绝对不主张、不赞成对方舟子封杀。君子对垒，要赢，得堂堂正正地赢，不要搞揭发举报这样整人的动作，也不要利用别人落难来发横财暴得大名。

第三点，不要以为你做了一次成功的道具，就会被黄马甲披身，得到“苟活”的免死金牌。真不是这样。除了赛雷，微博上还有一个热门人物李子阳，早年我跟他很熟，他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当时给薛兆丰先生出书当编辑，也是一副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他自己还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市场的力量》，我与他相识是因为北京“传行知”公益组织搞的经济学讲座，后来也一起做过节目。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突

然摇身一变，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天天在网上骂公知，站在国家主义立场释放“中南海范儿”，于是被人称为“野生国师”。每时每刻，他的语言里都透露着跟顶层管理者坐在一起坐而论道，立马要面见皇上那种样子。这几年他春风得意，因为论敌逐渐在网上凋零，死的死，封的封，卖货的卖货，禁言的禁言，他以为他的春天彻底到了，结果，前两天，他李子阳也被封杀了。原因是，对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发表了一些微词，提出与病毒共存才能体现我们大国的自信。没几天，他的微博就被炸了，他还不服，自己公众号上再写文章，结果公众号那篇文章立刻也被删掉了。

你看，你不要以为你站对了立场就高枕无忧，野生国师是你的自我想象，声声赞美给不了你永久苟活的路条。碰壁了，你就该觉醒了。

在《1984》这个舞台上，你的台词有多美不重要，你的命运都不取决于你自己，而取决于幕后的那个导演：“老大哥”。

5.27动态清零不停止，经济民生保不住

2022年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十万人参会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主题是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看到这个话题，我想起当年在中央电视台做评论员的时候，经常评论到这样的话题，很宏观、很宏大，今天，我想讲具体、细致一点的真话，讲一点李克强总理未见得敢说的真话。

先说前几天胡锡进的言论引发的一篇文章吧，叫做《除了胡锡进没人关心经济》，这篇文章一下子引起了社会大众热情讨论，刺激很大。文章里说，一贯“叨盘”的胡锡进现在一反常态，开始有“大臣死谏”的样子，呼吁决策层要关心经济，希望上面拿出“震撼弹”级别的政策扭转中国经济的形势。

事实是，进入到五月份以后胡锡进的确连续撰文，先说四月份经济数据刺眼、触目，必须得重视，后面紧接着说四月份的很多经济指

标已经“腰斩”，必须重视。他说这话的时候，四月份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向全社会公开，胡锡进却较早独家拿到了引起广泛关注的关键数据。这些文章是胡锡进本人本心出发而写，还是受命而书，很难判断，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胡锡进不会胡来，所有的“叨盘”都是在明确指示下才蹦出来。要是党内有两队主人，他叨谁不叨谁，还得选一下，这一次，可能也是“叨”了党内某一部分人的“盘”，否则以胡锡进的性格，不会这样出手。

但胡锡进的文章披露了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些重要数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是青年失业率高达18.2%，这个数据非常可怕，意味着差不多五个年轻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找不到工作！

胡锡进在那篇文章里还讲到两个重点：一，四月份很多经济数据是腰斩，二，很多实际数据低于本来就已经非常低的预期。连他都说，这个局面如果不改变的话非常可怕，所以希望当局拿出“震撼弹级别的政策”。按我的理解，胡锡进这话，难不成就是“赶紧放弃动态清零”？

依胡锡进的秉性，他不敢这么讲，只强调，管理工具箱里工具很多，希望上层抓紧得挑“震撼弹”级别的政策。你想想，现在的语境下，什么政策是“震撼弹”级别的？减税？补助？减费？都算不上吧？所以，我只能理解，最具有震撼性的动作，就是宣布防疫政策改变，动态清零停止。

但是他不敢讲透。

在这些信息前提下再看5月25日李克强总理作讲话的十万人电话会议，联系本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云南跟各省市的领导人召开的电视座谈会，就可以看得出来，主题词都是稳经济、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这些关键词都是和四月份的经济数字有关的。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有十二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其中10个省经济总量居全国前十位。为什么要在云南这个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地方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大家都在疑惑，似乎，就是想远离北京召开这个会议。而会议结束，李克强回京之后又搞这个十万人的电话会议，似乎也是为了呼应或者说延续、确认云南座谈会的主题。

我猜测，通过十二个省市领导的座谈会，会议应该是取得了地方大员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共识，因为如果连排名前十的省市对经济形势都开始悲观，那么再这么下去，可能今年的中国经济就要出大麻烦，所以，光是各省“高层”共识还不够，还得扩大影响，所以有十万人电话会议，这个参会人员名单没有对外公布，我估计范围应该是政府中层以上的干部，再加上国有企业中层或者高层以上的干部来参加。为什么是这样大的范围，我想，就是要赢得各级政府对国务院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党内获得民意支持。否则，稳经济保就业保民生的具体政策就很难推进。

也正是在这个会议中，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要“保就业”，把就业形势的严峻，四月份经济指标的超期恶化提前公布了，而这个指标原本是应该到二季度结束时才依规公开披露的。国务院通报这些数字，指向很明确，就是提醒大家，重任在肩，接下来要千方百计复工达产，让疫情（或许应该说是防疫）所导致的近乎停摆的经济状况恢复正常。这，是我观察到“十万人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

我想，李克强总理在十万人会议上说的话也有保留，我不妨在这儿替他直说，在国内体制内工作多年，以我的读解能力，会议上多少欲言又止的“弯弯绕”，就是事态已经严峻，动态清零政策不停止，保经济、保发展、保民生没戏，大家得随时准备着，等待清零政策戛然而止。

也许可以从反面佐证我读解的，是这个信息：十万人会议之后的第二天，署名经济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这篇文章给人的感觉是在跟李克强总理的十万人电话会议形成一种隔空交战，强调的是现在经济形势还可以，说是外商投资比例在增长，经济数据虽然下降，但是电商零售在增长……所以这篇文章的读解是，4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转弱，这是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变化，是受外在影响的阶段性波动。但面对新的下行压力、更严峻挑战，我国经济依然显示出强大韧性”。

这篇文章除了论点很有针对性，文章的数据也跟前面说的电话会议反着来，这外商投资的数据也不知道是出自哪个统计口径，如今重要

省市的外商投资额都在下降，上海骤降了90%，为什么全国还会相应的增加？

再者，外商投资额增加跟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即便外商投资额惯性发展，经济仍有可能在下降。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是赞歌加乐观，说得假大空，满篇喊口号。

可这篇文章在5月25日被新华社全文播报了。

看起来，党内也有两派，一派是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研判目前经济形势已经非常糟糕了，急着想要复工达产、保就业、保民生，而另一派，还在认为动态清零这个政策毫不动摇必须坚持，经济你放心，肯定能发展。这是现在呈现在中国社会决策层之间的两种势力。所以，我才说，李克强总理没有敢说的话，我现在替他说：动态清零如果不停止，保经济就没戏，保就业就没戏，保民生也没戏！

首先，提到经济发展，要做的第一项措施叫复工达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企业都停摆了，如果动态清零不停止，能复工吗？动辄几千人的小区封了，北京的大批人给转移到河北崇礼去了，而多少

岗位可以居家办公？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一部分事业单位，那里面有可以居家办公的业务。但蓝领的工作能居家办公吗？生产线、快递物流、餐饮业、建筑业、装修业能居家办公吗？不能吧。这个社会有大量的行业居家办不了公。

所以你看看上海的数字，非常触目惊心，手机生产下降90%，电视机生产下降98%，电脑生产下降95%.....这不差不多都歇业了的意思吗？如果不把动态清零的政策cancel掉，那就只能生产值往下掉。

目前，北京、上海这两所城市基本上处于”类封城“状态，虽然没有像当年武汉那样完全封城，但已经完全不是正常的生产生活了，想进出北京，比登天还难，上海也还是一样，虽然近期宣布社会面清零，可许多小区开了几天之后又不让出了。

中国的两大中心都在半昏迷状态，中国的经济能发展能活跃吗？只有流动才会产生gdp，只有交流，才有发展，《经济日报》说电商还有数据上升，简直无耻，难道出不了门了，还不用电商？都等着大白去救济吗？囤再多食物，也有吃完的时候，民以食为天，在电商上下

单可以说食品行业发展了？无耻谰言。这就是典型的“用局部事实来说谎”。

看看上海这个经济龙头的有意义的的数据吧：电力生产下降了40%，这说明什么？电是不能储存的，生产出来就得用掉，所以电产能下降40%意味着什么？用电量少了，民用电基本上是个恒常数，所以下降的就是工业用电，企业停产了，用不了电。

中国现在有两批人有两个不同追求，一队盯着经济，想复工复产，另一队盯着政治，“动态清零”仍然是目前最大的政治！这两个追求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就是我的观点，只要动态清零不改变，复工达产是没戏的！

有人说，按照十万人会议上的建议，给企业减负减税，是不是也能奏效，动态清零照样干下去也不碍事。请问，减负减税什么时候有用？企业开足了马力在生产的时候才有用，比如说增值税，生产出来了有增值税，减税了，企业就相当于增加收入了，但是如果这家企业如果产线都开不起来，减税就一点用没有。无非有一些费率在企业不

生产的时候，政府不征了，让企业不要受双重损失。但是这对促经济有何用处？

再说到失业率，18.2%,太恐怖了，怎么降下来？只能先让企业动起来，否则企业不招工，年轻人就没法有工作。还有些人，即便找到工作，小区一封，又出不去了，就算有人招工，你能去吗？所以，如果不停止动态清零的政策，想解决失业率也没戏，冲击到企业的事情，必然也就冲击到员工个体。

最后，我想说，经济指标的大幅下滑已经显而易见。过去四十年，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个根本共识就是求发展，这也是党内外最大的共识，所以这四十年以来，社会基本稳定，大家安居乐业，因为经济向好，大家都有赢面，所以，经济增长是社会最大的公约数。现在，这个最大共识被突破，经济增长受到空前挑战，由此引起一部分人对动态清零政策开始怀疑，这是好事。

形势越来越明显，这个愚蠢的政策全中国人看得到，全世界的人也都能看得到，但却有几个人似乎看不到，他们到底为什么看不到，到

底还要一意孤行多久，又是为了什么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党内大多数人的利益，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三四月份的经济数字狠狠地打了这些人一记耳光，看着吧，如果这个数字继续滑坡，我不相信动态清零还可以继续。

醒醒吧，孤注一掷的人，放弃动态清零这种愚蠢的政策，给老百姓一点活路吧！

否则，经济发展没戏，保就业没戏，保民生没戏！

附录：

上海2022年4月经济数据——

四月份工业生产总值1364.17亿，同比下降61.5%

四月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13个，同比下降98%

1-4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9%

四月份社会零售总额716.97亿，同比下降百分之48.3%

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下降11.3%

截至四月份进出口总额12269.53亿，同比增长0.1%

其中四月份2191.49亿，同比下降36.5%

工业产品中，产量汽车75.35万辆，同比下降74.8%

智能手机58万台，同比下降60%

计算机设备51.9万台，同比下降74.7%

智能电视0.18万台，同比下降98.7%

发电量41.62亿度，同比下降40.5%

5.27回忆新疆鲁克沁镇暴恐事件

近日，BBC表示，他们得到几千张被新疆“再教育学习营”录入名录的照片，据说是德国黑客进入新疆的警方电脑系统中，获取、下载并解密了一些文件后辗转交给BBC。BBC拿到照片后并没有立即发表，他们调查了几个月，核实照片里的人到底是不是被拘留、关押，失去自由，最终他们确认了大概两千多人，是被送入了新疆的“再教育学习营”，其中最年幼的是一个15岁的女孩，最年长的是一位73岁的老奶奶了。

看到她们的照片，我还是深受触动，但对这个新闻我没有采访过，不予评论。我只是通过这个新闻，联想到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跟大家分享。

2013年6月26日，在新疆吐鲁番鄯善县鲁克沁镇发生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包括10名暴徒在内共27人死亡，其中民警9人。这样的案子在央视原本是报道不了的，因为关于新疆、西藏、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负面案例，原则上中央电视台不报导，但是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宣传部主动提出，希望国内的几家权威媒体能报道这个事件，于是就约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环球时报》等少数几家媒体，中央电视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当时供职的《新闻调查》，我马上报名，因为新疆题材平时难得操作，新闻现场去得很少，这个题材又非常典型，我特别感兴趣，所以就在暴恐事件发生几天后和同事飞到了乌鲁木齐。

我们租了辆车从乌鲁木齐开往鄯善县鲁克沁镇，高速公路将近300公里，下高速时，特警荷枪实弹对着我们，要求我们下车接受盘问。虽然我们出示了中央电视台的证件，但他们在整个盘查过程中枪口始终对着我们，并要求检查后备箱行李，把行李箱内每一件衣服和携带的摄影器材都翻看了一遍。可以感受得到，特警的神经是高度紧张的。

抵达鲁克沁镇，和当地的市委宣传部接洽上后，我们采访了“6.26”事件幸存者，复原了案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很遗憾的是，这些采访最后中央电视台还是没有播出，所以，我想把没播出的内容分享一下，毕竟，至今，网上关于“6.26”事件的报道资料不多，很多信息也不准确。

通过采访，我们大致能勾勒出来“6.26”事件的全貌，这个背景是，2013年前后，新疆很多地方汉维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尖锐，当地政府实施了一些维族人不能接受的政策，禁止维族男性留胡子，禁止女性戴面纱、穿黑袍，原因是认为这两个行为都是极端宗教势力渗透的细节表现。所以，维族人如果反对这些政策，就被怀疑为是极端宗教势力控制的对象，会被列为“重点关照对象”。

这就影响到了每一个维族人的生活，假设你留了胡子，一上大街被人关注到，就是“重点关照对象”，类似这样的氛围让维族人十分方案。而这样的冰山一角是不是导致“6.26”事件发生的原因，也只能大家推理了。

案件发生后经过审问，警方知道，其实在2013年6月前很长一段时间，鲁克沁镇就有一批维族人密谋，准备在7月5日这一天搞袭击，主要目标是杀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计划是先攻击派出所，然后抢枪上街杀人，上镇政府杀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提前很长时间就到各个目标地开始踩点。但出乎这些维族人意料之外的是，2013年6月上旬，政府开始搞“清网活动”，把一些重点对象找出来定期盘问审查，而他们团伙中的一个人，恰恰被抓起来了。其实，政府抓这个人的时候并不知道此人和其他维族人在密谋发动袭击，但这队团伙紧张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政府是否已经得知他们的行动，或者被抓进去的这个人会不会在清网行动中把这件事供出来，所以，他们决定不再等到7月5日，而是提前到6月26日开始行动。

6月25日，密谋的维族人准备了刀具，做了宗教的一些仪式，并跟家人告了别，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6月26日早上5：50他们二十来个人首先进攻了鲁克沁镇的派出所。当时鲁克沁镇派出所大概只有九个人，通过监控录像我看到了，这二十个人冲进去时，门口有两个人站岗的，歹徒先拿刀砍了这两个人，其中一人当场身首异处，非

常残酷。然后他们就开始往二楼的枪械室进攻，见人就砍，派出所所长他们边抵抗边往外撤，退到了所长办公室，这些维族歹徒就拿刀砍门，派出所所长从窗户跳了下去跑了。

歹徒一看派出所所长办公室的门打不开，不再耽误时间，马上杀去第二个地点，是旁边的一个建筑工地，里面有不少打工的汉族人。当时这些汉族工人还没起床，他们冲进去之后一通乱砍，大概砍死砍伤了七八个人，路上偶遇了一个理发店的老板，是维族人，也杀。之后是他们攻击的第三个目标，一个武警中队。这个武警跟后来成建制的武警不一样，他们其实是维护当地治安的半军事化组织，整个队伍里只有队长有枪，其他人只有一些棍械。他们完全没料到大清早会有暴徒来袭，由于手上没枪，吃了很大的亏，且战且退中也死了不少人，最后他们退到后面的房间里，只有武警队长有一把手枪往外打，子弹都给打光了，打倒了两个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剩余的暴徒开始撤退，奔向他们最后一个目标：鲁克沁镇的镇政。

好在，跳窗逃走的派出所所长看到暴徒从派出所撤出之后，回到派出所，打开了枪械室，取出了冲锋枪分发给公安干警，然后到院子

里开了一辆消防车冲到大街上堵截暴徒，追上之后在消防车驾驶室和车顶上用冲锋枪扫射歹徒。局面陡转，这些歹徒中不少人被冲锋枪直接撂倒。

据干警回忆，当他们给冲锋枪换弹夹的时候，这些人拿刀就往汽车的驾驶室冲，砍驾驶舱的玻璃，完全是亡命之徒的状态。而幸亏派出所干警及时出现，鲁克沁镇政府虽然是暴徒的主要攻击目标，但受损失不大。政府人员逐步往外疏散的过程中，特警也出动前来支援，在镇外面布置了三条封锁线。暴徒中最后剩下的几个人抢了一辆桑塔纳冲出封锁线，之后逃逸到附近庄稼地里，起初几天，政府拉网式在庄稼地寻找，没找到，后来是这几个人饿得不行了，忍受不住饥饿，自己出来投案了。

这就是鲁克沁暴恐事件的过程。非常残酷。

在采访当事人和看监控的时候，我有几个强烈的感受，留存至今。

一是，当地汉维民族之间的不信任，甚至可以直接说是敌意，在很多场合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虽然政府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很多人是维族，相处起来表面客客气气的，但隔阂如影随形。而在民间，这种隔阂和敌意就更明显了。我们当时去大街上吃饭，政府部门的人就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进了一家维族人的馆子后，我们点了拉条子，你可以看到，整个餐馆里全是维族人，只有我和同事三个汉人，你能感受得出大家眼神里的寒气。他们当然不会不接待你，但是不热情，有戒心。这种对峙感，我们理解，至少我本人是理解的。

他们的菜刀上都拴着一个铁链子，菜刀上刻着主人的身份证号，这种被管制的程度，我们日常生活何曾能体会？

第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对潜在的暴力活动摸不到底，只有防不胜防的恐惧。这次鲁克沁的暴力袭击，密谋时间非常长，而政府的情报系统完全不知道，最初抓到的那个人也没交代，所以事后回头看，也给人一种深不见底的寒意。因此，派出所所长虽然接受了我的采访，但要求打马赛克。其实政府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和面貌信息一般

都是回公开的，但这位惊魂未定的所长还是不希望自己被太多人记住，怕被打击报复。

第三，政府部门的汉族人对维族群体已经产生了本能的不信任，或者说，现实已经让他们不敢随便对维族群体，包括维族同事产生信任。而新疆干部的整体素质跟内地比，各方面都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长期以维稳为主体工作的他们，在思想观念上比发达地区的警务人员远远落后。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些年来很多地方的安全，包括新疆地区的安全状态，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以新疆的汉维两族人民的权益牺牲为代价的。尤其是维族人，他们拿着新疆的身份证就进不了北京，或者就去之后住不了酒店。而七五事件对新疆的影响更是深远，乌鲁木齐基本分出了汉族聚居区和维族聚居区，曾在维族聚居区买房的汉族人后来就想把房子卖掉，有些人直接卖掉了乌鲁木齐的房子跑回内地。但无论是房屋买卖还是其他手续，在新疆，程序都相对内地麻烦，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城市管理就出现卡顿，而在这过程中，维族人所承受

的，肯定比汉族人要严重得多。比如维族人要申请护照，难度就非常大，他们想通过一张身份证走遍中国，也非常难。

所以，新疆问题确实非常复杂。我跟大家陈述这段陈年往事，不是单纯爆料，也不是单纯要谴责这些“暴恐分子”。当然，搞恐怖袭击肯定是要谴责的，他们在杀政府部门人的时候，不分汉维，是无差别杀戮，当然要谴责声讨，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暴徒的谴责上，民族间如何友好行进的话题就不可能真正展开。我觉得，我们首先得承认这是一个悲剧，是民族之间的悲剧。

公安干警告诉我，“6.26”事件次日，派出所民警到暴徒家里去核实当事人身份的时候，一进门，家里的女人们就掉眼泪了，她们当然知道，丈夫肯定已不在人世。我听他们这么讲，心里也很不好受，新疆是个好地方，生活着不少民族，我想，两族人民谁都不想看到杀戮、牺牲，而每一次的暴力事件一旦发生，给汉族和维族造成的伤害几乎是难以复原的。

到了7月5号这个新疆人都不堪回首的日子那天，我还在鲁克沁镇，当地政府把所有的店铺都停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政府也不上班，满大街都是武警战士，荷枪实弹。大喇叭不停地喊着各种各样的通知，“禁止上街”等等，类似于宵禁。那天风刮得特别大，每个在户内听着风声的人，肯定都会觉得寒意蚀骨。

究竟为什么新疆会发展到今天的状态，我想在今后的节目中慢慢跟大家分享、讨论吧。

5.29 杭州纵火案真相-上

2017年6月22号，杭州发生了一起纵火案，事情发生后不久，《局面》去做了一次深度调查，我在现场采访了死者家属林生斌、还有死者朱小贞的哥哥朱庆丰，以及现场参加救援的物业人员。节目播出之前，我写了一篇报道，一共一万多字，名叫《蹊跷的三小时》，我原计划让这篇文章随着视频节目的播出，刊发在我的公众号上，但被领导看到后坚决地阻止了我，说，以我王志安个人名义在公众号发也不可以。今天，我辗转把当年存在公众号草稿箱里的这篇《蹊跷的三小时》找出来，希望关注“杭州纵火案”的观众能知道，不会被披露的这起惨案背后的真相。

“杭州纵火案”的案情很多人都知道，2017年6月22日凌晨5时07分，杭州蓝色钱江小区一户人家的保姆莫焕晶因沉迷于网络赌博，输

光所有钱财后而还想从雇主家中借钱，又苦于此前已经伸手多次，故想通过纵火后扑火来邀功，继续向雇主借钱，岂料她点燃客厅窗帘和沙发后火势蔓延太快，莫焕晶自己逃脱，而女主人朱小贞和三名子女均在火灾中死亡。

火灾发生后，犯罪嫌疑人莫焕晶首先成为人们的讨论焦点，我采访林生斌时，首先也谈到的是他们为什么会雇佣这样一个保姆，而林生斌也表示后来才知道，广东人莫焕晶早年就沉迷六合彩等赌博，离婚后为躲赌债去上海做保姆，从那时候开始，就因为网络赌博多次在雇主家偷东西去典当赌博，林生斌通过中介公司找到莫焕晶，主要看中了她有开车的技能，可以接送孩子，而林家有三个孩子，用车比较多。林生斌表示，莫焕晶向他们家两口子以修房子等理由前后借了十一万五千块钱，其实都成为了赌资最后被莫焕晶输光。后来审讯中，莫焕晶承认在林家偷过宝格丽手表典当后赌博，在火灾前一日，莫焕晶又从林生斌家偷了一块名贵的瑞士手表，换到了三万五千块钱人民币，结果一晚上网络赌博后，输得账户里只剩下八毛五分钱，于是，她就想到了铤而走险，在客厅里放火。女主人朱小贞醒来后发现火

情，于是带着三个孩子躲进了他们家的女儿的房间，而这个房间，最终让他们四人命丧黄泉。

案子似乎非常简单明了，纵火犯莫焕晶被判死刑，现在已被执行。但这个案子因为涉及的是杭州豪宅的主人，且女主人和三个年幼的子女全部殒命令人震惊沉痛，所以，很多讨论至今余音未了。

我们在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公众非常关注，热点一波三折。而后期的主要热点是：死者家属林生斌，向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绿城物业提出了1.4亿的赔偿要求，被披露后引起轩然大波。

网上很多人开始质疑林生斌漫天要价，把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性命当作讹诈的依据，其中网络上很知名的“烧伤超人阿宝”，还有张洋（“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狼狈为奸地起哄。2021年夏，由于林生斌在网上做直播，且被披露再婚，大批网民又不干了，群起攻击林生斌。而当年同时接受我采访的朱庆丰又代表朱家开始跟林生斌反目，最终形成第二轮舆论浪潮，大众纷纷声讨林生斌。很多人还猜测林生斌在纵火案中是否扮演了更为不堪的角色，有人说他跟他情人合谋，

收买了莫焕晶把朱小贞和三个孩子给害死了，不少人来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山寨福尔摩斯”从我采访林生斌的背景黑板上的一串数字得出了一个结论，说这个数字一个是银行账号，还有一个是莫焕晶放火之后从火场逃离现场需要的时间等等。想象力实在丰富。

其实我采访林生斌的地点是林家当时在郊区租的或是买的一个房子，我记不清了，他们有时候周末会在那里度假，黑板上的字是林生斌的孩子以前写在上面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各种牵强附会和热心的猜疑求证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作为这个事件的调查者，不能充分披露信息的时候，公众是很容易被误导的。其实“杭州纵火案”最值得关注的信息，不是别的，是在我写的《蹊跷的三小时》里面的内容。但当时，我们无法披露，事隔几年之后，我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希望我们能从中看到真相背后的真相。

这个纵火案最值得关注的方向是什么？其实是纵火发生后到朱小贞母子四人遇难期间，杭州消防做了什么，是否存在重大疏失。

案子的时间线是这样的：4:50莫焕晶开始点火，5:04朱小贞第一次报警，5:05和5:08，朱小贞再而三报警，期间，外围也有人也开始报警，5:07，绿城物业报警，5:11，消防车赶到了小区门口。

消防队距离小区直线距离只有八百米，车行距离1500米，所以，出警抵达用不了几分钟。但跨过中间的消防救援过程，朱小贞和三个孩子最终被发现倒在大女儿卧室的时间是几点呢？7:00。也就是说，距离朱小贞第一次报警的时间过去了两小时左右，而消防队员第一次进入火场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他们自己说是5:24，我觉得这个时间可疑，但即便说5:24，竟然也用了半个小时的事件才发现应该第一时间救出去的人员，这是否太离奇？

这是居民楼火灾，不是工业区危险品区火灾，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才找到人？这当然不正常。所以我们在前方的时候，是沿这个方向去调查的，但是，阻力重重。

首先是消防中队，说因为是军队体制，所以不能接受采访，其次，所有被采访对象都害怕，物业尤其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和这个小

区的开发商都是绿城大集团体系的，绝对不能得罪消防，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以后再做开发或者物业服务，你消防还想审核通过吗？而且，当时受害者家属也害怕说错话。

实际上，最早发现有人在火场内没有被救出的，是死者朱小贞的哥哥朱庆丰，不是消防队。在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火场两个小时还没有发现他妹妹之后，他非常愤怒，从火场出来之后，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质疑杭州消防有问题，可当天下午，他就被警察带走了。晚上从警察局里出来的时候，他又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感谢政府感谢党。

这就是当时采访前面对的现实。

这个细节我没有在节目里讲，文章里也没有讲，到现在我才可以跟大家透露。而这个细节也能充分说明，你如果想调查清楚一个消防部门是否存在疏漏，那是天大的难题。

就消防在本案里的作用，我们可以来复盘一下。

女主人朱小贞在发现火情后一共打了三个报警电话，时间分别是5:04、5:05、5:08，而过程中，5:07她还给自己的一个邻居打了一个电

话，但这个邻居当时没听到，5:30邻居看到未接电话回拨的时候，朱小贞没有接，可能已经昏迷了。朱小贞接的最后一个电话是5:11，是120给朱小贞打的电话，问她在什么位置，朱小贞回答，她在她孩子的房间里，四人都在北边卧室，这是她接的最后一个电话。

朱小贞和她三个孩子最终的死亡原因全部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侵入人体后，人就会昏迷，但不会立即死亡，如果救助及时，他们是有生机的。

5:11，朱小贞还可以接电话，而消防车也抵达了蓝色钱江的大门口，可惜的是，小区大门口应急通道、消防通道全部被焊死，消防队员用破拆工具花了几分钟锯开，车辆进入小区。5:17左右，第一路消防救援人员赶到了发生火灾楼的十六楼，他们在那里集合，用了五分钟左右来到火灾现场，1802室门口，这时候已经在门口的绿城物业人员听到消防员说，没有带破拆工具。而这个小区的入户门非常坚固，消防员打不开。

事后消防对公众公布不能及时破门而入的原因是门内温度太高，一旦打开之后会爆燃，非常危险，但是后来有记者采访过其他消防员，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爆燃是在里面没有其他通道的情况下才会爆燃，而1802房间里的保姆门都是开着的，不可能发生爆燃，所以，不能及时进入第一现场的真实原因，显然就是因为消防员没有带破拆斧。

当时消防员就让绿城物业的工作人员去另一栋楼找消防斧，再回到1802门口的时候，已经是5:50，这期间消防员也没有干等着，第二路消防员抵达后，看到第一路人没进门，来到这个楼之后，让物业带他们从另外一个通道走保姆电梯进去了。

林朱夫妇住的这个蓝色钱江是当地豪宅，一共有360平米，房子设计方为确保主人生活私密性，把保姆房和主人生活区隔离开，保姆专门有保姆电梯和入户门。而保姆门和主人的入户门不在同一楼层，也不能直接互通，必须下到一楼从另外一个门重新坐保姆电梯。从保姆房进入厨房，然后穿越厨房进入客厅区域。

这么弯弯绕绕后，消防员终于抵达1802的火场，这是什么时候？根据消防员自己公布的时间，当时已经是6:24。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准确呢？

根据其他事件数据来参考，第二队进入小区是5:23，他们难道用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火场？

根据绿城物业消防系统的数据记录，保姆莫焕晶门前的消防栓上，消防用水的按钮在5:40被按下了。这个按钮的作用，是让消防水管不用楼顶18吨的生活用水后，而是用楼下储有500吨消防用水的水箱。从这点来看，第二组消防队5:40应该已经在保姆门口了。

所以说，第一组消防员大概是5:23到5:25之间到1802门口，第二组是5:40到保姆门口。当时朱小贞已经无意识，需要被立即救援。但最接近朱小贞和孩子们位置的第一组没带消防斧，第二组如果在15分钟，即5:40进火场，也已经是耽误时间了，但第二组从保姆门进去之后做了什么呢？他们穿越到主入户门，打开了1802大门，两队急急忙忙用两路水龙头在屋内灭火，灭火的速度倒是快，几分钟火势就下去

了，可奇怪的是，不知道是没找，还是没找到，总之，朱小贞母子四人竟然就在这灭火过程中仍然倒在女儿的卧室里无人问津。

《消防法》有明确规定，进入火场首先是要救人，虽然有火有烟雾，但消防员是有专业设备的，有隔离服、防热服、喷淋设备，具备找人的条件。

这里有个蹊跷的信息在社会上流传，说是5:28绿城物业有人给120打电话，说里面的人出来了，里面没人了，但这个信息我没有找到来源，绿城物业的人也回避不言，有人隐约表示，这是消防人员说的，到底谁说了，是不是把莫焕晶从出来就混淆为火场中的人全出来了，消防和物业都没有接受采访，如果真有这个乌龙，是不是消防人员也应该在现场核实呢？

我们采访了绿城物业的保安队长徐某某，他说，5:53，入户门打开之后，他问从里面走出来的消防员，里面还有人吗？消防员非常肯定地跟他说，没人了。

没人了，徐队长说，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损失再大，只要没死人，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然后大家继续灭火，朱小贞和三个孩子还在卧室里面。

真正找到母子四人的，是朱庆丰。

6:00左右，朱小贞的哥哥朱庆丰，听说出事了，马上打车赶往蓝色钱江，路上给派出所打电话，说我联系不上我妹妹，6:05再打电话问是否可以定位妹妹在哪儿，也没有反馈，6:10他赶到蓝色钱江，问到了莫焕晶，莫说人还在楼上，他想上楼，但那个单元已经被保安拦上了，不让进，他开始四处找人问朱小贞的去向，始终无人回复，直到6:30，他急了，发现隔壁单元的徐队长下楼跟绿城的人汇报完要重新上楼进火场，就混在保安中，通过旁边这个单元到顶楼又下到1802保姆门，到门口的时间是6:53，朱庆丰一看，里面还着着火呢，而政府部门此前披露的信息说，火都灭了，朱庆丰拍了一张照片，往进去看到里面一共有两个消防员，他问消防，人呢？消防员回答，里头没有人了。朱庆丰说，里面还有两个房间，你们知道吗？消防员答：不知道。朱庆丰赶紧带消防员到北部区域去，发现里面两个门都还没有

开，消防员就把门给破开了，朱庆丰问破开了里头有人吗，消防员回答，我们只管破门，其它的不管。朱庆丰急了，自己拿了一块毛巾沾上水，爬到了外甥女的房间，在门口一看，里面隐隐绰绰的，在床下躺着他的两个外甥，一个外甥女，还有他的妹妹朱小贞。

5.29 杭州纵火案真相-下

(蓝色钱江纵火案起火房屋示意图)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火灾发生后，朱小贞先到两个儿子的房间，把两个儿子叫醒之后，带孩子们都躲到了最里面女儿的房间，然后开始打电话报警。虽然女儿的这个卧室也有一扇窗，但这个窗户打不开，只能推开一个10厘米左右的缝隙，用于通风。

朱小贞和三个孩子的位置都是面向着窗户的缝隙的，他们应该感受到，房屋内虽然没有过火，但户外的浓烟在源源不断地从房间门的缝隙里蔓延进来。所以朱庆丰看到了孩子们脸上都被浓烟熏黑了，他们都是长时间吸入了一氧化碳，最终中毒身亡。

关于到底谁首先看到了四个人，上述是《财新》杂志的报道，但早期我采访的时候，现场人员跟我说的是，由于消防人员不让朱庆丰进去，他们自己进房间看到了四个人，出来告诉绿城物业保安队长徐然礼说，不行了，人不行了。徐然礼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他当时

就崩溃了，因为此前消防队员告诉他们，里面已经没有人了，现在怎么又是这个说法。朱庆丰得知后不顾一切冲进去，看到了妹妹和孩子们。

无论是谁先发现，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朱庆丰看到一大三小的死亡现场，绝对是痛彻心扉的。他抱起孩子往下跑，第一个被送下去的是七岁的外甥女，然后是十一岁的大外甥，最后一个被抬下去的，是朱小贞，而当时，已经是7：40，距离朱小贞打电话报警求救，已经过去了2小时36分钟。

这起因为保姆丧尽天良想做的戏，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施救的过程被拖延再拖延，最终酿成了四条人命大案。

如果追问问题出在哪儿？法庭上的宣判当然是一种说法，保姆作为始作俑者，十恶不赦，已经被判处死刑；物业管理在消防方面有漏洞，存在安全隐患且应对不及时，已经与林生斌达成调解，赔偿已经落实。惟有消防，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在这次出警过程中，是否正常履行了职责，是否救援到位。

我们在没有直接采访到消防救援人员，所以至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在破门第一时间救人，但协助消防的绿城物业人员告诉我们，消防队员进入火场之后，他们发现有一个队员突然不见了，找自己也耽误了一些时间。而最明显的是，在朱庆丰告知之前，没有消防队员发现房子的北部区域还有房间，而他们起初根本未曾踏足那块区域。

如果一定要说一下客观原因，那就是林朱夫妇买的大平层非常大，一共有360平方米，的确不是普通民宅，消防员想象不到一户家庭会有如此大的面积，然后以为自己已经巡查完整体区域，没注意到，有一个房间里是有通道的，穿过通道还有两个房间。

令人疑惑的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消防队出警时必须带上户型图，有图就不会遗漏区域，除非，这整个消防队没人会看图。现在我们有理由怀疑，杭州消防出警时没带户型图，也没有试图想办法看到户型图，现场又不允许他们带物业进去，于是他们就没有发现朱小贞母子所在区域。

这算不算疏忽，算不算过失呢？

假设他们既带了户型图，又备有破门设备，他们几点可以找到朱小贞母子呢？是否有可能在朱小贞母子昏迷时间还不长的时候送上救护车，把人救回来呢？

直等到朱庆丰这个家属出现来指路，才发现里面不是没人，而是有人，再送医的时候，朱小贞和孩子已经昏迷超过2小时，已经没有抢救可能。

我们做完采访后，由于大量信息指向救援过程的不及时，很多采访内容就都不能播出了，最后《局面》只播出了林生斌的访谈。

而在这个纵火案事实之外，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大家知道。首先是具有象征意味的灵堂的事，因为这个案子太惨烈，惨遭不测的三个孩子非常娇俏天真，可以说是人见人爱，而朱小贞也非常善良，引起了大家的同情和共同追凶的意志，所以邻居们就在小区里为他们布置了灵堂，杭州乃至全国各地的人络绎不绝地到这个地方来祭奠，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过程中，当地政府就有点坐不住了，据说，政府

也介入了林生斌与绿城物业的赔偿谈判，希望抓紧调解，拆除灵堂，消除负面影响。

而在此过程中，有一天林生斌的哥哥突然被抓了，警察从他手机记录里翻出一个卖淫女的电话，以嫖娼的名义拘留了林生斌的哥哥。然后派出所把林生斌叫去保释他哥哥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跟他说，知道你们家不容易，出了不幸，所以我们也没处理你哥，你就把他领回去吧。

这个插曲太不同寻常了，林生斌不傻，不会不懂言外之意，所以林生斌在面临我们采访的时候对这件事情只字不敢提，而大舅子朱庆丰被派出所带走那个细节，在采访过程中，他也不敢讲。一个商人无论如何发迹，对某种不期然灾难的恐惧也是难以抵挡的。他已经失去了四个亲人，如果再失去其他，那生活也会难以为继。

但追问消防毕竟是普通人也会联想到的疑问，所以，到了庭审阶段，当莫焕晶家属委托的律师党琳山针对救援过程感到蹊跷的时候，他也想到了，要复盘救援找人过程，想要了解消防在本案中是否有过

失。我们也联系过党琳山，他给我看了部分案卷，对于其中描述到一共有84名消防员参与了这场救火，而检察院只采集了两个没有进火场的消防员的供词表示不正常。所以党琳山认为，检察院在这个案子过程中急于取证，似乎只急着让莫焕晶伏法，平息舆论，这事儿就结束了。他们似乎急着让杭州消防隐匿起来，不被公众注意。于是，党琳山提出，一，要提管辖异议,杭州市的法院审理这个案子已经不合适了；二，他提了一个35人的出庭名单，其中包括现场救援的消防员、物业人员和120指挥中心的人，希望他们全部出庭接受律师询问。

对于党琳山的这个提议，我当时就表示，法庭可能不予采纳，他坚持说，如果不能满足他这个要求，他就要退庭。果然，从第一次开庭起，党琳山就按照这个辩护思路进行表达，结果显而易见，法庭拒绝了。而党琳山也真的当场退庭。

党琳山还以为，他退庭之后，法庭就没办法辩护下去了，谁知，法院当庭裁决党琳山自愿放弃辩护。之后，广东省司法厅对党琳山的行为还立案调查，认定党琳山涉嫌在庭审过程中不遵守法庭纪律，未

经许可擅自退庭，干扰诉讼正常进行，利用网络炒作案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吊销了党琳山的律师辩护资格六个月。

事情到这个份上，我们已经无法再调查采访了。北京有个知名律师叫何兵，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他说他想接这个案子，要搞清真相，同时莫焕晶不一定死。他希望我提供一些我们采访过程中获得的资料，我说没问题，我支持何兵老师。然后何兵就找到了莫焕晶的家属，又让家属跟他签了一个委托协议。

但何兵没想到当他拿着家属的委托书到了杭州市的法院要求做莫焕晶的辩护律师时，竟然被一口回绝了，杭州市的法院说，莫焕晶已经有辩护律师了，我们给她提供了法律援助律师，莫焕晶同意，自己书面委托了。何兵说，那我能不能见一下莫焕晶，因为她的家属给她委托了律师，而法律援助律师是犯罪嫌疑人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才提供法律援助，按照目前家属签署委托书的情况，就不需要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了。法院说，不行，不可以见，已经定了。就这样，何兵教授被挡在了这个案子之外。

而杭州的法院为什么如此积极主动地介绍法律援助律师呢？原因很简单，一来，按照当时的舆论，民意一边倒，莫焕晶不判死刑是不可能的，所以找哪个律师都是这个结果，没人会对此存疑，二来，政府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最大的好处是，他至少不会在法庭上挑战检察官，不会像党琳山或者何兵一样会把消防部门的消防救援过程作为重点来询问。这是制定律师最大的动机，最终也的确达成了，莫焕晶在两名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下走完了法律程序，一审被判处死刑。

一审开庭的时候，没有人挑战消防部门，二审的时候，通过律师要求消防做证，消防部门倒是有人出庭了，说高层建筑的救火是个世界性难题，然后又找了一个专家出来，专家说，消防部门不容易，这个很辛苦，这个案子就过去了，莫焕晶就被判了死刑。

死刑还存在于法律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莫焕晶并不冤，毕竟她身负四条人命，即便是她着火之后想救火，不是主观故意想杀人，但客观上造成了四个人死亡。可回过头说，如果消防部门及时救人的话，这四个人不至于枉死，那么莫焕晶的死刑可能的确就要打一个问号。

但在杭州市的法院审理过程中，没有人去追问这个问题，二审消防人员借用专家的话，更像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补丁，公众也完全不了解这段被略去不表的情况。

如果说这个案子让人心中沉闷，看不到一点希望，倒也并不完全如此。杭州纵火案发生后不久，国家成立了一个应急管理部，把过去消防部门在武警体系下的体制废除了，消防纳入到了政府部门的应急管理部，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公务员序列，不再是军队序列。这其中的区别是，军队序列的消防员会因为退役而变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职业经验很难积累延续，而公务员序列就可以让专业人员长期存续。另一个更重要的差别是，在我们国家，军队系统实际上是不受约束和监督的。在中国最强大的舆论监督节目里，也从没有人能去监督军队。几十年前走私泛滥的时候，很多军队直接参与走私，走私成品油，走私摩托车都是军队干的事情，如果大家看过江泽民晚年回忆的一个视频，可以看到他亲自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只干了几件小事，其中一件，我自己认为还比较重要的事情是，把军队不能做生意这件事情给贯彻到底了。

谁也不能干预军队体系的事情，缉私部门管不了，政府管不了，消防在军队体系下，就相当于在法外之地，媒体、群众，都不能监督。所以，当把消防并入到应急管理部，在政府体系里的时候，它才可以被监督了。

杭州纵火案的公平正义虽然已经不能用后期的改制来重新追问，但这个尾声也值得人们在这个黑暗故事的最终，稍微振作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富裕到住360平方米豪宅，养育三个可爱子女的林生斌一家，原本是每一个奋斗者梦想拥有的家庭，结果因为引狼入室，发生了如此惨绝人寰的灾难，而你想追问和讨回公道的过程不比任何一个街头百姓容易。所以，在权力凌驾于法律的时代，不要以为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其实，真的出了事情，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什么救济途径，你的生活可以顷刻间万劫不复，差别只在于，这个不幸的意外到底落在谁的头上。

恶意返乡系列

5.5王局恶意返乡记之一

在我的人生中，有几个重要的日子是必须记住的，其中一个，是2019年6月4日，我被封杀的日子。从那天开始，作为媒体人的我不能在中国的任何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伴随着这种不打招呼也没有理由可告知的“除名”，我的事业顿时停摆。半年后，2020年1月5日，我离开中国，世界那么大，我得去看看。

我的第一站是台湾，当时台湾正在总统大选，韩国瑜和蔡英文对决，作为一向关注台湾局势的我，就借此时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台湾。但是，当时台湾的旅游签证已经停办，所以我就办了一个“医疗签证”，到台湾之后需要去医院做一下体检。当然，对我来说，体检只是赴台的形式，检查完我可以在台湾停留半个月，于是我从北到南，考察了整个台湾大选的过程。这段经历，以后跟大家说，暂且不表。

1月19日，我从台湾入境日本。就在这个事件，国内疫情形势陡然恶化，先是中国陷入全国性的抗疫，紧接着，疫情开始波及到周边国家，日本当然是首批的，病毒的蔓延开始势不可挡，我们想再从日本去其他国家已经没办法办理。既然滞留在日本，我们无事可做，也之只能在各地游览，一边也关心国内的疫情，想着什么时机再回国。

就这么一耽搁，没想到的是，我的母亲在2020年5月31日晚，溘然离世了。次日早上我哥哥姐姐通知我的时候，我想马上回家，可机票订不到，由于疫情关系，中日间的航班基本都断航了。我也知道，其实就算订到票，按照当时国内疫情政策，我入境后必须先隔离半个月。折腾了一整天没订到票，我哥我姐就在电话里劝我说，其实你回来也没什么用，我们也不可能等你这么长的隔离期，现在不能告别，将来回来，到墓地上给妈妈上一柱香，跟她说一声对不起，我们就先把妈的后事办了。

这是我出来之后第一次想回国，但办不到，回去给妈妈扫墓的事情就变成了心结，在后来停留在日本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放不下解不开。

另外一点，虽然生活在日本的总体感受非常不错，但作为中国人想要在这外邦做点事情，各方面还是有难度。所以，我想着，必须找准时机回国，首先拜祭妈妈，其次，我仍然没有彻底放弃重起炉灶的念头，想再看看在国内做采访是否还有可能。

干了半辈子新闻，已经落下了职业病：看见国内发生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不去或不被允许去采访，我就特别着急，总会设想如果我去前方采访，会问哪些问题，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很有价值的，是公众感兴趣的。所以，在这种跃跃欲试回国的过程里，我其实订到过两次票，可最后都被取消了。

折腾来折腾去，到了2021年的3、4月份，我母亲快周年祭了，我想我得千方百计回去，所以必须找个人订到一张可靠的票。在这过程里，有个朋友在饭局上提醒我说，王老师，你要回国得查一下你安全不安全。

他说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点头称是。虽然我2020年初出国的时候比较顺利，但是谁知道回去会如何呢？出来的这两年，我发推特

比较密集，在国内来说，上推特建立账都是违法的，而我也算是个公众人物，这两年有很多时事点评，只要他们跟踪关注，保不齐给我按一个什么名头。

我请朋友帮我查一下，我在境内是否被确定了什么“待遇”，一天之后他告诉我，我在二类名单上。一类名单属于边境控制，回国之后就会被控制，而二类名单属于重点观察对象，不会立即被边控，但有关部门可能会找我。

朋友这么一说，我不太敢回去了，虽然日本与国内相比有很多不便，但是用失去自由的代价来回国，这个就不是我愿意承受的了。

好在，后来其他朋友也帮我去查，但反馈的信息说我不在二类名单上。犹豫再三，出于谨慎，我又把回国的事情耽误了。有人可能会说我胆小怕事，我想说，作为中国人，谁心里没有恐惧？我毫无征兆被封杀了的时候，一个朋友从境外给我打电话，说志安，你赶紧出一次境，看看自己有没有被边控，他提醒我的是，你不知道当局对你的

处罚力度是什么，网络封杀如果只是其中一环，那么后面是什么，你陷入的是无边的恐惧。

对方是个“庞然大物”，你跟它打交道，第一、你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第二、它也没有标准，第三、一旦出了问题，毫无救济途径。就好像我被封杀后，能找谁讨个说法和公道？完全没有。

为了测试是否被边控了，我就办了一张去澳大利亚的签证，带着一家老小去澳大利亚旅游。难以忘怀的是我在“中国海关”四个大字面前，在刷护照自助出关刷不过去，而我的家人都刷完护照出去了的时候，我心里擂鼓一样。旁边的工作人员提醒我，可以走人工通道，至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护照不能自助值机，当我在人工通道看着海关工作人员翻来覆去查验护照的那几秒钟，我真实地感受到了被国家机器碾压的痛苦，那过程是如此的漫长，而我是如何的渺小无力任人宰割，如果海关说，你不能出去了，我就知道，我被边控了。

好在，他看完签证之后，盖了个章，把我放行了。

那一刻我长舒了一口气。这种感受，很多中国人都有吧，明明我没有任何污点，但仿佛是随时被他们拿捏的戴罪之身，如果我被控制，我知道我也不可能反抗，因为一切都是徒劳，而我的家人会茫然失措地亲眼看着一根顶梁柱在她们面前轰然倒下。

这种感受，是外国人不能理解的（朝鲜除外），当你到国外，你会发现大部分外国人脸上有着心无挂碍的放松，和内心洋溢出的自信，这可能是中国人和老外在气质上最大的差别，中国人谁有这样的松弛和自信？也许权贵者有，或者天真烂漫的富二代有。

你在欧洲、北美、澳洲、日本都感觉不到他们对国家机器有这样的恐惧，政府首脑可能会被嘲弄，被拉横幅羞辱，政府机构和工会谈判也占不到任何便宜，没有人会恐惧因言获罪，或者你的观点就让你犯了罪，所以你的恐惧令他们无法想象。

所以当我告诉我的日语老师，我在中国因为某种原因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能从事自己的职业，他们表示不能理解，完全不能理

解。但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懂这种剥夺的“天然合理性”。从小朋友开始，不系红领巾你就是犯错，这是我们习惯低头习惯恐惧的开始。

因此回国是不是一件需要我反复衡量的事情呢？当然。千般犹豫，万般期待，终于，在分别找几个朋友查了三四个月的线索后，我评估，现在是安全的，我可以回去了。可我的朋友们比我还小心，又有人警示我，最好避开7.1（建党纪念日）和10.1（国庆节）这两个敏感日子，因为每到这些日子，政策会收紧，本来没问题的人也会被处理。我想，也对，等了这么久，不差这几天，于是，就把回国的日子定在了2021年11月。

买票后，还有人特别叮嘱，我在国外的电脑手机等，都不带回，要带着没有记录的新电脑和手机回国。我非常感激这些朋友的提醒，买了新电脑，手里就用回自己以前不用的老手机，然后也告诉他们，一下飞机，只要没有意外，我就通知你们，到了酒店，再报一次平安。因为我判断，假设出事，大概率也就是在回国第一天。因为下飞机以及到酒店隔离时，我必须拿出证件，而“系统”就可能识别出我个人的特殊性。

看，这像不像地下党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紧张到什么程度？

考虑得如此周密，结果，岔子出在了我自己身上。可能是因为紧张，也可能因为落地上海之后有太多跟疫情相关的手续，我在保平安的时候，给日本的朋友们发完信息，就忘记了告诉国内的朋友。于是第二天大清早，我在隔离酒店接到了手机通讯录里一个长期不联系的朋友电话，他说志安你把别人都吓死了，你承诺一下飞机给人家发信息的，结果一直没消息，人家以为你出事了。我一想，漏掉了一个重要朋友。而他跟我之前就约定好，如果我被扣下，第一不要声张，第二，去找可靠的人，看能不能把我捞出来，现在我没给他信息，他可能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要准备捞人了。

您看，多少人为我回国这件事情担惊受怕？我心里充满感恩，也充满酸楚。

几天前做节目，我说贵为马云，也不能免去没有自由的恐惧。有人在评论区反问：“马云和普通人一样没有安全感，这不正说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错了，我们面对的不是法律，是威权。

在法律面前，我们当然和马云一样平等，但在威权面前，我们都一样的手无寸铁，因为权力可以肆无忌惮扩大其边界，法律也奈何不了。再成功，再有影响力，一遭他得罪了更有权势的人，他就可能灰飞烟灭。

我一直认为，恐惧是刻在中国人文化基因里的符号，因为我们的国家里权力笼盖一切，权力翻云覆雨，你只要是个中国人，只要你在中国有“软肋”，那么即使你浪迹天涯，甚至换了国籍，你的内心也仍然有恐惧的黑洞。因为从古至今，这个国家拥有一个太强大的政府，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们还有个成语：噤若寒蝉，特别能形容在这个强大政府耿耿虎视下的百姓心态：深秋已到，落叶沙沙，就算没有天气预报，蝉还是可以感知得到寒意十足，肃杀的季节已经到来，保持沉默，不要说话。

国外的教育鼓励孩子们发表意见，多开口说话，我们中国人，哪怕到老，都会有家长有亲朋好友提醒你，不要乱说话，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虽然，法律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过，话说多，说得坦白会犯罪。

而我就是一个因为说话而招致封杀之祸的典型，我做的一切，说的一切，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你没有剥夺我发言和工作的权力，如果有，说出来，看看宪法哪一条写着？

然而这个质问只在我心里，我没有途径去起诉，更没有胆量去公然挑战，因为我身上，也有中国人恐惧的基因。

5.6 恶意返乡之二

我回国选择的是先到上海，再回北京。为什么这样曲折？因为直达不了。疫情之后，北京把国际航班断掉了，也就是说，北京不接受境外人员直接进京，想去北京必须得选一个外围城市落地，隔离一段时间，清清病毒，再去北京。

当时从日本回国的航班只剩下大连、哈尔滨、沈阳、青岛、西安、广州、深圳、上海等地，我当然选上海，在中国，它毕竟还是各方面比较发达和文明的城市，防疫政策也比其他好，要求是"14+7"，即酒店内隔离14天，再有7天健康观察。隔离在所难免，但这最后7天是可以出门自由行动的，只要定期做核酸就可以。这可比太原等城市直接让你酒店内隔离21天强多了。我的朋友从欧洲回国，在太原的酒店里呆了21天不算，每天抽血、测核酸，伙食又特别糟糕。我觉得这些方面，上海肯定文明多了，所以就买了一张从东京到上海的机票。

买完机票，我这才做了人生第一次核酸检测。因为疫情一来我们就在日本，而日本防疫措施基本是靠国民自觉：出门戴口罩，了不起进公共场所时测个体温，其他措施就没有了。要测核酸，除非你自愿去测，平时没症状的人就不可能无故去测核酸了。

现在为了坐飞机，我们必须得根据中国大使馆指定的东京都几家机构去测核酸。这些定点机构非常贵，比日本其他测核酸的地方贵好多，一次两三万日元，折合当时人民币大概一两千块。我不懂为什么指定的这几家要贵，更可气的是服务也不好。

核酸报告出来之后，我们把护照、机票、核酸报告的信息全部上传到中国大使馆指定的一个小程序里面，等他们收到并确认合格后，拿到国际旅客的健康绿码，如此才能登机。

揣着绿码，2021年11月4日，朋友把我送到了机场。一到机场看到国航柜台，祖国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不是因为服务人员笑容可掬汉语悦耳，而是偌大一个机场，在各个国家的航司柜台前，唯独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里面是一群大白在服务，特别扎眼，甚至有点恐怖。我在

日本生活这两年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尤其是在这全球航司共处一室的场合，这种另类似乎在凸显着什么。

但这只是开始。在柜台完成一系列操作，安检之后进了飞机一看，机组人员也都是大白。

那种感觉就是：提前让你感受祖国防疫政策如何与众不同。

两个半小时的航程，飞跃国境线，我感慨良多，从我2020年1月出境，将近两年时间过去了，我好像没做什么事情，时间停止在原地。现在回到故土，虽然充满期待，但更多的是忐忑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下了飞机之后会不会失去人身自由。

下午五点左右下了飞机，没有异样，看来，我还没有被“重视”到那种程度，不免心内一喜。但随即看到浦东机场，又很震惊：今日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哪里还是机场，一副兵荒马乱的场景，日常设施全部停用，取而代之的是一层一层一步一步，对旅客检测的各种通道。除了室内的各种摊位，还有的通道指引向户外的简易核酸亭，每一个

下飞机的旅客被吆喝着：“往那边走”、“扫码”、“排队”，你已经完全感受不到，这是在上海，这是在中国最高端的国际机场之一。

在这种混乱拥挤无序被训喊的过程里，人们因为劳累和接受不了不文明的指挥方式，开始有冲突。一个妈妈带着儿子跟我同一航班回国，儿子首先忍受不了，跟防疫人员发生了冲突，母亲劝导不了，母子间也冲突起来，最后儿子就说，我干脆不去中国了，我要回日本，掉头就走。当然，到了这个境地，他哪儿也走不了。我知道，他语言中表达的愤怒显然是因为他在日本从未感受到如此匪夷所思的场景，也从未感受过这么不文明的交流，然而他妈妈知道，这一切只能忍受。

每个人都很焦虑，在漫长的队伍里做核酸、等待，不停地分组。我一直想着，要找一个能点外卖的酒店，所以排队的时候就要留意队伍的终点，因为我听说上海的隔离酒店是随机安排，既有可能给你安排到闹市区，也有可能给你安排到崇明岛，这些酒店绝大部分不允许点外卖。我很久没回国，挺想中国菜的，一想到在隔离酒店吃半个月的盒饭就发怵，所以提前找朋友找了一个可以点外卖的酒店。但在那

乱糟糟的现场，要找那个酒店队伍太难了，一开始我走错队，等排上队要上大巴了才发现，目的地不是我要去的那家酒店，所以我只好逆流往回走，结果工作人员还不让我回去，好说歹说，总算让我回去找着了队伍，上了他们的大巴。

虽然对隔离酒店是什么光景我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可进入大堂我仍然吃了一惊。这个酒店已经被改造过，由于长时间只致力于防疫工作，已经不太像酒店了：没有吧台，没有服务员，只有一排桌子，坐的全是大白，让你掏出各种各样的文件、证明，最后给你一张房卡，告诉你，在房间里每天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再交给你一堆药片、一次性毛巾。

我被告知房费每天四百多块，包一顿早餐，但是不包午餐和晚餐，没有任何客房服务，14天内，不会见到任何人。进房间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左右。

从下飞机到进入房间，我足足用了八个小时的时间，那真是混乱又漫长的八个小时，虽然我感到无比疲惫，但躺下的瞬间，我首先还

是庆幸没有人来抓我。无论现场多么无序，工作人员多么无理，可我都非常配合，想来，每一个被捶打过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实相”，事实上，我在日常生活里，本来也不是一个找茬的人，所以这种不适也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而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也远远超出了八小时给我的煎熬，我也都平和处理了，这是后话。

我过了14天见不到人的日子，每天主要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吃喝拉撒。如果订餐，大白会把盒饭放到门口边的小桌子，敲一下门，他就走了，我开门的时候，走廊已经没有人。点外卖的话，他们也是在饭点把外卖送到门口。

房间里的设施已经长期没有人打扫维护，破旧不堪，到处弥漫着一股来苏水的味道，那是因为每一个客人走了，房间要被彻底消杀，这种过程肯定是粗暴无比，所以家具破损严重，地面也都是来苏水的残渍。比较不适应的是卫生间里没有浴巾也没有毛巾，改成了一次性，将就用。而如厕如果是大便还有一个增加步骤，得把发放的药片

在上完厕所后投入到马桶里，泡几个小时再冲，令人反胃又有点恐怖。但我会照做。

我仍然每天上午两三个小时坚持上日语学校的线上日语课，上完课就点外卖，这是个杀时间的好方法，我在外卖平台上看各种各样的周围能点的餐，研究、比较，然后下单，其实餐食差别也不大。

所有人固定的安排是每天上午和晚上有人上门测体温，核酸测得少，14天之间一共测两三次。每次见到来人，都是全副武装，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跟你没见到人也差不多，没什么交流。日子这么难熬，大多数人就想动动，我的方法是在房间里不停地走路，最长的一次，我一天走了一万步。有人跳绳，但被周围人提了意见，在隔离群里说影响他人休息。这个隔离群是管理员给我们发通知的，另外还有一个群，是医务人员答疑群。跳绳被抗议之后，我估计大多数人也就跟我差不多，只能走路，做做俯卧撑，因为长时间不活动，对人身状况肯定有影响。对我来说，直接影响是吃得少，有时候一天一顿，有时一天两顿，估计大部分隔离的人跟我差不多。

最难熬的大概是第七天到第十天左右，因为过了第十天你就觉得日子有盼头了，之前，每个人每天都在数日子，这就是失去自由的滋味，类似于秦城监狱里部级干部的待遇，确实难熬。但不一样的是，幸好还有手机，所以，每天打电话也是我的主要生活内容，天南海北的，跟各个朋友报个信儿，说我回来了。

说起电话，我想起在酒店里的第二天，我接到洛阳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问我是不是王志安，是不是从国外回来。我很惊讶，因为我父母和我的户籍的确是在洛阳，但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在洛阳生活过了，而且这个电话我从来没有在洛阳市公安局登记过，洛阳市公安局怎么会有我的信息的？他的重点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洛阳，我说我不回洛阳，我要回北京，他说了一句：你如果回洛阳就一定要报备，然后把电话挂了。

放下电话我多少有点不寒而栗。看来，我的个人信息无论在哪里出现，在警务系统里是完全透明的，当然，不仅仅是我，所有中国人都是如此，你的手机电话、出入境记录、出行信息，公安可以一键全

部透明。在国外生活了两年，我可能已经有点脱节，对于这个感到很恐怖。

隔离完14天后，终于脱离失去自由的煎熬，我可以在上海市范围内自由行动了，我订了另外一家酒店，那也是防疫定点单位，是专门接待我们这些隔离结束的客人的，环境好一些，我也可以出门了，能找找朋友见面吃饭了。因为多年没到上海，我也确实挺想四处转转。

但是出了隔离酒店，我发现自己的健康码是黄色的，行程码倒是变成了绿色。这样我就只能进一般的公共场所，因为严格的场所都要求双码都绿，比如我最想去的上海天文馆就要求必须双码都绿。上海市博物馆、上海最高的建筑上海中心，这些我都进不去，很遗憾。所以，在上海的自由7天也是75%的自由，好在还是见到可一些多年未见的同学朋友，大家一起聊天蛮开心的。

这段健康观察期内，我根据要求在政府指定的医院窗口又测了两次核酸，这两次，上海做得很不错，对于我们这些从境外回来，隔离

期结束的人设置了专窗，以便于跟普通市民窗口分开，防止交叉感染。

这七天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为了回到北京，我除了满足待足21天外，还得有北京市的“健康宝”绿码。所以在健康观察期的最后三四天，我天天给北京的12345打电话，说我即将满足21天条件，可现在下载的北京健康宝没有显示绿码，对方说，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建议等到21天以后再看。最后两天我就特别焦虑，除了前面积压了太久的等待，也因为听到了一些人说，虽然满足了21天的要求，但他们的健康码仍然没有变绿，于是就等于还要在上海待下去。

到了第21天的时候，我几乎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码没有变。我登时就急了，这要是不变色，我去不了北京去哪？甚至，我听说杭州有一个地方可以学滑翔伞，要不然，干脆到那个地方去待两周？结果到了第22天的时候，大清早一刷，码变绿了。

不由分说，我拿着行李就去了高铁站，买了一张票回到了北京。

22天的时间，从东京到北京，何其漫长？

一到北京，首先欢迎我的，还是大白，社区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在家里健康观察几天，照例的，又是接着做核酸.....

5.7 恶意返乡之三

回到北京的七天健康观察期，对我来说约束并不多，跟上海的健康观察相比，比较的健康观察时间里，只要我自己做完两次核酸就可以，居委会的强调也是，只要不去人群密集场所就可以，我主要也就是和朋友同事们吃饭叙旧，完成自己要做的必要杂事。而这次回国最重要的事，是去给母亲扫墓，所以，我很快就去了河南洛阳。

我带着水果和鲜花，随着姐姐找到母亲的墓地，心里无限感慨。母亲活了86岁，一辈子非常不容易，年轻时受困于她娘家成分是佃富农，我的姥爷土改时就被打死了，一家人生活难以为继，于是我母亲16岁就被“半卖”半嫁给我父亲，只为了换得几斗小米。她跟我父亲磕磕绊绊生活了六七十年，养育了我们四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

我跟母亲感情很深，记得自己第一年考大学的时候，高考没发挥好，只考上了一个专科院校，我不想去，但我父亲当时想让我去，他说专科也不错，可我觉得自己如果再有一年机会，一定能考上一个好

大学，母亲站出来，坚决支持我复读一年。那时候复读一年要交60块钱，对我们家来说，也是挺大一个数目，可我母亲非常支持我，相信我。后来上了武汉大学，我印象至深的，是母亲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其实我母亲原本是个文盲，建国以后上过几天扫盲班，能歪歪扭扭地写一些字，她给我寄来的信，连拼音带画图，跟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写的一样，内容是嘱咐我好好学习。那封信我保留了很多年，我知道，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期许，她付出了很多努力摸索着一笔一画千方百计写了那封信，而我一眼读懂了。

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想到母亲离开的时候，自己没在她老人家身边，我心里难安，如今她已经走了一年半了，看到墓地，想到她拉扯我们的岁月，悲从中来。

哥哥姐姐们委托我在洛阳把父母身后事处理完，比如之前大家一起凑钱给他们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没人住了得卖掉。要卖房子少不得要处理几天，可就在这几天之内，我在洛阳的健康码突然变黄了。我纳闷了，我在北京没有到过敏感场所，回洛阳后也是跟家里人一起行动的，他们的健康码都是绿的，怎么就我一个人变黄了？而这一黄，

麻烦了，有很多公共场所我就去不了，如果去市民之家办过户手续，就得看“双码”(行程码和健康码)才能进去。房子的买家已经从外地过来，我要进办事大厅，却因为健康码是黄色的，不敢给他看，本来想用身份证蒙混过关，结果身份证一刷，显示我是黄码了，现场服务人员当即变脸，特别粗暴地对我说：“出去，立刻出去，黄码”。我看他态度恶劣，就说你有话好好讲，不要训斥人嘛，他说你马上出去，不要再讲。这种粗暴，似乎我这黄码已经意味着病毒上身。

我抓紧想办法，因为买房的人也是千辛万苦从河南三门峡赶到洛阳的，这天过不了户的话，他以后出行也不知道什么时机了。我姐心生一计，说可以尝试从地下车库开车进去，车库是保安全管理，你坐在车里也许能混过去。果然，地下车库门口检查核酸的人没有用身份证刷卡的机器，只能肉眼看一下手机上的码，我坐在后排，亮了一下行程码，另外几个人给他看双码，人多眼杂，终于车子开进了车库，再从楼梯上楼就没人查了。就这样，把洛阳的事情算是办完了。

为了这个黄码，我没少吃苦头。先是天天找居委会申诉，说自己哪儿也没去，变颜色没道理，希望抓紧给我变回绿色。在那儿左右一

看，发现柜台前好多人都是跟我一样的说法，有一个女的她申诉健康码变黄的理由是，她家的一辆车停在了洛阳下辖的一个县，其实他们全家都没在那里，只是车主名字是她老公，然后夫妻俩就都变黄码了。这大数据收集信息的能力强得也有点离谱了。

你想想，为了疫情管控，他们暴露出来信息搜集和做所谓流行病学调查的能力，已经超过法律授权，让各个部门全面联网，搞得你本人都不知道它究竟收集到你多少个人信息。而健康码和行程码堪称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它抓取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和行程信息，曝光在闲杂人等面前，让你毫无隐私可言。利用这种发明的功能，有的部门机构也趁此机会抓住了别人的行踪。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北京上访人员常年都有，各地会派人去北京截访。而疫情期间，北京看不到任何一个人上访了，为什么？因为上访人员只要没有行程码和健康码就进不了北京。地方政府只要给敏感人物赋一个黄码，你就原地动不了了，比截访省时省力得多。

我在朋友中听说一件事，有个律师要去看看守所跟当事人见面，由于这个案子敏感，这个律师是维权律师，于是，在这个律师临上飞机之前，他的行程码突然无来由地变黄了。那航司就肯定不让他登机了。这个黄码跟他的案子到底是否有关联，不好说，但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有了健康码、行程码，被授权审核和赋码的权力机构可以对他们权限范围内的人实行个性化管理。

在防疫期间，现在这些动作都有防疫的名义，当一切回归正常之后，这些二维码还会不会继续控制我们？不知道。我深深觉得，这种信息牵制太便利权力机构了，大数据如果被这样利用起来，以后我们每个人还哪里有什么隐私？你自己所有的信息被集结在权力者手中，他们如果想要对你的行动进行干预，轻而易举。假如未来双码不取消，我们的自由其实也就是伪自由了。

怀着这种忧虑和当下的焦急，我在居委会那里每天都在问为什么，居委会让我也去做核酸，我就去做，可做完，码还是不变绿，就这样日复一日，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居委会，七八天之后，我急了。我说您看我态度一直还是很配合的对吧？我从来也不跟

你们吵架，解释得也很清楚，而且我的行程码信息也是非常清晰的，可这健康码不仅没有变绿，有一天还变成了红码，毫无原因，莫名其妙。红码我就动不了了，我打热线电话，人家也还是让我来找你们居委会，一反应情况，第二天又变回黄了，这到底有没有准谱？

居委会的人大概也被我搞烦了，给了我一个电话，说，这是管健康码的部门，你打电话直接问他们。我马上打了电话，人家也就管我要了核酸报告、行程信息等，让我微信传过去，第二天，这码真就变绿了。

这事说明什么？说明所谓大数据的能力虽然大得没边，可乌龙也太多了，申诉的人肯定是每天扎堆，而人工反馈根本来不及，没人去处理。要不是我天天去居委会反映情况，居委会被逼急了，我哪能找到这个管健康码的人？

拿到绿码之后我就想回北京，可么蛾子又来了，我北京的行程码有弹窗了，因为洛阳下面那个县有阳性，整个洛阳都挂“※”了。

我只能在洛阳的“※”解除之后，再给北京的12345打电话，说健康宝依旧弹窗，希望对方协助解决。北京那边问了我的住址电话，也没有别的建议，就是等。我又开始了毫无头绪的等待，也是每天打电话，每天仍弹窗，没法回去。

从新闻里，我知道有人从北京出差到外地，20多天回不去北京，能怎么办？只能不停地打北京的“12345”。终于有一天，有个接电话的人回答，你得去那种能把核酸报告上传给国家卫健委平台的医院去做核酸，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才会给绿码。

唉，我前面打了那么多电话，原来点的都是哑炮。那些人态度倒是好的，可怎么就连这种基础信息都反馈不了呢？

我一边感慨一边抓紧去医院，找到一家医院一问，他们说他们的报告可以上传到国家卫健委平台，于是我赶紧测了核酸，又拜托他们早点上传，医院记下了我的名字，答应尽早上传。最后，终于在第二天下午，我北京的健康宝重回绿色了。

当时已快过年，我的兄弟姐妹都劝我，马上就要过年了，你就别走了，我们兄弟姐妹凑到一起也不容易。我说，我其实也挺想跟你们在一起过春节的，可真的不敢，万一洛阳再出现一例阳性病人，我又回不去北京了。就这样，我抓紧时间再次返回了北京。

这样魔幻的经历，现在想起来充满感慨，其实，国内的人们每天都在过这样的生活，而在我走后，2022年3月起上海发生的那些故事比我在洛阳遭遇的要悲惨百倍，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应该庆幸。

5.11 恶意返乡之四

从洛阳回到北京，我主要就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了解我在国内重新开始采访事业的可能性。我在2019年6月4日被网络封杀，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也无从知晓被封杀的具体原因、封杀期限以及“减刑”可能性。到了2021年底，我想，是否时过境迁了？不论面对如何局面，我要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去努力一下。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重新去做采访有那么难吗？难。这就要说到中国的新闻管理体制了。

中国的新闻行业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这个管制不是通过法律来实施，而是靠一些政策条款来限制，其核心举措叫“牌照管理”。一个新闻机构要想具备采访权，首先要到有关部门去申请，有关部门根据机构的不同性质，发放不同权限的牌照，所以，有的新闻单位有采访权、采编权，但有的机构就只有编辑权，没有采访权。目前，市场类媒体，比如新浪、搜狐、腾讯等互联网平台，就只有编辑权而没有采访权。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成立记者队伍，如果有所谓记者，其

实也拿不到记者证。对一些不那么敏感的领域，比如体育，有关部门会管得松一点，你去采访他们也不管，但涉及到新闻，管理就非常严格，没有采访牌照的单位员工肯定不能去做新闻采访。

此外，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牌照还分为文字的、音频的、视频的，每一个种类都有分门别类的管理。举个例子，新浪微博有文字编辑权，但如果没有音频编辑权就不能做音频产品，没有视频编辑权就不能做视频产品，每一个模块都需要专门的授权，拿到牌照才可以做。

我是一个视频采访记者，如果我要在中国合法采访，就必须找到一家有视频采编权的媒体才能申请到记者证，当然，记者证需要考试，但因为我已经有记者编辑资格证书，所以我只要挂靠到一家有视频采访牌照的新闻机构就能拿到记者证。

如今，视频采访的牌照在中国非常难申请，全国31个省级电视台当然有，但在互联网平台，持有视频牌照的，只有7家：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环球网、千龙网（等），说白了，这7家都是政府的“亲

孙子”，能有牌照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老子”：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是政府的“亲儿子”，属于体制内媒体的延伸。体制外的媒体，一家都没有，在一党执政的中国，永远不会有。

我想重操旧业，技术上策是找有视频采访牌照的单位合作，但悖论是，这些政府“亲孙子”平台我本人也不太感兴趣，因为体制内平台就算给你采访机会，在内容创作上也会限制你：你感兴趣的题材他不让你做，他让你做的你不感兴趣，若是去那些平台，我当时何苦从央视离职呢？

所以，我考虑打个擦边球，找那些有视频编辑权但没有采访权的平台，他们在管得不严的情况下，有时可以用巧妙方法做一些事情，当然，前提是愿意给我担风险。

这样一说，您看，我能去的平台是不是很难找？

可无论如何，我并不想做违法的事，不想在无牌照情况下去采访。过去，我们很多持有正规采访证的记者也曾经被警方半夜敲门带走，那时候警方顶多也就是让记者做不成采访，因为人家有正规的记

者证，而现在，如果没有记者证，我再去新闻现场，恐怕就要承担“寻衅滋事”的罪名了。

前一段时间铁链女事件的时候，有两个退休记者到小花梅家去采访，我当时就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因为你退休了就没有记者证了，理论上来讲，公安真的可以抓你。

我在回国之前曾经跟一些媒体接触过，有些媒体曾经表示，出于想做好节目的考虑，他们愿意担一些风险，但这次我回去之后一接触，发现形势已经今非昔比，大环境让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胆量做冒险的事情了。

一家互联网媒体告诉我，他们自己版权的文章放在自己的网络平台上，本来是可以技术手段点开，外放文章音频给用户听的，结果，被叫停了，说他们没有音频编辑的牌照。你想想，管制到这种程度，哪一个媒体还能出来愿意跟我谈做采访？

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也讲，最近几年，媒体管制越来越严，党管媒体要管哪些内容呢？管资产、管人事、管内容、管导向。管资产什

么意思？以前我们讲媒体的市场化，回看二十多年前，改革方向是包括党报都要推行市场化，如果党报不能直接市场化，那么下面的都市报都要市场化，可现在，基本都往回走，报纸要国家机关化了。如果有的媒体有投资主体是非体制内的话，都要清掉，不让资本的力量涉足到媒体领域，这是管资产。管人事，就是党来决定管理层人选，党组织来考核人事编制。管内容，这是老话题，中宣部是最顶端，各级宣传部能把一切宣传机构的内容通通管起来。一纸通告，让你删帖你就得删，让你报道什么你就报。到了“二十大”，大家头版都是“二十大”，不论你是市场化媒体还是国有化媒体，都得一样，谁不听谁就没活路。管导向，也很好理解，就是看你报道的内容是不是正能量，是不是积极正面，是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是不是维护政府权威的。

我听完，说实在的，心已经凉了半截。我知道，如果还想用过去做《局面》的方式做节目，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应该说是绝对没有了。

这时我又想，能不能退而求其次，做点非新闻类的采访行不行？比如像许知远《十三邀》这样的，采访一些文化名人、歌星、影星，

虽然他们可能是我做新闻时不涉及的人物，也不像《局面》里新闻当事人那样，有强烈冲突，体现社会矛盾，不足够刺激、过瘾，但毕竟也是采访，我觉得过渡两年也可以啊。说不定有关部门看我老实了、认怂了，或许还可以让我重新出来做新闻采访？

于是，我跟一些平台联系了一下。他们都挺热情的，也都表示认可《局面》节目，但是一谈到具体项目，大家就毫无例外顾虑重重。为什么？我现在是被封杀的人，如果做了节目播不出来，那成本就白费了，而且，可能还得罪了有关部门。

这各种瞻前顾后，我也很理解。在一个没有显性规则的领域里，模糊不清会导致每个人都只能猜测，虽然从来没有一个有关部门下过一个通知说“王志安这个人不能用，他所有的产品都不能用，他也不能出来的采访”，没有，但是大家都在猜，猜的结果是宁左勿右。因为万一猜错，要付出很大代价。除了经济代价，更可怕的，是有关部门可能会告诉他们：“你们这是故意找茬？这个人早已被封了，你们为什么要找他做节目”？而这，是很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跟各家媒体接触来接触去，基本都无疾而终。留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我已经心灰意冷。过程中，有一个朋友建议我再去接触一下网信办，看能不能把我被封杀的原因搞得再清楚一点，结果，具体原因没问出来，但他们反馈，有人很长时间看不惯你了，否则不会一下子就对你痛下狠手，直接永久封。

这个倒有可能。

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老师陈虻成天给我们讲节目，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什么叫好节目？好节目就是审片领导不说好，但是回家愿意看，这就是好节目；领导想批评你，但又不知道怎么批评，对照所有的标准吧，你也都符合，可又觉得你自己想法有点多，那种感觉让领导挺难受，这就是好节目。

前些年在体制内做新闻，包括我从中央电视台离职后做新闻，其实我基本都在遵循这个标准：不求表扬，但求专业。所以领导不愿意表扬，甚至会觉得我平时貌似谨慎，可一有机会就跳出来，跟他不完全一条心。

但我自己心安的。那些年，我和同事们总是用专业主义的标准来保护自己，把节目做得尽可能标准，不留专业上的瑕疵，我在网上说话也从不直接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在新浪微博“有偿问答”模块，我经常被网友问到在央视工作面对的敏感问题，这些送命题我从不回答，这是我在网上坚持的底线原则。我总想，即使做普通的社会新闻，从家长里短里寻找世间的人生百态、道理法律，虽然这类新闻生存的空间已经日渐狭小，仅剩了一条缝，但我把这条缝做好，也该算是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吧？

但是，我想网信办不会认同我这个愿望和想法。所以，当有人建议我跟网信办的领导吃个饭沟通沟通或者写封信的时候，我说算了，你还能指望他们在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如果真的可能在意，也不至于一下手就是致命武器，把整个职业生涯都葬送了。再让我与虎谋皮，有意义吗？

我不想再求人。

忍了3年，为了这次尝试回国找平台做节目，这三年我所付出的精神损耗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以前我从来不讲被封杀的事情，我不抱怨，更不用说抗议。即便在日本，我发推特也是谨慎小心，一开始都不敢发，直到疫情后憋着难受才发了一些，总体来讲，我发推特的尺度跟我在境内的小心程度也相当。我总觉得，万一我回国可以做采访呢？不能把话说太绝了，说完没退路。可就这么小心翼翼，我获得什么宽限了？

在境外，我始终没有敞开心扉随心所欲过。多少次，当网友看到我放在YouTube上的《局面》老节目，建议我可以在日本做节目，在境外做采访，做评论，做脱口秀，从能力上评估，我能不能做？当然能做，但是我不敢，就怕我一旦开始做，就彻底失去境内的机会。

我当时权衡的结论是，采访在境内做和在境外做，社会影响力差别太大了。14亿受众，参与着这个国家的社会进程，这对我个人和对新闻行业本身来说，都更有意义。在境内做节目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在境外做节目。所以，为了回去东山再起，我作了很多忍耐和牺牲。

结果怎么样？我“好好表现”的努力是一厢情愿，一切忍耐等于零。

我的心彻底伤透，绝不愿意再低眉顺目摇尾乞怜，既然不给我做采访的立足之地，我不做就是，想办法再开疆拓土吧，也许，也只能就此下狠心，离开这个环境。

想想真是可悲，这么大一个国家，14亿人口，容不下一个记者，一个调查记者，说到底，我们这个职业如果要论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不就是批评吗，不就是监督吗？如果我这样的建言姿态和温和言论当局都容忍不了，那这个社会已经如何危险？

我真的想对有关部门的领导说：你们真的觉得，一个没有批评，没有监督，甚至连一点反对声音都没有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吗？才能确保你们所愿望的那样长治久安吗？

5.13 王局恶意返乡记之五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县长董鸿在抗疫期间，为了警告中高风险地区的乡民不能回家过春节，发明了一个词：“恶意返乡”，他语气相当狠，说，“凡是不遵守省市县疫情防控规定，不听劝阻，恶意返乡的，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

当时我正在河南洛阳，看到这新闻很感慨，我想，从某些人眼中看来，我这次回国是不是也算是“恶意返乡”、“千里投毒”呢？所以我这个标题起得还真不是调侃，这是社会现实在个人命运上的投射，掌握着我职业生涯命运的人肯定不欢迎我回到故土，虽然没有直接对我说“先隔离再拘留”，但如果他们做得出来，我也不奇怪。

很多人问我，王局，你为什么执着于要做采访呢？就不能换个工作吗？我身边不少朋友也这么劝我，“志安呐，你做不了采访了，咱就

认了吧”，我家人也劝我，“到我们这儿来，咱一起干，以你的才华，做其他领域的工作也可以。还有一个朋友劝我考律师，因为现在国内的刑辩律师收入特别高，顶级的辩护律师一个案子收几百万的律师费也有可能。他们说：“志安，以你的能力，做个刑辩律师，一年妥妥地挣一两千万”。我知道，刑事辩护是要挑出对方的矛盾、漏洞，通过证据去说服法官，为你的当事人谋求权益，的确跟调查记者采访时通过既定证据去发现真相很类似。甚至，在我看来可能比做记者还要容易一些。因为记者得到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一开始信息量比较少，要想获得真相，得四处调查，而律师以案卷信息为主，双方信息基本对等。我觉得如果仅仅从辩护策略，不谈其他什么非正常压力的话，做律师总体没有那么难。

但大家这些好意我还是一一回绝了。因为我不太愿意纯粹为钱而工作，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如果我想工作的话，就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否则的话，宁愿不做。另外一方面，我还是觉得，这半辈子积累的所谓职业经验也好，才能也好，正是需要释放的时候，不让我做，我心里难受，接受不了。

所以我回绝了大家的好意，也意识到，接下来我留在中国的意义不大了。这次回国，除了拜祭母亲，我主要就是为看还能不能做采访，现在答案既然是否定的，我就准备离开了。

走之前，我很想见见知交故友，也去一下国内一直想去的地方，而且，回国前也做了些旅行的计划。过去工作忙，没有来得及去，现在有的是时间，本来是可以马上行动的。比如西安，虽然我去过多次，但因为我学历史出身，类似唐陵、汉陵、乾陵之类的陵墓，我还想仔细去看一下，但疫情让所有行程都变得极其困难，以往的经历也让我担心又被套在某个地方，所以，不敢去了。有的外地朋友想到北京来看我，也是因为这些困难最后没聚得成。

中国的防疫政策彻底改变了这个社会，而这样的变故恰恰在我决定离开祖国的时候，客观上让我本来就感到巨大遗憾的回国之行变得更凄清。

我在东京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如果这次回国无所收获，要是再离开中国去日本，我就打算在youtube上做节目了，因为在国内做节目的

路已经被堵死，我再留恋也无用了。而我一旦在youtube上做节目，国内会怎么对待我？我完全无法设想，因为他们的底线在哪我无从探知。

在youtube上做节目，哪怕是现在我所陈述的“恶意返乡记”，都犯忌，提到六四也犯忌，我说我在六四那日被封杀，这在国内可能都是罪状。你不知道他们的标准，也不知道他们的手段，所以，只要在境外开始做节目，我就是断了国内的后路，说白了，短期内我也不敢回去了。

我是一个普通人，在威权面前就是蝼蚁，也许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或许也懒得管你，但我不敢冒险，内心还是害怕，因为我看到的，经历恐怖故事太多了。

所以我没有在任何平台上说我回国，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在youtube或者其他平台上发出这个信息，我也让他们赶紧删掉，因为网上有一批小粉红盯着我，他们本来就叫嚣着等我回国就举报我，这也不是没可能。

早年有一次，我跟我央视的老同事吃饭，他悄声告诉我，说另外的同事在跟北京市公安局的人饭局聊天时，公安问王志安还在你们央视吗？被确认后，公安局的人说，还在央视，那我们暂时就不动他了。当时听到这个转述，我脊背发凉，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了，公安说的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也无从核实，但我想，我的名字肯定已经被人家记住了。

回到北京的每一天，其实我都生活在恐惧中，一开始我怕回不了国，后来怕到了北京会有人举报，最后，我又怕出不了国。因为我在境外有推特，虽然我自己说，我发言的标准跟境内新浪微博差不多，但在他们眼里，在推特上发言本身就大逆不道，除非你像胡锡进那样“奉旨翻墙”，否则，翻墙注册账号你可能就属于“寻衅滋事”了，而我在推特上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力。要是他们想收拾我，我有什么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另外一个令我恐惧的细节，发生在我父亲的历史档案里。

我要卖我父母房子的时候，需要去开亲属关系证明，于是我就到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去查他的档案，那里面有我们家庭成员的信息，我得用这个历史材料去做个公证才能卖房。

在档案室里，我看到了父亲厚厚一摞档案，里面有一份我父亲写的检查，是60年代初，他买了二十个鸡蛋，成了一条罪状，被举报后得写检查。在这份检查里，我父亲说自己思想觉悟进步不够，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等待。看到这个，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父亲为了养家，养我们这些孩子，仅仅在集贸市场买了二十个鸡蛋就要写检查，而这份档案跟随着他一辈子，直到他已经过世了，还留在别人手里。我问管档案的人，这能复印吗，我想留一个纪念。他拒绝了，说这是国家机密，不能复印。

回家之后我跟我姐说，父亲真的不容易，在那个时代，买点鸡蛋都得写检查，天天自己跟自己作斗争，每天都活在恐惧中。而事实上，距离那个时代过去六十年了，我们何尝不是仍然活在恐惧中呢？

过去，为了能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有很多东西我愿意牺牲，比如，不让我在社交媒体上说话，我可以做到，不让我对中医药问题发言，我也可以做到，只要你还让我工作。可是当你非要剥夺我最热爱的事业时，我就不愿意在这里待下去了，我不愿意像我父亲那样，终身生活在恐惧之中，一辈子谨小慎微。我得离开。

当然，我也知道，离开以后，我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回不来了，所以我在北京开始处理自己的东西，我把同事叫过来，说家里的东西，只要你们想要就随便拿。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

我下决心要走了。有人问我，你走了，你不想自己的国家吗？我说想，但是没办法。其实我们这些离开祖国的人没有几个是真的愿意离开这个国家的。我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长大，说的是中文，我们伴随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成长起来，故土难离。我们去其他人的国家，语言不通，文化不同，可这是被逼的，没办法，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容纳不下我们。

从此以后，我们可能就浪迹天涯，中文就是我们的故乡。这一辈子，我们注定是讲中文的人。

下定决心要走了，我才发现，又很难了，因为当时日本正好开放了留学生签证，机票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我的返程机票订上之后隔了十天半个月又被告知，没订上，得重新定。我找朋友买了一张从大连飞东京的机票，想先飞到大连，住一晚上，防止第二天早上飞会来不及，结果在起飞前一天，航司通知我，这个航班取消了，自动改成了当日傍晚，而当时北京和大连之间的所有的交通都已断绝。我担心，如果这唯一剩下的傍晚航班再取消的话，我就登不了飞东京的飞机了，后面又是不知何时才能订票。

万幸，这仅剩的航班没有取消，但我在大连住不了宾馆、住不了酒店，所有酒店都不接受预定，就因为我所住的北京大兴区挂了星号。就在我可能露宿街头的时候，一个朋友帮忙找了大连一个开厂的朋友，他们深夜开车把我拉到伸手不见五指的郊区工厂，让我在工厂招待客人的客房里住了一夜。亏得有这个朋友帮忙，我在国内最后一个夜晚没有露宿街头或者机场外面呆一晚上。

历经五个月，我从东京出发回国，自上海到北京，去洛阳再回京，每一段旅途都艰辛而充满感慨。临走前，我给很多朋友打了电话，因为此去一别，不知何日再见。我的情况和他们身处的环境，没有任何可以弹冠相庆之处，只能彼此互道珍重吧。

我已经想清楚，即便最坏的结果是我将来不能再回中国，即便从此以后，中文就是我的故乡，中餐就是我的故国，我也要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了。

5.19 王局恶意返乡记之六

对于我恶意返乡，之后又决意赴日的节目，有人提问：你在国内那么谨慎，那你出海关的时候没有担心吗？当然担心。我知道有些想出关的中国人在海关会遇到“劝返”，尤其是拿旅行签证而没买返程票的人，到了机场以后，机场的工作人员、机组人员都可能对你劝返。而且，我前面也一直在说，其实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尽管我在国内活动特别低调，但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有没有盯着我，甚至是不是悄悄对我采取了某些措施。只要我没有安全踏出国门，我就不能确认自己安全。

2022年4月7日，我在大连机场办手续过海关的时候，工作人员问我：在日本有工作？我说是的，他看了看护照，给我盖了章，我顺利出关后，才算是出了一口气。我也知道了，其实有关部门应该还没有对我采取什么措施。

飞机落地成田机场后，也要核酸检测，也蛮长时间。从成田机场到我东京的住所，差不多五六个小时，但我感受到了很大的差别：成田机场的每一个程序都有工作人员不停地跟你讲解，如果你不懂，他可能还会找一个懂中文的人来给你讲解。比如他要求手机下载一个app，以便于在你在后续隔离期间检查你是否去了公共场所。很多人搞不明白，那就有专人过来指导你怎么下载，以及下载原因。

两相比较，我想说，疫情防控各国家都有一些措施，对民众造成不便是肯定的，但有的国家会更照顾民众情绪，尽量更人性化处理。比如，按照日本法律规定，我从境外来，要隔离三天，之所以是三天，是因为我注射过疫苗，但我只打了两针，如果打了三针的话，其实一天都不用隔离。即便被隔离，可我仍被告知可以去任何地方。我听了都难以置信，真的吗？防疫人员说，是的。只要你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可以去任何地方。

后来我在朋友的酒店里住了三天，在这三天内完成了一些事务性的事情，都非常顺利。而那个观察你生活环境的APP，只是每天跟你连线一次，你也不需要说话，给他看一下周围环境就可以了。

隔离结束后有人问我，你怎么比较中国和日本的防疫措施？如果让我选，我会选择日本这种方式。从表面上来看，对病毒的防控是中国的清零政策比较成功，但它让人付出的代价是严重的。

在我看来，公共管理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目标，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重目标，防疫当然重要，但绝对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目标，整个国家还有很多目标，经济指标、民众满意度指标等等。而国内动不动静默或者封城，赋黄码红码，行程码挂星，连累多少人无端地失去工作机会，生意机会，求学机会？被影响最严重的，是本来就在社会底层的人，比如送外卖的，开网约车的，还有小商小贩，防疫把他们的生计都限制死了。如果保住了健康但保不住饭碗，防疫就是一个人遭遇的一次意外伤害，其灾害之重完全不亚于病毒。所以，一个良善的公共治理方式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较小的代价，来实现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

但我这次回国的感受是，当局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所谓的“清零”。“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在公共管理上，应该特别谨慎使用，因为从某种角度讲，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代价，或者说，当我们可能会让某一

部分人成为代价的时候，必须有充分的理由。然而国内的操作方式，是除了某些特权基层之外，从不考虑任何一个群体的可能性受损程度。

不说别人，你就看看那些本来就有基础病要常年跑医院的人，比如血液透析病人，他们怎么正常治疗？所以，即使疫情的死亡率看起来低，但次生灾害非常严重。多少人因为防疫看病不及时甚至没得看而病故？政府计算了吗？这些人为什么平白无故就成了“代价”？

所以，一个良善的社会管理方式要在综合考虑社会各方面目标的基础上仔细权衡，做出取舍，而不是动辄让其它目标为某一个目标让路。

再退一步说，这些防疫政策真的是出于防疫需要吗？我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武汉以雷厉风行的方式封城，尽管也造成了一些人道灾难，但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的，我当时在推特上也表达过赞成，只是希望尽量让这个社会付出较少的代价。到了2022年，防疫

形势和武汉有天壤之别，当时，已经有有效疫苗，也有特效药，所以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防疫措施都发生了调整，“共存”已经成为大部分国家的防疫共识。新冠死亡率已经降到了普通流感水平，再采取那么极端的防疫措施来抗拒类似于流感一样的疾病，理由充分吗？

在我看来，防疫政策不改变，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政治化了。早期美国确实死了很多人，而中国看起来风平浪静，经济发展也不错，于是中国防疫模式似乎就变成了美国模式的对照，印证着中国模式的优秀，让政府感受到了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路径依赖产生后，事情已经越做越错，但如果中途放弃清零，政府似乎就变成否定自我。这是不是在全球面前丢脸了？

如果当局这样想，那就糟了。因为专业意见就不会有人听了，政府会认为，那仅仅是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但从我们最简单的思路考虑，为什么死守着清零不放？只要进口国外的辉瑞疫苗，进口辉瑞的口服药，完全没必要大动干戈，把北京上海等一众城市都折腾得七零八落。

中国怎么就不能像英、美等国一样“躺平”？休养生息，逐步实现全域性开放，做不到吗？很容易做到，可就是没人敢去唱反调，政治化的话题就是最敏感的话题，如果不是自上而下地确认停止动态清零，那下面也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我亲历了日本的防疫过程，两年里也有过严峻的形势，但实事求是说，生活在日本的人们基本没有因为防疫而受太大影响，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出门得戴口罩，进入公共场所测个体温。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做核酸或者隔离，如果隔离，政府会提供必要的食物，甚至还有现金补贴。这样的做法确实实能让民众感觉到，政府是以每一个普通纳税人的利益为核心来制定政策的。

从防疫的人性化管理中，我看到日本政府的友善，这也是我愿意在日本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问，王局，你以后在日本怎么生活？说到未来计划，我一两句还讲不清，将来会专题讲述，但我可以讲一点自己的感受：我想，将来，我可以在海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有人会觉得，这话听着别扭，你在哪儿不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可以明确说，在中国，真的做不了，因为你连腰都直不起来。在海外为什么能做？因为我已经可以感受到，在日本，我至少能有尊严地、按照自己真实意愿活着，我不用低头哈腰，不用委曲求全，不用说谎或者说一半留一半，我要坦荡磊落，说自己的真心话，做自己想做的事。

为实现这个目标，我给我自己列了几个要求，在此公开表态，也希望各位可以监督我。如果我做不到，将来大家可以用我今日所言来诘问：

一、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不会走上反华的道路。

我是中国人，从小接受中华文明的教育，聆听唐诗宋词长大，看祖国山川动情，所以我绝不可能走上与中国对立的道路，我发自内心希望中国逐渐进步、逐渐变好。这个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永不会走上反华的道路，绝不像一部分海外人士那样，希望中国分崩离析走向崩溃。

二、我在海外不会接受任何政府哪怕一毛钱的资助。

我既不会接受中国政府的资助，也不会接受美国政府、日本政府的资助，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我要保持独立性，就必须在经济上实现独立。

三、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尊重各种宗教派别，也尊重任何个人的宗教信仰，但我本人不信仰任何宗教，也不会跟任何宗教势力裹挟在一起。

四、我也不会从事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活动，我的定位还是一个媒体人、一个记者，我会保持价值中立，绝不参与更不会组织政治活动，对这些活动我从来也不感兴趣。对颠覆政府或者资助颠覆政府的行为，我通通没兴趣。

需要说明的是，我一直对两岸三地的政治人物有兴趣，假如有一天，我能采访到那些政治人物，我会全力以赴，但这并不代表我附议他们的政治理念，更不会由此参与到他们的政治活动中。

以上是我给自己定的四个方面的要求，概括起来就是：中国人的立场，普世价值，世界情怀。这是我在推特上曾经说过的三句话，这个定位我会长期不变地遵循下去。

所谓中国人的立场，就是像连岳老师说的那样，“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但我不是天天夸中国好，而是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去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这个角度，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有我的个人理解，某些人有某些人的理解。比如，我并不认为网上一些小粉红是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问题，虽然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汉奸卖国贼，我的自我评判恰恰相反，我认为我是基于中国的立场、中华民族的立场考虑中国问题。

论普世价值，是我希望中国社会的未来方向应该通过改良、努力，让中国充分融入到世界大家庭里面去，无论是在经济方面、制度方面、法律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我们不至于做世界大家庭的陌路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我们过去那种特殊的价值观，慢慢改造成普世价值观。

国内小粉红经常说中国没有普世价值，不是的，一定有普世价值，只不过国内外对于普世价值的定义会有一点差别，有差别不要紧，首先我们得承认有普世价值，比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保护个体权益，限制政府权力。这些都是普世价值，但这些原则会挑战中国人曾经有的观念，有些观念，在很多民众看来几乎是大逆不道了。但现在，很多中国人也在逐渐接受了，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再说第三个方面，世界情怀。既然我已经从中国出来了，就不可能仅仅关注中国的事情，我在日本生活，会有很多时间精力去关注日本的国情，未来可能我还会去美国、欧洲，我希望力所能及地去观察全世界范围内的事情，打开自己的眼界，去接纳更多的新知。而归根结底，关注他人，也是为了反观自身，反观他们的发展对中国有什么启迪，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

当然，小粉红们肯定会说，我这是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政府也不稀罕你的这种参考意见。别人珍惜不珍惜没关系，但凡我的努力能启蒙哪怕一个两个人，也是好的，如果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

到，也许未来他们中的某些人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些间接努力，受到启发，把国家变得更好。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心希望自己的国家逐渐变好，而自己也能光明正大地生活，再也不卑躬屈膝，再也不需要乞求权力的恩赐，再也不必为自己在缝隙里卑微地活着而持续压抑和牺牲自我。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才是美好的明天。

我希望我可以站着，在海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六月

6.01上海解封宣告清零失败

上海解封了!

上海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022年6月1日开始恢复公共交通运输,复商复市、复工复产复学,恢复公共服务。

对于上海市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上海市民已经被封控了两个多月,最长的有将近三个月,这段日子对上海市民来说,太不容易了。

回忆早期封控时,上海很多小区连基本的食物供应都没有,饿肚子的人不在少数,而病人送医时因为没有核酸检测结果,哪怕就在医院门口也得不到治疗的情况比比皆是,最惨的情况是就在医院门前去世了。两个月里各种各样的惨剧让上海市民心痛,让看着上海市民煎熬的全国人民震惊,现在,这个苦日子终于熬过去了。

全球都在关注上海，连我的日语老师都问我，听说上海要解封了？是的，但我向我的上海朋友求证时得知，还不是彻底全域解封，他们小区里前天发现了一例，于是他们就仍然不能解封。只是跟过去相比，待遇变好了，居委会现在会给他们送盒饭，不用自己做了。所以，政府放出来的消息似乎是阶梯式的解封，仍然有重点管控区、精准防控区之说，用一个好听的词，叫有序开放。好像，不能一下子180度大拐弯的意思。

但有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就是我宣布“动态清零”失败了。因为疫情并没彻底结束，解封不是因为清零完成。您看上海市5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5月30日，新增31例。这个数字的存在意味着新增感染病例的情况并未结束，不是和过去其他城市解封的前提那样，连续十四天全域不再出现新增病例。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上海不再遵循清零后解封的要求，这个城市是以与病毒共存的状态复工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动态清零政策首先肯定执行不下去了，其次，执行下去也不会有用了，而且次生灾害非常严重，大家挺不住了，经济快崩溃了。

还记得我在之前的节目《动态清零不停止，经济民生保不住》里给大家看过的2022年4月上海经济数据吗？我重复一下：

四月份工业生产总值1364.17亿，同比下降61.5%

四月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13个，同比下降98%

1-4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9%

四月份社会零售总额716.97亿，同比下降百分之48.3%

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下降11.3%

截至四月份进出口总额12269.53亿，同比增长0.1%

其中四月份2191.49亿，同比下降36.5%

工业产品中，产量汽车75.35万辆，同比下降74.8%

智能手机58万台，同比下降60%

计算机设备51.9万台，同比下降74.7%

智能电视0.18万台，同比下降98.7%

发电量41.62亿度，同比下降40.5%

从这些经济数字上，大家都能看到，上海2022年4月的经济数据是大幅下挫，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入肯定也是入不敷出，因为一方面疫情期间要给市民提供补贴，防控也需要钱，企业既然停工停产，哪来的钱给政府交税？而5月份的数据只会比4月更惨，再这么搞下去，经济难以为继。

5月31日上海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特别强调，要尽快复工复产，那必然是因为政府也快扛不住了，动态清零政策，说白了是让地方政府在封控期内坐吃山空，所以不可能长期持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科学上，动态清零也是做不到的。5月22日，张文宏等上海市专家在中华医学预防年会上有学术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奥密克戎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跟我们共存，不可能短期之内消失。

张文宏在报告里说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已经超过水痘，和德尔塔等之前的毒株相比，致病率大大上升，而致（死）率在大大下降，仅仅

对高龄的有基础病的病人，还有一定的致死率，但总体来讲，威胁已经下降了。

张文宏的这篇报告没有被封杀，媒体报道出来了，这也是逐步在告诉人们，再动态清零就是不尊重科学。我想，张文宏能斗胆把真话说出来，一方面是他本人的科学精神，此外肯定还有其他力量的推动，至于有没有政府方面的推动，也未可知。但这样的声音非常明确地代表着上海市公共卫生专家们对上海封城是不赞成的。

其实过去两个多月，多少专业的声音已经通过各个途径在传递，但是，没什么用，而深受上海市民拥护，也在媒体上得到最广大支持的专家张文宏能通过正规方式，并且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爆出来，我想，可以表示上海市的政府部门里，至少有一派是力挺科学防疫，反对动态清零的，否则，以目前的媒体管控力度，根本不可能出现不主流的声音。

如今，这个城市重新回到了正常生活，并且也告诉大家，假设未来上海市再次发现疫情，也不是全城封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套

办法，又回到了上海市过去精准防控的路子上。经过两个多月的试错，上海市民被折腾得身心俱疲，有人丢了性命，有人丢了工作，有人治不了病，有人吃不上饭，换来了什么？掉头回归。

瞎折腾的不止上海一个城市，可上海能解封，它就可以成为其他城市的榜样，上海市证明了动态清零政策不可行，那后续，其他地方会怎样呢？我觉得，大概率是，其余地方纷纷效仿。

半个月前我在节目里说，北京的动态清零政策注定要失败，很多人在底下评论说，等着我将来被打脸，现在，你还等吗？你看现在北京市做到动态清零了吗，没有。尽管它发明了一个词，叫社会面清零——这类名词能让我们想到社会运动里各种汉语创新，例如文革里的斗私批修、灭资兴无——我看像是文字游戏，想从无法彻底清零的状态下找出一个中间态的好听词汇，其实就是想表示，没办法彻底清零。但政府不愿意承认政策失效，非得用社会面这种说法来给自己下台阶。

现在上海说，不是全域解封，而是逐步有序开放，也有点逐步走下台阶的意思。咱们的政府对于如何做好文字宣传工作，攒下面子有很多方法，改革过程中产生失业，不说失业，叫下岗，物价上涨太多，换个角度，谈物价涨幅，涨幅回落，坏事变好事。为什么要变着法子换词换说法，换统计口径？说白了就是不愿意面对事实，不承认治理上的问题。

可不承认，就等于没发生吗？上海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有官员说我们这不叫解封，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封过城，给我逗乐了，估计很多市民听了也笑。这两个多月，大家走不出家门，给晚期癌症病人送药都要用无人机，这不叫封城？够幽默。

据说有的居委会跟居民讲，没封城，过去两个多月来都是市民自愿不出门的。那么那些因为没有核酸报告进不了医院，死在医院门口的人是自愿死亡？买不到饭，在家里饿肚子的是自愿挨饿？到这个时候你们还不愿意面对现实？封城无效，失败了，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北京也封城失败了，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如果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你还能指望它解决问题吗？

再看这次上海的新闻发布会，说城市解封以后出入公共场所，都必须拿七十二小时的核酸检测报告，但是核酸检测的免费期只有一个月，限制在6月30号之前，此后，就要自己掏钱了。我估摸着，财政快支持不下去了。大家给他们算算：三天一次核酸检测，一个月至少十次，按照现在大幅降价之后的成本，仅仅检测费用也是十几块钱，一个月一百多，这笔钱要是持续政府出，在目前的局面下已经是一个压力了，可对家庭来说难道就不是压力？如果一家三代同堂六口人，那就是近千块钱，本来人家也不愿意做，是你政府非要强制他们做，可还让群众自己付费，合适吗？你要么就让他们自愿做，自费，要是强迫，就得政府出钱。

但前几天，政府出台政策了，说核酸检测的费用不能再从医保里出了，全部从地方财政出，经过这几个月折腾，地方财政能富余吗？也困难，于是这锅就甩到老百姓自己头上了。现在不仅上海市，成

都、武汉这些城市陆续都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强制居民自费做核酸检测。

在解封这么一个令人有解放感的消息里，这一败笔又是令人遗憾而无奈的尾声。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遍体鳞伤，上海人的精神气还回得去吗？上海的元气还回得去吗？一个曾经是中国内地城市治理天花板级别的世界大都市，一个追求城市管理文明、执法文明、法治相对健全的城市，一个汇聚全球各类人才的城市，在过去两个月，经历了什么？

一夜之间，和谐共处的环境没有了，“大白”跟市民冲突，再豪华的公寓也布上丑陋的隔离带，执法变得粗暴，市民失去了耐心，上海市的执法文明顷刻间都荡然无存了，要回去，谈何容易？人心的伤痕，如何修复？

每个人都会想，这里是上海啊，上海也会如此吗？仅仅因为疫情期的一个政策，人心就变了？这到底是迫不得已的应激反应，还是上海文明的基因太容易被摧毁？

而且，以前大家都会说，上海有张文宏们啊，有专业精神足够的感染专家，有复旦交大里的法学专家，曾经上海以“精准防控”在疫情里让上海市民不受病毒的侵扰，这里的管理者和专家们也守得住科学防疫的底线，任尔东西南北风，上海坚持不封城。然而，三月上海沦陷得像大雪封山，任你张文宏等待专家再怎么委婉地谏言，有用吗？

所以，中国不缺少专业主义，不缺少专业人才，只是他们的声音，政府愿不愿意听，听到了，愿不愿意作为决策依据。这是当代中国现实，决策层需要的第一元素，不是专业人的分析，他们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科学性、专业性和经济民生。

沧海横流，祝愿上海再回英雄本色，成为亚洲最繁荣、最文明的城市，成为给国人以欣欣向荣希望的城市，做回海上明灯，照亮新的征程。

6.2毒教材错不在丑在于洗脑

适逢国际儿童节，我们讨论一下近期直奔热搜的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事。

不知道什么人，有一天突然发现，咱们中国小学数学教材里的插图特别丑，他把几个典型丑陋的插图拿出来放到网上，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看不知道，一看的确丑。很多家长看了都不淡定了，这教材插画怎么选的啊？

可除了丑之外，有些家长还总结了其他不妥：一是崇洋媚外，说插画上有小孩穿着星条旗的衣服，那怎么行？当年赵薇就是因为星条旗的一套裙子被喊打喊杀，这是代表美国啊；第二，插画里有个开飞机的人，飞机上有个数字写的是N33K，有人说，那可能是日本自卫队的飞机代码；第三，说插画中有性暗示，有暴露癖，穿着短裤的小孩

似乎还暴露了生殖器形状，小男孩和小女孩一起游戏，男孩子抓住了女孩子的裙角，都是性暗示。

这些插图我也看了一下，丑确实是丑，跟日本小学教材比，那差距确实大，新闻中指出的中国小学数学教材之简陋和没有美感，是可以坐实的。

但是后面这几个指责，比如星条旗、飞机型号和所谓性暗示，我个人感觉，夸张了，政治化了。孩子身上有星星条纹，怎么不行？就算代表美国的国旗，又怎么着了呢？至于飞机上的型号，那真是闲着没事干在捕风捉影。这就是境外敌对势力侵入？这侵入有什么意义？孩子看了能怎么着？至于性暗示，你要是自己看着不舒服，可以理解，但扩大到更多想象，没什么必要。

找毛病找到这个程度，说句不好听的，神经质了吧。你说它丑，对，是丑，但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方面，这是你自己敏感，你问问你家孩子，看得出这些倾向吗？

这么个挑刺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这是我主要想讲的问题。

不过我可以先说一下中国的教材体制是怎么回事。

自从1999年教材投资出版市场化之后，中国有四家主流编写教材的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最大的一家，属于国家队，民间称之为“人教版”；第二家叫语文出版社；第三家叫江苏教育出版社，也被称为“苏教版”；还有一家北师大出版社。虽然教育部早就规定各个学校均根据教育部编制目录自选教材，但实际上，各省经常发个红头文件就把选统一教材的权力放在了各省教育厅。尽管教材单本的盈利不多，但由于中小学生人口基数大，教材使用量很大，且一旦用了某套教材，基本是要持续好几个学年，所以教材订哪家，就变成了有巨大寻租空间的事情。这几乎是中国教育界一个公开的秘密。

而另一个秘密是，各省教育厅跟当地新闻出版集团以及教育行政机关商量之后，他们的政府招标采购工作也变成了走形式。地头蛇出版商先找到真正的教材研发大哥说，你的版本好，我就用你的教材来

投标，因为你也基本不可能中标，中标的得是我。但我也会让你得利，从我们当地的教材销售总额中提取3%作为“租型”费用，多了不给。可你要是不愿意租型模式把教材模版给我，那对不起，从此以后，我们省就不用你的教材，连带教辅也不买你的。

听着是不是有点黑社会的感觉？

这还算好的，据说，有的地方性出版集团给原始研发的出版社连3%的费率也不愿付，甚至提出教辅产品也得“分一杯羹”，否则即封杀出版社在该省发行。

其实，租型这个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当时交通不发达，物流是个大难题，为了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国家任务，政府就拉郎配，让人教社把印刷纸型（之后变成胶片）“租型”给地方上的新闻出版部门，让他们印刷发行。但市场化时代到来，租型其实已属于违法，可地方出版机构就敢这么强租。

说这些，主要强调什么呢？教材是稳赚不赔的产业，里面的水深不可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这条产业线上生存的，都是靠某种背

景和利益分配模式。能得利的是谁呢？各地教育厅扶持的教材出版商，永远不改的发行商新华书店。在持有知识产权的出版商当中，惟一真正有无可争议话语权的，大概只有人教社。

而特别让人教社得利的事情是，2013年以后，语文、历史和思想政治教育这三本教材就不再允许其它出版社搞研发了，国家只授权给人教社，以此让意识形态领域统一口径，其他出版社就只能在数学英语、化学、物理、科学等教材上努努力。人教社在三个科目上得到垄断权之后，当然也连带到其他学科也会占便宜，于是，这笔买卖做得越来越风生水起。

而这次被诟病的教材是人教社很多年前就研发确定的版本。有人说，人教社是因为给插画师的钱少了，才拉低了审美，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对于人民教育出版社这样的教材出版巨无霸来讲，钱根本不是问题，他们太有钱了，完全有实力请全世界最好的画家给它们画插图，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丑的图呢，最大的可能性是，他们把插画这个活儿交给了关系户。

所以，您明白了吗？中国的教材体制，有计划经济的不竞争，靠渠道，卖意识形态的特点，却也有市场经济想赚钱的特征，这两大阴暗劣根合并在一起，发生什么丑陋的事情，都很正常。

说了那么多，其实这并不是我最关心的主旨。我想说的是，中国教材真正问题根本不在插图，插图只是教材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真问题是中国的教材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它不是为了实施通识教育，而是聚焦在如何给孩子从小洗脑。

看看过去七八十年代的语文教材吧，现在你是找不到那种课文了，七十年代语文书里有毛主席的老三篇，有《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有描写黄继光、邱少云等烈士故事的。为什么现在这些课文没有了？因为这些文章中大量内容毫无文学性可言，就是赤裸裸为了意识形态的。

但现在彻底没有意识形态内容的课文了吗？不，当然有，只是选择了文学性强一点的文章，比如六年级上学期有一个单元全部是爱国主义教育，诗歌《七律.长征》、《狼牙山五壮士》、《开国大典》，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单元的文学性和其他单元可比吗？到六年级下学期，《十六年前的回忆》、《为人民服务》、《金色的鱼钩》，讲李大钊、毛泽东，讲红军，你可以看出来有些政治形态的内容是不可割舍的，编辑人员可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选择了相对不那么干瘪的政论文章了，但说到底，还是洗脑文。

此前还有人讨论，《史记·陈涉世家》要不要留在课本里，因为陈涉说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那是提倡革命手段推翻政权的，现在，咱们天天讲爱国爱党，要维稳了，还要提倡他们有“举大计”的雄心吗？

历史（课本）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历史解读必须只有一种声音，定性了就是不可更改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听老师讲历史，说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是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把李自成、洪秀全包括义和团打包，说他们都是历史正面推动力，然后讲到中国共产党接过革命传统，枪杆子里出政权。

我相信很多人成年之后如果再读史书就可以看到，太平天国不就是匪吗？义和团不就是一群毫无素质的乱民吗？洪秀全是什么德行？太平天国干了多少坏事？太平天国统治江南的十几年时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六七千万。历史书告诉你这些吗？没有，书中出现太平天国的原因，只为了告诉你，推翻清王朝的合理性。但这些都救不了中国，最后只有中国共产党推翻旧中国，成立新中国，是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洗脑书，不是要告诉你真相，只是要告诉你现在政权的合法性。

现在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国家把语文和历史、思想政治教育同一种声音输出，用一个标准答案考试，养育出整齐划一的，不知道真相，只知道考试拿高分的孩子。统一的教材，就是让教育部门放弃思辨和选择，学生没有选择，我们的未来就不会有第二种声音。

这是人教社一家独大最可怕的地方。

但更进一步说，教材是教育的重要工具，最重要的，肯定还是我们教育的理念、教育目的是否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崇尚的是惟一标准

的训导，不需要让孩子们学会去辨析、讨论甚至争论，那他们会长成怎样的一代人？

大家都知道，发达国家都有通识课，北美、日本有，过去的香港也有，孩子们会循序渐进地知道一个国家的基础结构，作为公民掌握基本的辨析方法。在美国的通识课里，在讲美国宪法的时候会以美利坚合众国制宪会议上“伟大的妥协”为例子，让美国南北方各个大小不等，人数差异很大的州之间彼此妥协，通过上院和下院不同的投票原则和投票内容的差异化，既不让人口小的州减少话语权，也让大州得到相对合理的权力。这样的通识教育是在教育孩子们：当我们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要学会双方适度的妥协来完成求大同，存小异，从而实现最大的共同利益。

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教会孩子们的内容。有辨析，讲道理，懂分寸，看大局。

但我们的教育灌输的永远是惟一性的答案，小时候这样，长大了要是逆龙鳞也是被封杀，严重的，杀无赦。我们的教育不允许人动用

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分辨，只允许你接过社会主义的枪，对待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所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经常有杀气腾腾的评论，因为他接受了绝对化的教育后，不允许存在不一样的声音，别人说了他没听过的话，那就是一派胡言，不正常，是坏人坏事。

让他们安心的是，人人都说一样的话，这个世界必须是同一个领袖，同一个思想，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教材体系培养这样的人，它培养你独立的思辨精神，而是让你绝对服从，唯命是从。

有人说，我们国内的教育也有通识课，有《道德与法治》，大家可以看看教材，和我们的现实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存在假大空。比如，老师教育我们诚实，但很多老师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在课堂上说了不少不客观的话。谎言不是他们编排的，而是教材就是谎言，例如前面说到的太平天国。有多少历史老师会说，我给你们补充些真实史料？

写作文，老师让你写“好人好事”“记忆深刻的事情”，你看吧，交上来的作业全是学雷锋，都是拾金不昧或者学雷锋扶老太太过马路。

王朔写小说提到，小学生都站马路边候着老太太，好不容易来一个年纪大点的，一帮孩子蜂拥而上上去搀扶，就怕事迹让人抢走。不是笑话，我们小时候也这么干的。

孩子们的脑子已经被机械教条的教育搞成木头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全部背得出，默写得出来，但每一个词的含义却没人知道。不说这么复杂的，就说如何待人接物，与人为善，如何在生活中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动手，学会基本的生存能力，这些，都没人教。

现在有家长怀疑课本里面有生殖器，有性暗示，我倒是想问问，你们家孩子懂得什么叫生殖器，懂得你们所说的“性暗示”吗？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性。我们的课本里什么时候有正规的性教育的？中学。我不知道现在的性教育教材里面怎么编的，我们当年的生理卫生课，关于生殖系统这一章节，没有老师会讲。为什么？可能老师也觉得这教材有“性暗示”，下流。这种回避的态度能教育出一个正常人的生理理念，能让孩子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吗？

现在很多国家从小学开始就进行性教育了。这才是正常的教育理念。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如果因为所谓的羞耻感，不及时进行正确的性观念教育，让孩子在好奇中自我摸索，那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所以我们与其要担忧教材的审美和莫须有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不如担心一下我们的教育会调教出什么样的孩子。

现在很多人移民，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大人们已经成形了，觉得国内的生活还不错，但是总觉得自己的孩子如果在这种环境下继续成长，复制过去的那种人生，非常可怕。我完全能够理解。国内目前的教育环境下，一个人如果要全方面健康，真的需要强大的自我抗拒能力。

有人说，那你不就是国内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吗？你怎么就走出轨道之外，把自己变成了带引号的“反贼”了呢？我这样的，是少数，除了上课，我自己会找书看。政治课，我找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看，所以虽然我高考政治考了九十七分，但这不意味着我认同标准答

案。但现在，具备这种自我学习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有吗？也有，太少了，大多数孩子已经被卷在了刷题战术中，哪里有自己的时间？他们就在被洗脑的教育中耽误了宝贵的通识学习的机会，浪费了被启蒙的时机。

教育是抛弃蒙昧的过程，所以需要启蒙，为孩子的心灵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知道如何变得文明，变得有教养，变得有知识、有才华，变成一个越来越智慧的人，目前我们国内的教育完全没有这个宗旨。而司马南之流还在带节奏，说语文教材问题大，提到圣诞节的次数比提到春节的次数高十倍，他们还在为意识形态的事情操心，恨不得中小學生走向极左思潮。再走，就是红卫兵要卷土重来了。

人教社教材的事情，现在发酵到出版社已经网上致歉，也说要建立专门的调查组，不调查清楚，绝不姑息，那接了插画图的吴某估计是完蛋了。就跟文革里面被抓住了小辫子的人一样，举报、整人，这种风潮又起来了。

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句话：一切都是政治，政治就是一切。这是我一个朋友对这次教材风波的总结，送给大家，共警觉。

6.3“马前卒”步王局后尘

最早向莲花清瘟胶囊发起进攻的“马督工”到底还是被封杀了，他所在的《睡前消息》编辑部留在微博的最后一条帖子是5月29日发出的，当日他们发布了一个针对“千金藤素”的质疑视频，然后就英雄牺牲了。

马督工所在的媒体叫“观传媒”，他们所制作的视频在境内看不到了，但在Youtube上还能看到，都是通过“观传媒”平台发布的。而“观传媒”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是一家左派媒体，和《观察者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背后投资者是同一主体，而马督工此前就曾经担任过观察者网新闻副总编辑。所以，《观察者网》和“观传媒”从某种角度讲，也是“姓赵”的近亲，有人说，马督工的“含赵量”还挺高的。然而现在，这么一个“含赵量”挺高的博主通过莲花清瘟和千金藤素的连续斗争，把自己作死了，这挺有意思的。

我在“观传媒”网站上看马督工过去的视频，确实比较“左”，比如说有一期他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达，比较“左”。但是从今年四月份开始，马督工出人意料地对连花清瘟胶囊发起了进攻。

这事情的背景是，今年上海封城时，马督工被封在家里，在收到的政府物资里发现了几盒连花清瘟胶囊，然后看到网上有人说，连花清瘟胶囊可以预防新冠，在武汉疫情中也发挥了不少作用，他觉得不对劲，上网一搜，更觉得里面有猫腻。首先他研究了世卫组织提到新冠疫情期间连花清瘟胶囊作用的报告，发现那只是在世卫组织工作的一个中国专家提交的报告，表示中国正在尝试用中医药防治新冠，而且报告里还讲到中国的中医药使用不规范，时常给怀孕的妇女和儿童使用，最后文章表示，到中医药防治新冠值得重视。这么说来，世卫组织根本没有宣扬连花清瘟的妙用，整个报告唯一提到连花清瘟胶囊的部分是一个注释，注释里提到一篇论文，说大名鼎鼎的钟南山院士主持了一个项目，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院士，参与论述的主要人物是吴以岭的女婿。

马督工一看，人家这世卫报告里何曾说连花清瘟胶囊可以预防新冠？其次，连花清瘟唯一的学术论文还是吴以岭的女婿写的，这有说服力吗？如果一定要说连花清瘟胶囊的作用很强的话，可能也就拜钟南山院士所赐，给这个药物的研发推动了一把。

钟南山院士和吴以岭院士关系不一般，他们曾联合在广东成立了“南山以岭研究中心”，由以岭药业提供资金，钟南山领衔，研究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胶囊对新冠的效用。这个“路数”近年在中国很常见，医药企业出钱，医院出病人、出研究报告，医学专家负责出“脸”“站台背书。只要不要脸，他们站台后就能拿到足够的钱。

学术研究本来最讲究独立性，要避免利益冲突，可钟南山院士堂而皇之地拿着以岭药业的经费搞连花清瘟胶囊研究，这研究出来的结果显而易见，你相信这其中的客观性、科学性吗？如果研究结果对以岭药业不利，发布吗？

做药物研究由企业出资也不算反常，但国际通行做法是首先要公开声明，但即便如此，这类学术论文的学术价值就都会大打折扣，说

服力勉强，你相信烟草行业资助的科研课题作出结论说烟草对人体健康没有危害吗？这种无法规避利益交换的科研项目让第三方和未来的人看，都是笑话，而国士钟南山院士却正在干未来会成为笑话的项目。

尽管两个院士的合作被曝光了，但以岭药业仍然出来脸不红心不跳地辟谣说，与钟南山院士为学术合作，钟南山院士未因此取得过任何劳务报酬，更非以岭药业的投资人。笑话，难道大家说的是钟南山直接从课题上拿个人劳务费吗？科研经费的所谓合理性支出就可以体现钟南山院士的价值了。

马督工看到这些信息，坐不住了，他通过《睡前消息》播出了一集《世卫组织推荐连花清瘟，谁告诉你的？》4月10日发在B站，引起轩然大波，总播放量很快达到了110多万。而其中最给力的转发人是王思聪，王公子，他的转发让这个新闻很快破圈。4月13日，王思聪在微博上转发马督工的视频后，同时评论说在中国敢说真话的媒体越来越难找，要求“证监会应严查以岭药业”。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发酵，虽然当天下午，王思聪删除了评语，仅留下“转发微博”四个字和

视频，但破圈的连花清瘟之疑问一下子蔓延开来，第二天以岭药业股价跌停。

随后，医药行业的其他媒体也加入战场，丁香园4月17日发文《不要吃连花清瘟预防新冠》，虽然文章的口吻不像马督工那么猛，但他们提供了更周全的科学依据，它向公众科普什么是安全的药物，那是要经过动物试验和四期临床试验的，而连花清瘟没有这些报告，所以无法证明安全性；另外，连花清瘟也没有按照我们国家药品管理方法提交过双盲实验的报告；最后，没有科学实验证明连花清瘟可以预防新冠，且明确指出任何药都有毒、副作用，既然没有预防作用，那么大众都随便吃就很有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在连花清瘟公开的成分里，有麻黄和鱼腥草，这两种成分都有可能造成副作用。这篇文章一发布，也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所以第一场战役是马督工吹响号角，王思聪扩大了影响力，而丁香园更是趁热打铁，把连花清瘟的内底都抖搂出来了。

以岭药业一开始还辟谣说不是他们提的能防新冠，也没说过世界卫生组织曾推荐，但公众已经因为大量被输送入户的连花清瘟毫无效

果和一度的盲目抢购，在此时感到了被愚弄的愤怒。一深挖，很多段子都出来了，比如大家发现连花清瘟胶囊是吴以岭院士在SARS爆发期间用15天研发出来的。15天！

大家都知道国际上研发一种药物动辄十年，甚至十五年、二十年，吴以岭院士研究连花清瘟胶囊仅花15天，厉害，更神奇的是，对治疗SARS（非典）有效。难道SARS在2003年肆虐之后，是因为连花清瘟胶囊而神秘消失的？这论文怎么没有被好好写一写？有了这个奇效，据说后来禽流感时期，连花清瘟胶囊也成了卫生部门的推荐药物，之后，又有传言说可以治疗手足口病，到了今年，连花清瘟终于开始业绩大爆发，它变成了不少政府向居民送温暖的治疗新冠神药。

可以说，连花清瘟所有病毒类的疾病一网打尽，风头无两，盖过了抗病毒特效药，如此看来，还搞什么疫苗？中国防疫付出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封城影响了如此多人的生活，影响国计民生，现在看来还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连花清瘟的奇效，全国人民人手一盒甚至两盒连花清瘟胶囊，我们就不用封城，不仅中国得救，吴以岭院士一个人就搞定世界范围内所有疫情，让普天下众生从此爱上中药。

据说现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给华人送温暖的，就是连花清瘟胶囊。

然而，从马督工到王思聪再到丁香医生等等一系列质问操作，让连花清瘟一下子就被扯下神坛了，最近，以岭药业股价持续下跌。

按照这个态势，我倒要回头给马督工他们提个醒了，在中国反中医药要特别讲究分寸，我就是个典型例子，质疑稍微重一点，往前一步变烈士。你看最不怕惹事的王思聪转发完之后，都是先是改评论，第二天再改成单纯转发。为什么？对方势力太大，触动中国中医药行业，首先会被定义为政治行为，因为中医药被列为了中华文化瑰宝，你不敝帚自珍还质疑，这就不爱国了。如果要质疑中医药没通过双盲、安全性、动物实验，那你说太多了，是不是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了？帽子给你一戴，完了，找死了吧？

其次，中医药背后利益巨大，以岭药业前三个季度仅连花清瘟一款药就卖了81个亿，按照这个推算，全年能卖一百多个亿，这里面30%到40%都是销售费用，就是用来做公关做勾兑，给回扣的，对象

包括了为他们打广告的，打批条的，还有专门给居民送温暖，给患者开药的，他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一般机构和个人哪里得罪得起？所以你看丁香园，发完一篇科普文章就撤了，再往前走就危险了。

但是马前卒马督工有点不知深浅，打完这一场战役之后，乘胜追击他紧接着发动了第二场战役，千金藤素，这和连花清瘟套路也是差不多，但没有连花清瘟胶囊的影响力那么大，可也足够把一家公司的业务拉下马了。最大的问题是，这第二场战役马前卒基本是孤军奋战了，但火力不小，水平也不低。

由于以岭药业要报警抓诋毁他们的人，马前卒来劲了，他经过一番研究，又在《睡前消息》做了一篇精彩视频，说以岭药业你要找的消息来源，我帮你找到了，一个是《人民网》石家庄频道发的，文章标题就言之凿凿说世卫组织推荐一定要用连花清瘟，因为它有预防作用，还有一个是《中国经济周刊》，也是《人民日报》旗下的。其中人民网发的那篇记者赵明妍两年前还是一个实习生，而今年能连发了四篇有关以岭药业的正面报道。其中，四月六日和四月七日发的那

两篇文章，可能有点效果，以岭药业股价开始暴涨，直到马前卒发文开始，才停止暴涨，转而暴跌。

马前卒在视频里就说，我学雷锋做好事了，把你想找的试图操纵股价的不实信息找到了，你赶紧去举报赵明妍，她上你们企业那么多次，拍了照片写了文章，却用了不实信息。

说实在的，这种口气，我很熟悉。过去我在微博也经常给一些企业挠痒痒，很多人说我是“战略挑逗局局长”，但我已经栽了啊，马前卒你可不要重蹈覆辙，低估中医药企业的势力。不过，马前卒不想收手，消息越放越多，对以岭药业没有双盲等内容连续文质问。然后再把千金藤素推上风口浪尖，那这不就是把新冠防疫之路上中药的作用一一砍杀了吗？

果然，没几天《睡前消息》被禁言了。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莲花清瘟让钟南山背书，用世卫组织的报告造谣，以及通过《人民网》赵明研发软文，都是金钱开道的营销行为，整个链条天衣无缝熟门熟路，大家都已经把这套路当成正常

营生了。所以，我跟鸿茅药酒对垒的时候，接到过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一个女记者的电话，说她可以做中间人，促成我跟鸿茅药酒之间沟通。你看，这些号称“国字号媒体”的地方频道早就用平台资源和地方企业勾兑了，他们已经不是媒体，而是线人，是软文写手，是广告商。

说实话我还是挺佩服马督工的，这些黑幕只有经过一个又一个人不断地揭露才有可能让真相曝光在全体国民面前，这些药被批量下发到居民手里，不少情况下，对人体有害无益。另外一方面，在抗疫形势这么严峻，财政如此紧张情况下，吃菜要去垃圾箱翻找的上海市民却能每个人拿到几盒连花清瘟，这说明了什么？背后黑手占了多少便宜？

在质问中医药的路上，我牺牲了，马督工如今也步了我后尘，未来肯定还有其他人会付出代价，比如王思聪，比如丁香园，但我认为，这些人，这些平台在做有益民生，改变历史的工作，值得点赞。

感谢马督工，我不孤独，你也不孤独。

看以岭药业如何在未来的耻辱柱上腐朽吧!

6.06李佳琦悖论背后

中国“直播一哥”李佳琦出事了。6月3日晚上，李佳琦在直播售卖饼干的过程中，助手端上了一个冰淇淋蛋糕，镜头特写显示出，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坦克形状蛋糕，没几秒钟，直播中断。对这个“事故”，李佳琦先是发微博说，后台技术故障，让大家等一会，但一等就是两个小时，之后，李佳琦又发微博说，设备故障，直播无法继续。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自那时至今，李佳琦的直播还没有恢复。

很多粉丝还不明就里，这是怎么了，李佳琦的直播怎么会有这种故障，蹊跷。但稍微有点历史概念的人，只要把次日之间和坦克蛋糕联系起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李佳琦踩雷了，一个大雷。

6月4日前夜你端出了一坦克模型，你有什么暗示企图？这，才是掐断直播的人雷霆之问。就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别说坦克，你就是放个蜡烛也是大逆不道啊。事到如今，可能很多粉丝也醒过味来了，知

道，这坦克蛋糕的寓意太深了。然而1992年出生的李佳琦不知道，他的助理，他的团队都不知道，这就令人意外了。

如果李佳琦机缘巧合看过《王局拍案》，在我讲到“赛雷”事迹的时候，就应该明白，坦克这个符号在中国意味着极度敏感，点到就要被封杀。典型案例就是小粉红赛雷，一个本自诩为党的忠诚卫士的网红，因为历史类视频看得少，所以在剪辑视频过程中，竟然把33年前发生在天安门的“坦克人”视频剪进了公开播出的内容里，于是完蛋了。现在，李佳琦就是第二个赛雷。

最新消息显示，现在所有网站都接到了信息，关于李佳琦的报道全部删除，再到淘宝上搜索“李佳琦”，搜索结果没了，直播间也没有了，他推荐的那些商品也全都不见了，李佳琦前途未卜，大概率，“618”他也出不了直播了，他最好的命运是躲一段时间，韬光养晦后再悄悄地复出。

据说，有关部门对这件事情可谓“震怒”，因为这是高压线。要说作为直播一哥，李佳琦是不应该不了解这个政治常识。在每一年的六

月四日前后，你不能说天安门，不能在镜头前表示出负面情感，据说社交平台也会在当日取消更换头像功能，防止有人把头像变成黑白或者搞个敏感照片，以试图回忆什么，纪念什么。你想，这是多么严重的中国禁忌话题？

可问题是，李佳琦是1992年生人，他的粉丝多半比他更年轻，你要是不想让他们说，不想让他们无知，那你倒是给他们一点提示啊，比如，明确指出，八九、“6.4”是高压线，可悖论就在于，这个敏感信息不能告诉大家。反过来说，其实这只能充分说明，李佳琦是长在红旗下，两耳不闻政治事的。

这里我们来说一下这李佳琦的背景。他1992年出生于湖南岳阳，考入南昌大学，但没毕业就辍学了，去化妆品柜台当美容顾问，说白了就是销售，由于他比较勤奋投入，也很有营销天赋，在口红这一单品上销售十分突出，经常自己亲自试口红，所以2016年电商直播兴起后，他首先就以口红销售作为重点业务。一开始，李佳琦的直播优势也并不突出，但淘宝平台开始扶持直播up主之后，李佳琦的业绩就开始直线上升，平台广告软文给他带来的影响力有时候一夜之间暴增十

倍。逐渐有点名气之后，李佳琦从南昌转移到上海，开始专门做淘宝的带货直播，业绩飙升，到2018年时，他还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成为全球30秒之内可以涂口红最多的人，被称为“口红一哥”，2018年“双十一”的时候，他还跟马云连麦在网上卖口红，当然，他也赢了马云。到2019、2020年，李佳琦已经是直播一哥，直播间最高人数达到1.6亿人。

1.6亿，您想，世界上超过1.6亿人口的国家也不超过十个，李佳琦一张嘴，相当于对一个大国在说话，所以他可以在五分钟内卖掉1.5万只口红，说一句“上口红了，快抢”，秒光。他再说一句，“OMG。这个也太好看了”，又一个商品被抢光了。可以说，他是网络直播时代的弄潮儿，举手投足都是眼球经济。其实，他在政治上也算小心的，前几年他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上海，拿到了上海市户口，很快又当选了浦东人大代表，加入了上海市青联，获得了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两会时还上过《人民网》的人民会客厅，如果不是平时谨言慎行，这些称号也不会与他有关。可这些，都没有影响他碰到“八九”和“6.4”相关内容时，要被一举下线。

我的朋友们分析说，他这个坦克蛋糕上得的确蹊跷，他很可能是被人黑了，要么是自己团队内部的人有意黑他，要么是有人指使让内部人黑他，我觉得有道理。偏偏要在6月3日晚上端出很罕见的坦克造型的蛋糕放到直播间，你要说是无缘无故，谁信呢？显然，李佳琦事先知道的可能性不大，不是有意为之。

有人猜测李佳琦在为"6.4"伸张，那根本不可能。一个带货主播，他一年的利润都有几十亿，公司有几百个人，他可能冒着自己平台翻车前途尽毁的风险为政治事件表达主张吗？根本不可能。

别说李佳琦个体，就算是国际上的商业巨头也不可能为了历史事件去得罪全世界最大的客户群主宰者的。所以李佳琦事先肯定不知情。但是不知情也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李佳琦和淘宝平台被处罚是必然的。

其实，有关部门如果要彻底防范于未然，或者年轻人们想要防止出现李佳琦这样的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免疫接种啊，你先让大家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那么，对于不能说的内容，你只字不

说，是不是也就难免让人碰到禁区呢？其实李佳琦可能耳闻过“八九”，但他不知道细节，起码不知道坦克。他6月3日晚上没有说六四话题，但坦克也触犯了禁忌，人家不知道，你说责任在谁？

所以说李佳琦不懂敏感词这不是个悖论吗？你何曾告诉过他和他的粉丝们，什么是敏感词？他们没有机会通过正常的途径获知，我们的教科书和历史教材从来没有可能未来很长时间内也不会讲述1989年和"6.4"的事情，共产党内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只表示"89风波"过去了。

所以，李佳琦要是反抗，完全可以说，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坦克不能说不能做？你怎么能默认我知道呢？事实上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啊。这就是“李佳琦悖论”。

那“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让公众知道，这些词汇、内容不能被谈论呢？我想起了一个苏联笑话。内务部长说，哈哈，这笑话太好笑了，旁边人问，什么笑话？内务部长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刚判

了那个说这个笑话的人五年有期徒刑。这个笑话很好笑，但我说出来就犯法了。

还有，文革期间在北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恶毒攻击江青”的案子，是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的。说是文革后期有一天，学校突然把北大师生集合到五四广场去，听一个批斗。犯事的人是北大的青年教工，由于恶毒攻击江青，被抓捕判刑了，而且判得很重。底下人就嘀咕，这人是怎么个恶毒攻击法的，判那么重？台上人就说，这个恶毒程度不能重复，一旦重复就是对江青同志的不敬。所以，底下的人到底也没有搞清楚，这个教工是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直到四人帮被粉碎，这个人被放出来大家才搞清楚，原来，他写大字报的时候犯困，把“油炸反动派，打倒XXX，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写串行了，“油炸”后面写了江青，写错后他没太在意，把那张写错的纸扔到垃圾桶里面，结果被有心人发现，“油炸江青”，这还得了？马上上报，于是这人就成了反革命。所以，他虽然被判刑，但犯罪过程却不能被重复，否则重复的人也犯罪了。

黑色幽默吧？专制体制下，这种政治禁忌一脉相承的。这种悖论的打破只有一个时机，那就是时过境迁，专制主题发生了变更，而后任公开否认前任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获得部分事实。

比如说文革、大跃进、三年大饥馑，我们怎么得知真相的？是因为邓小平上台之后否定了毛泽东执政路线中这些内容，毛泽东在位的时候，谁敢评论这些是非？彭德怀在庐山的时候想讨论一下大跃进里有些瞎搞，不是立马被打成反革命了，发配到北京挂甲屯了吗？等毛去世，邓小平上台了，否定过去路线了，我们才敢说，其实三年自然灾害不是天灾。可即便如此，你能从各个渠道了解的真相也只是部分真相，不是全部。

文革结束之后，巴金多次呼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世永远记住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但他至死也没有获得回应，为什么？因为对文革的否定不能伤及到执政合法性。反思文革，除了反思个人崇拜毛泽东，反思党内的错误路线，很容易往前再迈一步，论及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合法性，这当然是邓小平也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邓小平在回答毛主席纪念堂会不会拆的问题时，他很肯定地说，不会拆，就放在那。记者问，你怎么看毛泽东？邓小平说，有人说“64开”，我说“73开”，而邓小平的心里，老毛到底几几开，不足为外人道也！他说“73开”，说因为这个话题会涉及到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不是来自于选举，是来自于论述，而论述是代代继承的。

所以你看，每年毛泽东诞辰纪念日都是轰轰烈烈的，每隔十年还会有一次大型纪念活动。前不久的毛泽东诞辰，习近平还发表讲话肯定其历史功绩，为什么？他不知道毛泽东后期的瞎胡闹乱折腾吗？他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被整得多惨他还不知道吗？保持对毛泽东唱赞歌就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彻底否认毛就否认了毛选里面各种对于执政合法性的论述，也更谈不上继承合法性了。

所以，共产党执政下的历史叙述，指向性是很明确的，都是为了论述执政合法性，对这个目的存在威胁的，就不能说，只有在下一阶段要开启新的历史时期时，他们才会用某种方式让你知道局部的真相。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公开讨论六四事件？只有等共产党内部

有影响力的人有自信否定六四，确定这种否定不会影响执政权威的时候，或者，是执政党被替换了之后，才能拿出来谈，看当时的视频，分析当时的一切。在此之前，“八九”“六四”“天安门”“坦克人”这些词就是绝不可以拿出来说的。

所以，李佳琦被封杀的原因不能说，因为他做了不能做的事情，但具体是什么事情，年轻的粉丝是不知道的，这表面看是非常荒诞的“李佳琦悖论”，背后是当局维护执政合法性的归因。

至今，李佳琦的许多粉丝还在懵圈，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坦克？为什么不能有坦克？哦，那为什么6月3日晚上不能出现坦克？

生活在信息茧房里的孩子们还不知道，自己能获知的信息都是被投喂的，真实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之间，有一堵墙，这堵墙阻碍了外面的信息进入国内。他们如果不翻越这堵墙，就不知道李佳琦猜雷的真实原因，也不会知道自己未来也有可能在那个莫妙奇妙的瞬间踩雷。

所以，如果你爱护身边的青少年或有好奇心但仍懵懂的中青年，你希望他们获知某些问题的真相，那么，告诉他们，有墙的存在，以及如何“翻墙”。

顺便插播广告：敬请订阅《王局拍案》，我会告诉你，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天，中国发生了什么。当然，这不能大张旗鼓地讲，否则，你又踩雷了。

6.9 “120”，救命还是害命？

最近，发生在河南一位女大学生呼叫“120急救车”但未得到及时相应而最终殒命的新闻让全网震惊。我们在节目里播放了女孩彭某君在呼叫“120”时与调度接线员的录音，相信，每个人都不寒而栗又愤慨无比。

电话里，这个女孩虚弱得已经是用尽全力在说话，结果接线员嫌她说不清楚，不配合，还在评价女孩“我感觉你没事啊！”“您这说的什么呢，乌拉乌拉的！”“您这么大的人了，能不能配合一下！”

用这样的语言接听病人的电话，这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接线员已经不止是丧失基本的职业素养，更可以说是毫无人道。而这个女孩子不是一般的病人，她已经处于应该被抢救的病危状态，是用尽全身力气拨打了这个电话，当时，是上午10点27分，然而她没有等到

“120”，直到2小时后同宿舍同学回到宿舍看到她的状态赶紧拨打

“120”，救护车在15分钟后抵达现场把她送上救护车送进icu，已经为时已晚，这个年轻的女孩最终因为脑出血未及时处置，撒手人寰。

最新的情况是，河南省郑州市经过专项调查，把郑州市急救中心这个叫张真颖的接线员开除了，她的领导被记过、警告。责任人是处理了，但事情的整体复盘却告诉我们，仅仅追责到个人是不够的，倘若我们止步于揪出一两个人来，那彭某君的故事说不定还会发生在另一个“120”事故上。

那么，这个事件折射了什么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接线员张真颖个人的同情心不够，她在面对一个人求救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一点体贴之心，关怀之意，而是不耐烦，是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冷得令人透彻心扉。那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吗？不仅如此，其实，我首先感知到的，是这个人的不耐烦不关心来自于她的不专业。这些所谓的接线员都是临时工，多数人的工资非常低，据说，河南郑州的120接线员每月薪资是三、四千块钱，都是合同制，也没有什么保障。当然，这并不是她就可以失去关怀之意、恻隐之心的理由。我要强调的是，在

一个身份决定论的社会，“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差异，可能有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差异那么大，这个差异内容既体现在薪酬待遇福利待遇上，也体现在彼此的心态、努力程度、专业性、服务态度和风险评估上。

比如他们的社保缴纳基数肯定是不一样的，企业社保和公务员社保最后反馈给同一工龄人的退休工资能差两三倍，甚至四倍，你的户籍等身份比你工作的努力程度要远远显性地体现在你的收入上。最明显的是“农民工”，他们不是工人，本质是农民，所以在很多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无论买房买车看病上学，都会有无数限制。仅仅从医疗保障这一项上，你就可以看出，人们的身份差异决定了所得的各种差异。这种差异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致于身处金字塔最底下的人除了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及其他。这是一个客观社会现实，所谓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反过来也成立。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社会恶性案件都是什么人做的？是社会底层看不到自己生活向好希望的人。他们长期地为生活忙碌，而所得寥寥，再看到成功者生活的遥不可及，有的心理不健康的人就会产生反社会

人格，走入畸形偏狭乃至极端的死胡同。你听本案中的120接线员，她几乎是对病人用有罪推定的方式来说话，“我感觉你没什么事啊”，她其实在毫无依据地揣测别人在没事找事。这种偏见哪里来的？这种毫无顾忌的不耐烦哪里来的？也许是她觉得，这份工作不至于要让她那么珍惜，拿出十足的感情和敬业度去对待。按照当下时髦的话，这就是摆烂，是摸鱼。反正她再努力，也就是三四千块钱。

所以我认为，开除一个临时工解决不了问题，要改变这样的悲剧，我们就要多想一想，如果”120“ 是救命的，而不是害命的，那么这个系统应该怎么工作。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么一组数字，我国“120”急救系统在院前急救过程中能够救活人的比例在全世界都是处于最低线的。最典型的是院前急救遇到的病人如果是“心脏骤停”情况的话，由于病人只有“黄金4分钟”，需要病人身边的人第一时间给他心肺复苏，同时救护车必须以最快时间赶到现场接力救助，并送入医院才有可能把病人救回来，否则即便心脏恢复跳动，但对病人大脑和心肌的损伤太大，愈后（效果）是很差的。根据郑州市急救中心的记录，发生在120急救系统中，

被救治成活的心脏骤停患者仅有0.56%，也就是说差不多每200个人中间才能救活一个人。

郑州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人口众多，说它是二线城市也可以，就这个心肺复苏存活率实在有点低，那么首善之都北京呢？北京平均是1%，也不高，跟国际上大城市做一个对比吧：华盛顿是44%，日本平均水平在8%左右，我国台湾地区呢，因为有的区域偏远，所以在1%到7.2%之间浮动，丹麦等北欧国家，平均在14%到18%。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咱们落后得不是一点点。

那我们国家的院前急救水平为什么这么低？，除了服务态度，其实更核心的问题在这个“系统工程”里，需要几个环节共同构成。以心脏骤停案例来说，在各个城市的急救中心，他们要处理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紧急呼叫系统，也就是120接线系统，接线员必须第一时间判断病情，了解病人所在的具体位置，然后马上调度车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时间越快，患者心脏复苏的概率就越大。

在河南大学彭某君的时间上，接线员张真颖实际上根本没有病情判断能力，当她发现病人本身求救且无法持续清晰讲话的时候，她的指导是“不要用嘴巴呼吸，用鼻子呼吸”，后面就因为自己觉得“你没什么事”来训斥病人不够配合。这充分说明，她绝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并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在得不到宿舍房间号的时候，她没有调动车辆前往河南大学，因为她觉得病人问题根本不严重，而跑一趟空车对她的处罚可能才重。张真颖这个电话，我听到后不仅仅是愤怒，还有悲哀，如果病人打到急救中心的每一个电话都面对的是这样的调度人员，你还能指望他们在电话里给你什么专业指导吗？

其次，当调度员把接力棒传给各个医疗点的急救车，那就需要急救点的医生、驾驶员、担架工火速出车，在车上就准备好设备并想好最近距离的专业性医院。这过程中，需要急救医生精明强干，团队配合出色，就近送医顺畅，任何一个环节跟不上，心肺复苏就会失败。

我们国家低得可怕的救治存活率说明什么？说明掉链子的地方可能不少。

就这个院前急救系统，其实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环节也并不一样，以中日作为比较案例。日本和中国在院前急救上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救护车上的人不是急救医生，而是接受过急救专业训练的消防员。日本每个社区里都有消防队，他们配备的车辆除了消防车还有救护车。所有消防员除了兵贵神速的特长，还有被长期培训和反复操练的心肺复苏技能，从而保证争分夺秒以及心脏除颤的及时达成。用这个消防员模式的，还有很多国家。而另外一套院前急救系统就是中国这样的，救护车在医院驻点，由急救中心对医院提出人员配备和医疗设备配备指标。这两种体系，前一种理念是我们尽快地把病人送到医院去，在那里进行急危重症的判断和抢救诊疗，后一种理念是尽快让病人接触到医务人员。这两种模式很难说孰优孰劣。

但是为什么中国院前急救的数据跟日本比起来相差这么多呢，这是因为中国院前急救系统的医生是整个医疗系统里最下游的岗位，这个工作貌似非常重要，但社会地位却很低，因为在医疗线上，离开了临床，就难以有科研课题和临床上工作机会，日复一日处理的是“二传手”的工作，病人只在他们身边停留一趟车程的时间，然后就转移到急

诊系统去了，急诊医生的疾病诊疗能力是难以持续提升，原来所学的医疗知识无法操练，由此也难以晋升，原来从事外科系统工作的医生更是没有手术机会，专业都相当于被废弃了。所以，医院里的人都知道，急诊医生难招聘，而院前急救医生更难招聘，没人愿意干，留不住人。于是招聘院前急救医生的条件就每况愈下，基本上，临床做不好，或者出过什么问题本来就很难晋升的人才去干，这个岗位渐渐似乎和医务人员脱钩了，变成了一个类行政人员。

另外一方面，由于院前急救普遍收入低，医生在接病人的过程中，本来应该是按照就近、就急原则和疾病专业处理原则来送病人的，可有的医院因为缺病源，就向“120”系统给予回扣机制，所以，当病人的疾病程度被急救医生判断为并不紧急的时候，他们就会动用送人的权利，把人送到有好处可拿的医院。这个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躺在救护车上的患者成了急救医生那外快的工具。

再者，本来就能力不济、心猿意马的急救人，还要面对怎样的工作环境呢？依然用比较的方法。发达国家里，每个紧急救助人员大约要给一万人提供服务，而我们国家是平均每个人给十一万人提供服

务，您想，救护车的出车工作量是不是有点多？如果在城市交通拥挤的高峰，是不是能让接线员调度的车辆很少？美国救护车是要求病人打电话八分钟之内，救护车必须赶到现场，而我们国家的急救电话，打完要等多久，完全看你运气，有时候调度员会告诉你，目前没有车，需要等多久我也不知道。在河南郑州这个案例里面，彭的同学第二次给“120”打电话后，他们在宿舍里等了多久呢？15分钟。这对脑出血病人来说，就是一个抢救时机逐渐失去的过程。而这样的等待在中国，并不鲜见。

您想，在这种背景下，“120”的救治率能上去吗？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互害的社会”，一部分人受到不公之后，会把另外一种不公强加于他人，以此来拿回一些他认为本该取得的利益。而中国的“120”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的范例。

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在彭某君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之外，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本该就近、快捷和专业的治疗。而开除一个临时工，能对这种恶劣局面改变多少？

彭某君走了，她很不幸，罹患凶险的脑出血，但更不幸的是，她呼救的对象是一个无能无情的“120”接线员，在她神志清醒的最后时刻，她听到的不是帮助，而是“训斥”。她最终，无力留在这非人的世界。

6.14 健康码变身电子镣铐

在之前的节目《王局恶意返乡记》里，我曾预言，健康码很有可能变成国内各级政府控制普通人的电子镣铐，话音未落，一语成谶。

这几天，河南一些村镇银行的储户们爆料，当他们想去郑州找那些银行沟通“取款难”问题时，发现在扫码填报个人信息后，其场所码或河南当地的“豫康码”显示为“红码”，赋码原因是说他们属于“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而跟他们一起去郑州，但不是银行储蓄客户的人却还是绿码，这就奇怪了。难道，就因为要去银行维权，健康码就变色了吗？而且，还比较神奇的是，有些没去郑州，但想维权的储户在填报信息后发现，自己也变“红码”了。

储户们当然觉得，事情蹊跷。这麻烦事要从两个月之前开始讲起。2022年4月，河南有多家村镇银行因遇到资金危机，无法提供取款

服务。而这些村镇银行的储户不仅仅是本地人，还有大量全国各地的人，因为这些村镇银行开通的是互联网业务，一开始通过APP或者第三方存款银行平台拉银行存款，后来第三方平台转存款业务被国家叫停，就只用"APP"吸引储户。在这些银行打出去的广告里，比较吸引人的两点是：一、利息比支付宝高出20%左右。这个利息差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个诱饵；二、存满7天即可提取，这两个优势叠加，就吸引了不少外地储户。但是到了今年4月15日，当大家发现七天已到，而存款取不出来的时候，各地储户一下都着急了。

事后据有关部门调查，这起事件一共涉及到全国5家村镇银行，其中4家在河南，涉及储户有几十万人，总金额大概有400亿。这个数字是相当巨大，无论储蓄的是几万块还是几百万的人，这可能都是倾其所有，甚至是拼拼凑凑放进银行的，如果这些钱血本无归，那这几十万多数是社会底层的储户可不是要急红眼吗？据说，按照河南4家村镇银行的政策，他们首先断掉了外地储户的取钱路径，给本地储户留了每人每天5万块钱的取款额度。那外地储户的钱去哪儿了呢？据说，钱实际上没有停留在河南这四家村镇银行，而是通过另外一家公司转

了出去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去了。由于非法金融活动被查处，案件正在侦办，于是村镇银行就把外地储户的取款之路给断了。

更能耐的是，这些银行不仅断了互联网上的取款道路，连人家巴巴地赶到郑州后的维权之路也断了，怎么断？赋红码。

由于外地储户颗粒无收，焦虑的人们开始集体到河南去上访，这就演变成了一个群体性事件。要最快速地平息这群体事件，让储户就地止步，河南省政法委的官员们想到了当下最有效的禁足方式：管住储户的健康码。现在国内媒体已经曝光，储户们有三种情况会收到红码：一是从郑州的两个火车站下车后，在来访人员登记码环节，储户一扫，红码；二是扫了四家村镇银行门口的场所码，填写登记信息后，场所码、健康码变红；三是有当地的派出所给储户打电话确认，你是否已抵达郑州或开封，一旦确认，也变红了。

说实话，这种赋红码的逻辑大家都能一眼看出来，太露骨了。储户当然不干了，曝光给新闻媒体后，《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都开始刊发了。即便新浪微博不停地删帖，了不起的《第一财经日报》仍然

坚持，删一次发一次，再删一次，再发一次，我觉得，他们真了不起。

因为这件事情的性质还是非常严重的，曝光出来不但触动了某些人的巨大利益，同时可能酿成社会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媒体这么坚持跟河南的有关部门作对，风险非常大。由此我也想说，很多留在国内坚持凿壁偷光，用点滴之力试图慢慢改变不公，为民众争取权益，他们都是大写的人。今天的《第一财经日报》能如此坚韧地履行一个媒体的职责，我们应该为他们点赞。

事情引发舆情发酵后，河南12345接受采访说他们没有从后台给人赋红码，他们完全莫名其妙。可信吗？有很多储户，根本没有到过任何疫区，自己所在城市也没有一例阳性，他们的健康码颜色转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释？如果不是有人后台操作，那么你们敢公开所有的后台信息吗？我猜他们不敢。

利用防疫健康码控制储户去要回自己的权益、自己的资产，这太卑鄙了！

但是我对此并不意外。因为这种现象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过去也有，只是没有这么大张旗鼓。

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进京上访的情况。信访，一直是国家严管的事情，但也分事情的性质、层级。如果是一般性案子，比如到北京告地方上的状，控制关口是设在地方政府，北京一般是不管的。唯独有个例外是，假设上访人员去的地方比较敏感，在两个派出所被登记的话，麻烦就大了。这两个派出所分别是天安门派出所和府右街派出所，前者说明你在天安门"闹事"了，性质非常恶劣，后者说明你去了中南海，也很严重。

为了防止信访人员到国家的“门脸”去“闹事”，给中央领导添堵，有关部门就在中南海设在长安街上的南门口设了一个便衣岗。你如果是有心，可以去观察，中南海南门口的一条白线上常年有一个便衣在转悠，马路边上也常年驻留着一辆安着空调的警车，他们的使命就是防止访民到中南海前去上访。这，也是一种小规模截访模式。

如果访民不明就里被截到了前面说到的这两个派出所，都要被送到北京南面的马家楼收容站，同时通知各地政府来领人，而各地政府当然会把这种情形的上访人员打入另册，从此，他的身份证信息就会被“特别关照”，以后这人再到北京，只要一用到身份证，公安机关的后台就会报警。

除了上访人员，还有一类人的身份信息也是被打上符号的，那就是吸毒人员。一旦这些人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过，他们在公共场所一刷身份证，后台也会报警，标注着此人是吸毒人员，几分钟后公安机关就会来找。这也就造成吸毒人员要想重返社会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他取不下这个后台的标签，撤销不掉身份报警信息。

用后台数据处理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行动，这些都是很早就开始操作的，而“赋红码”这个新鲜出炉的控制方式与之相比，涉及人员可是要庞大得多，这是属于批量操作，效果显著。但它们的本质都是雷同的。

不过，今天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在于，赋码的权限级别比公安低多了，涉及疫情防控的部门和大数据处理单位就可以赋码。他们鼠标一点，键盘一动，就让维权的储户吃不了饭店，住不了酒店，进不了银行，他只能满大街溜达了。你想想，这招确实太有用了，太恶毒了。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舆论哗然，连平时叼盘的胡锡进都不叼了，说这是违反防疫法规的，要是这么搞，那是极大地损害了普通老百姓对防疫政策的认可，也挑战了政府的公信力。"胡式语言"虽不尖锐，但他站都出来表态，可见此事有多么触犯底线？

我在胡锡进的基础上再给大家普法吧：其实，健康码、场所码本身就违法，它们都是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被政府以防疫的名义搞起来的，目的就是限制人的自由流动。你去翻看中国的法律，有哪条是可以说明，政府设置这样的管控行为是合法的？没有。

其次，健康码被滥用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它太好用了！而权力的行使者本身都有自利的冲动，中国的国家体制让国家机器享有了不

受约束的自由，赋码也好，入户消杀也好，这种没有授权没有程序正义的政府要求，就是在示范权力的为所欲为。

比如我回乡在洛阳有一天突然天降红码，谁能给我解释？我通过什么程序申诉，我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统统没有答案，作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当事人，我还只能求爷爷告奶奶央求他们把我的码变成绿码，否则我就回不去北京。

所以说，其实不仅仅是那些储，今天的中国人全都面临着同样的境地：你得不到真正的行动自由，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储户"，是沉默的任人宰割的羔羊。

没有被关在笼子里的权力是势必要滥用权力伤人的，这是一个亘古不变、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像《1984》那本书里呈现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它的预言靠近。最终，这个国家的人群分为核心党员、一般党员、普通百姓，其中普通百姓占85%，核心党员占2%，外围党员占13%，我们通过和平部负责战争，让富裕部负责经济，又真理部负责宣传。

同时，我们肉眼可见，“科技”“大数据”让这个进程变得更快捷了，《1984》，或许很快就成为了我们的未来。

【后记】2022年6月22日，郑州市纪委监委表示，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团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下令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此外上述人员安排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赵勇，市大数据局科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健康码管理组组长陈冲，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耀环，对储户在郑扫码人员赋红码。据统计，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其中446人是入郑扫场所码被赋红码，871人是未在郑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红码。郑州市纪委监委决定撤销冯献彬中共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张琳琳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给予陈冲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杨耀环、赵勇政务记过处分。

以上处分在民间被谈笑为“自罚薄酒一杯”，对于如此典型的滥用职权行为，有关部门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让权力机构得到的是作恶成本很低的信号，故而，后期河南省7月初再次爆出多名储户被赋红码以及烂尾楼维权业主被赋红码事件。

6.15 吴晓波被禁言，内容创业已死

吴晓波被禁言了。

突然发现，我的很多节目都在说谁谁谁被禁言了，几乎可以说是系列剧了，当然，他们的身份完全不同，有的互之间还是论敌，被禁言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触及了“真理部”的接受度。如果这样的节目还不断持续，那姑且我就把这系列剧当做国内同类社会性死亡的一个纪念碑吧。

今天说到的是吴晓波。此人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不算顶流，但在江浙一带非常知名，是很多财经、民营企业、房地产论坛的座上嘉宾，在浙商中非常有影响力。他的主要角色是一名财经作家，早年最著名的作品是一本叫《激荡30年》的书，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史做了一个概览，可读性很强。之后他又写了《大败局》，是

描述民营企业家创业失败的故事，两本书在国内的MBA课堂过程中经常被当做经典来读。

在我看来，吴晓波所描述的30年里企业家的创业史跟改革开放大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每个民营企业家的个人奋斗史无不伴随着政治的开放性，也影响着改革开放后国运兴隆的每一个步骤。这两本书，我也推荐大家一读。

吴晓波被禁言的原因众说纷纭，如果他最后一篇公众号是一个依据，那么这个日子是6月2日，6月3日吴晓波停更了，也可能，是发不了文章了。而这个时间节点，按照众所周知的原因，是敏感期。但他微博已经很早就没有更新了，所以具体他被有关部门动手的时间和理由就不确定了。他的微信公众号也还能读，所以乐观地看，他很可能只是被捂住嘴一段时间，也许是一个警告。

但从他在企业界、财经界的影响力来说，哪怕吴晓波仅仅是暂时性的被禁言，这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什么？有传言说，吴晓波惹祸的文章是5月6日的公众号文章，名字叫《我们怎么了》。这篇文章

现在已经被平台删除了，但国外互联网有人专门收藏这些被国内封杀的文章，所以我就有机会看到，读了一下。

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文章一开始先讲了一个姓马的人，没有说出具体名字，就说这马某是个企业家，辗转托人邀请他吃顿饭，之后他可能要去加拿大了。而去国离乡的原因是对国内丧失了信心。文章就从这个话题说起，谈企业家对国内形式陆续失去信心的原委。其中，有两个数字非常醒目，一是中美两国独角兽企业的比较数字，以2015年为分水岭，之前中国数据占上风，但之后，尤其是2019到2020年，中国数字直线下降，而美国持续增长。独角兽企业是否蓬勃，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活力是否正向，持续性的大幅下滑显然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性、经济活力在下降。吴晓波讲的另外一个数字是头部企业市值的变化。几年前，阿里、腾讯、百度这几家企业的市值加起来，跟苹果公司相当，但几年过去，苹果的市值继续上涨，而中国这几家企业的市值却在大幅下降。现在，它们三家就算再加上中国在美上市的其他44家高科技企业市值加起来，还比苹果一家少一万多亿。

所以，吴晓波提出一个财经界人士共同的疑惑：中国企业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整个经济体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一个14亿人的市场，如果不瞎折腾，超过美国指日可待，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些指标却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吴晓波提出了他的看法：中国在两次历史转折的时候，也进行了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左右，还有一次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的时候，经济增长和思想解放相伴相生，而后者显然推动了前者。而现在，中国还能搞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来提振经济吗？他说，非常非常难。而像马某那样的企业家对中国的前途已经意兴阑珊，准备用脚投票。所以，吴晓波感叹，这些企业家初创业时或许仅仅为原始积累，但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会抵达马斯洛最高需求层次，希望自我挑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可如今我们的社会是否给予这些企业家这些机会吗？没有，企业家的荣誉感、参与感在被剥夺，营商环境在恶化，他们身上的正面影响力在被削弱。而自

古起来，让企业家得到信任是很难的，让他们失去这种信任却非常容易.....

我觉得吴晓波提出了真问题，文章写得很好，可以说是他近期创作中非常优秀的一篇。你还别说，"有关部门"还挺有见识，它精准地卡主了创作者最经典的作品，"咔嚓"掉了。当然，吴晓波本次被迫失语，是不是就是这篇文章的缘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篇提出真问题的佳作被删除，意味着一个路径的终点，什么路径？知识付费、内容创业。

倒退10年前，吴晓波，还包括现在得道CEO罗胖罗振宇都是中国探索知识付费的先行者，罗胖通过《罗辑思维》迅速积累了大量的粉丝，从《每天一分钟》的微信公众号开始，做成一个大IP。吴晓波可能口才逊色于罗胖，但他的文章始终有大量受众，所以《吴晓波频道》也是知识付费的南方龙头。罗胖将《罗辑思维》提升为"得到"平台后，除了他自己，还吸纳了大量提供内容创业的专家在上面开课，而吴晓波基本还是自己做，他们两种"知识价值的变现"都挺成功。很多年前，当吴晓波频道会员年费是168元的时候，当时已经有几十万用

户的订阅，所以仅这一部分付费订阅的收入都有几千万，应该说是相当成功了。

2019年，这两个知识付费的头部企业都曾想上市，吴晓波想通过全通教育借壳上市，当时他拿到了十五亿左右的估值，《罗辑思维》2019年接受上市辅导，试图2020年再冲击上市，但是，很遗憾，这两家企业上市都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大家回头去看2020年这个年份，它是个分水岭，除了疫情因素，对这两家公司而言，其实但是更关键的因素是，有关部门对内容的管控变得空前严格。

疫情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效果，是给政府一个相对极端的环境，让它在面对类似“防控”这种想要一边倒言论，不允许任何质疑的时候用最强大的舆论干预大棒。所以，伴随着疫情防空洞在整个社会受到的反弹和质疑，他们的舆论管控也在层层加码。时至今日，言论市场上的空前管制也基本到了强迫“静默”的程度了吧？

君不见，新闻领域内像我这样紧跟社会热点做报道的媒体人必然首先挨刀，而接下来，这个节奏从传统媒体慢慢扩散到自媒体，新浪

微博内大V"尸横遍野", 过去有影响力的公知基本都已经被迫销声匿迹了, 如果还苟活着, 可能也就是卖货吆喝, 要么就是老老实实做鼓掌派, 除此之外, 哪里还有什么活路?

再往外扩展, 知识付费平台、内容分享平台也已经首到广泛波及。我所了解的数字是: “得到”平台自2020年之后经营数字大幅下滑。本来, 疫情期间正是大家被关在家中出不去, 可以上线听课的好时机, 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 这怎么解释? 在我看来, 就是因为内容管控已经波及到这些领域, 很多知识天然就带着某种属性, 如果和当局提倡的方向不一致, 那一样会被审查掉。

拿经济学来说, 说产权制度就要讲到政府必须尊重产权, 如此才能构建整个现代经济体系, 这和当下的现实不是犯冲吗? 讲法学, 你看罗翔为什么在B站火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却退出微博? 尽管他本人否认, 但你可以想象, 他怎么在微博上分享现实案例和刑法的不对位? 他难道不愿意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吗? 当然想, 可敢说真话吗? 《刑法》里的条条内容如果说清楚了, 在当权者看来, 都是对他们的非难。所以, 刑法是书面上的刑法, 而现实是人治

的现实。所以罗翔知道，最大的法，是领导的看法。他讲到贩卖妇女量刑的时候说，在座的女同学们，你们知道在我们国家贩卖妇女要判几年吗？你知道贩卖一只熊猫判几年吗？你们可能不知道，贩卖女性还不如卖一只熊猫判得重。他能再多讲我们国家法律内部的荒谬性吗？

讲医学，这科普应该不犯忌吧？犯。因为有中医中药，你不能问我们国家中药怎么上市的，不能说中医不行，中药不行。当你讲临床医学，讲到一个药物上市前必须做三级临床，安全性、动物实验、有效性实验，其中有效性实验做的过程中还必须是双盲的、随机的、多中心的。等你把这些讲完，听众就会恍然大悟，哦，那我们中药怎么不遵循这种方式呢？是不愿意做，还是做了会起反作用呢？

所以，知识，不是一个没有属性的东西，当你把所有知识说到极致，十有八九会对照出我们当下的问题，因此，传道受业解惑走到最后都是政治。在中国，知识的尽头就是政治，所以，你明白了吧？所谓的知识付费，内容创业还能走多远呢？

我们的政治已经无法接纳知识秉承着专业属性走下去了，接下来的内容创业要么泛泛而谈，只做浅显的普及性的知识，但受众会感觉不解渴，不买单，要么你继续往纵深走，就必然进入到禁区、雷区，轻则像吴晓波一样被删掉自己的作品，重则因言获罪，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就是今天所有中国知识付费工作者、内容创业工作者面临的困境，路越来越窄，即便活着，也越来越没有意义。我就是先例。

吴晓波就算重新出现，你以为他还能畅所欲言，把自己的真实知识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吗？有这个心，恐怕也没这个胆了。他不可能再复刻2019年之前的辉煌了。

前两天推特上有人预言说罗胖曾经把他的跨年演讲入场券一次性卖了20年的，可能他不一定能搞得到20年。我同意。吴晓波、罗胖至今一直在搞跨年演讲，但我不相信他们能持续搞下去。不是他们不想做，是因为知识的尽头是政治，而政治话题的空间越来越小。

很多人说，王局你天天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让人绝望，怎么办呢？

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我给大家指的路就是能出来就尽量出来，到自由平台来做事业，到YouTube上做内容。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个人已经在给国内的内容创业者们趟一条路。我觉得，YouTube上中文的有价值信息是极度稀缺的，境内有水平的人有的不想出来，有的不敢出来，不敢出来的人之所以不敢，一方面是因为人在境内，在YouTube上做内容肯定会被有关部门弄成寻衅滋事，另外一点是担心海外华人群体数量太少，不足以支持他们的内容创作。我想说的是，这个担心可能是个误解。海外华人数量虽少，但整体需求强劲，如果你真的有料，在YouTube上认真做节目，未见得不能让你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所以我呼吁国内那些真正有水平的人尽早出来吧，那块土地可能真的不值得留恋。

毕竟，在YouTube上做节目，除了赚钱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价值——自由：再也没有人审查你的内容了，再也没有人问你的导向是什么了，你只要遵循你的内心，说出你所知道的知识，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生活方式吗。这本身就有着至高无上的价值，不是吗？

6.18滥权者反被钓鱼

自从有了低成本的自媒体短视频，我们就看到了不少鲜活的社会生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哈尔滨兄弟发在网络上的一个黑色幽默故事：钓鱼执法者反被钓。

什么叫钓鱼执法？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执法人员为了给已经瞄上的可能违法者设套，自己或唆使他人去试探引诱对方触犯法律法规。如果被设计的人中计违法，那就由执法人员亮明身份将对方绳之以法。在国内，我们听到最多的钓鱼执法案例是诱捕黑车。

而哈尔滨的这个事件最后却出现了大反转，执法者被他想治的“黑车”车主设了个套反手一击。

事情是这样的：6月11日晚上10点半左右，哈尔滨一个网约车司机接到一个订单，乘客上车后一身酒气，面色潮红，显然是喝高了。回

家途中，这名乘客提出想在车里抽烟，司机一口回绝，说网约车属于公共交通工具，车内抽烟是法律禁止的。乘客一听不高兴了，摆出架势问司机：你有证吗？有网约车的运营资格证吗？司机说没有，乘客一听，好，没证，就犯在我手里了，你车子开到我们执法站去吧。

网约车司机没有惊慌，他照做不误的同时，用监控录下了全过程：乘客很自得地用手机免提呼叫他的执法同事，说：“有个小黑车，载我回家还不让我抽烟，那我收拾他就完了呗”。整个骚操作他自认为是行云流水。布置好的接头的执法人员，他又回头跟司机很带劲地强调：“办你”，“你真狗了啊，一会儿让你认识认识我”。他让司机认识他的方式首先是在车上就问执法人员黑车怎么罚，电话里回答说5千到2万，他马上说，叫两个人回站给开罚单，直接顶格，“签他2万的罚款”。

要说平时想看这种类型的执法嘴脸还挺难，这次网约车小哥拍得非常全面，喝高的执法人员压根没把法律要求的程序当回事，权力在他手里似乎就是个面团，他想捏圆就捏圆，想堆成方就变方，估计平日里作威作福居高临下惯了，此刻哪容得下别人说个“不”字儿。

半小时后，网约“小黑车”抵达执法站，司机的灵活机动性也不一般，他也叫来了自己的一个同伴去执法站跟他汇合，现场他全部用手机录下，还配合解说录制：到场的两个警察一个穿着制服，一个没穿全制服，把他引到执法站的乘客没有制服和工号显示，顶多能叫他是“举报的热心市民”。最绝的是，这司机拿出了自己的所有证件，一应俱全，完全合法。

这下本来想要让司机“认识认识”的“热心市民”恼怒了，搞了半天，“你欺骗我”？

这网约车司机不简单，不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得滴水不漏，伪装到最后胜利过关，而且实实在在懂法律，他知道执法的时候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在场，执法的时候必须着制服，出示证件，没有证件他就不认，而且所有执法程序他都非常熟知，对在车上抽烟违法的法律依据也很了解。于是当晚，这个想把别人给办了的执法人员只能气咻咻地听司机笑话他，你这属于无效举报。

事情的后续是：第二天，打车想抽烟的那个执法者酒醒了，主动要约司机。不过网约车小哥原则性很强，说他正在搜集证据，针对被钓鱼执法的事情要打电话报警。这回，话术反过来了，轮到网约车司机说了，“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法制社会”。他明确说，抖音、媒体和各个大群上，很快就会出现他们头一晚的黑色幽默视频。

说到做到，网约车小哥把录制的视频放网上了。因为素材罕见又精彩，这视频传播速度很快，影响力也不一般。6月13日，也就是第三天下午，当地针对网约车司机实名举报钓鱼执法的事件做出回应：哈尔滨松北区对区交通局运管站相关人员执法不规范等问题进行严肃查处，9人被处理。抽烟乘客为松北区交通局借用人员杨云博，已作出清退处理。而帮他“打击报复”的现场两名执法人员周兴旺、钟晨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执法岗位。

这还没完。事情闹大之后，网友对司机的视频进行了深入研究，竟然又找出了另外一些不同凡响之处，协助“办人”的执法人员周兴旺在视频中所佩戴的手表和所用手机非常惊艳：手机是华为新折叠款，价值一万九，而他手表更是2020版劳力士绿水鬼，公开售价14万。一

个普通的执法人员如何用得起这么昂贵的东西？于是，大量热心市民开始再次向纪委举报。

一支烟引发的9公职人员违规事件，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很多启发。

其实想要办了网约车司机的三个执法人员，就当晚的事件来说，把他们定义为钓鱼执法还不是很恰当。他们实际上是公权滥用。在他们眼里，权力就是他们这个圈子的，冒犯一个人大家就可以合伙收拾你，什么程序什么公共场所不得吸烟的法规，在他们眼里都不是事。公家给他们制服，他就觉得拿到了相关的权力，他们可以基于自己的主观去随意行使，所以，这是比钓鱼执法性质更为恶劣的公权力滥用。

何谓公权？那就是基于完成公共目的的权力，不属于任何个体，如果被个人自行摆弄任意解读，那公民面对执法人员的时候是完全不可能有机会据理力争了，就好像本案中想要顶格罚款的执法人员一样，处理原则只凭着他们的意念，所以如果过程中你冒犯了他,他就可

以把公权力以个人理解的方式施加于人。那这样的话我们普通人还敢全力申辩吗？肯定是不敢，因为对方可能由于你的不服而给你加码处罚，让你更倒霉。

不过本案中的网约车司机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那就是对这些公权力的行使者，首先知己知彼，要熟知他们的工作程序和合法性要求，再以巧妙的方式进行监督：不必和盘托出，你们可以钓鱼，我也可以隐蔽，因为我没有义务给一个不在正常程序上的执法者任何答案。其次，保护自己还应该留下证据，能录像录音最好，而且网约车录像是平台和法律支持的行为，所以执法人员也就没有依据去处理那位小哥，反过来，想抽烟的那个乘客丑恶言行都被记录下来。

其实，我们做记者的时候，也经常用这一招，先不暴露身份，给知法犯法者设套。比如河北省曾经有一个制假、贩假基地，把滑石粉当作豆粉往豆腐皮里面掺，这样煮出来的豆腐皮韧性好，不容易烂，但想想滑石粉对人体健康是多大危害？于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就先冒充他们同行到那去买那种滑石粉，偷拍完后，记者四处转悠了一

下，发现这种制假贩假不止一处，整个村子到处都是，这就让人不免想到，难道当地政府不知情吗？如果知情那为什么不制止呢？记者判断，政府很有可能默许了这些制假贩假窝点的存在。为了验证这点，他们就设了一个套，用摄像机对准村里的大喇叭，同时给当地宣传部门打电话，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了解到你们某村有造假窝点，准备去采访，我们提前跟你们说一声。放下电话没几分钟，村里的大喇叭果然就开始广播了：“各家各户注意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马上要来了，把你们各个点的东西(滑石粉)都赶紧收拾起来，要不然被中央电视台记者拍下来，你们就完了。”这段喇叭里的紧急通知被全程拍摄了下来，放在了片子的最后。你想，多么具有讽刺意义？

所以，再看到网约车司机的巧妙处理，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借鉴，对于那些不法执法者来说，设套并记录下来是对他们最好的监督方式。

以前，只有记者有拍摄的设备和技术，有播出平台，而现在，人人手里都有麦克风，有手机，每个人都可以做《焦点访谈》里的记者去曝光丑恶现象，而且可播放的平台也有很多，抖音、微信、快手等

等，只要你的内容真实又是猛料，那么被曝光者肯定很快就会成为舆论热点，如此也必然倒逼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科技、互联网让大家的维权门槛大大降低，成本也大大降低，你的曝光视频随时可以媲美《焦点访谈》成为当下热议话题。

因此，哈尔滨网约车的案子总的来说给大家三点启示：要懂法、要有策略，要会取证。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权益不容他人践踏，而不是看见制服就唯唯诺诺。如果每个公民都觉醒了，还有这样的知识点和技能，那么那些认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跟官爷叫板就属于螳臂当车的人，也会收敛很多。你也完全可以像这个网约车小哥一样，对耍狠的执法者回答“不用跟我五马长枪，我懂法守法，你查吧，我不怕你”！

权力面前，我们照样不做冤种！

6.19唐山的荒唐

唐山打人事件令人发指，堪称人神共愤，这事情是非太明确，本来也没什么好说的，把凶手和同党们查个底儿掉才是正道，可这两天，唐山市政府的一些骚操作让这个新闻热度居高不下了，他们干了什么呢？最大的动作是微博辟谣的同时，宣布封禁了几百个账号，理由是这些账号在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后传播谣言。

谣言是什么？是有人微博上说四个女孩中死了三个，另一个生死不明。有关部门站出来说了，四个女孩伤势都不重，有两个都没住院，所以，针对夸大其词的造谣人员，唐山恼了，掷地有声地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然后就对几百个账号痛下杀手。

这工作效率倒是高，办普通老百姓的社交账号一点不带犹豫的。可是你为啥不站出来早点把事情痛痛快快说清楚呢？这样谣言不攻自破，还需要你们去费心思去收拾不明真相的造谣人员？

对于唐山事件，我想公众无人不关心，因为网上公布的视频，除了全程彰显了凶手的无法无天之外，还有很多疑问，很多不解，大家都想知道。

比如说，这四个女孩的伤势到底如何？现在没人知道。这被打的四个女孩没有被采访过，有关部门说挨打最严重的人病得严重，那其他人呢？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吗？有两个是轻伤，没住院，那轻伤人员为什么没有接受采访陈述事实？那几个打人的被抓起来了，审讯过程中暂时不能接受采访，这个可以理解，可女孩们是受害者，又不是犯罪嫌疑人，怎么不能出来说话呢？是她们怕事不愿意，还是政府不让？现在网络上除了猜测，也送到了唐山把很大人力用在“防民之口”上，有人去医院送花，警方也是严阵以待，要问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送花？恨不得把关心女孩的市民当犯罪嫌疑人来排查，女孩们要是想对外说话，估计也没途径了吧？更可笑的是，打人的家属倒是出来喊冤了，说我们是好人，是老实人，可经不起这些。滑天下之大稽。

第二，现场还有很多信息没搞清楚，所以大家肯定会猜疑了。最主要的是视频最后那个小巷子里头也是打人的地方，但是没有录像公

布出来，那大家更要了解清楚巷子里面还有没有恶劣事情发生。

第三，现场老板娘后来被网暴，很多人说她不拉架，是不是和打人这帮有关系？到底是胆子小，还是和稀泥？这也得给人家说清楚，否则老板娘也是要继续遭无妄之灾。

第三，现在已经抓了9个涉案人员，审了一周多了，有没有什么可以披露的信息让公众了解情况？这么大的事情，快十天了，唐山市政府怎么连个新闻发布会都没有？

难以理解唐山市政府的沉默和用力用在捂嘴动作上。你们自己不说实情，对于讨论这个话题，但不明真相的人又下封口令说是造谣，你倒是说说，在这个案子里，你们工作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

说到封口，唐山不只是对老百姓的账号下手。前几天，贵州电视台《百姓关注》的记者到唐山去采访，唐山市政府严阵以待，给人家的不是一般的闭门羹，而是像剿匪一样地威逼恐吓。我倒是奇怪了，人家贵州电视台的栏目本来就是做这种社会题材的，你们这儿出了热点新闻，他们作为正规媒体去报道真相，给你们一个澄清谣言的机

会，说清楚来龙去脉怎么不对了？记者去采访这样的题材不仅是应该的，而且可以说是必要的，可是大家看看，自从唐山事件发生以来，网络上除了一片猜测，有媒体报道刊发出来吗？没有。是人家媒体不去采访吗？当然不是，从贵州记者身上，你就可以看到，其媒体都经历了什么。

贵州省电视台的这位记者遇到障碍的第一站，不是医院门口，也不是事发现场，是唐山火车站。火车站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外地人不得随意进唐山，要想走进唐山，要提前48个小时找你要去的社区报备，社区同意接收，外地人才能进唐山。这是什么原因？防疫？当时唐山并无疫情，此前也没有这种防范措施，看来，是防记者吧？

记者当然不知道他得找哪个社区，于是就问现场工作人员，你能告诉我社区的联系方式吗，对方回答，不知道，也不能告诉你。记者懵圈了，他就算联系上愿意接收的社区，那还得在火车站待够48小时，到那个时候，核酸报告又过期了，在他不知所措干等的过程里，搞笑的是，工作人员到点下班了，出口处没人把门，他就出去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万幸之余，这记者想，唐山市政府这招挺绝，如果那个出口24小时有人把风，他就只能插翅进唐山了，跟河南郑州给人赋红码比，唐山市倒是没有在大数据上动手脚，他让你困在唐山火车站，进退不得，疫情的旗号一打，你能奈何？所以唐山这招比郑州更高明也更阴损，还落不下口实。

不得不说，在对付人民群众这方面，各地方政府的智慧真是层出不穷。

贵州记者出了火车站之后就去了那家烧烤店，本来他想采访一下这个烧烤店的老板，但已经倒霉被网暴的老板不愿意接受采访，出门后，记者发现，有人往烧烤店门口送花，又有人在店门口放哀乐，大概有些人不相信政府，相信网上的传言，以为女孩死了。贵州台的记者就把这些信息发回电视台，台里做了节目。但看到有人放哀乐，烧烤店老板受不了了，就报警了，其实警察就在店门口，好几天都驻守着，防止有人闹事。

于是警察现场处理的时候，除了处理放哀乐的事情，也把贵州电视台的记者给带到了警察局。这事儿奇怪吗？不奇怪，现在中国警察处理问题，除了关注当事人，就是防着新闻记者，恨不得把所有带摄像机的都归类为犯罪嫌疑人。

贵州台记者就在派出所遭到了典型的盘问，你是谁，从哪儿来，来干嘛。记者如实回答了之后，即便知道他是持有证件的正规记者，警察仍然将他反手扣绑，按在地上，搜走所有设备并破口大骂，对于记者突破重重障碍前往现场采访定义为“没素质”。这记者就前后被折腾了八九个小时，然后又毫无说法地被放出来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算是留了案底，而这笔录是属于什么法律程序。

有人分析，国内警方经常这么干，形式大于内容，笔录什么的一番折腾，主要是为了煞有介事地给你制造心理压力。因为警察24小时传唤的权限是不需要有关部门批准的。但可以想象的是，任何人只要进了警察局，被走了一番程序，别说24小时，就是4小时也是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这是警察恐吓无记录普通人的惯用伎俩。

当然了，这贵州台记者心里也七上八下，他们单位也吓了一跳，于是让他出了警察局就赶紧回贵州了。将心比心地想，为这么一个新闻选题，遇到这样恶心人的“接待”方式，你说记者再做任何努力值当吗？采访毕竟是一个工作，不应该搭上任何人损失什么清白，更不应该玩命。所以，记者的离去，大家都能理解。

每当遇到这种事，我都想说，真是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对黑社会犯罪，大家有预期，不奇怪，惹不起躲得起。可社会要是黑了，你走哪儿都是深不见底的漆黑，根本不知道坑在哪里，也许你踏出的每一步，都在他们的圈套里，因为你在明处，他们在时时可以监控你的暗处。

6月12日，唐山市委、市政府召开动员部署大会，说是自当日起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这雷霆风暴的消息一放开，据说公安局门口举报的人排队排了几百米，这些人都会反映什么情况，有多大的冤屈，过去了一周有什么收获，本来媒体也可以报道一下的，这也不一定是负面新闻，完全可以客观报道正

面成绩的，但是，公众目前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因为，媒体被唐山火车站，被各个地方卡住了，现在媒体到唐山采访，已经比登天还难。

所以再回头去看唐山封号事件，你更能感觉到悖论了：你们谁说错事实了，不管线上线下，不管是放哀乐还是夸大其词，政府马上收拾你，封你的帖子删你的号，再不老实，判你寻衅滋事。可真相到底是什么，就不告诉你！谁敢来问，来采访，我关你在门外，你要进我唐山我就让你做笔录。

说白了，唐山就是希望普天下的人对发生在他们“这座英雄的城市”里的丑事不闻不问，“要你们多嘴，关你们屁事，谁想了解真相谁就是闹事”。所以，雷霆风暴专项行动结果怎样大家不知道，可他们的“捂嘴行动”效果倒是很明显：公众的确啥都不知道，记者的确啥都采访不到，而这个负面新闻也就持续发酵：不仅发酵出灭不了的谣言，还发酵出了公众对唐山政府的质疑和反感。

其实，很多低端治理的政府都是如此，面对负面新闻只会一味地捂盖子，怕媒体知道，怕公众知道，也怕领导知道，但新闻传播的规

律就是：越是不说清楚的，越给人想象空间，新闻的延伸内容就越广，发酵力量就越大。你当然可以不让新闻媒体进行自由、充分的采访，但最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后果就是，你得不断地收拾这个收拾那个，但抽刀断水水更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唐山因为惩处造谣者而封号几百人的事件，政府是否有权利判断他人是否在蓄意造谣呢？在我看来，他们没有这个权力。事实上，在这样的新闻中，政府本身也是一个角色，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唐山的上级政府河北省政府是不是也在审视它？唐山的官员是不是也有被问责的压力？肯定有，所以唐山政府要想力挽狂澜，他们认为首先比较容易的事情是控制住舆论，最好大家都闭嘴，让风头过去，所以他们这个角色在整个事件中不具备可以客观处理和公平看待事情的能力。

其次，唐山市政府能独立快速地了解真相吗？我们看到过很多新闻发生后，政府走弯路的情况。比如前不久的“铁链女”事件，当地政府一共发了三次公告，事后看，这三份公告前后矛盾，如果认定第三份公告是正确的，是真相的话，那么前两份公告都是错误事实，那政

府是不是在造谣？所以政府不要觉得自己全知全能，他们既不是上帝，也不是上帝的儿子，不应该轻易给人定“造谣”的罪名。难道“铁链女”事件中前两个公告的发布者被抓起来了，被封号了？

普通老百姓发布了事后被认为“不真实的信息”，大部分顶多是以讹传讹，至于就该被删号禁言吗？州官放火的事情很多，就不要指责百姓点灯了吧。

所以，如果不想让舆情发酵，不想让公众愤怒，变被动为主动的方法只有一个：保证公众知情权，让媒体自由充分地进行客观报道。

关于这个案子的最后，我想说一个新闻：网信办最近放出一个征求意见稿，以后网上发贴，不光是帖子本身要被审核，下面评论也得博主自己审核后才能放出来，而网信办会全天候巡查。这真是管天管地管到神经末梢管到四海八荒了。网民以后说话要承担的责任可真不少，不仅对自己言论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评论负责，否则评论区被监察到出了问题，博主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这样的法规通过的话，那就是意味着政府不让人在网上发言了，发言的责任太庞杂了，没说一句话都得候着自己的粉丝会不会放出不合时宜的话来，一不留神要团灭。你想想，那粉丝数几百万的大V审得过来吗？是不是干脆自封闭嘴更安全？

法制社会最基本的原则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对自己之外的其他人负责，用法律来合理化别人说话我躺枪，这不是“连坐”是什么？

可悲的是，我们对这一切可能还无能为力。

6.21航母下水是大国复兴

2022年6月17日上午，中国的003号航母在江南造船厂下水了。这是个大新闻，国内舆论非常关注。虽然此前中国已经有两艘航母，分别是辽宁号和山东号，而这第三艘在下水仪式上被正式公布命名为福建号的航母跟前两艘有很大的区别，前两艘都是滑跃式甲板，而福建号跟美国的福特号一样，是平直甲板，电磁弹射。以前，世界上掌握电磁弹射技术的只有美国，而003号航母的亮相向世界表明，中国也掌握了这个技术，虽然据媒体推测，003号还是常规动力，但可以推测，接下来出场的004号航母，可能会成为中国第一艘采用核动力推进系统的航母。

过去10年间，一艘一艘航母下水，很多中国人都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我也不例外。翻看中国近代史，积贫积弱的过程中，谈不上有外交，战场上是不断败仗，尤其在海军空军这些现代化的兵种上，中国基本没什么让人扬眉吐气的胜仗，可以说，民族自尊心被碾压成畜

粉。所以，今天，当我们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自然感骄傲和自豪。放眼当今世界，现在拥有庞大航母舰队的就是美国，虽然英法俄罗斯印度也都有航母，但基本上就只有一艘。如今，中国三艘航母下水，标志着中国已经建成了继美国之外的全球第二大海军力量。

我不是军事博主，不作军事方面的专业探究，但除了民族自豪感之外，也想从另外的视角来说说这个话题。

我们先从中国的001号航母辽宁舰说起吧。辽宁号是从乌克兰买回来翻新改造而成，其入军是在2012年的9月份，这是什么日子呢？是临近十八大倒计时最后一个月。胡锦涛即将面临着权力移交，他当然特别希望在自己任内完成航母在中国海军的入列，实现一个中国海军史上里程碑意义的动作。于是，2012年9月25日，胡锦涛、温家宝共同在大连造船厂见证了中船集团将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交付给中国海军，由此，全球媒体报道了：中国终于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后一个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

但实际上，很多军事迷都知道，当时的辽宁号不具备入列海军的条件。入列后辽宁号出海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造船厂接着去改造了。

由此可见，让001号航母赶时间下水入列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国家领导人内心，他们可能有种很强烈的愿望是：追求历史定位。也许普通人难以理解，这事情有那么重要？对领导人而言，当然有。因为他们想的是百年千年以后，人们看中国海军建设发展史的时候，会关注，什么时候建成了第一艘航母。现在，历史书会记载，是在胡锦涛主政时期。

国家领导人和其他领导人一样，都希望在自己人气之内完成大项目，要有全球性影响力，比如开奥运会、世博会，这些项目都会别列在"帝王功劳簿"，航母下水也跟这有雷同之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步骤。

但我不由得想到，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前，中国海军也曾经靠着定远号和镇远号被列为亚洲第一、全球第六，这两艘清政府1885年从

德国购买的军舰，吨位有7000吨级，算得上是当时的海上巨无霸，号称是打不沉的猛龙，至少在亚洲可以说独孤求败。所以，在入列后的第二年，当丁汝昌率领北洋水师访问日本长崎时，由于镇远舰士兵跟当地发生冲突，定远舰就在海上升旗威胁日本，当时日本看到定远和镇远是受到很大威慑的。然而后续呢？

仅仅过了十年，1895年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正面迎战，遭受重创，主力舰队基本没有战斗能力了。总督丁汝昌遭受精神重创，他干脆命令舰队以[存在舰队](#)形式停泊在威海卫不出，使得清政府失去甲午战争的制海权，最终也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覆灭。

在这段历史中，有个非常著名的典故是，1895年2月，中日海军在刘公岛决战、北洋舰队陷入绝境的最后时刻，日本海军统帅伊东佑亨给丁汝昌写了封劝降信，前面先说你我曾因国事有所相交，彼此并无私仇，现在是国家之间的对立：“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

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伊东佑亨这番话，对丁汝昌而言是什么滋味？十年前伊东佑亨是怀着敬畏接待丁汝昌，而十年后，纵然你仍然有定远和镇远，却不能免于沦为败亡者的命运。而这，是因为中国积弊不改，不谋新政，人才断流，整体落后，

伊东佑亨的这封信，至今读来很有意义。回看清末也曾经有洋务运动，想向西方学习，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比洋务运动还晚了几年，两国都派出了海军将领出去留学，在普利茅斯海军学院这些海军未来的领导者还是同窗，表面上来讲，大家进度差不多，但差别在哪里？日本改变了幕府制度，整个国家的社会体系大范围地向西方看齐了，而我们只学了什么？学坚船利炮，花钱去买，学技术制造，派人留学，而天朝的制度和文化内省呢？不变。

所以日本人都可以看得到，中国的改革仅仅是皮毛，不彻底，也不会有多大成绩。

这些，都在甲午海战过程中非常明显地看到了结果：中国军队没有职业兵，仍延用的绿营，没有职业性训练。而日本当时已经实行了明确的职业兵制，选拔的都是年轻人，有文化，又经过了现代化的训练，素质很高。两国海上相争，北洋水师一战即溃是必然的。

老电影《甲午海战》里说我们的炮弹里装了沙子，所以打不赢日本，其实，这根本不是主要问题，事实上单论战舰阵容，北洋水师之强大完全不亚于日本海军，真正打不过的原因是人，队伍整体军事素养跟日本根本没法比！所以整个甲午海战中，日军海军加陆军只战死了1132人，而战时总阵亡的13488人中，88%是因传染病而病死的，也就是说，大清用30年洋务运动发展起来的北洋水师，以4小时40分钟被基本消灭，而大清击毙的日军只有他们病死人数的1/10，假设不把台湾义军消灭日军的数字计算在内，大清陆海军消灭的日军只有700多人。

再回头看十年前刚刚买了定远镇远的大清，当时的乐观何其可悲？想得到甲午之耻十年就到了吗？伊东佑亨的信虽然让丁汝昌不堪

其辱，但人家说的是实在话，日本真正虚心向西方学习了，而中国呢，学了个表面，学了点皮毛。

不过，日本的虚心好学所取得的辉煌，在后来的军国主义扩张之路上也消失殆尽。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为了扩张地盘，吞并朝鲜，又占领了库页岛，在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穷兵黩武，发动太平洋战争，还向美国宣战，最终在1945年战败，广岛上空的蘑菇云成为日本永久的创伤。

此时再论日本为什么战败，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日本学习西方学到了很多励精图治的国家管理之“术”，有制度革新，有社会组织能力，有推动生产力的技术，但是，日本没有学“道”，没有靠近普世价值，没有把人类文明的精髓学下去，所以它只是个成绩优秀的高智商犯罪国，当它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它的智慧就变成一种破坏性力量，在侵略别国的时候，也遭到了反杀。

好在，日本的战败让它有了反省的机会，今天的日本是一个有现代化和平宪法的国家，在宪法之下，它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已

经基本没有。国内有人说日本有军国主义抬头，我个人觉得，那都是非常局部的现象。今天的日本再也回不到战前军国主义的好战状态，这个国家已经被彻底改造，日本的民众与政府的关系，言论自由的程度，以及法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都已经表明日本是现代化法治国家，跟西方国家已经完全没有区别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二战战败才是日本新生的开始。

再说回003号航空母舰吧。我说的一切看似和航母没关系，但一方面我想让大家知道，清末的海军在相对强大的时候也没有给国家带来永久的平安，有时候某些自豪我们也要保持适度。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对军事力量的推崇过了度，那要警惕了。

以我的观察，今天军国主义思潮最泛滥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看看中国网民的言论吧，他们最喜爱的是赵立坚这样的战狼外交代表，他们呐喊着用武力去征服，动不动就是“虽远必诛”，再看看中国军费开支的不断增长，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在中国，军国主义的思潮会不会不断发展起来？

什么叫军国主义？我概括，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集体本位。个人的权利不重要，要向国家奉献，国家利益第一位。第二，不允许言论自由，言论不符合国家意志的，要受到严厉的打击，不臣服让位于国家利益的私人权利也要受到严格压制；第三，在外交方面，崇尚用武力去解决政治分歧；第四，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族优越感"，认为自己这个民族才是最优越的，其他民族都不行。

按照这几个标准，你去对号看看，现在什么人符合这4个标准？

今天，我们看到网上高涨的爱国主义已经有逐步狭隘化的倾向，越来越多的人民族主义意识强烈，在国家间发生分歧的时候都喜欢以武力的炫耀去震慑他人，在国内听到不同的声音主张以封杀这种剥夺私人权利的方式去实现国家本位的集体主义，私权受到空前压制，政府的权力得不到约束，国进民退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不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吗？

网上关于攻打台湾的言论中最可怕的一句是"留岛不留人"。如果你真的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部分，那么2300万台湾人当然是我们中华

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当然我说这话台湾有人不同意），为了所谓的统一价值观，你宁可牺牲同胞性命？这是什么价值观？这就是典型的军国主义价值观，典型的国家主义价值观，典型的集体本位价值观。为了实现集体目标，毫不犹豫去牺牲个体性命，这就是军国主义。

其实，现代社会以战争威胁为手段去解决政治分歧的方式早已被人鄙夷，彻底落后于当代文明了。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这一观点，但我始终认为，政治文明的标准就是用非战争的手段去解决政治分歧，不管是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秀肌肉秀出来的不是正常价值观，而是粗鄙行径。

所以，再看003号航母下水，我一方面为海军实力增强而欢喜，但我更怕由此让更多人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同于中华武器库的庞大化。

我们都希望民族复兴，光耀中华，但这是个怎样的梦想呢？在我心里，不是建一艘又一艘的航母下水，不是军事能力强到随时可以威

胁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有幸福感，有“人”的权力和自由，有活出自我的可能。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可以做到古人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有人不分贫富和地域都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不分性别平等地同工同酬，不分民族平等地接受公共服务……那绝对比一艘接一艘航母下水更让人有民族自豪感。

所以，请关注并警惕民族自豪感背后危险的军国主义思想吧，如果那汹涌的暗流得不到遏制，中华民族到底会迎来伟大复兴，还是好战时期日本那样的下场，恐怕难说。

殷鉴不远，当有警钟长鸣。

6.22沉默的声音

这几天有几件本来可能成为热点，但被有关部门“英明决断”，掐灭在刚冒出头时候的新闻值得大家知道。

第一件，扮演《编辑部的故事》中的牛大姐生病中风了，她的儿子讲述了她作为高龄老人在上海某医院的经历。

“牛大姐”本名童正维，在王朔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里她饰演老一代编辑，快人快语、热情但又固执保守，和三个年轻编辑相比，牛大姐是改革开放后单位里相对因循守旧的老知识分子。童正维演戏不多，很早就退出演艺圈了，但因为牛大姐这个角色，一提起来，老中青还是熟悉的，肯定算是名人。而就这位高龄名人，在上海封控期间首先是病情被耽误，之后好不容易到了医院，被抢救过来之后就一直住在走廊里。她的儿子马良在网上记录了母亲中风后入院的经历。他说，他母亲生病的时候，他非常无力无助，现在的医院就是人间地狱，医生们因为从方舱医院撤下不久，特别累，对每个人说话都特别

冲。但母亲要在那看病，他没有办法。此刻，每一个亲人都变成了人质。在他发出的网文中，有一句话让我触动很大，妈妈童正维在走廊里躺着的时候，把他拉到耳边说：“儿啊，人生美好的日子像一瞬间就过去了，但是我现在的每一秒，都像一整年那么漫长”，说完，老人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后来马良克服重重困难，把母亲送到了一家私立康复医院，他说在那里，最起码人可以过得有尊严一些。记录了这段经历之后，马良把文章发到了微博上，结果，没多久就被“咔嚓”掉了，连马良的微博也被禁言了。

我倒是疑惑，连记录家族苦难经历的文章也要被删，网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要在此刻仍然保持一片歌功颂德吗？如果，从马良的文章里面再一句句地找，那么是不是这一个细节你们受不了了：马良提到，孩子的幼儿园也破产了，他得重新为孩子找学校，对于这社会秩序的有破无立，他在文章最后问了个问题：这就是你们追求的“大国复兴”吗？

这个问题是问倒了有关部门，还是不可以问？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在理，就好像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我们的大国复兴是从一艘艘航母下水这种情形上体现，还是还得看看老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我们，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单位，大家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尊严？有没有获得感？

当我们看着亲人饱受病情折磨无能为力，看着孩子仓皇失学无法解释，看着一个个机构倒闭关门觉得殃及无辜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不能对目前的防疫政策问一句：你这政策符合大国复兴的目标吗？

马良倾诉了由衷的感情，但有人就是不让他说，你一个人家里的事情不能否决国家层面决策的集体导向，所以不允许你叫屈！

其实我也不是只想讲述牛大姐一个人的遭遇，我是想说，这个社会还有千千万万个牛大姐等着要看病，要像人一样被对待，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他们得有人道主义去救赎，而现在，他们变成了防疫的成本！你们到底要付出多少类似的成本，让整个社会失血多少，才可以正视现实？

每当我说，现在这么办，从整个社会管理角度来讲不经济，不人道，不值得的时候，都有人反驳说，这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嘛，你看早些时候美国政府不管事，死了一百万人呢！你不能光看眼前的代价，要知道因为有这种防疫政策，还是很多人得救的。是这样吗？

我接着说第二个被掐灭的故事，是关于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被禁言的话题。

梁建章最知名的身份标签本来是携程的创始人之一，曾经的董事会主席。我个人对携程这家企业的印象很糟，不过梁建章本人倒并没有因为携程的口碑而“沾光”，因为他频频出现于媒体的话题基本上跟企业无关，而是探讨人口和经济话题，所以，这是一个集学者和商务人士符号于一身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公众(平台)上，他曾经孜孜不倦地反对计划生育，后来国家政策果然放开之后，他就紧着劝导大家生孩子，无奈现实中人们对于生儿育女的热情完全没有政府想象得那样反弹高涨，于是梁也出过不少耸人听闻的馊主意，比如他说，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可以先结婚，先生孩子，比如每生一个孩子国家奖励100万之类的言论。

但本次被禁言的原因，倒不是人口学话题，而是习惯于直言不讳的他在今年2月份和近期写了两篇文章，分别用定性和定量的方式论述了目前防疫政策的不正确。当然，文章现在已经被全网删除了，但我觉得，很有价值，值得被复述。

大部分人在讨论防疫政策的时候习惯以定性方式和生命至上的伦理学角度来讨论防疫政策，但是梁建章把防疫措施中的各种投入产出进行了量化，最终计算出来的结论是：目前的防感染方式，从全社会的生命质量和经济指标来说，都非常不合算。

他的论点是，GDP的增长和降低跟人的预期寿命之间有非常强的关联性，GDP每降低1%，人均预期寿命减少5天。我想，这个正向关联性大家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GDP增长，大家有钱，可以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买单，反之，一切捉襟见肘，健康状况也堪忧。他举例说，前苏联在崩溃解体后最初几年GDP大幅下跌，导致了整个前苏联地区人均寿命降低了2至4年，而我国2010年的GDP数据跟现在的相比，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45%，当时的预期寿命也比现在少两到三年，所以他推断，当我们今年GDP减少下来后，人员预期寿命也会减少。现在

封城这种方式已然导致GDP的大幅下跌，上海封一个月，会导致全国的GDP总量下降4%，深圳封城一周，直接经济损失达到六百到七八亿人民币，现在通过清零政策节约下来的死亡人数和因为经济下行而增加的死亡人数相比到底是哪一个更多，哪一个更少，只有事后综合在一起对照，才是真实的结果。如果眼下大家就认为防疫一定拯救了多少人性命，那是单一角度，你看不出总体成本的正负。

回头看童正维的经历，如果不是因为防控，她中风救治的过程就会快，诊疗过程就会好，预后也必然好，这样的一次折腾，一个让人度秒如年的经历会不会折损老人家多长时间的寿命，很难说。所以，多少看不到的损失发生在防疫过程中？你能因为没有精确的计算而忽略它的发生吗？

所以我赞成梁建章的核心观点，经济大幅下跌所导致的人均寿命减损和动态清零节约下来的寿命数字必须比照。

但梁建章已经预测，动态清零不合算。他也说新冠肺炎早期时，由于病毒致死率高，武汉封城措施是非常正确的，但后期情况已经不

同了，奥密克戎现在的致死率大幅下降，从新加坡、韩国、日本的数字来看，奥密克戎的总体死亡率平均大概在千分之一左右，这个数字跟我们平时流感的死亡率是一样的！流感你恐慌过吗？封城吗？没有。那么现在对奥密克戎用封城、动态清零的方式，是不是大大的夸张了？

梁建认为，只需要对于重点人群接种有效的疫苗，全社会就可以放开管控。如此，经济才能正常发展，人的预期寿命才会随之回到正常增长的轨道上来。

这篇有见地的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马良的文章是不让你抱怨，梁建章的文章是不让你出不同的声音。

看来，除了一边倒的歌功颂德，再也说不了别的话了。

我从外网中把这些故事、观点捞回来，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些事实与讨论，希望大家知道民间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希望未来，如果中国防控政策发生了改变，政府应该知道，这是民众呼吁已久的盼望，但是，这些声音不仅叫不醒装睡的人，还被毒哑了！

如果肉食者一意孤行，我们有什么办法？喊，喊不出声，不从，他们就有整你的办法。大量散步出来的声音都在说中国的防疫政策比西方国家合理，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对人民群众负责……

很多人的确看不到防疫造成的苦难，看不到封城导致的次生灾害，因为那些内容被全部屏蔽了，他们放出来的信息全部是他们想让你看的，说明动态清零有多大作用的。当民众被蒙蔽着不知道真相的时候，也许大家的确是安心的，但，真相包得住吗？

我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关于真相被曝光在人眼前时，被愚弄者的反馈。

上海方舱医院的一位“志愿者”赵衡衡前不久自杀了。之所以给志愿者三个字上面带引号，是因为赵衡衡自述是被劳务中介骗到方舱医院去给地产集团做志愿者的，本来去那里之后可以有报酬，但由于他们只被视为劳动力，没有岗前培训，现在也没做防感染管理，所以到方舱第一天他就被感染了新冠。赵衡衡没有挣到钱，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却在后面一个月的被隔离时间里被迫自掏腰包支付隔离费，直

到分文全无，没钱吃饭，流浪到马路上。为了讨个公道，他把自己的情况发到了抖音上，公安抓了他到了派出所，而叫来的劳务中介除了当着警察的面给他一拳外，明确说没有任何补偿。2022年6月1日，跟赵衡衡有类似遭遇的几百个志愿者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又被警察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跟他们说不许去市政府，不许上访，这些受害人就像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一样，被当成了"不稳定因素"。

赵衡衡悲愤莫名，他感受不到包括警察在内会有任何部门给予他基本的关爱和生存的权力，走投无路，屈辱之余，赵衡衡选择了以死明志。他说，我们这志愿者中间有人没了，你们总应该重视我们这个群体的利益了吧？

然而就连他的遗书也很快被删帖了。赵衡衡的人与文很快消失在有关部门的操作里，些许涟漪也很快被抹去了。

今天，我把他的故事也捞了出来告诉大家，是让人们知道，很多人觉悟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个人的命运在国家叙事的过程里，

被当做随时可以过眼的烟云，而这些消逝、受创、噤声的人，正是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也可能是未来的我们。

而这些，会不会被统计在防疫政策的次生灾害里呢？我想，他们可能连统计的动作都不会做吧。统计的口径，永远掌握在那些人手里，他们想睁眼或者闭眼，完全不由民众的呼声说了算。

看吧，终会有有一天，当这看似合理的防疫政策搞不下去的时候，那些被抹杀的故事会被人重现的，因为，所有的苦难和悲剧都被记录在人心之中，哪怕上不了统计数据，也会让人认清是非和对错。

6.25赋红码事件后续：党规大于国法

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红码事件终于水落石出，果不其然，是当地政府的一番骚操作。

根据2022年6月22日，“清风郑州”公众号发布的《关于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问题调查问责情况的通报》，我们大致能够拼凑出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全国各地的储户到郑州去上访，人数之众，影响之恶劣肯定是全国级的群体性事件了，所以，这事就必然要申请郑州市政法委的指示，政法委负责分管维稳信访的常务副书记叫冯献彬，他此刻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这后一重身份当下是举足轻重的，毕竟，疫情防控已经是政治性工作，所以政策工具箱很多，管得孰轻孰重都是他说了算，同时，下面精兵强将也很多，掌握着最前沿最隐私的大数据，和影响每个人自由程度的健康码。

以前有群体性事件，第一件事情是让特警公安上阵，控制住人员规模，控制住局面，得派人截访、接访，现在怎么办？这位冯书记头脑活络，把权力一盘，先找到自己的副手：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同时也是郑州市的团市委书记张琳琳，这听起来也是位有上升空间的人物，所以待领导把他分管的维稳重点工作一说，张副部长心领神会，领命而去：这好办，给访民每人一个红码，让他们“定”住，动弹不得，去不了银行闹，也没办法到政府机关去。

于一个联席会议高效达成了冯书记的指示：郑州市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的处长赵勇把维稳涉及到的人员名单给郑州市市大数据局科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健康码管理组组长陈冲和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耀环，让他们通过大数据的采集搞清楚多少人到了郑州，到的人还在联动外地多少储户，然后达成一个目标：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安排对储户在郑扫码人员赋红码。

就这样，冯书记和张副书记充分利用了自己权力，让亲信们共同编织了一个“红码局”。最后，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了红码，其中446人系入郑扫场所码的时候被赋的红码，而871人系尚未来到郑州，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了红码。

这招管用，红码在当今中国就是镣铐，就是关禁闭的铁锁，想来郑州的储户来不了了，已经到郑州的，也寸步难行，因为按照防疫的有关规定，红码了就必须立刻被隔离，或者自驾点对点回到原住处隔离。你还能维什么权，要什么存款啊。

郑州的调查结果算是清楚了，但这通报里还有一个问责情况，大众看了，有点不认同。

冯献彬因为是第一责任人，得的是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执行冯命令的张琳琳则是拿到了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另外几个可能是因为“从”了领导命令吧，被轻轻一笔带过，就是记过处分。

从党内的处理方式来说，对冯献彬的问责应该还算严厉了，但老百姓不答应，舆论汹涌，讽刺这些触犯法律的干部还被通告叫做"同志"，问为什么他们没被抓起来。大家为什么如此不满意？因为有对比，所以感到被伤害。你想，普通老百姓在防疫过程中因为红码或者黄码违规后，动辄就是刑法伺候，有的还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直接逮捕，有人为送黄码亲人去看病，也被有关部门抓起来行政拘留。

就在6月21日，丹东市一位女士父亲生病了，她带着社区开的证明和48小时内的核酸报告自己开车送父亲去看病，还是被警察拦住，说她是黄码不能外出，双方在言语冲突过程中，女士的父亲打了一下警察，警察立刻就倒地，还问同事拍到视频没有，气得这个父亲打了警察一拳，于是，看病的两个人就被带到派出所，女儿被行政拘留10天，父亲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所以你看，三天内出的两个新闻，让人感受到什么？面对权力，弱者动辄得咎，而为官者违反法律，影响一千多人的自由，性质如此恶劣也只是行政撤职，这两种被惩戒的行为到底哪个对社会危害更

大？而惩罚力度符合他们的影响力吗？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吗？显然不符合。

回头再看《通报》，说这几个人的问题在哪儿呢？说是“违反《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办法》及健康码赋码转码规则”，严重损害健康码管理使用规定的严肃性，是典型的乱作为。这几句话就有点“重重举起，轻轻放下”了。冯献彬和张琳琳触及的到底是什么法？在我看来，已经触犯了刑法中的好几项。

首先，他们都触犯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第二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第五条：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第六条：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本案中，去郑州与银行接洽谈判的储户名单、行程记录、手机号码都是储户的个人信息，有的人甚至还没有去郑州，属于只有银行知晓的储户信息，可全部被政法委搜集起来赋码，毫无疑问，他们违反了上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条款，政府不仅从银行搜集信息，还通过大数据库扩大信息量，属于违法搜集个人信息，也不符合“最小范围原则”，而他们的使用原则更是属于明令禁止的误导、欺诈、胁迫。

其次，他们触犯了《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以前我们看到政府动不动把这个罪名给予异见人士，但凡谁在网上说了不符合政府导向的话，就扣你一个寻衅滋事的帽子。在防疫过程中，有的地方政府连不报告黄码红码也当做寻衅滋事罪，那这次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政府滥用职权赋了红码，这难道不是寻衅滋事？最早期媒体刚刚曝光此事的时候，郑州市的“12345”管理人员还解释说，那些红码是由于技术故障导致的。现在回溯，那是不是造谣？按照不少政府对普通老百姓删帖封号行政拘留的缘故，造谣就可以对你法办，告你寻衅滋事！

第三，他们都属于《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独有的权利给公众造成重大影响，这难道不是滥用职权？给

国家、政府的声誉造成如此重大影响，给社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都应该属于检察机关应该立案调查的范围。现在，大家还会如此相信健康码的客观公正吗？还会那么愿意配合防疫措施吗？这给党和人民群众造成的信任危机太严重了。

第四，他们还触犯了《刑法》中的非法拘禁罪。因为这些到了郑州之后被赋红码的储户不能自由行动于任何公共场所，按照防疫政策，他除非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能直接回原籍隔离，要么直接在当地隔离，还得自己掏钱支付相关费用。这不是变相剥夺了公民人身自由吗？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非法拘禁要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公职人员更是要从重处理，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这四条也就是我说说，大家伙说说，事实上，冯献彬一伙国家公职人员有没有按照其中任何一条来处置？没有，他们只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管理条例》和国家公职人员的一些管理办法进行了处理，党内撤职、政务撤职、记过、记大过。所以，人民群众不答应了，凭什么普通百姓犯法你们从重、从快，你们国家公职人员犯法就“轻轻放下”，仿佛“自行罚酒三杯”？这可真是对待自己的同志如春

天般的温暖，对待群众像秋风扫落叶。这些“同志”还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不过这种处罚情形也不鲜见，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描述过，人类奴役各种各样的动物，猪作为所有动物中最聪明的动物就认为这不平等，于是动员其他动物为自己的权利而反抗人类，动物们觉得猪所言非虚，于是一起把人打倒了，农场就变成了动物的天下。但没过多久，其他动物都发现了，游说他们反抗人类的猪变成了动物庄园的统治者，于是它们喊出口号：“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可猪拔高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在这句口号后面还跟了一句，“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最后，赶走了人类的动物发现，昔日跟他们平等的猪开始两条腿走路了，它们变成了跟人一样压迫、奴役其他动物的统治阶级，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只不过，原来的统治者是人，而后面是猪。

这个寓言现在我们似乎在社会现实中也能感知到了。曾经，那个党在率领农民闹革命的时候把“平权”作为最大的吸引力，说赶走了剥削阶级，大家就平等了，然后，有一天大家蓦然发现，什么时候开始，在所谓的平等之外，还有一群猪有异于普通百姓的“更平等”，那

就是特权。当这些特权长年累月潜移默化在当权者手里的时候，他们就渐渐无视法律，而只在意他们系统内部的“处理原则”，于是，党纪党规就变得大于国法。

赋红码这样恶劣性质的违法行为，纪委调查完了就用如此党纪来惩处，他们眼里还有国法吗？国法已经位居党纪之后了！推而广之，现在我们国家最大的权力在法院吗？当然不是，权力最大的是党的纪委监委部门，他们的权力之大，已经可以覆盖其他各个部门。所以你看我们的领导干部有很多时候不怕公检法，他怕的是纪委，怕的是组织找他谈话。因为他知道纪委的权力大于法律。

所以，如果群众要非议对郑州赋红码事件的处理原则，我们只能从跟子上去考虑，其实，事情怎么调查，调查出什么结果，以及怎么处理，都不有赖于法律，而是在法律之上的更一个雷霆法则：党的权力指挥棒。

所以你们如果用法律依据去判断是非，就完全无法匹配这些国家机关干部的奖惩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法律约束不了权

力，我前面所述的那么多违法项，本来都是约束政府权力的，然而，事实上形同虚设。而用党纪去惩戒他们的同志，这似乎变成了他们的“家规”，轻重原则，也只有他们内部来评估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裁判文书网，搜一搜滥用职权被判刑的案子，你会发现，大部分案例都是说政府官员滥用职权的内容是以权谋私，而以权侵犯公众利益的，几乎见不到，比如政府官员利用职权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或者滥用职权非法拘禁群众，这种案子你找不到，是因为没出过这样的事情吗？肯定不是，更大的可能是有这样的事情也上不了裁判文书网。

约束政府权力的法律是具有宣誓性质的，但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些约束其实不存在，因为“这个政府”不愿意让法律来限制自己的权力，就好像猪不愿意牛马驴跟自己彻底平等一样的。所以，法律条文归法律条文，但现实还是由着纪委由着他们的组织去掂量，跟你们老百姓，没得商量。

难道老百姓能撺掇检察院去起诉冯献彬、赵勇维稳方式触犯刑法吗？检察院会理你？不会的。他们是一个阵营的，他们的工作汇报对象最终是同一个，本是同根生，不会急相煎。

所以，郑州市纪委这么办，充其量是有关部门给自己下的"罪己诏"：对不起我做错了，砸了我们自己牌子，影响了安定团结。既然民怨沸腾，那我总要有交代：撤下政法委副书记冯献彬，毕竟，他是直接分管人。

组织上可能会觉得：老百姓至于还计较下去吗？我们的调查通告里面已经说了，这事儿政法委书记不知道，市委书记也不知道。那你们就散了吧。撤掉这么大的一个副职，也算给大家一个交代了，舆论可以平息了啊。前面我们很重视群众呼声了，现在我们把罪己诏发到这个份上，你们应该见好就收，假设太拿国家法律法规当回事，把我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当做服软，还揪着不放要用法律来说事的话，那就不要太幼稚了，没门。

是，咱们不能太幼稚，您看古代封建帝王的"罪己诏"哪一条是真正要给他自己降罪的？假设你以为皇帝有肚量"罪己"，那你就真的要跟他讨论罪行如何的时候，你自己离入罪也就不远了。

所以，罚酒一杯的假把式，当不了真。

6.27还有多少“卢克”？

一个叫卢克的中国人在非洲出名了，不是好名，是恶名，恶到影响了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恶到让非洲人民咬牙切齿。

他被曝光是从国内互联网一个叫“黑人笑话社”发的视频开始的。视频里一群非洲小朋友以欢快的语气大声说着中文“我是黑鬼，智商低”，而镜头内小黑板上正写着：“我是黑鬼，智商低”。

这个视频不久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大部分人感到不适。一位BBC女记者懂中文，马上理解了这个视频里的种族歧视意味，她义愤填膺，决定找出这个视频的拍摄者。

记者很快发现，这段视频抖音上也有，且标注了地理定位信息，是在非洲马拉维的首都利隆圭附近的一个体育场。根据这个定位信息，她在Facebook上发出询问，非洲当地人回复，是某个村庄。于是这位记者找到BBC驻马拉维的记者会合，直接去村庄打听，很快得知

附近是有一个中国人在教孩子中文，村里不少孩子学都不上了，跟着这个名叫"叔叔"的中国人每天学点中文，还可以得到0.5元美金的报酬。

记者发现在中国的抖音账号上有类似“黑人笑话社”那样主要播放非洲孩子对中国人讲搞笑或者祝福汉语的，还有两个账户，分别是“非洲小骚克”和“顽皮哥在非洲”，这两个账户发送的视频拍摄地点也都在那个村庄附近，都是非洲孩子给人演出送祝福，或涉嫌种族主义的言论。有个视频中，非洲孩子一方面大喊中国加油，而后面却跟着一句自我嘲讽的“我长大之后绝不去中国”。还有台词说，“黄皮肤比黑皮肤要美丽”。

根据村民的说法，记者怀疑“叔叔”很有可能是视频拍摄者，为确认，他们翻看了大量视频，终于在某个视频中发现了博主自称“叔叔”，由此也核对上了，村民说的那个中国人就是视频制造者和散播者。

在抖音账户上，记者翻到了视频博主上传过的护照信息，其中显示他名叫卢克，他在境外也有Facebook账户，而在卢克Facebook上14个关注者中，有一个是境外记者。BBC记者跟这个记者联系上后，了解到卢克在五年前曾作为在马拉维的中国商人接受过外媒采访，当时他还大谈马拉维如何美丽，他如何热爱这个国家。

所有信息汇总后，记者终于可以确定，视频的拍摄者，“叔叔”卢克是中国浙江籍商人。为了让卢克不设防地说出他在马拉维的拍视频动机，BBC女记者找到了另外一个中国记者，请他伪装成一个巧克力商人约卢克谈合作。

在马拉维，暗访的中国记者两次约见了卢克，从第一次的寒暄没有信息量，到第二次见面渐渐熟悉后，卢克就开始吐露心声了。话匣子一打开，信息量很大。卢克先说了自己在非洲拍摄短视频很挣钱，他每天可接到中国代理发来的几百个非洲人演绎“祝福视频”的订单，他组织好小孩子们，分好组，有的上午场，有的下午场，最多一天可拍摄380个视频，每个视频可获利200元人民币，一天就能赚76000元人民币。他还推心置腹地告诉“巧克力商人”，黑人85%都没良心，千万

不要可怜他们。如果要可怜这些黑人，就会坏事。他还说黑人基本上都偷东西，所以作为中国的老板，必须要用冷血的态度对待他们，如果他们干得特别好，可以给他们一颗枣，如果干得不好，就得老板的方式对待他们。

说到这里，很明显了，这位“叔叔”就是种族主义分子。既然他已经毫不遮掩种族主义言论，“巧克力商人”就拿出那段“我是黑鬼”的视频问他，“这是你拍的吗”？卢克一愣，一开始承认了，但很快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开始警惕着说，视频是过去和他一起的福建人拍的。大概，对于别人拿出这样不光彩的作品问他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这不是正经营生。不过，暗访记者更有经验，并没有听到卢克否认就止步，他问卢克既然会拍短视频，那么他出售巧克力，也想向他订购一段视频，内容是：“巧克力会让非洲的小朋友变得聪明起来”。卢克一口答应。

卢克“接活”充分说明了，他对于这样种族歧视的言论内容非常熟络，不以为忤。“让非洲小朋友变聪明”言下之意和“我是黑人智商低”异曲同工，一个意思。

卢克不仅答应，还主动问视频是否需要一边跳舞一边演，他还拍胸脯说自己拍过几千条视频，都能应付，你要想让这些孩子跳舞的话，我就让他们跳。

如此，暗访记者确定了，卢克就是拍摄种族歧视视频的始作俑者，在他把暗访视频发给BBC记者后，BBC的记者再次前往村子进行核实调查。而一直对那位不止免费教学，还支付小孩每天0.5美元的“叔叔”感到不解的非洲家长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的孩子连学都不上，争着抢着要去录教学视频的事情不是公益事业，而是让孩子们自毁形象，羞辱自己肤色和智商。

由此，家长们也曝光出来，这位“叔叔”在“教学”过程中对孩子还有打骂行为，有一个孩子家长反映，他的孩子连续三天参与卢克的拍摄，把嗓子都喊哑了，回家就病了。结果，卢克带了几块炸鸡到他们家，让孩子吃完炸鸡接着出去拍。

获得这些信息之后，BBC的记者才到村子里去当面采访卢克。她问卢克，你拍这些视频是什么目的？卢克说是为了推广中国文化，让

这些孩子学中文。而当记者问卢克，视频拍摄后是否用作商业用途牟利时，卢克一口否认，还说自己是公益行为。记者再追问，既然是公益行为，那你是属于哪个慈善组织，卢克说自己不是慈善组织的，此时他已经开始心慌，要求戴口罩，不敢面对镜头。而当BBC记者直接告诉他，媒体已经取得了他从中渔利的证据时，卢克又避重就轻说，要赚钱也是中国的代理赚，赚了钱之后也是为了帮这些孩子买面包。但至此卢克已经方寸大乱，在BBC记者的追问之下他狼狈不堪。

之后，BBC《非洲之眼》栏目中播出了对卢克拍摄种族歧视视频的采访，卢克一看情形不妙，立马从马拉维跑到了邻国赞比亚，但不久他就在赞比亚被逮捕，目前在等待被引渡回马拉维接受审判。

我想这个卢克，肯定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法律制裁，他至少涉嫌几项犯罪：

第一，是欺诈，他利用孩子在中国赚钱，欺瞒孩子和家长说是在做公益项目，给孩子每天的报酬就是面包和半美元，而过程中欺骗孩子用中文说种族歧视台词，实乃无耻之尤。其实，后来我们查到，做

黑人喊话的博主在非洲不少，但多数情况下，博主是雇用职业演员，按照合理劳资关系支付报酬的。卢克把孩子当作免费道具，且让孩子自取其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二，他雇佣童工作为商业盈利的路径。而雇佣童工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第三，他还涉嫌对这些孩子进行虐待，掐耳朵、打骂孩子。

第四，卢克在暗访过程中的叙述是明确的种族歧视的言论。

根据以上种种罪行，我相信卢克必将承担巨大的法律代价。而更坏的影响是，卢克把整个非洲社会对中国人的印象都败坏了。最近，非洲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几天前，很多非洲人去马拉维的中国大使馆面前游行示威，抗议卢克的这种言论和行为，因为非洲兄弟绝不会把这个事件孤立地看做是卢克个人言论，而会把它扩大为中国人对非洲的态度。即便中国驻马拉维的大使已经表态对种族主义的言论零容忍，但恶劣影响已经造成。

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粥，真是毫不夸张。

今天谈起卢克，我说想说，这事虽然看起来是极端个案，但就“黑人喊话”这个行业的长期存在而言，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七年里，中国电商对于这样的视频仍然充满了恶趣味，用买卖来持续伤害非洲人的感情。诚然，大部分视频博主和机构是给“喊话”人支付劳务费用的，大部分的喊话内容也不涉及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而多是“祝你生日快乐”之类的祝福内容，但这种爱好背后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为什么几句祝福一定要雇用他人来说呢？

在我看来，这种趣味背后折射的说一种虚幻的优越感，一种“我族胜他族”的民族主义心理。这种需求表面上看，是一种虚荣，让外国人来祝自己“生日快乐”，我付点小钱图个新鲜感，往深处说，是用“厉害了我的国”的心理充盈自己浅薄的世界观，急着想要感受“万国来朝”的高峰体验。

自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从大国复兴的slogan被喊起，尤其是战狼外交掀起热浪后，一些中国人的沾沾自喜、喜不自胜

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通过某些形式发泄了，觉得外国人学中文，外国人唱中国歌，外国人用中国"一二一"的方式去阅兵，都是小兄弟在朝拜我老大哥。花钱让非洲裔祝自己生日快乐图的，也是这种快活。

此外，在中国我们很少谈及种族问题，但中国到底有没有种族问题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从每个人扪心自问做起。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内心是对不同肤色有不同看法的，而这种意识的根源可能是古已存在的一种心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几年前，中国有一个洗衣粉厂家做过一个广告：一个女孩谈了一个黑人男朋友，她把这个黑人男朋友扔到洗衣机里，倒点洗衣粉，"哗"一洗，出来一个白人男朋友。这广告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适，尤其是外国人的不适。我也觉得，很不合适。你想，洗衣机厂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广告？他的潜意识里，根本不觉得这个广告存在什么问题，他不觉得这已经赤裸地在宣讲黑人不受欢迎。

类似这种心理的人在中国肯定不少，所以很多中国人出国之后在面对不同族裔时，就会展现出"种族意识"。不少国家做过相关调查，

在有歧视黑人心态的族裔中，中国人的数量排名靠前。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种族问题，更谈不上反思。我们没有过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的创伤，没有一百多年平权运动的奋斗，所以，种族观念在中国人心里还是一个懵懂状态，有的人还不曾探知自己内心深处是否有一个幽暗的角落，在那里，我们很少打交道的有色人种是否被看低一级。

但卢克事件是一个试金石，如果你看卢克的视频觉得舒适，那么，你就是种族主义者。

出事情以后，中国的电商平台把所有黑人喊话节目都下架了，抖音也封了一批账号，但我想说，这不是对种族主义的“零容忍”，既然曾经这是一个买卖，那么说明这样的种族歧视者还大有人在。中国人如果真的想要输出价值观，标榜自己也是优秀的民族，那么，首先做到最基本的一点：去尊重其他族裔，去认同众生平等，去保护别人的尊严，就像维护我们自己的尊严。

让我们挖去内心阴暗的卢克火苗吧。唯敬人者，人恒敬之。

6.28北京的“五年”虚惊

昨天北京的老百姓被一则新闻震惊了，网络上哀鸿遍野又高度反弹，大家都说，“受够了”！

什么事情受够了？“长期动态清零”。用全面一点的话来讲，根据《北京日报》消息，周一在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作报告时说：“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而这段话的时间状语是：未来五年。

北京人民当然炸了窝了，有网友感叹道：“未来五年，勿念未来。”还有人说，“爱党爱国的我此时此刻也想‘润’了”。更有人悲观地说：“看来，清零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了。”显然，“未来五年”四个字让本来就疲惫不堪死撑硬扛的北京人受太大刺激了。

你想想，五年时间常态化防控，那住燕郊的人就真成外地人了，要么别去北京上班了，要么别回燕郊住了，你出一次差都可能长期回不了家，打个网约车还跨不了区，进出家门次次要健康码，核酸报告时不常得做，一次错过就可能进不了公共场所……这种日子，说白了不是人过的，熬几个月已经让人疯魔，要熬五年那真是恨不得现在就溜。

一般道听途说的话，大家可能还不信，可这是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在2022年6月27日（周一）上午10点18分发出的，“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上传的一张截图上就有。

不过，仅仅8分钟之后，10点26分，“未来五年”这四个字被删除了，但删除时，没有勘误说法，没有解释。老百姓更不踏实了，怎么回事，不让说，就这么悄悄地做下去？

到当日下午3点半，《环球时报》原总编辑胡锡进粉墨登场了，没叼盘，这回他是勇做人民代表，表达了两个修改稿差异性的“个人看法”。他说《北京日报》改得好，顺应民意，哪个老百姓也没法想象未

来五年都过着今年上半年这种日子，相信北京市政府一定能够想到更好的防疫方针给民众以信心。文字仍是一以贯之的“叨盘体”，但内容，至少还是说了他心里话。

这个帖子说明，第一，胡锡进也没有第一消息来源，第二，胡也受不了就像上半年这样过下去。回看胡锡进在北京封城期间的帖子，一开始他在家里撸铁，还特别乐观向上，说自己愿意宅着，多锻炼，少吃点，没关系。后来这种漂亮话就少了。现在看来，要过五年这种日子，他也不乐意。

又两个小时后，6月27日下午5点半胡锡进又发了个帖子，这次他底气足了，说是拿到了蔡奇在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预印本，其中关于防疫这一段，确实没有谈及时间限定。所以胡锡进气壮了，说没有“未来五年”这回事，大家散了吧。

关于预印本，我略作解释。由于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很长，内容庞杂，所以在非常正式的各种大会，包括各级党代会上，汇报人的报告，包括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在会议正式召开时，由会务人员

给与会人员发一份影印版。蔡奇的这种报告，写作班子早就提前草拟完了，报送给汇报人进行审阅并进行修改，等到开会的时候，他在台上念的版本是最终版。胡锡进拿到的“预印本”应该也就是最终版，是蔡奇的讲话稿，否则，人家也不敢拿出来。

这个重要的证据说明，蔡奇没有说“未来五年”这个概念。

而在胡锡进协助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名之前，下午四点半，《北京日报》社社长赵靖云也在他的朋友圈引述胡锡进的微博，对于北京日报的纰漏做了点解释，说这是他们报社小编因为图省事，在蔡书记报告没出笼之前先做好了会议报告模版，这模板里，把“未来五年”这个时间状语搁在最前面，后面说北京市计划要做的一二三四事。结果，这小编忽略了“防控”不是五年性的日常工作，时间状语套错了。

从逻辑上来说，赵社长的辩解是合理的，但从社会影响面来说，堂堂北京日报社这么大过失就靠社长自己刷一下朋友圈了事？这太不地道了。

说实话，这个纰漏不小，北京日报社为什么不公开辟谣，公开道歉？这么严重失实的内容，刊发之后虽然8分钟就删除了，可大量群众已经被你的“模版”惊吓到了。我倒想问问，如果《南方都市报》犯这种错误，你们也这么轻描淡写？如果是腾讯犯这种错误，也装作没事发生？恐怕轻则总编辑挨骂，重则腾讯的新闻部门就得被关掉，反正他们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

然而《北京日报》是党的亲儿子，就可以这样一笔带过，完全不对公众做任何交代。我想说，你们这种官方媒体刊发如此重要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如此不专业，造成的结果就相当于造谣传谣。这么恶劣的影响，按我们日常所见例子，就应该被我公安机关抓起来判个“寻衅滋事”。

不过，在我们国度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句空话。官方的虚假消息就是“疏忽”，可以不追究责任，可以不给公众解释，比照不得普通老百姓。

然后咱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蔡奇书记如果真的说了“未来五年”要坚持不懈搞动态清零，北京老百姓就被吓坏了，因为知道未来日子不好过。可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日本东京都，会发生什么情况？

东京都知事叫小池百合子，职务相当于蔡奇，我们假设小池在他们议会上做工作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东京都防疫搞紧急事态宣言，不说别的要求，单说每个市民出门必须戴口罩，你看老百姓会怎么说？他们会不会害怕？不会。民众会笑，小池你有这个权力吗？谁理你啊。

《读卖新闻》采编也出不了这个错，因为给她小池十个胆子，她也不敢这么做，不要说小池，就连日本首相也绝不可能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也没有任何一个民众会配合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中日会有这个差别？因为，假设蔡奇真说了未来五年北京继续常态化动态清零，那他还真的能做得到，北京市政府肯定做得到。只要他们想搞，别说五年，十年也是有可能的。

你看现在各级政府动辄封城，多少人说“不”，可政府能办到吧？前段时间，丹东仅仅以靠近边境比较敏感为理由，不声不响封了两个

月的城，其实中间没发生一例阳性，那又怎样？谁能阻止他们？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只要以防疫的名义，搞任何动作都不需要拿出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政府的为所欲为已经通过防疫演绎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而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吗？毫无办法，有不少老百姓还举双手赞成呢，觉得得了社会主义的好处，把大家保护好了。

不说五年，就说现在，“动态清零”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有时间表吗？没有。可大家都在猜，政府会不会“向后转”，毕竟，现在经济下挫得不是一点点，接下来，民不聊生的局面可能会越来越凸显。

我的分析是，明年“两会”之后，这个“动态清零”可能就不“动”了，这是基于我对共产党的那套执政逻辑、管理逻辑得出来的。因为今年二十大、明年两会都面临换届，二十大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换届，明年的两会是国家领导人换届，而这一此的换届非比寻常。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经定下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只能连任一届，也就是说，最多干十年就得下台交班。但这一届，众所周知，很可能要突破，尽管现在还没有到二十大，离明年两

会也还有点时间，但我预言，十年交班的规矩肯定要突破了。而这样的改弦更张需要的是当政者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力绝对强力。即便以前，但凡临近两会、党代会，政府对社会管控的措施也都会加强，现实中上访人员要清走，流浪人员全部清场，网络上负面报道不能有，负面评论也不能有。而这样的惯例延伸到接下来的这一次，那更是得重拳整治了。

今年，以当下舆论纷纷扰扰的情况，政府此刻转身更是会引发各种负面评论，所以我认为，这个“动态清零”措施近期不会结束。那么，两会后就会结束吗？我还真就不知道。因为眼下这个防控措施对他们统治太有好处了，“疫情之下”，一个健康码的颜色就足够管住所有人。可防控对他们也有不利因素，是什么呢？经济。经济数据的跌跌不休是触目惊心的，而这是防控措施的最直接最刺激的负面效应，谁也怠慢不得。

所以我猜测，他们，也有进退维谷的地方，只是，得等大会开完了。

现在，“未来五年”的这一场虚惊是结束了，但悲观的人说，五年还算有个说法，啥都不说，会不会无止境？这问题，我回答不了。在专制主义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让你失去自由或面对别的苦难，而是缺乏稳定的预期，让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如果我们是规则社会，法治社会，那么每个人就好像懂得红绿灯的指示一样，能知晓下一步的可能性，能在稳定预期的前提下控制好自已的节奏，让全社会有默契和谐的秩序。而你现在在一个规则长期无效，制度随时修改的社会，你怎么判断？你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所以，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间，你除了根据他们已经暴露出来的运行规则对部分事情站在他们立场上做出判断之外，其他事情，你缺乏依据，也没有稳定预期，无法作出理性的决策。而这，是最可怕的，所以你听到任何谣言都会觉得像真的，听到任何好事，也会怀疑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说我不会猜测，也猜不出动态清零的终点在哪里。

谁能猜出来？蔡奇吗？恐怕，他也不能。不信，你去问问他。

我的1989

我的1989之一：觉醒的八十年代（上）

这是一封公开信，写于1989年5月17日，执笔人是我另外两位武汉大学的同学，写信的对象是北京市民和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本来这封信我已经散失了，为了做这个特别节目，确认更多的回忆，我找了很多大学同学，结果有幸再次见到了这封信。

1989年5月19日，正是厚厚一沓公开信复印件陪着我从武汉到北京，加入了八九学运的天安门队伍。时隔三十三年，当我重新看到这封信，回忆起当时的血脉贲张，当时的青春激扬，当时的家国情怀，我想，岁月不算蹉跎，情怀没有丢失。此时我回顾历史，是想告诉年轻人，告诉不知情的很多人，1989年的中国经历过什么，而六四，不应该被遗忘。

在讲八九学运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那个激动人心的80年代，因为如果你不知道1980年代发生过什么，你就很难理解八九学运为什么会发生。

我是1986年从陕西省潼关县考上的大学，我读中学的时候中国恢复高考，这是邓小平给予中国学子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大家都拼命学习，争取考上好大学。1985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失利，只考上了一个专科，为了上心仪的学校，我复读一年，终于以潼关县第一名的成绩被武汉大学化学系录取，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是刘道玉。

不得不对刘道玉多说几句。刘道玉自己就是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的，他和武大从做学生到任职校长，渊源极深，而在他七十年代末期任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期间，他曾对全国高校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等重大事项都起过推动作用。80年代他回到武汉大学担任校长，除了对高校教育体制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等改革之外，也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这些，都对武汉大学的学生，对整个武大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刘校长至今仍被认为是武汉大学校史上最著名的校长，也和八九学运有关。这，是后话了。

我入武汉大学时，高考恢复已过八年，我们上几届是第一批因为恢复高考得到人生转机的，他们大多是从田间地头走向考场，走出农村走向新世界，所以在大学求知若渴，发奋追回失去的年华。到了我

那几届，大部分同学是正常完成中学学业的毛头小伙，二十啷当青春勃发，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天之骄子”的自信与豪迈。在我们最好的年华，我们经历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所以每个大学生都是雄赳赳气昂昂，希望通过知识不止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要改变祖国命运，推动社会前进。

1986年9月10日，我只身一人来到了武汉大学报道，不日，应届新生奔赴湖南耒阳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年全国性的高校军训，为期40天。军训是按照新兵营的建制训练的，和新兵入伍不一样的是我们的训练周期短，而训练内容和方式却别无二致，这就造成了我们那届大学生第一次集体性的反抗。

教官眼中哪里有什么“天之骄子”，训练场就当时战场，可武大的大一新生都是刚从千军万马杀过了独木桥的尖子生，难免都有些傲气。教官在炎炎夏季为了动作的整齐或者姿势标准度，轻则训斥，重则打骂，翘起一脚踢学生屁股也是常有的事情，这学生们哪里受得了？终于有一次，我们班一个同学挨踢之后就说要罢练。双方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我当时是副班长，当天晚上，就带着同学一行到部队指挥所要求见军长、师长，反映问题。部队上人一听都乐了，有个军官讲，部队有纪律，禁止越级反映情况。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军队有这个规则，得逐级上报，不能越级反映情况。这也是我第一次敢于出头，代表同学去发声，去维护权益。

军训结束，回到武大已是11月，我们发现，大学校园里学术报告非常多，布告栏常常贴满，感觉可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一天，我听了一场影响了我人生走向的学术报告，是当时武汉大学哲学系教师赵林的讲座，题名我至今记得，叫《尼采：生命的悲剧意识以及自我超越》。

那场讲座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哲学有这么大的魅力，社会学有这么大的魅力。此前，或许是因为有科技兴国的口号，全社会都有点重理轻文的倾向，都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一直觉得只有那些学习不好，理科差生才会去学文科，因此在文科生面前多少还有点自鸣得意，然而那天赵林老师的讲座颠覆了我的认知，

为我打开了另外一个窗，我心潮澎湃，几乎恨不得马上从自然科学的座位上站起来，转身投奔文科去了。

其实几十年之后再看来，当时赵林老师的讲座内容还属于基础普及性的，但这对于从来不曾接触哲学的我来说，已足够振聋发聩了。他讲述尼采的《上帝死了》，是我闻所未闻而又深以为充满思考张力的话题，这足以让我对未来人生之路的规划顿然刹车转向。

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跨出化学世界，因为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班主任同时兼化学老师的鼓舞下度过的。这位老师之所以动员我报考武汉大学化学系，是因为他认定了我在化学学科上有灵气，所以上学时他常给我开小灶，让我先行操作实验，然后课上给其他同学做演示，而我最终的确不负所望，高考化学几乎满分。在听赵林老师的讲座之前，我是打算四平八稳地把化学系学位读完的，然而尼采的哲学命题一出现，我醍醐灌顶，之后就一头扎进了各种社科类的学术讲座里，同时也开始摩拳擦掌：不学化学了，改投人文科学门下。

天时地利，因为刘道玉校长推行的学分制和转系改革，我可以合理合法申请转系，于是，我开始了毛遂自荐的转系活动。

本来我最心仪的是新闻系，因为那是武汉大学最热门的系，他们有一个特别时髦的课程叫新闻摄影，我看到过他们学生拿着照相机出去拍照，特别神气。可当我兴冲冲拿着高考成绩单去找系主任时，人家婉言谢绝。我再去哲学系问，竟然也没门，转来转去，最后就只有政治学系愿意接收我，专业是马克思主义。

别无他途，我还是铁了心要离开化学系，于是就转到了政治学系。

四年本科生涯，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我们还学一些延展性的学科。我最喜欢的是《政治学概论》，任教的唐崇寅老师虽然当时还是个硕士生，但思想前卫新锐，已经完全用西方理论框架来给我们传授政治学了，他所讲述的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宪法等概念基本都按照原著导读，这些理论对我产生了一生的影响。而唐崇寅课上还论及了很多其他内容，比如国内胡平先生的《论言论自由》、约翰·斯图尔

特·密尔的《论自由》，以及约翰·洛克的著作等等，他们的思想都对我有很大影响。

唐崇寅老师也是高考恢复后入学，后留校执教，所以跟我年龄相差不多，我们亦师亦友，来往密切。他在湖滨的教师公寓组建了一个“青年学者沙龙”，邀请武汉大学的很多年轻学者、青年教师齐聚他家分享学术收获，我们一小部分学生也有幸能参加，而我就是“青年学者沙龙”里负责联络学生的人。

沙龙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李工真老师，他讲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起源，讲武汉城市文化都讲得非常好，现在他被称为武大名嘴，是德国问题专家，其实是早年就打下的基础。另外，新闻系的周光明老师讲新闻传播学也非常精彩。

《政治学概论》这门课结束后，唐崇寅开了门演讲课，我也选修了。受唐崇寅的启发，武汉大学成立起了第一个演讲团，整个社团也有几十、上百号人，规模不小。唐崇寅鼓励我带头尝试在学校里搞一次学术演讲，这个想法对我一个本科生而言，很有挑战，因为当时活

跃在武汉大学演讲台上的要么是学术泰斗，要么是青年学者，我一个羽翼未丰的本科生直接搞学术演讲，似乎太自大。但当时的学校管理者思想开放，看到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设置任何障碍，我只向校学生会申请了一下，就安排好了学术演讲，最终，以四五十分钟的时间完成了我毕生第一次所谓学术演讲，这个演讲的篇名到现在我也没忘记，叫《重铸传统的政治文化》。

为演讲成功，我阅读了大量政治学著作，除了看西方论著，我也看了时任复旦大学王沪宁教授的学术著作《比较政治分析》、《美国反对美国》等。在这些论著基础上，我得出了自己政治学方面粗浅的初步想法：我认为若要政治变革，除了必须有制度变革，还应该重视文化变革，如果没有文化变革，那么政治变革有时候也难以取得“实效”、成效。

记得我的演讲基本还算成功，唐崇寅老师上台给我点评了一下。虽然跟其他学术讲座，尤其是后来的“名嘴”们相比，我的演讲还稚嫩，但在我个人的成长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界碑。

唐崇寅老师给我带来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我通过他认识了其他一些有识之士，比如武汉大学的教授雷祯孝老师。熟悉八十年代思想史的人应该知道，他是最早研究“中国人才学”的学者，身世传奇。他也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很早觉醒的一批人，主动参与民主化运动，与王军涛等民主人士关系都很好。

雷祯孝曾因为政治见解有很长时间不能正常工作，刘道玉校长不仅邀请他到武汉大学任职，还专门设置了“高等教育研究所”，请他来当所长。我跟着唐崇寅结识雷祯孝后，也多次去雷家感受了一段“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日子，印象中雷祯孝家的藏书之丰富，令人咋舌，而他家的满座高朋也长期穿梭，不愧是人才学的研究者，他身边的人才当真如过江之鲫。

雷祯孝后来逐渐远离政治，专注于“人才”研究，他跟唐崇寅意气相投，曾想整理编撰一套关于中国八十年代思潮史的丛书，后来似乎未能如愿。但雷祯孝后期又从研究“人才学”延伸到对“电影学”的研究，强调电影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所以他近年来的成果主要是针对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应逐步匹配着看哪些电影，其

实，这个命题已经偏向于教育学。这个角度在国际社会还是很受重视的，据说日本学界很欣赏他的研究。

唐崇寅博士毕业后也远离政治，他下海，去南方做了一家国企法律事务部的主任，从此告别学术圈，如今已经退休。

对我来说，这些出现在我大学时代的师长是永难忘怀的，是他们，引领出了今日的我。

我以一己视角展现八十年代后期中国高等学府的生态：学生是什么样的，老师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学术志趣，我们的政治理想，我们的社会环境，而这些，是最终促使武大走向八九，促使我个人走向天安门的元素。

无论八九学运被如何评价，但八十年代毋庸置疑是我们大学生的黄金时代，它让我们每个人有醍醐灌顶的机会，让每个人积极思考，畅想未来。

我的1989之一：觉醒的八十年代（下）

八十年代的耀眼，是因为思想解放，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社会全方面的耳目一新、百花齐放。可以说，它一扫前三十年的盲从、混沌、愚昧、压抑和肃杀，撕破无数禁忌，走向新风尚。国人看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和过去相比，都变了。

是什么让一切截然不同？当然是因为文革结束之后，新的中央领导人自上而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导，人们虽然没有看到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直接对毛泽东文革理论进行反对和清算，但他们提出的新口号，实施的新制度新政策，就是和过去划清界限的思维模式引导人们走出文革误区的，这是和毛时代思想层面的割袍断义。而知识分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作为最接近政策导向的群体，可以明显感受到体制内许多人开始真诚反思过去30年的路错在哪里，他们也支持全社会反思，支持不同的声音出现在媒体上，这对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影响非常大。

思想解放首先体现在报纸刊物上。80年代的出版物，无论是报刊杂志还是书籍，内容都展现出多元化的一面，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这份中国只存在了9年的报纸在对国人思想解放、观点启蒙的影响力方面，远远超过后来的《南方周末》。当然，这跟两份报纸各自所处的社会时期包容度有关，导报生存和发展在八十年代的艳阳天里。

从报纸外观上来说导报并不大气，和《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这类党报相比，它只有4开的小版面，但胜在内容丰富多元，话题蓬勃而繁多，一开始是半月刊，后来改为周报，最终形成了4开16版的独树一帜形态。而导报的别开生面更突出在内容上，报纸名字虽带了“经济”二字，但事实上其报导内容除了经济领域，还涉及改革开放的各种前沿思想信息、制度建设，或反思或批判，或倡导或建议。不只是创刊人钦本立是新闻界崇尚民主自由和改革开放的资深媒体人，整个编辑团队都思想自由度很高，他们合力让导报变得前卫、新锐。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每到一周里《世界经济导报》出报的那天，都会提前跑到邮局等着买报纸，在这份报纸上，我读到了严家

祺、苏晓康的主张，感到受益匪浅。1988年春节前夕，导报推出记者述评，篇名为《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球籍”问题》。文中说：“从整体经济实力特别是人均指标比较，可以说，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文章强调，中国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继续拉大，照此情况，再过五六十年，中国有可能重演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中国人有可能被开除“球籍”。那篇引子开始，导报开始每期都出“球籍”问题的讨论，按照现在的说法，“球籍”上了热搜。当时的读者还用信件表达阅读感受和评论，据导报统计，关于这个话题的读者来信、来稿超过500篇，而导报上编发了三十多版。

我印象中有一个作者叫吴大求（音，未核实）曾表述了《一球两制》的观点，说既然中国能提出一国两制，那为什么一个地球不能两种制度呢？为什么我们自己实施共产主义，还非要去解放全人类，要打败资本主义？就让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有何不可？

今天的人们看这个设想，很多人会觉得这想法很初级，观点很幼稚，可你要知道，对于刚刚走出文革的人来讲，意识形态就算不是头

等大事，但解放全人类的说法也没有被弃之荒野，此时有人竟然提出“一球两制”，当然是惊世骇俗。

除了导报，我们还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那些作品的题材、角度是后来许多年都没有再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1988年中央电视台出品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河殇》。

《河殇》的制片人夏骏是北京广播学院（后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中央电视台的，他在做《河殇》前曾参与日本跟中央电视台合作的纪录片《黄河》，由于《黄河》没有过审，片子没能在中国播出，为了再次呈现《黄河》的精彩段落，中央电视台就另外策划了《河殇》，夏骏也被指定作为这个项目的牵头人。夏骏后来还有一个杰出贡献是开创了央视知名的《新闻调查》栏目，但对他职业生涯来说，有终身荣誉的仍然是《河殇》。

《河殇》播放时万人空巷，它在思想界引发的震动是天崩地裂式的。这个片子摆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窠臼，用一种新语态，用开放的视角来讨论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此前，中国媒体界讨论社会问

题的语言离不开意识形态的立论，言必谈阶级论，从农民起义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词汇，而《河殇》完全抛弃了这一套，它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大量引用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学术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近代中国落后挨打。

诚然，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再看《河殇》，我们会发现片中不少分析和结论有点牵强，但置身于那个时代，《河殇》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都是极其巨大的，它强调中国的内陆文明很难自发地产生工业文明，必须要靠外力介入才能走向蔚蓝海洋象征的现代文明，而中国近代已经证明，夜郎自大、闭目塞听的农业文明古国一定会走向落后，必然要挨打。

《河殇》播出之后，武汉大学也掀起了一轮学术大讨论，我记得青年教工们天天搞学术演讲，分析《河殇》表达出来的学术思想，印象最深的是梅园大讲堂里，新闻系的周光明老师讲完《河殇》分析后，台下的我们也觉得受到了启发，当即便决定搞辩论赛，我当时还代表我们系参加辩论，辩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不能孕育出现代文明？

其实，初出茅庐的本科生理论基础很薄弱，不过大家热情高涨，在辩论赛场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认真得很。由此可见，《河殇》对全国的思想界、学界，对大学生的影响有多大。

除了这些社会现象之外，政治体制也出现松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不能光搞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治体制改革如果不动的话，经济改革走到一定程度就会难以为继了。所以，那个时候执政党内的改革派明确：“党要管党”，而党外的事情尽量不靠“党”来插手，其实，这种执政理念已经非常现代化了。

八十年代末，还有一些发生在庙堂之上的事情让大家印象深刻。最有意思的是台湾来的人大代表黄顺兴做人大代表的事情。黄是一个在台湾做过县长和议员的人，到大陆定居之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件事情本身就挺轰动的，而更轰动的是，1988年第七届人大开会的时候，会议首次在过道上为代表准备麦克风，让代表们表达意见时，黄顺兴大声说出了：“我反对！”他反对的内容是周谷城出任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理由是“我不认识这位候选人，但从简历上看，他已八十有九。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应该让他好好保重身

体。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虽然黄顺兴的发言仅1分多钟，对于在台湾多次参加竞选的他来说，这种意见表达十分自然，并不艰难，但对于一贯全票通过的中国人大会议来说，这反对绝无仅有。邓小平等台上领导也始料未及。而黄顺兴的反对获得了全场热烈掌声，因为这是人大会议上的第一次反对意见的表达。虽然周谷城最终仍当选为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但表决中出现了11张反对票和61张弃权票，可以说，黄顺兴翻开了中国大陆政治历史的新一页。

黄顺兴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言论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深圳市的市长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按照法律规定，市长应该由人大选举产生。但深圳没有人大，怎么会有市长呢？这番质问对媒体来说实在罕见。改革开放深圳建立特区的时候制度不完备，没来得及组建人大就任命了市长，虽然在中国市长由人大选举也就是个形式化流程，深圳但违背了法律条款却也是实际情况，所以媒体也大胆刊登出黄顺兴的质问：没有人大，深圳市长是通过什么程序产生的？

据说，是邓小平曾经提出既然深圳是建特区，搞一个市长直选也没什么。这也充分说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中前期对政治改革是持开放

态度的，他的很多理念其实很超前、务实。只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开始警惕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些理念发生了改变。

而社会上的思想解放潮流一旦开禁，在年轻人看来，一切就可以百无禁忌。当时出版界的《走向未来丛书》就是个例子。丛书的编委会都是有很高学术水准和知识见地的知识分子，王岐山也是其中一个编委。丛书介绍的海内外著作都是非常前沿的思想，让众多如饥似渴想要了解外部世界的年轻人有了很多新知。这些思想启蒙的点滴辐射让80年代的年轻人对整个社会、对中国前途命运有了一个思考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铺垫，你也很难想象会发生八九学运。

当这一起源于共产党内部的思想解放运动溢出到全社会的时候，虽然上下一致地反对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挂帅和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得到了大众拥护，但随之而来的所谓“自由化”在速度和广度上却都远远地超出了执政党最初的预期，不到十年，人们已经从反思文革跃升到反思整个社会制度，乃至开始反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和执政党履职的合格程度。

八九来临，是思想解放运动狂飙突进的结果，解放的进行曲如此鼓舞人心，最终让最年轻最热血的学子走上街头摇旗呐喊，喊出“民主万岁”和“自由万岁”的同时，也喊出了“反对官倒”，“反对党内腐败”等等内容，最终引起了共产党内保守派的不安，继而带来了冲突。实际上，思想领域的解禁是必然伴随着民智的开启，也必然会有人追问：我们以往信奉的一切似乎存在逻辑漏洞，而世界存在多种可能性，我们的一党专政，是不是也存在问题呢？

从八六思潮到八九学会，都是这样一个追问，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名词出现了。

当然，当时我身处其间不能明白这其中缘由，时隔三十年，大家渐渐恍然。

回顾那个时代，有几个场景让我记忆犹新，其中一个，是1990年3月，崔健的全国巡演。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因为崔健曾在1987年和1988年在北京高校演出有轰动效应，以及他曾在八九学运前期去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而对他有所限制,但他还是以给亚运会募捐的名义开始了巡

演，搞了几个城市，巡演就被迫终止了，但幸运的是，武汉还是迎来了崔健。

那时候我很迷崔健，听说他要来武汉特别激动，为了凑演唱会最便宜的十块钱门票钱，我卖掉了自己的一件羊毛衫，跟同学去洪山体育馆听了那场激动人心的演唱会。至今记得，六七千人的现场上，崔健让灯光熄灭，然后让大家点起了打火机，在黑暗中陆续燃起星星点点的火光，而崔健的吼声在静寂的舞台上猛然响起：我曾经问个不休.....

哇，我们跟着沸腾啊，觉得自己心里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情绪被崔健的歌释放了。

我觉得崔健不仅是摇滚歌星，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者，他对我们那代人的影响不亚于一个思想家，而且艺术的影响力直击人心，比学术更快地穿透我们的外壳进入沉默的心灵。至今，当我听到《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花房姑娘》，都会心潮澎湃，因为那是八十年代的声。

崔健的摇滚唱响了八十年代，那是个觉醒的时代，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一个每个人都努力地呼吸新鲜空气的时代。正是在那样时代的孕育下，最终，我们走向了八九学运。

我的1989之二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八九学运六四天安门事件，更不知道，八九学运实际上是“八六学潮”的延续，而八六学潮已经被很多人淡忘，或者，一开始就了解得非常少，而我恰恰是1986年9月份进入的武汉大学，所以，还在懵懂之间见证了武汉大学的“八六学潮”。

因为我作为大一新生并没有直接参与“八六学潮”，所以，关于这段回忆，我联系了校友们来了解，因为“八六学潮”的骨干，不少也正是“八九学运”的中坚力量，我联系上其中部分同学后又采访了他们，通过他们，回忆起了36年前的武汉大学往事。

当时我们大一新生刚从军训基地回武大没几天，学潮对我们来说非常突然，是从一阵敲门声开始的。

1989年12月9日中午时分，有人到我们宿舍区挨个房间敲门，说游行去啦，游行去啦。我不太懂，没敢去，但我们班有几个学生胆子

大，就跟着大部队从桂园集合，开始往外走。

这次游行的组织者名叫单自杰，好像是法律系85级的学生，当学生们聚集着准备出校门的时候，却发现校方似乎已经提前知晓，把校门锁上了，不过学生完全不顾这个阻拦，大量的学生还是翻墙出去了。我们班那几个同学中有两个一看要翻铁门，评估了一下学校阻力，还是发怵，于是回去了，只有一个同学胆子大，翻铁门跟着出去了。这是第一拨游行队伍，全校加起来大概有几百人，但相对于武汉大学当年总数来讲，比例也蛮大了。

根据出去游行的同学说，他们穿过街道口先到了中南财经大学招呼同行者，待队伍壮大一些后，又一起步行到了武昌火车站，转了一圈就前往洪山体育馆，最后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湖北省委礼堂。本来省委礼堂前面有一个铁栅栏门锁着，学生们开始翻墙，工作人员一看，干脆把门打开了，于是学生涌入湖北省委礼堂，提出要求，说要跟湖北省委领导对话。一个副省长出来接待了他们，代表学生上台的一个是单自杰，还有一个是社会学系的应仲民，而对话要谈什么呢？

其实游行的学生没有特别成熟的想法，只说要民主要自由，关于具体化的议题，说的却是要改善饭堂水平之类的小事。

湖北省副省长就开始打官腔，他问，你们要民主，你们要什么样的民主？你们要自由，谁剥夺了你们的自由？学生虽然对其居高临下的状态有所不满，但确实说不出什么特别明确的目标，所以只谈了五六分钟就一哄而散了。出了省委礼堂后，大家连队形都不在保了，散着回学校了。

那么到底武汉大学的学生为什么要上街游行，他们要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时游行的学生说不出很多所以然，而今天我们再回顾，才明了其中的渊源，也就是八六学潮掀起的大环境原因和具体起因。

1985年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情况，农村的经济改革基本成功，而到城市实施的时候，阻力却非常大，虽然中央要求简政放权，也就是削弱党的集权管理方式，开始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但实际上，“放权”根本放不下去，党管全套的现实一时之间无法打破。

八六学潮的风，其实在1985年就开始吹起了。

1985年12月，同济大学[陈破空](#)等长期活跃于讨论国计民生，讨论民主自由和改革开放的学生本来想通过纪念“一二·九”运动在上海发起游行示威，呼吁推进民主进程，发起政治体制改革，但因上海市管理严密而组织过于仓促，决定放弃原计划，改为直接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陈破空等共计十位研究生联合签名写信，呼吁当局尽快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让他们意外惊喜的是，这个呼吁得到了回应，胡耀邦指派中宣部两名人员前往上海与陈破空等人展开对话，陈破空后来在他的八六学潮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向这两位中宣部干部当面阐述了我们的政见：扩大民主，广采民意，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讲得激情，两位干部听得认真。我们的结论是：胡耀邦，一位难得的中共开明总书记。中国的政治改革，或许可能从党内改革派开始？”而中央与学生这样的交流和呼应，后来被视为八六上海学潮的一个铺垫。

事实上，1986年邓小平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也提出，必须在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故而，1986年国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其中，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言论在高校中传播最广。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励之表态最多的是：“实行人民监督是政改成败的关键环节，人民代表至少应拥有质询权和弹劾权”。

方励之虽是天体物理学家，但对社会科学也非常感兴趣，曾著有《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是大学生当时热烈追捧的书籍，我觉得至今值得一看。方励之支持民主化运动，作为大学校长，更对学生充满了传播民主自由精神的热情，在中国科技大学，及北京、上海等地的很多高校都做过演讲，所到之处获得学生高度赞誉。用现在的话来说，方励之先生是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偶像，他带动了高校学生对于民主自由的憧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向往。

同济大学的陈破空等人在得到胡耀邦派员接见后，本就热情更高，在1986年11月8日和11月16日，又分别请到了刘宾雁和方励之两个人先后到上海同济大学进行演讲，在上海掀起极大波澜，其尤以方励

之的演讲影响力巨大。据陈破空回忆，当方励之抵达演讲现场时，等待听讲座的人有一万两千多人，是方励之参加过的演讲中听众人数最多的一次，而那次演讲，把整个上海高校学生的改革参与热情推向了高潮。

几天后，安徽省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前夕，中科大学生认为当时人大代表候选人是内定的，不符合民主决策程序，于是提出质疑，在校园内出大字报，号召师生抵制选举，说师生均有权自己提名或自荐参加竞选。第二天晚上，方励之校长在自荐学生和推荐候选人的演讲会议上点评，支持学生争取民主权益，并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这句话给学生莫大鼓舞，次日，即1986年12月5日，中科大的学生联合安徽大学等其他高校的四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开始了关于争取人大代表选举权力的游行。“八六学潮”开始了。

而之所以发源于安徽合肥的游行会蔓延到其他城市，是因为当时高校之间的串联已经非常活跃，武汉大学当时也常有北京学生去串联，所以当时武汉大学校园内也常有人贴大字报，提倡民主自由。本

来没有中科大事件，武大也计划用上街游行来纪念“一二九运动”，得知安徽发生高校游行，武大的游行声势就愈加壮观了。上午搞了一场不算，晚上又搞了一场更大的游行。

其实，现在回头看，当时不少学生对民主自由的理解还比较初级，所以，在武汉大学第一拨游行过程中，他们只能提类似于饭堂质量不好，对军训有意见等话题。其他城市的高校游行也一样，各有各的诉求，没有中国科技大学这样直接对人大代表选举程序提反对意见这样的议题，更没有系统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这一方面是因为前期思想禁锢的时间非常漫长，另一方面八十年代西方思潮虽进入也还是初期，大家对民主只有朦胧理解，喊的口号是“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僚，反腐败”，但这些口号无法进入到细致阐述的层面，更不可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倡导思路。但仅仅是大学生们能进行串联，能上街，能把这些民主自由理念口号喊出来就足够令中央政府震惊了。

武大的第二拨游行队伍是在第一拨回来的时候开始的，仿佛接力。我当时作为大一新生还不解其意。第二拨游行的组织者是中文系

的刘向阳、化学系的郑乾、新闻系的范鹏、图书馆系的王继祥、历史系的刘伟江这些人。

刘向阳一直是思想比较活跃的青年，很早就开始密谋搞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游行，除了在自己学校暗地发动，他还联系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廖宝斌，后者又介绍了湖北省音乐学院的鲁迪，据说鲁迪当时已经被湖北省音乐学院开除了，但他还在学校活动。

那天傍晚，郑乾等人把床单撕开，上书：“要民主要自由，自强不息”这样的词，然后到附近山上砍了两根竹子，把床单挑起来做横幅，又买了一大堆鞭炮，到人最多的食堂前面点起，等着学生聚集，到人数有一定量之后，就先在校园里转一圈呼朋引伴，再走出学校。对于游行口号，有人提出要喊“打倒共产党”，没有得到多数人同意，因为这口号太极端，会把大家吓住，于是回归为“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游行过程中，学校很多政工干部跟着他们，偶尔还提醒：不要太极端，差不多就行了。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学校虽然不希望学生游行，但对于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是同情认可的，师生关系也基本融洽，这点，跟中科大方励之他们的态度其实一致。

示威的人群从武汉大学出去，先到华中师范大学，与廖宝斌他们会合，再行进到湖北省音乐学院，串联了大约有两千五百人左右之后，直奔武昌火车站。在火车站的12路公交车站牌下，鲁迪跳上公交车开始演讲。鲁迪是学音乐出身，有很强的艺术家气质，他从社会不公讲起，很有煽动力。听众中一个市民受到他的感召，也跳到车上去演讲，说学生们你们永远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不要怕，我们市民支持你们。之后，刘向阳也走上前，他引经据典，提到中国自北宋以来就是靠学生上书，直至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青年学生力量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些演讲在武昌火车站掀起了一股热浪，路过的人们纷纷附和，掌声如潮。

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派去的办公室主任也在底下，等刘向阳讲完，就赶紧悄声告诉他：可以了，撤吧。于是学生们就大张旗鼓地准备回校，结果走到半道傅家坡的时候，有人说，湖北省委可以跟学生对话，于是游行队伍转弯前往湖北省委礼堂。省政府秘书长等人出来与学生代表对话，鲁迪自告奋勇想当代表，结果被拒绝，说不是学生，不能当代表。学生们面面相觑，看来，他们把鲁迪的背景已经调

查得一清二楚了，而刘向阳、廖宝斌进入了座谈现场，作为学生代表跟湖北省的官员进行了谈判。

和第一拨游行人的对话一样，省政府官员问学生的具体诉求是什么，刘向阳他们脑子里就懵了，具体要求他们还真的没想清楚，临时想议题，第一条还是改善食堂伙食，其次提出学校对学生太粗暴，压制学生。最大的命题是：希望湖北省委向国家反映，要逐渐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党内的官倒、腐败、双轨制这些负面现象要处理，以及请省委领导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账。

游行队伍回到武大已是深夜，武汉大学的校领导们都在等着对游行学生分别谈话，每个系都发出指令，凡参加游行的人，都要向系里汇报。

我们班的同学一回来，大家就招呼：“英雄回来了”！他正跟我们讲游行见闻，转而听到系里让去汇报，又紧张了，不敢去，还是害怕秋后算账。因为没有主动汇报，次日早上辅导员就跑到他宿舍里不点名地告诫：有什么情况最好说清楚。这同学虽忐忑不安，最后还是悄

悄到辅导员那里去承认自己参与了游行，好在辅导员倒是没有深究，只表示知道了，承认就行，还说不要有思想包袱。

处于串联中的刘向阳他们本来还想持续再搞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的，但第一天晚上被重点谈话后，他们系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主张对刘向阳处理，另外一派反对，两派意见分歧的结果，是刘向阳没事，系里支持学潮的一个领导却辞职了。这位领导宣布辞职时，为避嫌保护刘向阳，还特意在会议上指着刘向阳说，这个人一贯不听话，在我组织的会议上还专门迟到。从这种师生关系上，当时校内的开明、民主氛围可见一斑。

事实上，当时很多高校的领导都认为学生运动本身是积极向上的，是进步的。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本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先锋，长期以来对学生运动持支持态度，在八六学潮中也一样，不主张处理学生。虽然还有不懂事的学生提出打倒刘道玉，但刘道玉对学生的暗中支持始终没有放弃。

由于游行示威始终被视作对体制的巨大挑战，所以说是不秋后算账，高校也还是对学潮进行了彻查，类似刘向阳这样的组织者遭到了反复盘问。据他回忆，“一二.九”之后，他们系里专门搞了一个办公室，几个领导轮流找他谈话，要求他交代情况，问游行是谁组织的，怎么组织的，大家互相写揭发材料。

刘向阳说，这个过程让他痛不欲生，天天在办公室里有老师看着他写交代材料，不仅仅交代自己的，还要写交代别人的。各种压力之下，他交代了鲁迪参与整个学生运动的过程。写完这个交代材料之后，他心里不安，跑到华师找到廖宝斌说自己很愧疚，把鲁迪供出去了。廖宝斌劝他说，你也不用内疚，鲁迪其实早都被盯上了。我跟你情况差不多，也被天天要求写交代材料，我们最后也把鲁迪给供出来了。

而多名学潮组织者共同举报鲁迪的结果导致鲁迪最终受到了严厉的处罚。1987年3月，鲁迪因“阴谋制造社会动乱、妨害社会秩序”，被判有期徒刑4年。鲁迪最后成为了八六学潮武汉地区的牺牲者，湖北省音乐学院没有选择保护鲁迪，早早地以开除他作为对政府的回复。而

武大和华师选择了内紧外松，学潮的发起者刘向阳、廖宝斌由于学校的同情和庇护，没有被处理。

据说，武汉大学当时的副书记郑永廷坚决反对处理学生，所以当中文系准备处理刘向阳的意见向学校汇报的时候，郑永廷很坚决地压了下来，刘和廖表面上受到了学校批评，但是一没有受处分，二没有受到公安机关询问，而除了鲁迪被当成负面典型之外，那个跟随鲁迪跳上公交车演讲的市民，后来竟然也被判了有期徒刑3年。

武汉的八六学潮就以这二人的判刑成为整个运动的句号，中国科技大学作为八六学潮发源地，被清算的是校领导：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的管惟炎和副校长方励之同时遭免职，被调离合肥，管惟炎调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员，方励之调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从更高层面看，八六的学潮导致的结果就更严重了，胡耀邦总书记因姑息学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行为，被迫引咎辞职，虽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实际已没有政治前途。同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掀起了，邓小平和其他几位党内的“老人”均认为，八六

学潮是在针对“四项基本原则”，是在威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对不能纵容，而胡耀邦作为总书记，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1987年1月13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成立，该署专门负责全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工作。同日，中纪委发出《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要求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不管是谁，如果违犯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要受党纪处分。邓小平特别提出，对于严重危害党的人，要坚决清除出党。他点名了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认为此三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魁祸首，他们的政治言论是“八六学潮”的思想根源，故而三人陆续被开除党籍。

一年多以后，我们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因为教育改革不被教育部认可，又受到其他势力的合力夹击，也突然被免去了校长职务。刘校长一走，武汉大学的改革基调变天，校方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八九学运开始后，刘道玉虽然已经没有职务，但仍然站出来重新支持学生，成为武大人的精神领袖。

八六学潮的时间并不长，但被认为是八九学运的一次预演和彩排，在这次运动中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法出笼了，这充分说明，邓小平在内的很多党内人士对于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从最初的喜闻乐见变得警惕乃至敌意，他们认为，解放搞过头了。

我还记得当时一开始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一位学界领袖还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自由就是自由，“自由化”是什么意思？“自由”本身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词，一旦说“自由化”，就变成负面效果了，所以为什么说“自由化”？其实就是在表示弄巧成拙。我们说一个人是好人，是好的，但你说他“好人化”，就是说他本是坏人，说“正当”是褒义，但说“正当化”就是贬义。所以“自由化”这个词汇是政治标签的表现，从邓小平的角度来讲，他觉得，从80年代开始推动的改革有点失去控制了。

虽然，80年代总体上是民间社会跟共产党之间一个蜜月期，在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阅兵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学生还打出了一个“小平你好”的横幅，成为一代人的记忆，说明共产党的政策在民间社会获得了非常大的支持，大家几乎是心心相印的。然而，随着80年代后期

方励之、严家祺、苏晓康等一批思想启蒙者带入了独立思考精神和西方各种迥异于马列主义的思想，大家就开始深度思考，开始研判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对不对，能不能改。邓小平等人对于八六学潮，对于那些思想启蒙者的论调感到危险，他们立即反击，开始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对高校进行思想整治运动，事后回头看，他们一定觉得当时的整治力度不够，因为从八六年到八九年，在全国各地的高校里思想解放运动的火苗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愈演愈烈的。《世界经济导报》仍在发行，它刊登的很多文章仍然充满了火辣辣的态度，所以，虽然党内在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但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实方兴未艾。

八六思潮结束，但余烬在酝酿更大的力量，1989年，当已经下台3年的胡耀邦大面积心肌梗死的消息传到国人耳中，人们情难自抑，巨大的悲伤被迅速转化为要做点什么的动力，天安门，到底还是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我的1989之三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了一本书叫《惊心动魄的56天》，下发到各个高校，用于揭批所谓赵紫阳集团利用学生搞动乱的来龙去脉，对今天的我来说，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很高，因为书中详细地列出了哪一天发生什么事，谁说了什么，报纸报道了什么，记载得非常详细，不止有北京高校的情况，也有武汉的情况。而我也必须借助这书才能相对准确地回忆起当年自己经历的一切。如果对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感兴趣，我建议大家可以找来一读。

同时，我也声明，事隔三十多年，尽管这段时间我也做了些功课，但是一些细节，我肯定不敢保证百分之百准确。而且，人往往会在回忆中无意地美化自己，恐怕我也会有这个情况，所以欢迎经历过八九学运的人，经历过武汉大学1989年事件的人们来纠正、补充我的讲述。

1989年的4月19日傍晚，我和女友吃完饭正散步时，发现通往校门口的主路上走来了一队游行队伍，队伍的前面抬着胡耀邦的遗像，旁边的录音机里放着哀乐。我知道，这是纪念突然在4月15日去世的前总书记胡耀邦，于是赶紧过去，当即就加入到了游行队伍里。

大家都知道，胡耀邦是在八六学潮后，因为“姑息学生”，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强有力的手段，所以承担责任被迫请辞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的，尽管他后来仍然被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大家都知道，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两年后，他的自然生命也突然告终，当然让所有经历过八六学潮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不能接受。人们把他遭遇不公和心脏病发联系在了一起。

4月15日当天，北京大学、北师大的校园里就开始有学生贴出挽联、大字报，要求党中央重新评价胡耀邦。4月17日，北京有学生开始上街游行。武汉大学也是校园里先出现大字报和挽联，到了4月19日，游行开始了。那一年我是大三学生，已经对学生运动有相对充分的认知，对民主自由也有专业学习的背景，更是一腔热血的时候，对于这样的游行，自然积极参与。

和八六年一样，武大的游行队伍经过街道口又走到了武昌火车站，火车站广场大，可容纳的学生多，又是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人来人往，坐火车的人也会把消息迅速扩散到其他地方，所以武汉大学的学生，以及武汉其他高校的学生都喜欢把武昌火车站当作是游行的重要一站。

4月19日晚上，我们武大学生游行到武昌火车站之后，可能因为没有人组织策划，所以现场就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我当时算是在学校里比较活跃的学生，有人看到了我之后就鼓动我说：王志安你能不能讲几句？我年轻气盛，也确实觉得，在如此激情澎湃的时刻应该要振臂一呼，于是马上响应，说没问题。几个同学就把我一抬，站到了一个自行车的后座上。

我至今还记得，几个同学扶住我的大腿，让我站稳，而我环顾一周，整个武昌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大量的学生，还有一些围观的市民看着我，照相机的闪光灯在我眼前开始噼里啪啦响，我想，说什么呢？我说了两点。

第一点，我反对在这个时间点召开人大会议制定《游行示威法》，因为《游行示威法》本来应该是保障公民游行示威权利的，但是在此时此刻，人大召开特别会议制定《游行示威法》让我们感觉不是想保障这项权利，而是要限制这项权力。底下的人山呼海啸，就开始鼓掌了。第二，我说我们学生现在走到了历史的潮头，希望政府能够正确面对学生的诉求，跟学生沟通对话，而不要把学生当作是反对势力来对待。下面一阵叫好，学生又开始鼓掌。

我讲完这两点就下来了，没有人接着上去讲话，于是大家开始回校，队伍也不再保持成游行状态。记得从武昌火车站回武汉大学的路还是挺远的，我的鞋不得劲儿，半道就干脆把鞋都脱下来了，光着脚走回了武大。

结果一进宿舍，我们系的系主任、党总支书在宿舍等着我呢：“英雄回来了”。我一看，麻烦了，系里知道了。当然，我知道瞒是瞒不住的。因为当晚武大是在八九年的第一次游行，我是唯一一个站出来演讲的学生，系里能不知道吗？

谈到晚上11点多，党总支书和我们系主任还特别交代宿管人员，不要熄灯，苦口婆心地跟我谈：你太年轻冲动，游行的性质很严重的，知道你们热血澎湃，但是……我明白如果不应着他们，当晚这关我过不了了，谁都别想休息。他们目的也简单：第一，说清楚参与过程，第二保证此后不再组织参与类似活动。搞到凌晨，我终于承诺，说不再从事类似活动了。

4月19日这一天，是我正式参加89年学运的开始，武汉学运的帷幕也拉开了。

后面几天，学潮运动就风起云涌，学生的热血一旦沸腾，要让他们凉下去可不那么容易。而游行示威又空前地简单，不需要别的组织动作，只要抬个花圈，放一张胡耀邦的遗像，在校园里走一圈，就会凝聚起一大群激情燃烧的大学生们。平时大家有事都压抑着，不敢乱来，但那几天，学生们一看，游行了之后学校也没怎么着，那就敞开了吧。这一方面是因为年轻的心血脉贲张，另外一方面，也揣度着法不责众，以及回顾八六学潮最后的收场，校方多半还是都保护了学生。

学生们游行的目的，是希望4月22日那天，在胡耀邦的追悼会上，他能得到党中央一个公正的评价。大家都在说，最关键的是看两点：一，邓小平是否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第二，悼词会如何评价胡耀邦。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寄托规律，一个人的盖棺定论，对逝者和与之有感情而生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悼词是有一套专用术语的，最高评价标准是叫“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一词一句都隐藏着微妙的玄机。所以4月22日这一天，全国都在等着胡耀邦的追悼会，看看到底党中央是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他们对于民望很高的胡耀邦的定论。

追悼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电视有实况转播，我们学生宿舍没有电视，所以大家都跑去食堂看那里挂在墙上的几个电视机。令大家松口气的是，追悼会邓小平还是参加了的，赵紫阳致了悼词，没有在最关键的第一段说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悼词第二段，出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是一个有限的补丁。

后来看相关记录才知道，就在大会堂内召开胡耀邦追悼会的时刻，在大会堂外，北京几万名学生提前一夜坐在天安门广场上等着为胡耀邦遗体送行。官方要求学生在大礼堂门口，让出一条30米宽的通道，以方便参加追悼会的车辆通行；作为交换，官方在广场上架设高音喇叭，进行追悼会的实况转播。学生代表同意了这些条件，几万学生在几分钟内，就整齐地平移30米，空出了通道。

然而，当追悼会进行到尾声，学生们没有听到关于胡耀邦1987年被迫下台的平反内容时，他们不满意了。广场学生草拟了请愿书，并要求李鹏走出大会堂接受学生这份请愿书，为了郑重表达学生意见之急切、尊重，学生领袖郭海峰、周勇军、张志勇三人甚至跪在大会堂正门的国徽之下，高举请愿书，可惜的是，三个人跪了超过45分钟，没有任何人出面。

而在武汉，学生运动也没有因为胡耀邦追悼会的结束而平息，当天下午，武汉大学的学生又开始游行了，那次游行，我没参加，是丰园研究生宿舍带头组织的。研究生搞游行比我们本科生要正规，他们焊了一个特别大的铁花圈，花圈上缠着花，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参与其

中，在前面抬着铁花圈，从武汉大学出发，开始了第一次跨江游行，目的地是汉口的武汉市政府。

武汉市政府和武汉大学之间的距离大概是三十公里左右。这么长距离的游行，一走就得七八个小时。4月22日这一天的游行就是如此，大家从武大出发，过大东门阅马场，然后奔长江大桥，那时4、5个小时已经过去，学生先驻足休息，歇口气再继续往前走，到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们就在汉口最繁华的的中山大道游行。当时武汉市民都驻足拍照，给学生加油，然而走到滨江公园的时候，学生已经都累得人仰马翻了，人数没有出武大门时那么多，队列也不是那么整齐了。

我那个抬着铁花圈的同学已经彻底累虚脱，所以就放下了铁花圈。这下，很多学生就认为游行到此结束，便一哄而散。后来，我同学只好又找了一个人，把铁花圈从汉口的滨江公园抬回到了武大，那真是个重体力劳动。

休息了几天，一篇社论又让高校炸锅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文中将之

前全国各地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及学生、市民的抗议活动称之为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定性为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工人所制造的动乱。这篇“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其实4月25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公布了，学生听到后，对立情绪马上上来了。

本来，从4月19日开始到4月26日期间的一个礼拜，总体来讲学校和各级政府对学生没有太多的干预，但是“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让大家非常不平：我们是在悼念胡耀邦前总书记，胡耀邦也是共产党体系内的一个高级官员，又不是一个敌对分子，你怎么能说学生悼念胡耀邦是一场动乱呢？学生的不解、失望乃至愤懑比此前更甚。

当日，武大有人贴出布告，说准备在华北楼302召开武汉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仪式。

这个布告是谁发布的我不清楚，但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很期待这个会议。自从游行开始之后，我虽然答应系里老师不再参加活动，但实际上也阳奉阴违，在学校里还是比较活跃，私下仍在各个系之间串联，能搞自治联合会大家就不用偷偷摸摸串联了。从北京案例看，联

合会是十分必要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或“北高联”）成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基本是有组织有策划的，武汉高校此前没有组织，搞活动都是一盘散沙，而官方学生会跟学生运动是对立的，他们负责给学校领导做密探，阻止学生参加游行。所以，如果踢开官方学生会成立自治组织，大家都乐见其成。

那天晚上，华北楼的302教室人山人海，我是提前去占了位置，后面来的人就坐不下了，有站着的，有趴着窗户的，大家都期待着组建仪式的开始，没想到，刚出现了一个学生主持人，把要组建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计划一说，突然就冲出两个人到讲台，说他们是学生干部，质问学生，你们要做什么？目的何在？你们要成立这样的组织诉求到底是什么？

虽然现场学生很多，但基于“四·二六社论”的压力，武汉大学第一次试图成立类似“高自联”的努力就被学生干部给搞黄了。

“四.二六”让学生运动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学生诉求从悼念胡耀邦变成要求中央对学生运动正名。武大学生的上街游行也变成了持之以恒的一件事情。临近五月，大家开始等待一个重要的日子：五四。因为“五.四青年节”的来历就是基于对学生运动的纪念，在共产党的语系中，它被视作中国近代化新生之缘由，而八九的“五四”，政府又会如何评价呢？

全国各地的高校都在串联，商议要搞全国性五四大游行。

我印象最深的是《科技日报》对北京五四那天的图文报道：5月4日上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从学校走出，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照片上，走在第一排的学生每两人抬一个大字，字特别大，写着：“五四的先辈们，我们走来了”。当时我看到这样的标语，热血沸腾，感觉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从五四的那一代先辈手里接过了历史责任，要完成他们未竟的历史使命，我们和他们是传承关系，我们不仅不是在搞动乱，而且是在完成国之重任，我们有无上的使命，也有无上的光荣。

那天，武大的学生也走上了街头，再次走到湖北省省委礼堂，向省委领导递交请愿书。学校各级领导都跟着一起去了，一方面监督学生不要出格，另外一方面沿路就跟我们这些学生头头谈心，试图力挽狂澜，减小游行的摩擦力。

我们武汉大学的党委副书记郑永廷走到半道看见我了，说“这不是王志安吗？你又参加了？你觉得你参加这场运动，目的是什么”？我一看，郑书记已经累得够呛了，这段路不近，我们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都有点气喘吁吁，更不用说他们五六十岁的人了，因为必须要跟着我们的节奏走，所以三四个小时之后，这些校领导就基本上累得要垮架子了。郑书记旁边有个工作人员帮他拿着脱下的外套，他还是紧赶着跟我走，一边还是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你说说，这么搞，能实现你的目标吗”？我只好回答他：“郑书记，能不能实现目标我不知道，但是，把我们的这个诉求表达出来，就实现了我们的历史责任，完成了我们的历史使命”，然后，我就跟他拜拜了。

到了湖北省委礼堂，几个学生代表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递交了请愿书，应该说，当时的学潮力度是很大的。不过，那天有个好

消息是，赵紫阳在当日上午会见出席亚洲发展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向他们表示，学生上街游行并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赵紫阳说了跟“四.二六社论”完全不同的评价，他说，学生是爱国的，不是动乱。

这下，学生们感受到了，中央出现了两个声音，继任胡耀邦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是认可学生运动的，他只是强调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还提到，“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应该说，赵紫阳的这段话给学生基本是平反了。北京市高自联的首任主席，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现场就在天安门广场对全体学生传达了他作为高自联主席的“五四宣言”，说七十年前我们的先辈们用他们的年轻热情创造了中国的历史，现在历史的责任传递到了我们这代年轻学子身上……最后落点是：宣布从第二天开始，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开始复课。

当时，为了抗议"四.二六社论"，北京的各个高校已经全面罢课了，赵紫阳的讲话一出，周勇军认为实现了学生的诉求，就可以开始复课了。

八九民运是走到了缓和的路口了吗？非也。

我的1989之四

1989年的5月4日，中国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全国各个高校大规模游行，希望中央对于“四.二六社论”作出纠正，给学生运动一个正面评价；二是赵紫阳公开讲话，说学生运动不是一场动乱，学生是爱国的。在赵紫阳的讲话发表之后，时任北京“高自联”主席的周勇军在广场上宣布第二天就复课。然而，周勇军的计划没有实现。

周勇军的复课决定没有经过高自联的群体决策程序，属于个人决定，因此违背了高自联的纪律，高自联其他常委，如北大的王丹、北师大的吾尔开希对周勇军很不认同，认为要把学运进行到底，而周勇军也随即被罢免，吾尔开希当了“高自联”的第二任主席。

事后通过历史复盘，我们知道，可能赵紫阳这一派官员跟学生有接触，他们希望学生继续往前走，不要轻易地停这场运动，然而当年我们身处其间是不知道这些信息的，所以“5.4”那一天，本来武汉大学

的学生们也以为这场运动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因为赵紫阳总书记已经对学生运动重新定位评价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此前一段时间，学生担心学校会秋后算，好在学校没有实质性地处理任何学生，如果运动真在五四时结束，那么学校里其实就没有发生实质意义上的互相伤害，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没想到，北京传来消息，学生重新开始罢课了，“革命形势”又变化了。我们作为地方院校，一直以来唯北京马首是瞻，既然北京继续罢课，那我们也得跟着。

那段时间，武大已经罢课多时，我们以为要复课了，我就去上了久违的《近代政治思潮史》，很不好意思又迟到，那位任课老师平时跟我关系不错，看见我从教室后门溜进去，还特地招呼我：“老王来了”！当时教室里也没几个人，他觉得很久没在课堂见到我了，招呼我一声，这种心头一暖的细节我今日还记得。只是，我们没上几天，又罢课了。

五四之后的学生运动烈度更高了，因为大家发现，学校对学生运动的态度竟然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最一反常态的是一向抵触学生运动，天天给我们游行学生拆台的学生会竟然摇身一变，也开始组织游行了，令人咋舌。

后来想，不管是反对还是参与，学生会说到底还是听学校领导的指挥，五四后，大概他们有了官方支持学生运动的明示，于是开始积极搞革命了。不过，因为前期革命表现不佳，大家对他们组织运动的参与度不是很高，但他们的长处是有经费，有组织，还可以打官办的旗子，搞得似乎很正规，不过，在我们眼里，这个组织不是经过我们全体学生选举产生，没有合法性，所以你再变身，也是学生眼里的"非法组织"，我们不认可，我们非得要自己选举自己的组织。于是，那一段时期武汉大学的学生游行就出现了两派，官办的，和民办的，大家各走各的路。

除了学生会，更明显的是老师和学校领导的态度从跟着劝，找谈话，要求交代变成了放任，甚至鼓动。像我这样一个活跃分子，天天

出去游行也没人找我谈话，还有老师背后点赞，搞，继续搞，挺好的。

最典型的，是八六学潮里的学生领袖刘向阳的待遇。八九运动一开始，老师就给他打防疫针，警告他不要参与，还要求他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的当天必须离校回家。结果，他万万没想到，5月12号左右，系里主动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返校的刘向阳自己心有余悸，系领导却责备他落后起来：“当时不让你们搞运动的时候，你们特别积极，现在让你们搞运动了，你怎么还畏手畏脚”？

武大中文系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插班作家班，里面不少活跃分子，其中一个知名人物野夫，他在89年也是个活跃分子。他找到刘向阳说，“你知道吗？中国每天要死几百万人，但是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只有区区几个，现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不管是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就看你这几天的表现了”。他知道刘向阳是八六学潮的领袖，有号召力，而如规劝的人所言，刘向阳终于不再畏手畏脚，他再一次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尽管他已经大四即将毕业，也仍然冲向了第一线。

5月15日这一天，刘向阳他们中文系的学生就发起组织了一场游行，这场游行是武汉大学自“五四运动”之后搞得最大的一场游行。学生想串联隔壁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穿过两校之间的“友谊门”，动员水利电力学院人数众多的工科生一起游行，再穿过水果湖直抵湖北省政府。

到水院之后他们发现，水院的学生竟然都被学校锁在宿舍区里面了，看来工科院校的校领导就没有武大领导们这么紧跟前沿，保守怕事，于是把学生给锁了。看到武大学生来游行，水院学生就在宿舍里喊，“快营救我们！”武大学生一激动，拥向水院宿舍大铁门，竟然用身体生生把锁给撞开了，刘向阳当时是前面第一排，被撞得很疼，但马上抖擞精神，和水院学生汇合后，人多势众，浩浩荡荡就到了湖北省委礼堂前。当时天色已暗，但学生们马上就开始组织演讲。

第一个出来演讲的是一个姓闵的学生，他说，我们今天站起来是响应历史的召唤，现在历史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到底是推动历史向前进步，还是开历史的倒车，就看今天学生的表现。然后他说要带大

家唱一首歌，那是不论你走到何方，只要唱起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的歌。

他唱的是《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歌曲一下把现场气氛调动起来了，刘向阳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走到了前面，开始演讲。刘向阳在回忆中感叹说，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他的演讲被记录了下来，虽然是当局的反面教材，但也让他成为《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里，提及武汉学生运动涉及到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他曾一起搭档领导八六学潮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廖宝斌。

刘向阳回忆自己的演讲内容是：今天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1789-1989），且五四运动从1919年到现在是七十周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历史的轨迹在这里交汇，我们在这里听从历史的召唤走到了历史潮头，没有退路，只有往前走。

这话一说，学生们掌声雷动，大家高喊：“自由万岁，民主万岁”。

喊完口号，刘向阳又讲：“有些人讲不能搞民主，是因为一搞民主就会乱，这是托辞和借口”，他还模仿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人群中你们肯定有特务，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你们如果认为有罪的话，请判我们爱国罪！但历史女神将来会把你们的判决撕得粉碎，因为我们是无罪的”。哗，底下又欢声雷动。他一共讲了四五十轮，引起大家持续欢呼。

当时，在后面观察的学校领导如郑永廷及系主任等都对刘向阳的演讲赞赏有加，接着，他们让刘向阳进入一辆吉普车，通过一个地下通道开回了武大。休息了一个晚上后再见校领导，领导也对刘向阳表示：你演讲得很好。没有人对他有责怪的意思。

第二天，当武大学子再去湖北省委礼堂静坐的时候，武汉市其他高校也纷纷前来声援了，首当其冲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廖宝斌带着的华师学生，紧接着是华中理工大学的学生从关山赶来。如此，武汉市影响最大的三所学校胜利会师。在湖北省委礼堂面前，他们就开始商议，要向湖北省委省政府递交请愿书，下午他们临时起草，交给湖北

省委礼堂，要求政府必须在4点钟之前回复，否则，学生就到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去静坐。

大家都知道，长江大桥如果有人静坐，武汉市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就断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但即便如此，到了下午4点，政府没有回复。于是，刘向阳他们就带领学生到了武汉长江大桥去静坐，最终也确实形成了武汉市第一次长江大桥被人为堵塞的情况，武汉三镇之间跨江要道失去功能，市民要想过江就得坐轮渡，若是汽车，就得从一个叫徐家棚的码头坐汽车轮渡。

这两天运动我并没有参加，只是从同学那里道听途说，而我为什么没去长江大桥现场呢？是因为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搞运动。

因为5月13日开始，北京市的学生已经开始搞绝食了，全国各地不少高校学生陆续赶去北京，齐聚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学生，我们武汉也有学生去。我每天看新闻，觉得在武汉搞运动参与感不够，只有去北京的运动现场才让人心潮澎湃。所以，我打定主意要去北京这个政治运动的核心。

当时我们政治系有一个组织叫政治家俱乐部，是我上一届一个叫魏劲松的活跃分子发起成立的，我是这个政治家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我把自己的意愿告诉魏劲松之后，他表示支持，但提出建议：要搞革命必须得有钱，你想去北京，咱们先一起上街去募捐。否则没有钱，搞不成革命。

所以5月16日，当武大学生到长江大桥静坐的时候，我也已经带了一拨人到了武昌火车站开始募捐了。我们依然通过演讲吸引来往的群众，我的演讲内容包括两个：第一，目前国内的革命形势未来应该如何发展，第二，谈学生们的诉求。很快，群众就开始给我们捐款，第一批捐款凑到了一两百块钱之后，我们先买了个话筒，然后接着开讲。

我至今还记得，在南来北往支持我们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先是捐钱，然后又给我们买了一袋饮料，他在我演讲间隙把我叫了一边，悄悄告诉我，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不便公开支持，但认为学生干得好，他很支持，希望我们加油。我当时非常感动，对当时的我来说，《人民日报》记者是遥远而又神圣的。

这一整天我们组募捐到四千多块钱，这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字，我估计大概相当于现在10万人民币吧，拿回去之后，我们俱乐部的所有募捐凑到一起，魏劲松统计，一共募到了一万两千块钱，用军用挎包装了七八包，挂在他的房间里。我很兴奋，就说，钱募捐到了，我准备去北京了，魏劲松同意，正是在这个情况下，由魏劲松起草，我和另外一个《民主导报》的创始人一起修改，形成了这封《致北京市民和天安门广场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5月17日，我们找了一个印刷厂，将公开信印刷了好像五百份左右，我带往北京两百份，剩下三百份交给魏劲松在武汉大学校园里张贴，以及游行过程中，给武汉市市民分发。

但我们想去北京又面临一个交通问题。那两天京广线已经因学潮而中断，没法坐火车赴京，我们一商量，就由我一个人肩负重任，买一张飞机票飞到北京去，代表武汉大学去支持革命活动。可买飞机票也不容易，光有钱不行，必须要有介绍信才能买。谁能给我开这个介绍信呢？我想到了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位老师，他有一个现代化研究所的管理职务，我找到他说明情况，说怕自己再晚就赶不上北京的革命

形势了。老师二话不说，拿出公章，给我的介绍信盖了个章。于是，我就以现代化研究所职员的名义买了一张飞机票，至今记得，机票价格270块。

然后，我就背着一书包传单，肩负武汉大学学生的重托，坐上了从武汉飞往北京的航班。

我的1989之五

1989年的5月18日，天安门学生绝食进入到第五天。这一天，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李鹏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绝食学生的代表。其中一个是在北师大的吾尔开希，当时他打着吊瓶跟李鹏进行对话，给中国观众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但这一幕我没看到，因为当天一早我就背着挎包，步行去了武汉的南湖机场。当时武汉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已经瘫痪，我只能步行前往。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在飞机上吓得也不敢吭声，等落地之后，我马上问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天安门广场，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于是我就问同一航班的乘客怎么去天安门广场。他一听就问我，你去干嘛？我说，我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我带着武汉大学写给天安门广场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到那儿去声援他们，周围人一听

特别激动，然后热情地告诉我，要去坐机场大巴，坐到西单后走一站地就到。

我到了大巴车上又担心了，因为当时天已擦黑，又下着淅淅沥沥的雨，路上行人不多。从西单怎么去天安门广场我还是不清楚，于是我就向邻座问路，周围的人又问我，你去天安门广场干嘛？我把意图又说了一遍，整个大巴车的乘客立刻沸腾了，他们说，我们支持你们学生，干得好。下车之后好几个人告诉我怎么走，甚至有一个人还带我走了几百米，然后，我就沿着长安街，在小雨中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走着走着，逐渐感觉到前面有光，有声音，拐过南长街一看，纪念碑前灯火通明，路灯下细雨霏霏，而天安门广场通往长安街的两个路口，一辆一辆的救护车响着，带着广场上因绝食而晕倒的学生前往医院抢救，那个场面令人震撼，也令人心痛。

整个天安门广场最外沿有学生每隔一米站成的一道封锁线，我从外面要想进入天安门广场，就必须穿过这道封锁线。我走上前去，学生们就问：“你的通行证呢？”我就拿出武汉大学的学生证，“我是武汉

大学的学生，代表武汉大学的学生们来天安门广场递交我们支持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行为”。我拿出公开信，他们就给我放行了。

就这样，我拿着学生证，和那封公开信，一路穿行到纪念碑的三层，那是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指挥部帐篷所在地。走近了，我能看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面挂着一大排喇叭，里面不停地宣讲着声明和各类注意事项，所有人都非常忙。

我把公开信交给了指挥部，他们接下了这封公开信。就这样，我第一步的使命就算是完成了。然而接下来我要做点什么呢？夜雨中，我看着天安门广场一侧救护车不停地在拉人，看起来似乎要持续整个通宵，而我能去哪呢？

在天安门广场上走了几圈以后，就到午夜十二点了，我已经感到疲累，站在天安门西侧开始考虑在哪休息。西侧有个圆顶建筑，是中国银行的总部，入夜后他们的职工就出来跟没有地方休息的学生打招呼，因为当时绝食的学生已经被北京市公交公司开进去的大巴车接到了车里，但是非绝食的学生没地方住，很多学生就在细雨霏霏中在广

场露天睡觉。中国银行的职工们就招呼这些学生到他们的职工宿舍去休息，我也跟着他们走进了中国银行总部地下室的职工宿舍里，那些职工对我们特别热情，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是从武汉大学来的，他们很感动，然后给我打热水用来洗脚洗脸。至今，我也难忘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一个晚上，是中国银行总部员工收留了我，在寒冷雨夜给了我莫大的温暖。

第二天天晴，我开始去天安门广场北侧绝食区，跟绝食学生聊天。问他们绝食这几天身体怎么样，为什么要参加绝食。作为如此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我去北京前就想好，要做两件事，第一，把这份公开信送到天安门广场的指挥部，声援北京的大学生，第二就是在广场上多积累素材，我要见证这场运动，搜集好这场运动过程中有史料价值的传单，希望将来这些资料能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八九天安门运动。

5.19下午，我离开了绝食区到了纪念碑的西南角，找到了武汉大学驻天安门广场的驻地。其实，我抵达天安门广场之前，武汉大学已经有不少人到广场了，他们聚齐在一起，被分配在了纪念碑西南角，

在那里我见到了温勇和张涛，他们都是武大法律系的，一个是国际法专业的本科生，另一个是研究生。由于我们在武大闹革命过程中就互相认识，所以见了面很高兴，随后就一起商量如何让学生晚上有休息的场所。因为当时的天安门广场露天休息条件不好，不下雨的时候非常热，一旦下雨又非常冷，下雨时又没有公交车可让学生转移，所以晚上休息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都很担心学生的身体会出问题。

结果就在那个下午，武汉大学驻点上的一个女生突然在太阳暴晒之下精神崩溃，行为失控。我们赶紧叫医生过来把这个学生接走了。大家都意识到，长时间在这种户外露天场所，人高度焦虑，身心可能都容易出问题。

好在，当晚天安门广场的喇叭里宣布所有绝食学生复食，改为静坐。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事后才知道，学生们得到消息，中央要在北京搞戒严，理由是北京失控，学生被某种势力劫持才搞绝食的，以此要挟党中央。学生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决定复食以便于让戒严没有借口，故而把绝食改为静坐。

但，为时已晚，事实上共产党内的决策已经确定，5月20日，李鹏还是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随后也成立广场指挥部和“纠察队”，希望能够来保卫天安门广场。因为一旦实行戒严的话，军队可能就要进入到北京了。这一天，我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同学那里睡，恰好，也赶上了次日他们学校组织成立“和平敢死队”。

当时北京各个高校都在成立“和平敢死队”，5月21日，北师大“和平敢死队”也成立了，我虽然不是北师大的学生，也报名参加，成为副队长。“和平敢死队”的任务，是去进入北京的各个路口，向周边市民宣讲，争取他们的支持，动员市民到路口用各种方式挡住军车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挡路的方法很多，群众也都自己想办法，有的是把路上的隔离障碍物弄倒，横过来，有的是把隔离墩用来挡道，有的是把公交车横在路口，总而言之，不让军车通过。不少市民表示，愿意在路口二十四小时把守，一旦有军车过来，就向学生通风报信。

为了动员这些市民，我们这些“和平敢死队”的队员一天一夜没合眼，就奔赴北京的大街小巷，每到路口，看见市民就讲。当时很多老百姓其实也不了解全面情况，都在向我们打听，我们就传播当下情

况，让他们知道天安门都发生了什么，戒严会怎样。我作为“和平敢死队”的副队长，每次都会演讲，队友们会一把把我抬到电线杆下的墩子上。那墩子大概一人高，我就站在那上面对群众讲目前的形势，我们的任务，分析革命形势的未来。

市民绝大多数都很热心支持，给我们鼓掌，于是，跨过一个又一个路口，做了一个又一个演讲，大家都忘了时间，也不记得讲了多少场。终于，迎面看到解放军的军车，而车辆前面地上躺着北京市民，他们不让这些军车往前开。

记得有一个令人眼眶一热的情景是，北京的大爷大妈们把家里煮的稀饭、鸡蛋给解放军军车送去，给敞篷卡车里坐着的年轻士兵吃，然后说，孩子们你们吃吧，吃完之后，大妈跟你说一句话，记住，千万不能向学生们开枪。

那天，我们和平敢死队的同学们都因为累得不行，最后是在路边睡了一觉。醒来后，周围的大爷大妈们也给我们送来了煎饼、鸡蛋和稀饭，让我们吃了一顿。我们回到了北师大暂做休整，大家准备再出

发。但是，我想去天安门广场跟武大同学会合，只能跟“和平敢死队”依依惜别了。我们那支“和平敢死队”里二十多个同学因为我和建立了一天一夜的战友感情，临别时，在我的挎包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背着这个挎包，带着我在北师大找的一些传单，我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我心里放不下天安门，不知道戒严会给学生运动带来什么。

我的1989之六

印象中，我离开北京师范大学的和平敢死队，重新回到了天安门广场大概是5月22日。

这个时候的广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戒严令的下达，学生想与政府对话希望的彻底破灭，天安门绝食的学生停止绝食，改为静坐在大巴里休息，而其他外地高校的学生多数仍在天安门广场南侧。

当时，全国声援天安门学生运动已越来越轰轰烈烈，广场上，除了北京高自联，还有来自各地的大学生，在运动人员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和因戒严而成立的广场指挥部形成了两套班子两批人马，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就容易有分歧。最终，北京八大院校联合各派代表去广场召开了现场会议后，现场投票，多数票要求高自联撤出现场指挥，广场由广场指挥部领导，避免了多头指挥的混乱。

我回到武汉大学驻地，现场还有几十名武汉大学学生，他们推举我为武大驻天安门广场的代表，每天参加全国高校代表的联席会议。所以我每天能拿到一个通行证，这个通行证确保我能在广场各个区域穿行，而当时一般学生是不被允许在广场上随便穿梭到其他区域的。当时的纪念碑一二三层的通行证权限也不一样，等级最高的才能到纪念碑三层，因为那里是广场总指挥部所在地，每晚两三百个高校聚在一起，了解当时形势的最新情况，对重要事项进行讨论和表决。

在这些会议上，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南京大学代表李录，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也是副总指挥。李录演讲口才非常好，由于较早到了天安门广场，也有见地，成了天安门广场核心决策层的一份子，而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柴玲非常信任和尊重他，所以李录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上也影响柴玲的判断。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之外，尤其是周边区域，各种各样的游行开始频繁发生，这些游行有的是全国各地来天安门广场声援的大学生在组织，有的是北京市各个单位组织的员工上街游行声援活动。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甚至警察部队，

这些所谓党的最核心部门也都派队伍上街去游行了。我们甚至还看到了老师在组织小学生上街游行，而北京乃至中央的机关单位，甚至国务院，都有人组织游行。

在林林总总的游行横幅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中科院化学所的横幅：“锂+硼=苯+氮”，锂硼苯氮都是化学元素，化学所很巧妙地用化学配平方程式表达了他们对李鹏的看法。还有一个横幅，我忘了是哪个单位打的了，写着“何以立本，几时东昌，缘木求鱼”，非常巧，把当时在六四中几个小丑都写进去了，“何以立本”是指北京市委宣传部的袁立本，“几时东昌”意指的当时的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缘木求鱼”是抨击当时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由于巧妙令我过目不忘，33年之后还记着。

当时因为游行单位实在太多，所以每个队伍的游行距离其实都不长，即便如此，长安街上仍然挤得人山人海。我们武大学生游行的时候，我也就招呼大家从纪念碑的西南角走到长安街上，因为根本没办法走远。我们队伍里的张涛有一次拿着汽水瓶，用一个小木棍上绑着的绳子吊着，讽刺邓“小瓶”。而广场上反对邓小平的横幅也不少。

游行困难，天天在广场上静坐也不是个事，我就经常出去溜达，看看社会上的情况。溜达过程中经常看到有学生到胡同、街角去跟市民演讲交流，我也上去围观，说实话，不少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演讲能力都一般，不过这个也好理解，毕竟大多数学生是凭借着自己一腔热情参与到这场政治运动中的，此前可能也没有接受过相对专业的指导，所以谈及民主自由这些概念难免流于空泛，多数时候就是喊喊口号。我跃跃欲试，觉得作为政治学系学生，可以利用我的知识储备去给大家做些概念普及。

后来我就开始了“市井演讲”活动，我从专业出发，但也考虑市民听得懂，所以尽量通俗，深入浅出。我主要讲了两点，第一，我强调我们学生搞运动是坚持合法反对方式，并不逾越法律。分两个层面说：首先我们强调自身有反对权力。因为政治如果没有反对就没有竞争，如果只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不能叫政治文明，只有反对党存在的时候，政党之间才能竞争，这才是现代政治文明。其次，我们认为反对行动和言论必须是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因为我们做的不是简单的权力更替，而是要建立一种政治文明新秩序，希望跟

现在的当权者共同来分享权力，参与决策，绝不是取而代之，把他们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我们不是砸烂旧秩序的革命者，我们是建立新秩序的代言人，所以我们必须全程恪守法律的边界，不越界。

讲到这里，不少市民就开始给我鼓掌。

我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因为我们有这门专业课，我自信这是有学界共识的。民主是多数决定，但同时要保护少数，防止多数暴政，防止多数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我讲什么是自由，自由分为言论自由、人身自由、财产自由等等。我把这些最基本的政治学概念给大家普及，对于市民来说，他们虽然只知道了一个大概，但这些观点已经比一般学生讲得深入得多了，所以非常受欢迎。

记得有一次讲完，我吃到了人生第一顿肯德基。因为那一次的演讲就在肯德基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店，前门总店门前，我讲完后，肯德基的一个服务员就自己掏钱买了份肯德基给我端了过来，是炸鸡。我从来没有吃过肯德基，非常感动，就问了那个人的名字，她的名字跟

我姐姐名字一模一样，所以时隔几十年，我仍然记得她的名字，我也仍然记得那顿肯德基。

作为武汉大学驻广场代表，参加了几天会议，看了那么久的形势，我逐渐觉得这场运动可能有一些问题。从外在看，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卫生状况已经非常糟糕，无人清理垃圾，而全国各高校的来北京的学生晚上基本就靠帐篷安营扎寨，有的直接露天而宿，健康风险非常大。此外，大家虽然都长期坚守，但士气逐渐受影响，很多人对这场运动的走向感到茫然，我开始觉得，长期搞下去不是个事。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出席联席会议，在对学运领袖们近距离观察之后，我也产生了一些个人看法。我发现，学运领袖们有官僚化倾向，每每出现都前呼后拥，而且高自联的组织架构也高度共产党化，分宣传部、组织部、纠察队等等，跟早期共产党闹革命时的组织结构一模一样。

作为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我信奉的是现代政治秩序，而眼前的高自联或者广场指挥部基本上都是以我所反对的那种形态构建起来的

组织机构，所以我开始怀疑，他们究竟能否完成当下的历史使命。慢慢地，问号在我心里越来越大，终于，我决定在联席会议上发表我自己的看法。有一天晚上，我们又一次召开联席会议时，我终于举手，说要发言。

我在那天晚上的会议上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建议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应该集体撤离，回到学校去复课，为什么？我说真正体现我们力量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能够发起一场运动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已经证明了，当我们想让学生游行的一动员学生就上来了，当我们想让学生静坐或绝食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能力，但是，这只是一种较低层次的能力，真正的能力还应该包括我们可以让现在天安门广场所有静坐的学生回到学校复课，如果我们具备了这种能力，才会令对手望而生畏。

为什么现在戒严部队要往天安门广场进攻？是因为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绝食、静坐。当我们回到学校以后，他还有什么戒严的理由？这才让对手最难处理。这才是真正的表达我们力量的一种表现，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说不要把政治改良当做是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战役。我们之所以是改良就不可能一次达到目标，如果我们的革命目标是推翻政府，那我们可以再激进，但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吗？显然不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中国，有新的政治秩序，这个目标可能要分多次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要抛弃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但现在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做法其实就有点这种思想的苗头，想通过一场学生运动就解决我们过去30年来所有政治领域内的积弊。更可怕的是，这样一种不妥协的状态也把政治对手逼上了绝路。

我说，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改良，是不是也应该让政府有一点台阶下，有一点面子？这样政治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我们学生上街游行了，最终你没有把我看作是动乱，又认可了我们学生是爱国的，我觉得我们的阶段性目标就已经实现了，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承认学生上街这种行为是合法的，更遑论还承认学生游行是爱国行为的，有过吗？没有过。这个目标一旦实现，就意味着我们今后如果在政治上有反对意见，我们仍可以走上街头，这难道不是很大

的政治收获了吗？可以见好就收了，不要把政治对手逼到绝路。这是我说的第二点。

所以我的核心观点就是，现在就撤，回学校上课。

然后大家表决，200多所学校表决，最后支持我的，二十几票，反对票两百多票，没通过。

没通过没办法，这是政治运动，只能靠多数表决，所以我也接受这个现实。第二天，陆续有其他高校的学生代表找到我，来跟我辩论，认为我的观点不对，有的人过来表达对我的支持，但是毕竟表决的结果已经生效了，我也接受这个结果。

我也反思这个结果，其实在政治运动中，尤其在群众政治运动中，越激进的声音越容易获得多数人的认可，而越是温和理性的声音，越不容易得到众人的认可。所以，政治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就有一种自发的加速力量往前推动，如果你不能始终站在潮头，很快就会被甩下去，这是我作为亲历者的体会。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反思学生运动跟我追求的那种政治目标之间是不是契合？还是它被某种自我盲目的力量裹挟着往前走？这是天安门广场给我一个很大的思考和收获。

而我个人，在高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已经阐述清楚了我的政治立场，这是我对学运的看法，也是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最高光的时刻，虽然当时只有极少数人认同我的观点。

学运结束之后，在我们学校专门有两个老师整我的材料，要求我交代在北京的所有行动。我跟这老师讲，我跟其他学生都不一样，他们主张要冲、冲，但我很理性温和，我在联席会议上也提出学生应该回学校复课，我不激进。结果，我们那老师说：“王志安！你这个建议更歹毒，要真像你那么做，我们政府怎么办？”

我无话可说。

撤退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后，我个人对在天安门广场继续从事“运动”也渐渐失去兴趣。恰在这个时候，我的女朋友从武汉大学跑到北京找到我。她和另一个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一起，把我拉到故宫博物院

的大门下面。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博物院巨大的门洞下空无一人，我们三个人在那里促膝长谈，探讨这场运动的价值和意义，最后我们都认为继续参与运动已经没多大意义了。

我的那位好友决定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学校，我也决定从北京离开回武汉大学。次日，5月31日，我和女友就从北京坐上返程的火车。当时火车不要票，就跟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串联一样，只要拿上学生证，就可以去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不需要买票。而北京到广州的京广线也重新开通了，我和女友就此离开了北京。

从5月18日到到5月31日，我在北京一共待了13天，这13天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我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学生运动。如果说有什么遗憾，我觉得是我到北京次日，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温家宝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时，我因为不知道消息没去现场，还在中国银行总部地下室的职工宿舍休息，这是个遗憾。当时赵紫阳去的是绝食学生避雨的一个公交车里，他拿着一个喇叭所讲述的话中央电视台也播放过，当时赵紫阳知道，其实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所以他讲话的过程中一方面勉励学生，另外一方面也说出了自己的无奈，

“我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这一口河南话被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下来，并传播到全国，我觉得，这些话里包含的内容非常多，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

而这13天的收获，对我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我在北京各个地方的演讲极大地锻炼了我的口才，锻炼了我在面对众人时的思辨和论述能力，而更重要的是，使得我对这场运动，以及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有了更深入的更个人的理解。总而言之，八九学运让我得到了淬炼，所以，当我再次回到武大，继续从事学生运动的时候，我感觉，此时的我，跟前期的我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

我的1989之七

1989年6月1日，我回到了武汉大学。而在我离开武大的近半个月时间内，学校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最主要的变化是，我走的时候武大还没有建立自己的“高自联，但之后很快，武大的“高自联”成立了，第一任的领导者都是很早就开始发起游行的八六学运的元老，比如刘向阳。在“高自联”的领导下，武大发起了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学生运动。就在我离开武汉的当天，学生到武汉长江大桥静坐的那日，湖北省当时的省委书记关广富也跟武汉的高校学生代表刘向阳、应仲民等进行了一次对话，这场对话还在电视上直播了，影响比较大。

后来，武汉高自联还组织了几次学生到红钢城（武钢），劝说工人进行罢工，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在武汉地区影响也比较大。当时武汉的学生们认为，这场社会运动如果只是学生动起来很难成功，要联

合工人阶级出来支持学生，才有可能成功。而武汉工人阶级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红钢城职工们，当时武钢是武汉最大的国有企业，工人的数量也特别多，如果他们站在学生一边，革命形势的成功可能性就更大了。

再往后，到武汉长江大桥上去静坐已经成为武汉大学生游行的必然之路，所以5月20日之后长江大桥基本就被常态化封堵了，京广线也中断了。而在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组织的同时，学运领袖们的权力斗争也开始激烈发生，就像北京“高自联”第一任主席周勇军没当几天即被罢免一样，武汉的“高自联”组织也是成立没几天就罢免了第一阶段的领导层，所以等我回到武大的时候，是“高自联”第二届领导班子在指挥了，而其中无论是领袖还是骨干，我大都不认识，包括在我后面从北京回到武汉的温勇、张涛这些人，也不认识武汉“高自联”的新一届领导。这就造成了我们的尴尬：我们老革命，他们新革命，大家都要闹革命，组织结构已经完备，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和张涛他们也不可能再插入其中，于是，武大“高自联”时任主席哲学系的潘铭泉就组织了一次会议，形成一个决议，让我们这些学运里的“革命元老”在“高

自联”当智囊团，没有行政职务，但是可以列席“高自联”的会议，并且可以在“高自联”的会议上发言，拥有表决的权利。

然后，北京就传来了镇压的消息。6月3日晚上，戒严部队开始从北京周边强行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路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很多市民和学生就在这天夜里就牺牲了。消息传到武大，我们都非常震惊，所以6月4日那一天，武汉各个高校的学生就自发地开始上街游行，6月4日晚上，武汉大学的“高自联”开会做出决定：一、决定在6月5日这一天，在武汉大学的小操场召开一场“六四”死难者追悼会；二，决定在6月6日举行武汉市各高校联合大游行。

6月5日这一天，“六四”追悼会在武汉大学的梅园小操场举行了，追悼会上，两名从北京回来的学生代表在台上讲述了戒严部队冲到天安门广场导致广场血流成河的惨烈情景。然后他们带头喊口号，在台上跪了下来，我们其他所有学生一起下跪，大家痛哭流涕。

紧接着，学生就开始在校园里纷纷焚烧自己的团证、党证，在我们桂园食堂门前，很多团员证被归拢在一起之后点着了。当时武汉大

学还有一个插班生是军人，还当众把自己的军装给烧了，据说他在“六四”之后受牵连很大。我只记得他姓童，不知道他后来下落如何。

到6月6日，武汉大学的学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北京镇压学生，这场游行一直走到了汉口，走了整整一天。回来之后，“高自联”内部召开了一场会议，讨论接下来怎么办，北京镇压已经开始，地方上要继续学生运动吗？大家已经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

会议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要坚持斗争，甚至不惜以武力方式要跟政府对抗，要搞武装斗争，但是我坚决反对，我认为我们学生是没有能力跟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这不是大革命时期，可以去秋收起义，可以到井冈山打游击，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一方面没有社会基础，另外一方面，说实在的，我们学生也没有这个能力跟政府武力对抗，说白了只会白白牺牲，所以我当时的提议是“空校”。“空校”什么意思？就是大家现在赶紧从学校离开。我们追悼会也开了，游行也游了，接下来不确定政府在北京的镇压会不会波及到其他城市，那时候每天各种消息满天飞，难辨真伪，有人说武汉市郊区也有很多军队

要来了，要镇压武汉的学生。所以我建议大家分散离校，回家休息，因为我们空校了，就算他们来镇压也镇压不到我们学生了，而且空校本身也表达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

最后，我的“空校”决议获得通过，所以我们准备号召全校学生赶紧离校返家。

结果次日，我正出门准备走，碰到了“高自联”的另外一个成员，说头天的决议被推翻了。我很纳闷，就到“高自联”办公室去问，这才知道，“高自联”又开了一个会议，这次的会议没有通知我们，会议过程中就把已经通过的“空校”决议又给推翻了。

我非常震惊，没想到这一届武大“高自联”对程序竟然视同儿戏，毫无严肃性。说白了，这是对组织程序毫无尊重感。我太生气了，当即表示辞去智囊团的职务，就离开了。

6月9日，我离开武大，准备执行“非暴力不合作”计划，但当时京广线断了，我回不了洛阳，只能跟我的女朋友坐船去了上海，想着可以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再从大连绕道躲到内蒙古去。说句心里话，我

当时以为已经没有机会继续读书，内心也想逃离武汉，因为不知道军队的镇压会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来抓捕我们这些参加了天安门运动的人。

在上海待了两天，陇海线通车了，我就和女友坐火车回到洛阳，在洛阳待了几天后，还是决定先跑到内蒙去。当年从洛阳到内蒙必须得在北京转车，所以6月21日早晨我们又一次抵达了北京。

我忍不住想再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眼，所以从北京火车站出来之后就准备坐地铁到天安门。结果，到了天安门广场那一站刚下车，还没出站，一个警察一看我们是学生模样就拦住了我们，当时我还背着那个在北师大“和平敢死队”时背的那个包，上面还都是其他敢死队成员的签名，而包里全都是我当时积攒起来的传单，所以我就有点担心。警察把我和女朋友分开问话，而且搜了我的包，于是，传单暴露了。

我特别紧张，以为就此会被警察抓走，但结果，那位警察把我和女朋友叫到一起，在角落里训我们说，“你们这些学生，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你瞧瞧你们搞的这个事情，你想怎么样？”虽然被训了一

通，但我们能读出来他的意思，他埋怨我们：拿着这传单、这包，你还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晃悠，是自投罗网吗？他暗示我们赶紧把传单都处理掉。然后，就把我们两个放了。

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厕所里，我女朋友把一大包传单都给烧了，原本我想留下好好作纪念，但现实让这个计划已经变得难以为继。传单烧了很长时间，我们不敢点大火，还得望风，因为天安门广场附近已经布满戒严部队的士兵，他们就站在大街上，头戴钢盔，手拿冲锋枪。广场上，还停留着坦克。我们把传单烧完后，就没有敢在那地方再多耽误，赶紧跑回了北京站，当天晚上就坐车去了内蒙古，准备静观其变。

7月初，电视新闻里说，武汉大学已经复课，我们赶紧找人打听到底有多少学生复课了，武汉形势如何，结果人家告诉我们，只有1/4到1/3的学生复课了，我们这才放心了，不考虑急着回去。直等到8月中旬，我想看看情况，就一个人悄悄地潜回到了武大，找到我们系的辅导员问他情况。当时的辅导员周益川也很年轻，只比我们大几岁，当我上门请求他帮助我分析情况，了解能不能入学的时候，周老师很

笃定地说，没事，抓了几个人，但你不到级别，放心吧。我说不会有事就肯定不会有事。

我这才大着胆子去找“高自联”里同事过的几个人，了解到，武大“高自联”的重要骨干在6月24日左右被抓了，而在学生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李海涛、刘向阳、彭英权也都被抓起来了，后来也大都被判刑。带头作用低一点的学生被揪出来之后，虽然没有被捕，但整个暑假都被迫在武大的学习班里接受洗脑。有些人是在回家途中被拦下又被送进学习班的，比如应仲民。

回头看，我和几个从天安门广场回到武大，在“高自联”没有行政职务，只做所谓“智囊”的“老革命”们，反而被有关部门定性得不那么严重。

然而，9月1日开学后，“双清双查”开始了，我们的麻烦也来了。普通学生天天开会，系里组织大家政治学习，要求扭转思想观念，让大家确认六四是一场反革命暴乱，而我因为去过天安门，又被重视起来了，系里派了两名老师跟我天天困守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的任务是

监督我写交代材料，这材料的描述时间得从“动乱”开始的第一天，即4月19日我参与第一场游行开始写起，一直要写到我离开武大的6月9日，我必须把每一天的行动轨迹都写进材料。如果经过老师监督，认为你写清楚了，那你还得找出一个第三方人员帮你写见证材料，以此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那些天，我就是成天在做这两件事：交代自己的行为，以及佐证别人的某一天是否像他的交代内容一样真实。

这个过程搞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负责监督我的那两个老师，一个非常同情我，愿意鼓励我，另一个则十分严厉，经常恐吓我。鼓励我的是《近代政治思潮史》的任课老师，我一直非常感激他，虽然后来因为他调到南京去后我们断了联系，但我始终记得他的鼓励对我安慰很大。他说，你放心，你的情况不太严重。如果没有这位老师，我真是不知道在另一个老师的吓唬声中，怎么熬过那天天写材料，按手印的艰难时世。

交代过程中，最令我心里不安的是，我去北京买飞机票的介绍信来历我无法隐瞒，斗争了很多天，最后，还是把它交代出来了，因为我编不出瞎话，也熬不住各种威逼，就把我的老师给交代出来了。写完交代，当晚我就去了这位老师家，向他负荆请罪。那位老师说，没事，反正是这么个情况，咱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那个时候，搞“双清双查”的不只是学生，老师们也在被查，也在不停地交代，那种政治运动的残酷性，让我寝食难安。我永远也不想回到那样的场景：天天让你斗争自己灵魂深处，让你不断地交代自己，让你自己给自己定罪：你参与了动乱，反革命动乱。

我的1989之八

1991年夏，在我本科毕业前夕，武汉一些参加过八九运动的人搞了一次聚会，聚会地点就在武大。记得那天好像是6月30日，或者是7月1日，下午大家先聚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像，照片标题写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然后晚上在餐馆聚餐。

大家当时想的是，八九一起闹过了革命，从此要天各一方，四处离散了，聚一次也是为了记住当年这一段共同的经历。我没参加照相，但吃饭我去了，吃完饭，大家还在武大的桂园操场聊了会儿天。

第二天一早，八九学运参与者聚餐的事情就传得沸沸扬扬了。我被系里的领导叫去，他开门见山就说：“王志安你昨天晚上又参加活动了是吧？你昨天晚上说的什么我们都知道”。他一说，还真跟我在桂园操场上说的一样，可见，有人“听者有意”，全汇报给领导了。

本来，我就因为六四历史没有被“包分配”，看着班里其他同学都早拿到派遣证了，我无人问津，只能回原籍洛阳自谋出路，现在又出了临别聚会的事，学校就压着我的材料不让我回家了。眼看着其他同学都陆续离校，我一个人留在宿舍等得心里发毛。又过了大概十来天，我就去找系书记王长明，说王书记，我已经没钱吃饭了，再留在这里，我饭钱都没着落了。他这才允许我离校。

回到洛阳，找工作肯定不容易，那时候我妈在小市场里头有个摊位，她批发了馒头在那里卖，我就帮我母亲卖馒头，收钱。直到半年后，1991年12月份，洛阳市财会学校主动找到了我，说是在人事局看到了我的材料，觉得我既然毕业于武汉大学，应该还算高材生，就把我招过去当老师。

洛阳市财会学校是一所中专，我去工作了半年后，有一天被校长叫到办公室。他说武大发来了一个函，不能直接给我看，但可以略略透露，函里说了我六四的事情。我当时有点忐忑，但校长马上跟我说不用担心，学校根据我工作的表现和为人，决定不往档案里放这份材料。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武大因为担心我们这些在“六四”里留下案底的学生找不到工作，想给我们在自谋出路的时候留一份干净档案，所以交给人事局的档案没有六四相关内容，然而在我们找到工作一年后，他们会发一个函给我们的接收单位，说清楚我的六四问题。而当年我们“双清双查”期间写的那些交代材料就全部留在武汉大学，假设此后我们这些学生社会上又参加政治运动，或者犯了什么错误，人家要到武大“外调”，了解我就学期间的情况，那武汉大学就必须把这些档案提出来给调查组织。在那些交代材料里，我属于有前科的人。

很感恩洛阳市财会学校的校长，他和武汉大学一样开明，也对我宽厚。后来我因为考研要填档案资料的时候，翻看过自己的档案，发现里面真的没有六四信息。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我后来的人生由此基本没有受到六四的负面影响。

但作为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六四对我显然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在很多年以后，当我又看到很多当年我看不到的材料，我思考了很多，我想的是，这场运动带给我个人什么，带给我们国家的，又是什么？

六四带给我的，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历财富。虽然我曾经忐忑害怕过，在找不到工作的半年间也迷茫担忧过，但对于投身于这场运动的原始热情，我从不后悔。我的父辈经历过战争、土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很多政治运动，但在我这一生，截至目前，只有八九学运可以算得上是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感受了那样的风雨，此后再经历挫折、障碍，甚至压迫的时候，我的心态就比一般人好很多。所以，我经常自我总结，到如今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为什么至今能够保持乐观？因为我走过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

因为我懂得了从希望跌落到失望的滋味，体会过无情中的有情，感受到了一腔热血和冰冷现实的对冲，所以后面再经事，就不怕了。最大的考验都过去了，后面还能如何？

其实，六四之后我以为自己绝无可能还能接着读完大学，高考的努力全部白费，人生要重启，但是后来我不仅读了大学，还安全毕业，我又参加了工作，还能考研成功，还能去北大深造，后来竟然还进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做了记者，有机会走近更多弱势群体的生活去见证这个国家的发展历程，见证小人物在时代里的浮沉，这是

何其幸运？虽然过程中有过一些插曲，但总的来说，我的人生际遇没有被六四的影响冲垮，我幸运地走到了今天。

如果因为八九学运我没有正常毕业，而是被抓起来判刑了（那也不是不可能），我又能如何？事实上，我们武大有好几个被判刑了。为哀悼六四组织追悼会的李海涛被判了4年，潘铭泉也被判刑，刘向阳虽然没有被判刑，但在武汉市看守所里关了1年多才放出来。他们的人生跟我相比，相差很大，六四运动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比我不知要大十倍还是数十倍。尽管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做了同样的心理准备来承担“历史使命”的。跟他们相比，我不应该奢求更多，更不应该追悔付出，那就是我们的青春印迹。

六四带给我的另外财富，就是此前我讲述过的：经过那场运动，我的很多能力得到了历练，比如说我的公开演讲能力，就是在六四运动期间几十次演讲过程中练出来的，包括在武汉火车站的募集善款演讲，包括在参加北师大“和平敢死队”的演讲，还包括在高校联席会议上的演讲，我通过这些机会锻炼了自己思辨能力，面向公众不发怵的能力，演讲能力。

如果再追问这场运动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的话，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戴晴的一段话，她曾经说八九时，她曾以为中国成熟的民主化运动到来了，但后来她发现她自己错了。她的意思是，八九学运并不符合她的期待，学生运动呈现出来的，不是中国成熟的民主化运动篇章。我跟戴晴的看法差不多。

从战术上和战略上两个方面来看八九学运，我个人有以下观点：

一、从战术上来看，八九学运的最佳结束时间应该是5月4日。当天，赵紫阳已经扭转了“四.二六社论”的评价，而且基本上是180度大转弯，承认学生运动不是动乱，是爱国行为。我认为那个时候学生运动应该就此停止，回校复课是最佳选择。

而后期绝食，继续要说法，这个活动当时的确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但也成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戒严逼学生停止绝食的借口。

在我看来，次一等结束学生运动的时间点应该是在绝食改为静坐之后，到6月3日之前。这段时间内，学生如果能撤离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至少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我说这些，并不是我认为学生们是这一场悲剧的所谓“肇事者”，不是！我们都知道，镇压者就是中共，后世争论到底死了几百人还是死了几千人，我觉得任何个体的死亡都不应该。血债债主就是中共，下令开枪的就是邓小平，这是史实，没有异议。我们无论用多么严重的方式去谴责刽子手，都是应该的。我们反对任何借口的惨无人道的杀戮。

但从策略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各方面考虑得更高明一些，会让政治对手有更少打击你的可能性。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我们要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假定政治对手的反文明程度，尤其，当时的中国是在转型期社会，从事街头政治运动必须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才可能实现和平转型。

从战略上来讲，我个人觉得，学生们当时跟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力量走得太近了。想必大家都清楚，赵紫阳这一派政治势力与某些学运领袖是有串联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程度有多深。至今，海内外媒体，尤其是海外媒体对赵紫阳评价非常高，认为他支持学生，支持民主和自由，而把邓小平当作保守势力的代表。这种区分，我觉得可能有些

问题。我想问，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什么矛盾？是路线之争，还是权力之争？如果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路线之争，你很难解释邓小平后来对于改革开放的坚持态度。所以，在八九时期，我认为他们之间更多的矛盾可能是基于最高领导也不是本人是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所以复出之后他没有担任党的第一书记，而是让胡耀邦当了。胡耀邦因为八六学潮下台，他又把赵紫阳扶上了总书记的位置，但事实上，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都要对邓小平早请示晚汇报。赵紫阳对此不满到什么程度了呢？在八九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时候，他竟然把这个内情告诉了外人戈尔巴乔夫，说邓才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要把这个事实在那时候突然公开于世？可以想象，应该是赵紫阳已经忍受不了了，突然爆料也有公开决裂的意思。

共产党内部的这种默契，你去跟一个外国的元首讲，这摆明了是给邓小平难堪。

赵紫阳同情绝食学生，去现场跟学生对话非常动情是不假，但他直接否决“四.二六社论”，让中国人都知道党内有两种声音，是在拉学生好感，还是同时也让邓小平、李鹏出丑呢？学生对邓小平和李鹏的

各种抵制、不满，甚至不屑的口号，赵紫阳一清二楚。如果邓小平应和学生，做出退让，这对赵紫阳的真正上台是莫大的好处。当然，也许他不是贪恋权力，但他确实想按照自我意志进行改革，这一点，在很多材料里都可以佐证出来。

赵紫阳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这个目标上，基本没有很大差别。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看来，他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坚决程度完全不亚于赵紫阳。八九后，共产党内部有一股所谓的左倾势力抬头，有一批人几乎要否定改革开放，所以高龄的邓小平就到南方去，在深圳、上海，在沿途停留之处，告诫地方政府：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有了那次南巡，才有后来30年中国改革开放不动摇的现实。也就是说，被认定为基于思想解放运动才导致的八九学运灾难，也没有动摇邓小平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改革开放之路。

所以我认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最大的分歧不是“自由化”的程度，也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程表，这些差异还到不了让他们决裂

的程度，真正导致他们分崩离析的，是最高领导者的权力只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当时有两个“司令部”。

热衷于街头政治运动的学生过分地介入到这种权力斗争中，是不是明智？

历史上，党争始终是残酷的，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而跟着站台的队伍，无论是推手还是工具，其实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不会被真正重视的，一心想追求现代政治新秩序的学生那时也已经丧失了政治独立性。

学生都是热血的，冲动的，理想化的，他们能行动起来，是因为单纯的的政治诉求和理想目标，然而一旦被裹挟在宫斗中成为别人的工具，即使某个阶段成功，也未必真的能长久实现自己理想的一切。或许少量的学生领袖可能以此获得些政治资源，但更多普罗大众又会如何？他们很有可能变成炮灰。

但，退一万步，如果五四之后，高自联的周勇军倡导的回校复课实现，这场运动给中国的影响就会更正面，更泽被后代吗？

八九年之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呈现了一个断崖式的停顿，共产党就对所谓的政治组织、政治运动采取极其高压的手段，持续至今，愈演愈烈。八九历史是绝对不让提了，学生的任何行动都被虎视眈眈，别说上街游行，就算在学校搞规模大点的活动都被严控。当时想要跨出一大步，如今是寸步难行，所以，很多人痛心疾首，说八九如果不闹到那种地步，中国的民主自由运动或许还不至于如此糟糕，我部分同意这个观点，也不完全同意。六四这种强烈冲突当然直接引发了中国后来的各种政治高压，这毫无疑问。不过，没有六四，外部环境恐怕迟早也会让共产党警觉而越来越谨慎的。

1991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瓦解，共产党当然会感到警钟长鸣。戈尔巴乔夫"新政治思维"带来了俄罗斯、苏联的民主化，最后戈尔巴乔夫个人丧失所有的权力，苏联也解体了。共产党一看老大哥都这样，自己绝不能步人后尘：绝不可以与学生或者跟其他政治反对势力分享权力，因为多党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原执政党自取灭亡，这当然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革命成果岂容他人抢夺？

台湾的国民党也给了共产党一个很大的警示，他们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最终不但是政党轮替，下台的政客还要遭到政治追杀。所以，即便八九以和平复课收尾，也很难乐见到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就此轰轰烈烈、顺顺利利开始。

从细节上看，八九过程中不论是学生还是知识分子、各阶层代表，大部分人都是凭着一腔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而成熟的民主化运动在我看来一定是基于自己的权利展开的社会博弈，从这一点来讲，八九学运的各个阶层都不具备。

而我所期待的中国民主化运动应该是什么图景呢？前提是中国产生强大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稳定器，而他们有很强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可以利用合法方式推动中国走向法制化、民主化，只有这个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庞大，能力越来越强，他们才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倒逼政府收缩权力，在宪法范围内行驶职能，最终导向整个政治结构的变迁。

但这条路，迢迢万里，也求不了快，它不可能通过一场政治运动实现，而必须靠缓慢的日积月累。不过，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期待见证这个历史进程的实现，也盼望大家不忘来时，铭记六四。

切莫丢了昔日的理想，切莫忘记有一批热血的年轻人，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走上街头，经历血雨腥风。

七月

7.03 习下李上？请远离各种迷魂汤

前段时间跟朋友去吃饭，有人问我，“王局，听说习近平二十大之前要下，李克强要上”？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呢？这种信息国内不可能有任何朋友会讲。又过了几天，又有人来跟我求证，我就纳闷：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相信这种政治揣测？后来我查了下，YouTube上还真有一些中文博主在有鼻子有眼地分析，说习近平马上就不行了，李克强要取而代之。

我一方面觉得特别可笑，因为这种揣测离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态太遥远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可悲，这些“毒鸡汤”在麻醉海外华人，对海外信息圈危害很大，如果大家持续听闻这种低质量没谱的信息，可能人们慢慢就会丧失对正常信息的判断力，这可真糟糕。

一个人要了解外部世界最重要的是坚持用事实判断，以理性逻辑来分析，而不是有赖于我们的喜好，不取决于我们反对什么，期待什么，如果这个原则丧失了，人云亦云，那我们的认知力就废了。所

以，不管我们当下是什么境遇，也不管我们反对什么人，坚持求真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对手。

当然，这些政治传言和不靠谱的分析在海外华人圈子里流行也有些客观原因，一方面是国内的政治运作极不透明，都是黑箱操作，大家就习惯了猜。共产党的人事程序是个形式，所有的"博弈"早在程序开始之前就已完成，是"密室政治"的产物，常委谁能上谁不能上，总理谁能当谁不能当，包括下一任的总书记到底是谁，这是无法依据公开的政治资料以及公开的政治博弈得出结论的。这一点，所有共产党国家都一样，中国、朝鲜、前苏联，无一例外，说它们离政治文明遥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斗争跟古代的宫廷政治从本质上讲，有多大区别？

另一方面，过去十年，大家对共产党的执政者越来越不满意也是真的，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说实在的，大部分老百姓还是过上了一天比一天好的日子，经济体制改革后普通老百姓获得了实惠。但最近十年，国进民退，政府权力越来越不受约束，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尤其疫情这三年，对外搞"战狼外交"，对内搞"防

疫措施”，对言论自由的打击愈演愈烈，对民营企业的重拳让人苦不堪言，人心所向也为“习下李上”提供了舆论土壤。

人们常说，“政治谣言”不少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有可能，但也有不少是我们的愿望，大家传来传去，好像从中得到了片刻欢愉和希望，所以政治谣言就甚嚣尘上。然而“谣言”成不了真，只是一种引发幻觉的毒鸡汤，听多了，人容易迷失，会离现实真相越来越远，梦醒时分更痛苦。

我在国内刚开始翻墙的时候看到推特上很多“反贼”的言论大吃一惊，不是因为他们“反”，而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中国现实，传播的东西过于荒谬，所以就显得毫无价值。比如他们天天传三峡大坝要垮塌，中国经济要崩溃，共产党马上要倒台了，这些言论几乎天天有人在传，而在国内生活，感受着真实世界的情况，就会觉得他们这些“分析”着实离谱，就不会想多看。

我相信国内翻墙来的人大部分人会有跟我一样的观感，在Twitter尤其明显，有些人反共，反对共产党，唱反调的方法比共产党还可

怕，还文革。这种感情大于理性，叫嚣大于分析的状态，如果真的回去闹革命，能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吗？既然很多人把"反共"当作信仰，那传道也总得争取民众支持，天天不过脑子随意转发，这种自我麻醉法会把老百姓都吓走。

坚持自己的立场没错，但总得坚持理性分析、合理逻辑吧，这跟反不反共没有关系，实事求是取信于人的基本标准。不要用愿望来麻醉自己，不要把愿望当作事实。

我不是时政博主，我做的选题基本上都是社会新闻，就事论事，因为我个人没有政坛独家爆料的信息源，中南海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政治局常委的皇亲国戚里也没有我的亲戚朋友，所以我要做时政分析也就只能基于一些"常识"，看看西方主流媒体的内容分析。所以，我老老实实告诉大家，做时政类分析我不在行，也不做，但关于为什么有的政治谣传不靠谱，这个逻辑我还是能跟大家交流交流。

比如“习下李上”为什么不靠谱？我们一起来分辨一下。

首先，如果真有这迹象，西方主流媒体不会一点报道和分析都没有，这不符合他们具备的信息源和分析水准。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路透社》都是长期跟踪中国时政新闻的，他们有专门分析和写作的班子，虽也有不靠谱的时候，但跟自媒体相比算相当靠谱。在我看来，最有水准的是《纽约时报》。过去几次共产党的权力交接前，《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都报了所谓秘密渠道传出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后来被证明都不对。我私下了解到，其实在前二者报道的时候，《纽约时报》手里也有这份名单，但他们认为不那么可靠，而且，预测这样的名单也没有太大意义，反正很快常委名单就要宣布，提前几天报料意义不大。从这个细节我对《纽约时报》还是更认可些，在这几大媒体中他们相对来讲最严肃，最追求专业性，所以我一般看中国的时政分析会首选《纽约时报》，《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要靠边一点，其他媒体就更不靠谱了。

因此，假设中国会发生重大政治变革，自媒体说得这么热闹了，西方主流媒体还能一点动静没有？不可能。

其次，自媒体不是正规媒体，绝无大媒体的信息源。国内各类媒体是共产党内不同派系各自放话的渠道，当党内有不同力量在抗衡的时候，国内不同区域的媒体会有异于往日的迹象，比如邓小平“南巡”时，不是北京的媒体最先出手，而是深圳和上海的媒体率先报出“南巡讲话”。当时中央媒体非常紧张，这么重要的时政新闻该首先由《人民日报》来发表啊。这就是不同媒体站队的结果。所以，如果习和李之间有任何角力，挺习或者挺李的媒体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迹象。

关于媒体与体制力量的亲疏远近问题，我们还可以知道一个常识：境外一些“陆资”控制的媒体，比如香港的《大公报》、《南华早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也是共产党向外放话的一个固定渠道。不过他们放的信息大多是中国对外关系，比如中美之间冷战一段时间，中方想软化一下的时候，可能通过一些“亲中”媒体报道一些有转圜作用的新闻。《凤凰网》、凤凰卫视有时候也有这种功能。表面上看，它是一家香港媒体，现在其实也基本上被大陆控制的。

第三种情况，有时候共产党会选择性地故意把党内不同的声音放给西方媒体，这种情况不多，但大家如果看过沈栋那本书，讲到《纽

约时报》报道温家宝家族的事件，其信息源就是薄熙来派系所为，

《纽约时报》的记者拿到爆料，做完信息核查就报了出去。这属于借力打力，党内斗争很激烈的时候就会有人不顾一切地给最猛的媒体放料，国内刊登不出来，那就找西方重磅媒体。注意，我说的是西方重磅媒体，是头部的这些大媒体，不会是YouTube上的海外自媒体。

我也是海外自媒体，我没有轻视他们的意思，我只想陈述客观事实，那就是真正的猛料如果要起作用，放料的组织都会选择好最有权威的平台。自媒体肯定不是，流量再大，也不是。因为大家肉眼可见，做自媒体博主的人往往是被驱逐之后被迫流亡海外，有的人已经流亡了一二十年了，他们对信息的弹指之间渠道非常有限，对政治生态的草蛇灰线已经完全失去感知，他们日常的博客或者推特、YouTube上有很多不实信息，你想想，关于政治局常委名单或者最高领导人更迭这么重大的事情，会有靠谱的来源用靠谱的方式给他们吗？他们的影响力跟西方主流媒体比，不值一提。

所以，自媒体的人在YouTube上分析来分析去，其实都是从一处空穴来风走向另一处空穴来风，就跟乡野村夫谈国计民生，出租车司

机谈国际形势一样，就是贫嘴神侃。

第三，我个人分析一下“习下李上”可能性概率基本没有的原因，大家姑妄听之。

大家都知道按照共产党的接班序列来讲，习李是同一代人，习没有站到台前之前，其实李已经先行一步，被当做后备梯队来培养的：团派干部，年轻，30多岁就到河南当省长，被称为“娃娃省长”，后来调到辽宁，又进了政治局，再后来又进入常委，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拾级而上。习近平的学识水平，上升速度等，还没有李那么显著地形成直赴中央的状态，但他异军突起后就形成了两强竞争的局面。有一段时期，他们两个人在表象上位置几乎差不多。我记得我在中央电视台做新闻评论员的时候，领导下达指令说，习负责“足坛扫黑”项目，李负责“扫黄”项目，你们评论员组在评论时对两个主题要保持平衡，不能偏颇，否则怕外界解读出两个人已经轻重有别。后来习战胜了李，当了老大。现在，如果真是到了迭代的时候，会在两个同时代人之间切换吗？我觉得，共产党的接班序列不会让“习下”之后，让“李上”，就算要换人，也是会找一个比习年轻10岁以上的人来接这个班。

看一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总理后来上任当总书记的，只有一例，就是1986年赵紫阳取代了胡耀邦，这是个意外事件，因为八六学潮导致胡耀邦“引咎”辞职，除此之外没有过了这种同代人交接权柄的情况。在共产党的权力序列里，总理跟总书记是搭班子的平行线，基本上做总理的人不做总书记，做总书记的人不做总理。八九李鹏算是尽忠立功了，那也不可能在赵紫阳下来之后取而代之，邓小平还是点了年轻不少的江泽民直接越过李鹏当了总书记。所以，虽然没有成文规则，但我们可以看到，总理和总书记基本是要退一起退。

我认为“习下李上”不可能的更重要一点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党实际上有一种文化：崇拜“强人政治”。你别看现在民间如此反感的高压政策，恐怕党内反对习近平的声音也是不少，我就听说习规定副国级干部一年得搞两个调研，让高官也怨声载道，可除了这些嘀咕的声音之外，有没有有组织的反习力量？我看，党内党外，可能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共产党的政治基因里就带着对“强人政治”的崇拜，至少是顺从。所以虽然在中办发发的一个暂行管理条例里面说到，同一职位连任两个任期之后不再推荐，但这只表示程序上，习不能再连任国家

主席，但从来没提共产党的总书记职务不能连任。而这个条例只是中办发的，没有法律约束力。这说明共产党在制度建设中就没有防止独裁的考虑，他们的政治基因就是崇拜强人政治，一旦有政治强人出现的时候，即便共产党内很多人有怨言，但更多人并不排斥，这才导致老毛搞了30年怨声载道的事情，但这极致性的强人政治就可以让别人臣服，直到毛自然死亡。我看，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习上任之后，一开始跟王岐山联手把党内的反对派基本都肃光了，通过改制又把军权也紧紧抓在自己手上，如今党内成气候的“反习”组织根本不存在，想要通过党内的政治斗争把习搞下去也根本没可能。

这是我基于自己的政治常识进行的分析，大家姑妄听之。以最终二十大的新班子亮相为准。

有人问我，怎么办呢？这样下去太绝望了，习下去的话好像中国还有点希望，不下去，再执政10年、20年怎么办呢？我想说，咱们可能得接受这个现实，不要骗自己，二十大后他如果继续执政，你就悲观得无法直视现实吗？那到了明年两会他又继续当国家主席，你又怎

么办呢？你可以怀有美好的想象，但更要紧的是基于现实来做分析，然后为残酷的未来做好目标规划。

我自己的方法是，对中国未来，你分析也好，憧憬也好，都不要寄希望于某一个人的上台和下台，甚至某一个政党的上台与下台。我们只要看，中国的老百姓会不会过得比以前好，社会风尚和管理细节会不会进步，看这种具体和现实的事情如果是正向的，那就应该高兴。如果社会退步，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们就要得讲道理，说反对。这是我个人的标准，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急于了解所谓的政治秘闻，我对那种谣言或者预演从来不感兴趣，谁入常委谁当主席，这都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变好变坏的根本指标，我没兴趣，也无从判断真伪。况且，政治密室的运作始终如一地不可见人，也不必热衷，我们还如下功夫在对我们的生活和理想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真的在乎中国的社会进步，在乎我们的同胞境遇的改善，我觉得方式只有一个：让愚民政策见鬼去，让普通百姓们觉醒，让他们开眼看到真实的世界，去争取文明，争取权益，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只有大家都觉醒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变了，土壤变了，我们这个

国家才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变革和制度变革。在这些变化发生之前，某一个人的"兴废"、上台与下台，对于整个国家影响有限。况且，谁能保证，习下了，再上来的那个人就会比他好？

把中国未来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某一个人身上，在我看来本身就不正确。

虽然要想让14亿民众觉醒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在我看来，要真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必须沿着这条路做点滴的努力，做持续的积累。

我通过自己的节目不断地推广常识、普及常识，向大家讲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在参与这个伟大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政治八卦、"政治秘闻"在我看来是混淆视听，大家只会陷入希望、失望的死循环，得不到救赎。

人上当一次可以，两次也可以，上当五次十次之后，自然会反思，"政治算命师"们除了博取眼球，换来流量，还有什么贡献？他们能靠算命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吗？

所以我奉劝所有海外华人，不要轻易去听这些“政治听床师”们的政治秘闻，没有意义，实属低级。有这个时间，好好过日子，好好工作做生意，好好学习，好好教育下一代，把世界上最普通的最朴素的常识代代传承，做有分辨力的人，这，才是有意义的事。

7.04香港五十年不变？事实如何？

2022年7月1号，香港回归25周年，也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第一届特首李家超就任的日子。这天，国际媒体都很关注香港，习近平也亲赴香港。

一个近乎搞笑的场面是，习近平乘坐的高铁抵达香港车站时政府组织了一批人列队欢迎，喊的口号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与七八十年代内地欢迎政府领导视察的陈旧口号别无二致。紧接着，香港搞了一台众多明星参与的文艺晚会，一起欢唱《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里歌声多么嘹亮……”，你能想象这是在香港吗？

由此大家不由得会想到《中英联合声明》，其中提到，中国对香港的承诺50年不变。现在，25年过去了，承诺到底有没有变？这是个争议性的话题，因为2017年，英国就指责中国对《中英联合声明》没有履约，中国强烈反击，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

任何约束力，“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意思是，你现在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你不要插手也不要过问。

这话有一定道理，1997年之后英国对香港肯定是没有这些权力了，但，《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个历史文件，没有现实意义？

《中英联合声明》实际上是不存在有效期的结束日的，它在联合国已经正式登记过就有法律效应，声明中的那些承诺也应该随之有效。中国外交部对英国措辞谨慎的提示都予以这样强烈的反击，甚至直接把《中英联合声明》当成是过期文书，我觉得，恐怕有点不恰当。

香港回归，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没错，但是如果中国政府觉得，基于条约所约定的中国对香港的承诺如果不具有现实意义，那会带来什么？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97年香港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对回归有疑虑，所以李嘉诚面对邓小平有那句著名一问：“50年真的不会变吗”？邓小平当时回答：“50年保证不会变，马照跑，舞照跳，而且50年之后

也不会变”。我认为，邓小平当时讲的那句话应该是发自内心的，那么，自97年至今，25年，大家看，当时中央政府对香港做的这些承诺到底有没有变呢？

我认为变了，而且变得不小。最重要的一点：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居民有权通过“普选”方式选举自己的行政长官，可您看，现在香港特首是通过普选产生吗？不是，是通过选举委员会产生的。而选举委员会的提名在25年里不是越来越宽松了，而是限制越来越多了。过去还有竞争性选举，选举委员会里至少有两名候选人，到了李家超这届，就他一个候选人，没有第二个。所以，仅从特首选举角度来讲，普选的规则变了。

第二点，是香港人非常抵触的两年前通过的《国安法》。《国安法》的宗旨在于香港回归大陆之后有义务参与维护“国家安全”，这本来是有共识的事情，分歧在于如何进行第23条立法。很多香港居民担心一旦第23条立法了，香港人视为珍贵的“香港精神”的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就会荡然无存。所以23条立法在香港争议了一二十年，始终没有立法的真正时间表，也因此导致2019年《国安法》在香港以全国人

大立法的方式通过之后，放进了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而附件三一公布实施，香港每年的“六四”游行集会没有了，其他游行示威也少了。以前温家宝访问香港，一边开着新闻发布会，外面就有人抗议，记者还提问温家宝怎么看这些抗议中央政府的游行，现在，你看习近平访港时还有人游行吗？没了。

几天前我看到一个消息，说香港规定四个人以上就算集会。所以香港有组织就想用四个人上街来表达诉求，结果还没有上街，警察就找去了，说小心，不要这么干，否则你有可能违反《国安法》。于是就游行黄了。

对于香港人来说，《国安法》23条里面最可能给他们带来风险的，就是颠覆国家政权这类罪名都没有准确的定义，如果政府想严格执行或者打压某一批人，有些行为就可以被冠以这种罪名。比如上街游行就有可能触发这个条款，就可能被拘捕14天；再比如说勾结外国势力这个罪名，也没有准确的标准。跟外国人吃顿饭，谈谈政治，就有可能就被定义为“勾结外国势力”。一旦没有准确释义和边界，法律就是一个随时可以给公众罗织罪名的武器，老百姓当然噤若寒蝉。大

家看《国安法》出台之后，即便是“反送中”运动中最强干的两个年轻人，周庭、黄之锋也在被判刑之后，哪怕释放后也不出声音了，为什么？因为在目前这样的法律框架下，搞街头政治反对运动基本不会有结果，而自己要付出巨大代价。

这就要说到，由此可见，香港的司法独立有没有受影响？当然。

而且，《国安法》规定有极少数案件不再由香港的法律来管辖，可以直接拿到大陆去审理，“极少数”多少？范围怎么划定？没人知道。而且，涉及《国安法》的案件，香港可以由特首指定法官进行审理。这还是司法独立吗？司法之所以要求独立，就是要把行政权力关在门外，特首可以指定法官审理案件，这就是在干预司法。而有的案件就是民众针对政府而起，这种情况下，法官必须不受政府干预才可能公正审理，如果特首可以指定法官，那就直接表示在解构司法独立。

再者，《国安法》已大有凌驾于《基本法》之上的姿态，因为解释《国安法》的是全国人大，而不是香港的终审法院，香港的司法体

系在解释何为“勾结国外势力”等等问题上明显是要仰人鼻息，所有分级性争议发生时，只要大陆开口，香港的法律恐怕是无能为力的。

至于言论自由，只要从黎智英被抓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香港的言论自由已经今非昔比了。以前内地媒体人都特别羡慕香港媒体的自由度，但《国安法》实施之后，《苹果日报》停刊，创办人黎智英一直被羁押，而香港民间的报纸、自媒体，不是关闭也是转向了。所以，国际社会上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排名中，在新闻自由指数上，香港已经从过去全球第十八掉到了第八十。

你说，《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承诺的香港生活方式基本保持不变，信守承诺了吗？

像外交部说的，香港既然回归了中国大陆，那就是中国的内政。没错，但是不是中国政府想怎么管就怎么管，把香港《基本法》废了也无关他人呢？我个人不同意。虽然说“50年不变”的说法是道义责任，但这也事关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任何国际条约，你只要签署了，哪怕是自我约束性的，也有个诚信问题，有个是否负责任的政府

形象问题。否则，在未来的外交事务上，你能让别人信任你，长久地跟你做朋友？如果一个政府可以堂而皇之背信弃义，那你能期待你的对手能对你守信？你又如何能把国际形象和大国复兴的梦想联系起来？

两年前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我去现场观摩，对一个细节印象特别深：有很多来自于香港的民众戴着黑口罩，在大选前的造势晚会上打出横幅：“台湾挺住”。显然，香港民众不希望台湾成为下一个香港。而这香港人的横幅对台湾总统大选有没有影响？我认为有。台湾人有非常大的警惕性，害怕成为下一个香港，因为香港近年来的种种情况，已经让一部分台湾人对“一国两制”开始有疑问。

早些年，我曾经憧憬说，大中华地区三个资源：香港的法治、台湾的民主、以及新加坡的行政治理，是未来中国走向民主宪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资源，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吸取这三个资源，中国未来在民主宪政进程中会有光明的前景。但，25年里，相信大家看得到，香港的法治已经沦陷，台湾的民主从某种角度来讲朝不保夕，新加坡的行

政治理大陆也没学会多少。所以，抚今忆昔，书生意气的理想主义者在80年代的对中国前景的乐观预期已然破灭。

虽然历史发展是螺旋式上升，也许再过50年、100年，后人看我们这个时代，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经历只不过是历史折冲反复的一个插曲，但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香港人、台湾人，也包括我们大陆人来说，我们承受的历史代价不轻。

如今很多香港人都在移民，当然，战狼赵立坚说“中国来去自由”，可是，站在民族立场上，看到那么多优秀港人离开家园，去英国、北美重新建设自己的人生，大陆也是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人移民到国外，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我希望当政者认真思考下这个问题。

当然，也可能，我这个希望太幼稚了。

7.06人口的社会调剂

这两天，广西桂林的一则《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在网络上火了，有人去信访投诉自己的孩子被当地计生部门工作人员拐卖，信访局要求全州县卫健局处理此案，而全州县卫健局就作了如此回复：你家超生的孩子是被统一抱走，由县里“社会调剂”了。

可能大部分人跟我一样，不知道原来人口也可以像物资一样“调剂”，据说，这在当时还是合法的，是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细则办理的。这发生在我们国家的真实故事在当代年轻人和外国友人看来肯定是天方夜谭。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8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的一对农民生下了他们家第七个孩子，这在当时自然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了。一年之后，由于凑不齐超生的六千块钱罚款，只交得出两千，孩子的母亲就带着孩子东躲西藏，但终于，还是被计生部门在一家宾馆里找到，现场把孩子抱走了。自此，那老七就下落不明，三十多年过去，

这对夫妇没有放弃找孩子，但苦于找不到，就开始上访，希望公安部门对此立案。广西自治区的信访局接到信访函之后，并没有批复给公安，而是批复给了全州县的卫健局，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修改后，原来的计生部门已经被并入了卫生系统。卫生部门反馈，当年县里确实有文件规定，对于超生的家庭，要在超生孩子中选一个抱走由全县统一安排，调剂到无孩家庭，所以就回了这么一封函。而且，卫生部门还说，为了维护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年他们送完这些孩子都不做记录，以保护领养家庭。

计划生育部门可能没想到，有一天，这基本国策会变，变得让他们的举动变成了违法，违背人性。如今网络舆论风波起，当地政府一看，先把卫生局的局长和副局长给停职了，也让公安机关立案了，广西自治区还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这对夫妇几十年来的奔波，终于通过微博热搜有了可以解决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局长和副局长挺冤的，背雷了。他们一不是暴走孩子的始作俑者，二没有说瞎话，人家也是查了当年的政策依据的。但因为现在民愤太大，调查组找出他们的毛病是：态度不太好。这是哪门子

责任？是说他们没赶紧地给人找孩子去吗？还是，上级怪他们没好好动脑子想词儿，写出来的信回复函太惹事儿了？我觉得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此事引起的民愤极大，很多老百姓在网上点评，说这就是是政府有组织地拐卖孩子，普通人拐卖孩子要被抓起来枪毙，那政府拐卖孩子，用社会调剂这个政策来做"孩子专卖"，该当何罪？

政府听了，可能也的确两股战战吧，先平一平民愤再说。所以，我说卫生部门的局长们这次是顶雷填坑的。

因为这个新闻听起来着实上不了台面，胡锡进也出来叨盘，他说啥呢？他说，这件事情是很错误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官民在这个违背人伦的问题上立场空前一致，这说明我们社会在进步。啊，这胡锡进姓胡还真不是百姓的，特别能胡谰、胡来、胡扯，这胡说八道的角度总是那么诡异，那是啥“官民立场高度一致”？那不是因为计划生育结束了吗？假如计划生育政策现在还在继续，胡锡进你敢说官民立场会一致吗？

现在不仅是计划生育结束了，还一百八十度大拐弯，鼓励你多生，人家生了娃被抢走这件事就可以拿出来光明正大地谴责，说这人口调剂是违背人伦了，倒退十年，你敢说吗？这对夫妇求告有门吗？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四十年，这里面罪恶太多了，除了政策本身的违背人性，还有执法者、政策执行者的恶。为了执行计划生育，发生了多少法律不管的恶性事件？前两天全州新闻出来之后，有人搜了裁判文书网，原来这社会调剂不是个例，全国各地都有。山东省一个案例也是因为当年交不起计划生育的罚款，孩子被政府抱走了，跟这个案例一模一样。这对山东夫妇懂法，把当年的计生部门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孩子，结果法院怎么判你知道吗？说这不归法院管，诉讼内容不在法院诉讼范围内。这就是说，计划生育本质上是“法外之地”。

在国内做记者的都知道，计划生育领域是报道禁区，所有涉及计划生育的问题都没法报，因为如果按照正常的新闻标准，由于执行该政策导致的打人，抢人，关人，把人直接塞到车里送去医院做人流的，带环的，简直多如牛毛。现在你听着可能觉得这些很恐怖，很不

人道，但在当时就是一个公开的恶性执法案例。回头看，当年计生部门的每一个行为几乎都是违法犯罪。要站在计生部门的立场上，如果他们不违法犯罪，那个工作根本没办法干得出成效。想生的人就是拼了命也想生，那个部门能让他们失去拥有亲生骨肉的動力？没有，所以计生部门怎么办呢？你倔，我就比你狠，除了罚款，还要牵牛，赶羊，扒房，强制结扎，强制人流，衍生出来一系列的手段哪一个不是违法的？涉及到非法拘禁、毁坏财产等等，所以法院的确没办法，只能说这事儿不归我管，你要找他诉讼，那回头看，案件数量都得上亿。

所谓社会调剂，今天看来完全违背人伦，当年却非常普遍，只不过以前没被报出来，大家不知道。就在这个新闻发生之后，有人翻出了2013年凤凰卫视播的一期节目，那个节目的当事人是四川达州的一个小姑娘，从小被人领养，长大知道身世之后就想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后来在邻县找到了亲生父母，一打听，当年她母亲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就戴了环，但之后还是未能成功避孕，怀孕了十几次，做人工流产又特别痛苦，所以最终在怀上这个女儿的时候，她母亲就决心把

孩子生下来，因为她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当时这个母亲还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为了躲避计划生育部门的人，夫妻两个跑到隔壁县去躲在大桥下面，在一个小诊所生下了孩子，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悄悄回到村里。而到家她就发现房子的瓦被人戳烂了没法住，即便如此，最终孩子还是被抢走了，之后孩子下落不明，直到这个女儿长大了，自己千方百计地寻亲，才揭开了这段身世。

所以说，当年这种"社会调剂"在全国各地很普遍，计划生育部门为了完成业绩，不上非常规手段达不到效果，上面就有高压指令了。以前，一个地方政府如果计划生育没抓好，上面对其考核可是要一票否决的，所以一级压一级，最后，什么强制措施都上了。有钱的罚钱，没钱的，最狠的招数就是把孩子给你抱走。很多地方的计生部门由于长期在法外之地胡作非为也不受法律管束，逐渐产生权力的异化。比如这两天大家都在热议"邵氏弃儿"。计生部门去超生的家庭里去抢孩子，先在法律上把孩子做成弃婴，然后送到福利院，通过福利院公布的国际领养渠道拿外国领养家庭的钱。

据统计，我国跨国领养的案子有几十万例，其中美国最多，据说现在有11万多人，荷兰排第二。这些孩子中，80%是女婴，80%有残疾，当然也有正常的，像邵氏弃儿就属于正常孩子被蓄意通过福利院牟取每个孩子3000美金的收益。这样的案子，是计划生育政策掩盖下的诈骗。

而社会抚养费、罚款这些钱去了哪里呢？有的上交给财政，有的就被计生部门消化了，甚至有的就揣到个人腰包里了，最终执法异化成违法的人口贩卖。

让人愤慨的是，这些案子曝光后，没有什么人进了监狱，绝大多数只不过受到了党纪处分、政纪处分，所以才激起大家的抵触，人人都想问一句，普通人贩卖孩子抓起来要枪毙，政府贩卖孩子就合理合法？这就是“持证贩卖”。

过去40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期间，还有多少罪恶如“人口调剂”一样？我想，只要你曾经生活在治理文明程度欠缺的地区，肯定都知晓、听说，甚至目睹。大家都记得，10年前，有一幅著名的照片，是

陕西省镇坪县一位怀孕妇女被大月龄引产的残酷现场。孩子已经7个月了，早产出来都可以活了，但是计生部门把孕妇拉到医院强行引产，孩子死了，尸体被摆在床上，家属给胎儿和他妈照了照片，震动全国。只是，当年计划生育政策还在继续，这位母亲受到侵害也无法为孩子和自己争回应有的权益。

如果说“人口调剂”是叫拐卖儿童，孩子至少是活下来了，但陕西的这位母亲被强迫引产，实际上是计生部门直接杀人，而在中国，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一个长期从事违背人伦工作的职业，一个长期不受法律约束的部门最终肯定是走向毫无人性的罪恶深渊的，“邵氏孤儿”的命运就是这些罪恶的典型案列。

如今，广西全州的案子得到重视了，专案组或许能帮助那对夫妇找到自己的第七个孩子，但随之而来的，肯定还有两个家庭的伦理问题。一个国策毁掉了很多家庭的幸福，这个遗毒要肃清，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让很多当事人经受很大代价。

如果我们反思过去40年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错误，那么我们应该回避那一个个惨痛的个案，曾经的一级一级的决策错误如今审视，无论是从目标来看，还是从战术、策略来看，都是错的。从终极目标来讲，它违背人权，让中国在国际社会饱受诟病，从政策的功利目标上，其导致的今日人口急剧下降的恶果也说明了这个决策的错误。到今天，我们在政策纠偏的时候，还要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政府应该向社会道歉，向40年来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受到伤害的千千万万个家庭道歉，甚至要给他们一些补偿。如果做到了这一步，这些被报道出来的个案就有价值，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只是抓一两个替罪羊，给人免职算不得什么反思和纠偏，这对推动政府反思整个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价值。

不过，这个道歉会存在吗？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吧。

7.08中国人口危机预警（上）

今天我想说说二十年后中国人口状况的可怕图景。之所以想说这个话题，起因是昨天看到的安徽芜湖统计局发的一篇文章《回应关切：芜湖市人口生育情况分析》，其中讲到了芜湖市令人堪忧的人口状况。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发了不到一天，又给删了。不过，该文已经在网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文章里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芜湖市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1。

什么叫“总和生育率”，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育龄妇女（15-49岁女性人口）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人口学界一般认为，要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即每一代人口规模持平），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而生育率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且很难恢复。

芜湖市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芜湖市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到了1.11，低于同期中国平均水平（1.3），以国际通行标准看，芜湖毫无

疑问已跌入“低生育陷阱”，如果不干预的话，芜湖的人口每隔一代就要减少一半。而从芜湖看中国，其实全国1.3的总和生育率这个数据也不稳定，其实每年都在降。根据过去几年人口普查的数字，从2017年开始到2021年，新生儿出生数字在大幅降低，2017年是一千七百万左右新生儿，但是到去年，2021年就已经跌到了一千万，四年时间人口出生数量下跌了40%，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除战争、瘟疫等非正常时期人口下降趋势中最陡峭的一个曲线。

众所周知，现在东亚国家生育率普遍低，日本生育率1.3，韩国更低，0.8左右，中国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是1.3，但很多学者在怀疑实际数据比这个还低，因为统计口径的不一样往往会影响真实水平。比如，芜湖的生育率1.11，这不是户籍人口作为统计口径的，而是根据常住人口算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数据中还包括了流动到芜湖打工的育龄妇女，假设没有这个数据增补，那生育率还更低。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全国已经有十个地区人口数据在负增长，全国性的数据会如何，也是可以想象的。

如果只是读数据，也许很多人还不能想象这意味着什么，而且，这些数字造成的影响也不是当下很快就能看出，所以对人们而言，不是非常显性的警示，但就长远来看，这些数字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我想讲一讲二十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结构可能是什么图景。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日本有一个城市叫夕张，在日本的北海道，那里盛产蜜瓜，不过过去它的主要产业是煤矿，但随着煤矿枯竭，夕张这个资源型城市就逐渐变成了空城，现在，夕张整个城市已经破产，城市满目萧条，破旧的大楼没有人，街头店面关闭，商铺倒闭，成了一个无人光顾的地方。虽然夕张的案例相对极端，但在日本，小城市出生率下降，人口急剧减少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你若去这些小城市，会发现那里留守的基本只有老年人，年轻人极少。去年我去日本一个旅游景点叫合掌村，那个村子被评为联合国物质文化遗产，我在那里跟当地人聊天，老人们说，村子里一共就六七十人，其中五六十个是老年人，年轻人没几个，学校里头一共只有四名学生在上课，

你可以想象吗？但不要惊讶，再过二十年，中国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图景。

其实中国现在也有这样的城市。几年前我在甘肃玉门采访，看到玉门作为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房价跌到两万块钱人民币一套，最低的还有四千块人民币一套，一栋栋的住宅楼全都是“鬼屋”。人都去哪里了呢？四散了，因为昔日的主要产业油田做不下去了，人们为了谋生只能搬走，这和夕张非常相似。

有人说，人口少了资源多了，这不挺好？这是计划生育时代说服人们的说辞，实际上，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口不是仅有消费这一项，人口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们本身是社会重要资源，人要消费，所以拉动了生产，而人本身也是劳动力，是生产力的重要的组合元素，所以当人口急剧减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就很难维持在一个正增长曲线上。

那么，中国的人口如果一直下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一，劳动力急剧减少。从2014年开始，大家就开始讨论“刘易斯拐点”是不是来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讨论，成为一个肉眼可见的现象。而我们都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人口红利，这批人口红利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的人口高峰带来的，那一代婴儿潮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正是劳动力壮年，而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交流使得早年的产业结构发生转移，日本、台湾等地的劳动密集产业不少都转移到中国来，形成了经济发展的爆发期。中国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加上改革开放的措施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而现在，随着劳动力减少，工厂招不到工人，用工荒达到了我们以往难以想象的程度，世界工厂还能做得下去吗？现在已经有明显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从中国向印度、越南这些国家转移了，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丧失，用工成本越来越高。而作为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制造业如果成本越来越高，生存难度越来越大，那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肯定会大受影响。

另外，劳动力减少也必然让服务业的就业人员越来越紧俏。中国的服务业从业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村出来打工的溢出型劳动力，他们

奔走在快递、外卖、餐饮、保姆等等服务业上，使得我们获得性价比很高的人工服务，然而，这个好日子不会太久了。大家都知道，保姆价格越来越高了，再过十五年，中产阶级肯定雇不起保姆了，他们的服务价格会逼近甚至超过一个白领的劳务价格。所以，当劳动力急剧减少的时候，服务类产业一方面没什么人干，另外一方面，人们会逐渐支付不起用人成本，就像今天的日本一样，家政服务价格昂贵到令人望而生畏。餐饮行业也一样，眼下中国的餐饮、外卖便宜都是因为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除了薪水支付得少，雇主也基本不给他们保险等福利，农村劳动力眼下还不算缺，你如果嫌钱少福利不好不干，还有别的一群人等着，所以雇主不愁，但再过二十年，可就没有这等好事了。当下送外卖做餐饮开网约车的壮劳力，到时候就都将近或者已经退休，那时候的壮年劳动力就是眼下一代比一代少的新生儿，当他们成年后工作分流，哪里还会有大数据地图上蝼蚁一般多而密集的劳动力去做外卖小哥？你看看日本外卖什么价格？很多时候，外卖在物流上的费用比便当本身要贵。而缺人手的不少发达国家都如此，你休想花点小钱买来各种人工服务。

人口下跌的第二个恶劣后果，是资产价格会大幅下跌。过去四十年，几乎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在上涨，最明显的是房地产。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富的60%-70%是由房产构成的，所以房地产的资产价格关乎每一个人的财富状况，为什么房价涨幅这么大？因为经济在增长，人口在增加，需求在增进，还有城市化的因素让农村人口到城市后购买住房，或改善居住空间。但恐怕，拐点很快就要来了，人口急剧减少必然会使得房子的刚性需求大幅减少，最后存量房越来越多，资产价格一定会下跌。

根据日本的经验，人口急剧减少之后除了东京、大阪这些少数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的资产价格都会大幅贬值，甚至贬值到零。很多人可能不相信，离东京50-100公里左右的地方，很多地方政府在出台政策，你只要搬过去住，政府就免费送地或者免费送房子，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人口，那里的资产价格就会为零。在那些地方，假设你投资房地产，不管东京的哪一家银行都只认东京、大阪这种城市才放房贷，小城市根本申请不了房贷，因为银行认为其他地方资产没有抵押价值，风险太大。日本泡沫经济时，很多东京中产阶级在海边购买

的度假屋基本就属于白送，五百万，甚至两百万日元一套就卖。有个滑雪场，附近房子七万日元一套就卖，差不多就是白送了，为什么？资产价格归零了，不卖的话屋主还要支付持有成本，每年要交固定资产税，还要维护房子，所以不如白送出去。

这个场景会不会出现在中国？大有可能。除了中国的北上广深这些超大城市，一般的小城市资产价格很快会大幅下跌，所以现在还要投资房地产的人要三思了，因为中国房地产的结构性机会已经过去了。

人口骤降危机的第三个恶果是社保可能会崩溃。我先普及一个概念，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叫“现付现支制”，我们每个人虽然有一个社保账户，你看得见的是数字，但提取不了，社保账户里实际上是“空账”，那我们缴纳的社保去哪儿了？是被征服支付给了这一代已经退休的人。假如你父母现在已经退休，他们领取的退休金就是社保账户里从数字变成现金的钱。以前，中国的养老金都是国家统一从账户里拨付的，但养老金制度改革，变成社保账户支付后，政府没有能力为每个人的社保账户补交齐社保资金，于是就采用了“现付现支制”，东墙

补西墙。当然，这种“现付现支制”也不是中国独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用这种制度，因为它可以让政府在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时候节约一大笔钱，但同时，它也带来一个问题是，一旦人口结构产生大幅波动，年轻人少，老年人多，那抚养比就失衡了，社保账户的收支就出现亏空，很有可能会破产。现在年轻人多，我们的人口红利还可以吃一阵子，让工作人口养退休人口，毕竟眼下养老金人口是小头，但是再过二十年，这个结构就会颠倒，干活的人少，等着拿退休金的人多，这就必然造成社会问题。时间越久，情况越严峻，极端情况下，一个人工作缴纳的社保可能必须得养4到5个退休老人，那么“现付现支”就会面临东墙不够补西墙的情况，要么国家财政补窟窿，可如果补不起来，社保账户就会崩溃。

当然，中国政府有一个政策，就是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划拨一部分到这里，这样能不能填补得上社保窟窿？不知道。因为社保账号的计算模型在人口大幅下跌的情况下，结构变化超出想象，所以很难预估各类参数的变化，但简单逻辑推理而言，人口结构就这样变下去，社保账户的崩溃就是一个迟早的结果。

人口持续下降的第四个恶果，是影响社会稳定。再拿日本来做例子，日本的日本总和生育率现在是1.3，算是危机四伏了，好在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目前社会还稳定的，人们到这个国家只是都会惊叹，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努力工作的比比皆是。而中国会怎样呢？中国“银发族”要面对的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还无法和发达国家媲美的情况，未富先老，年轻人要面对经济大萧条、资产价格下跌的情况，银行坏账率上升，金融系统可能发生挤兑，一个恶果造成另一个恶果，社会矛盾就会复杂而尖锐，整个社会没有多少人感受到安宁快乐和上升感，反而是挫败感、无力感、恐慌感占了上风，这跟改革开放后日子越过越好的那代人的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大环境一旦变差，会带来很重要的两个问题：人们不接受政府降低福利，而政府如果要满足这些福利类的刚性支出，也举步维艰。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冲突。

上世纪90年代到世纪之交，中国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群体性事件特别多，因为城市里工人下岗，农村里推行计划生育、三提五统，经济矛盾最后都变成了社会矛盾，为什么到了2000年之后逐渐转好？

是因为农村取消了三提五统，还给农民补贴了，计划生育问题慢慢也都不太尖锐了，城市下岗潮过去之后经济增长了，大家收入也开始增长，中国社会的矛盾才变得没那么尖锐了，假设20年后经济进入萧条期，你想，社会矛盾会不会空前尖锐？

所以，不要小看人口危机，不要觉得，我此刻在危言耸听。

7.10中国人口危机预警（下）

中国的人口数量要跌到什么程度才是谷底，现在还难以预料，我估计，现在顶多是半山腰。因为新生儿数量从2017年的1,700万跌到2021年1,000万，而中国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新生儿的出生率肯定还没见底，假设有一天，中国的新生儿出生率跌到5、6百万，那中国的总和出生率将会是全球最低，低于现在的韩国水平。中国人口状况造成的可怕后果虽然我做了一些预测，那事实上，我怀疑最终的结果可能仍超出我们的认知。未来究竟会怎样？

人口专家易富贤写过一本书叫《大国空巢》，在书中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反思，也对未来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几年前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很多人都预测中国经济会超过美国，但他说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错误的人口政策导致劳动力急剧减少，消费也没有力量拉动。这个状况的恶果已经显现，而中美之间角力的预测到底会不会变成现实，还需要大家观察。

过去我也认为，如果不出太大问题，中国经济再过10年是会超过美国的，现在，当我看到中国的人口趋势，那么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出现拐点，往下走的可能性也就大幅提高了。

回头看，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人口数量大幅下降？

毫无疑问，大家都会想到这是计划生育的后果。

40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很有效，一方面控制了人口出生数量，把总和生育率在2000年就压到1.2了，那个时候很多人想生而政策不让生，给你结扎，给你引产，罚你的款，牵你的牛，扒你的房。说实在的，计划生育部门可以算是中国最勤奋、高效的一个部门，40年的努力，他们不仅把人口总量控制住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如今，日本的生育意愿平均是2.4-2.6之间，但是实际的总和生育率是1.3，评估一下，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大致有50%的差距，那现在中国的生育意愿比日本还低，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会怎样呢？生育意愿反映的是未来的人口出生数据，在中国很多家庭默认“只生一个好”的情况下，人口低谷的底线你能猜得到么？这就是计划生育

政策的次生灾害，它影响了中国的当下，也在影响中国的未来，要想改变生育意愿和思维习惯，很难。根据易富贤的研究，2000年总和生育率1.2可能还是计生部门而且计生部门谎报瞒报之后的结果，易富贤的研究表明中国自2000年之后真实出生率可能远远低于政府实际公布的数字，而真实数据一旦出现，就呈现了中国人口出生状况的断崖式下跌。

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有一个导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是城市化。大家也都在谈论，现在生孩子的成本太高了，因为这些年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快速城市化，房价也随之越来越高。大家都会算这个账：生一个孩子，一家三口两居室就行了，生5个孩子至少四居室，若是在北京这种一线城市，可能得多花500万到700万，这对工薪阶层来说，成本太高了。所以北京市总和生育率只有0.7就很自然，为什么？房价太贵。高房价是阻止人们生育意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全世界都如此。

育儿成本高的原因除了房价，还有养育的其他成本。几年前就有人算过。若在北京生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把他供到大学毕业，平

均每个孩子花费200万。当然，这里头有中国人的观念问题，孩子要参与拼，参与内卷，从小辅导班、兴趣班成本很高。这是东亚文化通病，中日韩都如此，所以，“只生一个好”其实意味着人们的成本承担能力只有一个孩子，

第三个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婚育意愿实际上也在下降。过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但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很多人首先对婚姻观念发生了改变，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结婚就不一定是人生必经之路了，人们放下了养儿防老的理念。日本有统计，50岁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没结过婚，所以日本生育率低主要是因为结婚率低导致的。他婚都不结，怎么生孩子呢？毕竟非婚养育的还是极少数。婚育意愿低现在在中国也显现无疑了，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城市里不愿意结婚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看到如此局面，这两年政府当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不过，依我看，中国要想改变人口状况其实挺难的。首先，生育意愿这件事情可不像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那么容易，你不让他们生，可以采取强制的

措施，强制流产、结扎，甚至引产，这些事情屡见不鲜，但是你要让他生，这能强制？你能说，你必须至少生两个？你总不能让计生干部摇身一变变成催生婆，去人家卧室里强迫人家受孕吧？政府再敢突破底线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政府能做什么？顶多是不让流产，不卖安全套，你还能做什么？人家根本不结婚，你管得着吗？你强迫得了吗？

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说一个女孩因为到了婚育年龄，居委会上她家去关心她个人问题，去谈心，在网上引哗然一片。回头看看你们曾经做过什么，现在在做什么吧！你们过去能抱走人家超生的亲骨肉送到社会上“调剂”，现在你们还能调剂成人？你能把不婚妇女“调剂”给孤寡男性？再下发生育指标？你做不到了吧？！

你要让育龄妇女生，只能做一件事情：给他们提供服务，从管制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服务”什么？上幼儿园不要钱，免费提供好的幼儿园，学校资源平等，不搞重点学校，提升公共服务，做得到吗？

政府似乎也在试图做些什么，但不彻底。的确挺难的，因为要做这些改革，就得革掉很多利益集团的收益，然而政府顶多把民营的新东方、学而思干掉，不让补课了，能改革掉家长的需求吗？中国教育的选拔机制能改革掉吗？不改根子，光是不让补课根本不是减负，不让他们明面补，他们就偷偷摸摸用其它的方式补课。

你要解放人们的思想压力，就得动真格的。可高房价你搞得下去吗？北京、上海如果房价降70%，可能吗？银行就会破产了。牵一发而动全身。

说到底，政府就算服务再彻底，生育意愿能不能提高也是个问题。日本其实对婚育妇女已经非常好了，日本的保育园制度是对育龄妇女养育孩子最好的一项福利，假设母亲有工作，孩子出生一个月就可以送到政府办的保育园去，根据孩子父母的收入情况，象征性收钱，甚至不要钱。孩子在保育园里每天可以待10个小时，早上8点钟送过去，晚上6点钟接回来，在里面吃、玩，都不要钱，这措施很好了吧？但是日本的生育率就是1.3，提高不了。

相对照看，中国现在上幼儿园多少钱？在北京，一个普通的民办幼儿园一个月五千到一万很正常，公立幼儿园是有，很多人的孩子进不去。如果政府咬咬牙，给老百姓育儿假，延长产假，那妇女也未见得生。女性的独立性已经增强，她们不会愿意做生育工具，生或者不生都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评估和喜好，这是正常现象。东亚国家的低生育率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存在，现在香港只有0.8，台湾每年的新生儿出生数量也已经进入了负增长，这跟东亚文化崇尚把大量资源投注在孩子身上是息息相关的。在全球范围内，举全家之力供养孩子去做所谓“人上人”，拼尽全力要让孩子挤入精英阶层的观念在东亚长盛不衰，再加上重男轻女等等腐朽观念的遗存，即便是政策上给年轻夫妇再多支持，对很多人来说，育儿仍然是艰苦卓绝的事情，很多人还是认为无力去承担。

政府不可能很快解决人口困境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压根还没敢直视和正面承认计划生育政策的失误。像芜湖统计局的数据报告，只是客观提出预警，但文章一被热议，马上就自行删除了，不敢谈，不敢彻底暴露真相，这是政府发布很多鼓励生育政策还遮遮掩掩的原

因，也许，目前他们仍然觉得面子比其他一切都重要，要维持伟大光荣正确，就不想说，眼下的人口结果已经警钟长鸣。

看看甘肃玉门，还有黑龙江鹤岗，2万一套的房子无人问津，整个城市几斤失血，这难道不是已经到了紧急关头了吗？如果政府连直面问题的勇气都没有，怎么可能去解决问题？

有人说，国民不生，那考虑移民呢？可惜中国不是个移民国家，这条路恐怕是走不通。美国总和生育率目前也只有1.65，但它是个移民国家，每年可以批准其他国家的人到美国去，年轻人为主，最好可以通过资产、学历、语言能力、获奖履历等等证明自己是人才，那他们就会欢迎，如此，美国获得了青壮年高等劳动力，通过移民补充劳动力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中国不是，其实日本、韩国也都不是，所以他们的生育率大幅下跌影响就非常大，劳动力不断枯竭也必然造成东亚国家重大的社会问题。

20年之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我昨天已经表达过预想，首先经济很可能陷入长期萧条期，跟日本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破灭，三四十年

在低位徘徊的状态一样。其次，可能会造成社会矛盾的剧烈冲突。因为很多国人还不敢想象也不能接受经济形势开倒车，由奢入俭难的时候，人们对于政策的容错率可能就不会很高。不像过去，大家日子越来越好的时候可以容忍领导层决策失误，到黑暗年代，人们的神经可能随时会像骆驼遇见最后一根稻草，每一项损失都会让他们对政府失望甚至有更严重的情绪。

所以以前大手笔建机场航站楼，建高铁，就算一时之间不赚钱，甚至大笔亏钱，群众也愿意正向理解这是政府在做长线投资；而经济下行，政府在没钱的时候哪怕做正确的决策，也会被大量人怀疑他们的决策可能错，因为纳税人的钱包里都已经亏空，政府每一个动作，群众都想监督你是不是真正用到实处，你的规划是不是正确。出产需求的人少了，中国的基础建设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现有的都会过剩，而投资拉动、劳动力产业、外向型经济的形势都在暗淡，那时，你想，人民还有幸福感、获得感吗？还会提大国复兴吗？

如果有人认为我说的“盛世危言”太夸张，不要着急，一路走着，我们甚至不用看20年，就看三五年，看看新生儿出生数量是不是在逐

步走低，看看市场是不是长盛不衰。

中国人有句老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愿我所说的一切，都不会成真吧。

7.15连花清瘟胶囊的习惯性流产

几天前，一个海外朋友拜托我了解一件事，说是大使馆给他们发的防疫物资中有连花清瘟胶囊，他想知道连花清瘟是不是在海外各国已经能作为合法药品销售了，因为传说连花清瘟不但在国内被作为治疗新冠适应症的有效药物，还去美国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临床实验了，说是要冲击美国市场。

我觉得这事确实值得调查，于是就查了一下，不错，连花清瘟胶囊果然去美国申请FDA了，要说这可真算得上是个大新闻，但这新闻竟然已经不算新。我们查了下，2015年国家商务部就在宣传了，只是当时没什么人注意到，当时实验项目名为“二期的流感药代动力学试验”（轻症），试验开始时间：2016年9月，结束于2020年7月31日，做了四年，不知为何，没有披露结果；在2020年7月，以岭药业再次向FDA发起申请，题目是“轻度新冠症状患者辅助治疗疗效随机试验”，不知为何，实验没有做。今年，2022年1月19日，连花清瘟胶囊的临床

安全性试验申请再次提交，又过半年了，不知道申请进程如何……看来此事殊为不易。

大家都知道，美国FDA是国际公认的药品审批与监管的权威，任何药物想要在美国上市，都得向FDA申请，而FDA平均一年才批复10款左右药物，所以如果莲花清瘟能获得FDA的批准，那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咱们国家的中药从此就能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了，这个关口可太重要了。

而对以岭药业来说，如果莲花清瘟胶囊真的冲击美国市场成功，那收益太大了。因为凡是获得FDA注册的药物，药价由着药企定，想定多少钱就多少钱。莲花清瘟胶囊在国内定价十几块钱一盒，如能被FDA注册，即被证明安全有效，那在美国上市的价格可以让以岭药业随意开，你定一万美金一盒也不违规。现在美国疫情肆虐，他们全民免疫，每天也的确死不少人，莲花清瘟要是在美国上市，治疗效果好，降低死亡率，那绝对是为中国的中医药事业大增光彩，比孔子学院更高效地发扬中华文化，而且能赚美国人的大钱。美国FDA的批准就是全球最权威证明，比多少院士为它摇旗呐喊都有用，有了这个资

质背书，以后不止可以在美国卖，那绝对可以在疫情期风靡全球，让以岭药业赚翻。

都说美国FDA的新药上市审批是世界上最严格，最规范的，一般性药企通常需要花费5亿美元，用12-15年才能让一款新药走向市场，到底是怎样的程序呢？一般来说，分七步：首先是临床前试验，通过实验室和动物试验，证明药物针对特定目标疾病具有生物活性，并且要评估该药的安全性。比如治疗肿瘤的药物就需要在有肿瘤的小白鼠或猴子或其他什么动物身上试用新药，看有效性，如果有效，就进入到第二个环节：向FDA提交新药临床研究申请，以便可以将该化合物应用于人体试验。

新药临床研究申请需要药企提供先前试验的材料，并把他们的临床方案提报给机构审评委员会（IRB）进行审查，且这种资料被要求每年向FDA和IRB汇报一次试验进程和结果。这些工作，不知道连花清瘟胶囊做得怎样了。

第三、四、五步，分别是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这些阶段的临床试验一般需要征集志愿者进行试验研究，目的是提供该药物的安全性资料。而志愿者的人数，从一期的20—100名，扩大到二期的100—500名相关病人，三期更需要扩大到1000—5000名临床和住院病人。三期最难，试验必须在多个医学中心进行，通过医生的严格监控佐证药物的有效性，并获知副作用情况以及与其他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多中心，安慰剂（或/和有效对照剂）对照和双盲法试验，是整个临床试验中最主要的一步。

到第六步才是用前面试验资料和数据向FDA提交新药申请，通常来说，一份新药申请材料可多达十万页甚至更多，FDA本应该6个月内审评完，但因为申请材料实在太多，因此据说大部分药物半年之内是得不到审批的。

完成了前面六步，在全部过关情况下，这个药才抵达申报的终点：被FDA批准，正式上市销售。即便如此，药物研发单位还必须定期向FDA呈交有关资料，部分副作用受到关注的药物还会被FDA要求做第四期临床试验。

令很多药品研发单位头痛的是，有的新药在申报三期临床试验过程中，FDA还要求额外增加“头对头试验”的补充报告。“头对头试验”是让新药与临床上日常在使用的治疗药物或治疗方法作对照，是两种或者更多种药物在有效性和安全性上的直接PK，这对新药的要求非常高，且耗时长、花费大，对药企来说，挑战非常大，因为一旦不成功，可能就成仁。

如果连花清瘟能通过FDA这么严格的程序上市，我想，大家的确实不要再争论连花清瘟的有效性，还要一起为我们这“民族之光”敲锣打鼓广而告之呢。

初看到连花清瘟胶囊提交申请，我还真觉得，吴院士了不起，对自己的产品绝对是信心十足才会去冲这个难关啊。但，前面我们说过了，三次申请，只有2016年开始的试验持续了四年，但是，结果在哪儿啊？没公布，没消息了。2020年4月，当连花清瘟在中国获得了药品批示三个月后，他们第二次关于新冠轻症辅助治疗的临床试验为什么没消息呢？8月份为什么主动撤销了申请呢？理由在FDA官方网站上写着：找不到首席实验员。

首席实验员有那么难找吗？为了连花清瘟胶囊的出征，这得是多大一件事情啊，怎么就这么一个轻飘飘理由就搁置了？美国、中国有很多CRO（药物研发外包服务）公司，你花钱雇一家嘛，我就不明白了，以岭药业有这么强烈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心，竟然为了找不到首席实验员放弃实验？实在可惜。那后来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半年没什么进展，陈述的状态是：人员招募中。这叫什么事呢？一期临床要求的志愿者不到百人，要在美国上百万新冠患者中找100人，那是难事儿？难道是连花清瘟胶囊臭名昭著，不管药企用什么方法都重赏之下也无勇夫？不会吧。

这个蹊跷的现状以岭药业没解释，但FDA网站不给人遮丑，所有状态就这样公开着，连花清瘟胶囊作为中国第一个冲刺FDA的中药，似乎在摆烂。

按说，以以岭药业的实力和吴院士的口碑，公式的实验停下来的原因其实根本不是个事。中医药文明如此重要，如果连花清瘟胶囊真的功效过得硬，能为天下苍生造福，挽救无数生命，那就是举全国之

力来协助我们这一款中成药，大家都支持，何至于找不到志愿者和首席实验员？

而唯一正常进行过试验的关于轻症流感的治疗功效，在4年391个志愿者的参与下，应该也有点数据支持了，为什么结果到现在还没公布？以岭药业的说法是，结果还在统计中。怎么说呢，这工作效率，比以岭药业要申报FDA的行为还令人吃惊。

不过，我想这种无疾而终也是一种试验结果，试出了连花清瘟在美国获批的可能性，是0。

所谓对新冠肺炎的治疗有效的论文，据说是以岭药业和大名鼎鼎的钟南山院士合作的，我虽然不是医疗专家、药学专家，但为了学习，还是认真研读了论文，也看了很多科学家对这篇论文的评价。简要说来，大部分专家指出，论文中一个严重的缺陷是，连花清瘟胶囊的功效是在跟美国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Gilead公司的抗病毒药物）对照中呈现的，而瑞德西韦是美国第一个获批上市的新冠治疗药物，被国内很多专家批评为疗效不行，结果连花清瘟胶囊在体外实验

过程中跟瑞德西韦一比，药效只有瑞德西韦的1/125，临床上疗效大约只相当于后者的千分之一。

另外，就实验本身来说，还有一项严重的缺陷是，实验中连花清瘟胶囊是被稀释在一种有机溶剂里观察药物功效的，而有机溶剂本身对病毒对细胞也有抑制作用，本来，以严格的实验要求来操作的话，至少要设一个对照组，看看同浓度的有机溶剂里如果没有连花清瘟疗效如何，说不定，也有1/125瑞德西韦的疗效呢。可事实上，没有这个对照组。

在体内实验环节，也就是内服的时候，药效要参考体外药物奏效的要求来，剂量要加倍，以此来消解体内胃液等物质的干扰度，但如果真按照连花清瘟胶囊体外实验有效性的数据，病人内服剂量要实现有效性得吃160克一天，160克，相当于400粒连花清瘟胶囊，如此，药才“有可能”有效。

国内连花清瘟胶囊说明书上的服用剂量：一次4粒。那就是说，只服用了有效剂量的1%。

就这样一篇论文，让莲花清瘟在中国获批上市，不免让人想到，大概是钟南山院士和吴以岭院士两个名字的功劳，当然，再加上目前中药头顶的万丈光芒。

可你想在美国也复制这样的一套数据和逻辑吗？看看FDA在2020年给莲花清瘟胶囊和双黄连等在美国的五家代理商发的警告信吧，没有经过FDA认证的药物，在他们看来，所有的药物说明都是虚假宣传，涉嫌欺诈。

难道三次受挫，和这些警告难道还不足以让莲花清瘟胶囊清楚自己压根没有指望通过FDA审批吗？0.00001%的可能性都没有啊。我想，以岭药业应该是心中有底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背后，可能是商业宣传的动机，是挂起羊头准备卖狗肉的野心，是时不我待的贪婪。

2020年4月，莲花清瘟获得国内批准之后不久，一个叫香港中大国际的网站因专卖莲花清瘟被美国FDA发现并警告，因为电商销售终端包括了美国。之后，通过香港中大国际就只能搜得到FDA的警告函

了，再通过域名要找它，会自动跳转到另外一个含有“lianhua”的网站上，那里仍然供奉着钟南山院士的照片和连花清瘟的广告，并宣称自己是专门销售中国草药的企业，事实上，销售内容又只有连花清瘟胶囊。

是谁在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不知道，如果没有FDA这样的机构，也许这种见不得光的企业会无孔不入地出现在全球各种角落，而以岭药业如何会把连花清瘟授权给境外网站去销售的，抑或是被蒙蔽了？这又是一个悬疑。

但连花清瘟到美国FDA去申请注册这个举动，能给所有销售渠道一个巨大的广告噱头：喏，我们有过得硬的技术，敢去冲刺FDA。FDA审批过程长，所以这段时间里，趁着疫情肆虐，大家先浑水摸鱼吧，至于能不能获批，这根本不重要。为了赶上疫情这波潮水，先把鱼饵扔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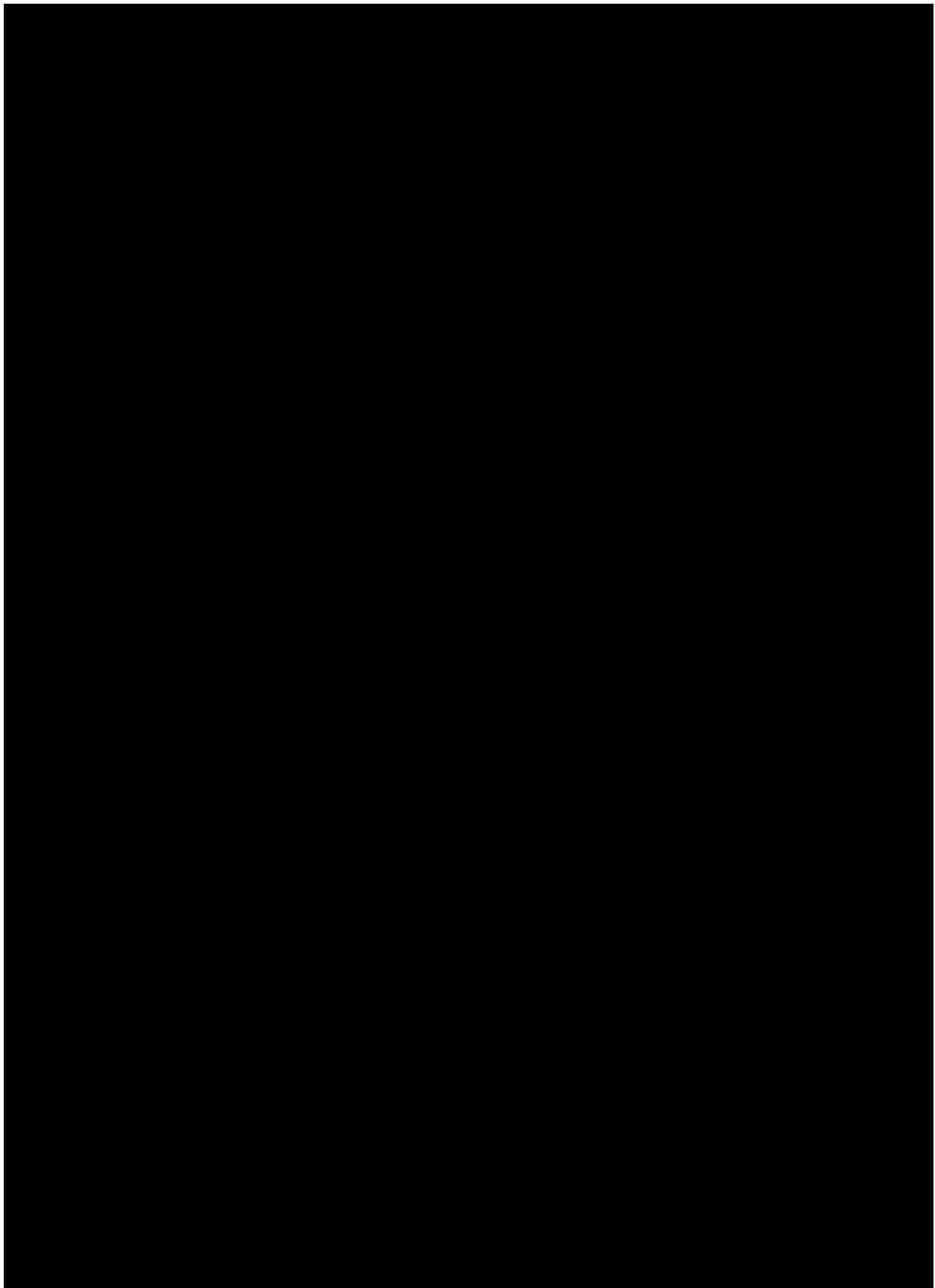
在FDA的申请中，我们看到了连花清瘟的实力。



王志安

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zlibrary

Your gateway to knowledge and culture.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z-library.se

singlelogin.re

go-to-zlibrary.se

single-login.ru



[Official Telegram channel](#)



[Z-Access](#)



<https://wikipedia.org/wiki/Z-Library>